俄罗斯前代总理剖析苏联解体深层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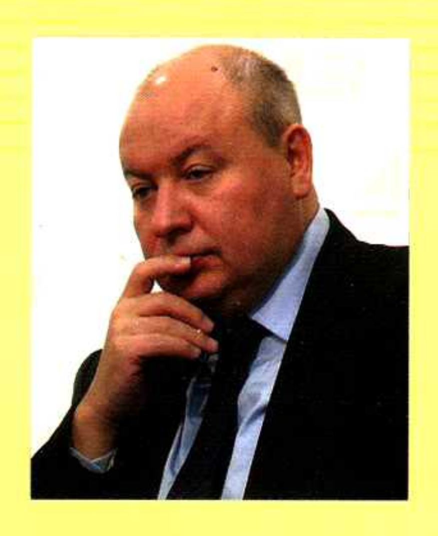
帝国的消亡

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Гибелъ Империи　Уроки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俄〕E.T.盖达尔／著

（E.T. Гайда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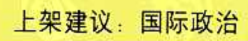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作者从介绍世界历史上各帝国衰落的过程开始，从呈现上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状况入手，抽丝剥茧似地分析了苏联由食品短缺、物价飙升、货币危机、金融失信、石油价格下跌、政策失当而引起的经济恶化，如何一步步地演变为危机、演变为灾难、演变为破产，最后演变为政治失控，导致了苏联的消亡，使人们了解到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在骤然间迅猛地分崩离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和必然的结果。本书对我们全面正确解读苏联解体这一命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Гибелъ Империи Уроки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E.T.盖达尔　经济学博士、教授。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政府代总理；1993～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政府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94～2001年任“俄罗斯民主选择”党主席；1999～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时为“正义力量联盟”党的共同主席之一，同时担任预算及税收委员会委员。现任俄罗斯转型经济研究所所长。

盖达尔先生在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及出版的著作有上百部之多，其中包括：《经济改革与等级结构》(1990)；《国家与演变》(1996)；《经济增长中的反常现象》(1997)；《失败和胜利的岁月》(1998)；《漫长的时间—— 俄罗斯在世界上：经济史随笔》(2005) 等等。





ISBN 978-7-5097-0136-2/D · 0052

www.ssap.com.cn

定价：39.00元

帝国的消亡

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Гибель Империи Уроки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俄〕E.T.盖达尔/著
(E.T. Гайдар)
王尊贤/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俄〕盖达尔著；王尊贤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
ISBN 978-7-5097-0136-2

Ⅰ．帝…　Ⅱ．①盖…②王…　Ⅲ．政治-研究-俄罗斯
Ⅳ．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7947 号

帝国的消亡
——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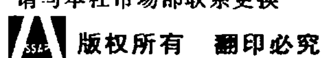
著　　者／〔俄〕E.T. 盖达尔
译　　者／王尊贤

出 版 人／谢寿光
总 编 辑／邹东涛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100005
网　　址／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010）65269967
责任部门／编译中心（010）85117871
电子信箱／bianyibu@ssap.cn
项目经理／许春山
责任编辑／张苏琴
责任校对／徐沅潮
责任印制／盖永东

总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市场部（010）65285539
排　　版／北京步步赢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20.5
字　　数／323 千字
版　　次／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0136-2/D·0052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8-2318 号
定　　价／39.00 元



目　录

引　言

我们无力承担一个帝国！——而且也没有必要，我们应该将其抛弃，因为它使我们不堪重负、民穷财尽、加速毁灭。

——亚·索尔仁尼琴[①]：《我们应当如何构建俄罗斯》

如果降生在帝国，那最好住到僻静的海边省份去。

——伊·布罗茨基[②]

当今渗透俄罗斯人意识的后帝国怀旧情绪，在国内并非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早已发生过，而且非止一次。苏联也并非20世纪解体的首个帝国，却是最后一个。20世纪初号称帝国的国家，至世纪末已无一幸存。就一系列关键性特征而言，我国并不同于拥有海外领土的传统的殖民帝国。有关它是否算作帝国的争论仍将长期持续。还会出现许多著作来证实俄罗斯帝国的特性，并表明无论在沙皇时代抑或共产主义制度下，在与国内其他各民族的关系上俄罗斯族都是最主要的贡献者。会有人列举非俄罗斯族的俄国活动家的例子——从巴格拉季昂公爵[③]直至约瑟夫·朱加什维利[④]。可能正是这一与众不同之处，使得俄罗斯帝国较之先前数十年间解体的其他帝国维系了更长的时间。

不过，沙皇时期的精英们都视自己的国家为帝国，而且也这样称呼它。苏维埃帝国的领导人从不这样讲，却在苏联的名义下将其远远扩张到

---

①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苏联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本书脚注，除特别注明外，均为作者所加。）

② 伊萨克·布罗茨基（1883～1939），苏联作家。——译者注

③ 彼得·伊万诺维奇·巴格拉季昂（1765～1812），俄国公爵，帝俄步兵上将。——译者注

④ 斯大林本来的姓名。——译者注

本国的正式疆界之外。[1] 如今拥护恢复帝国的人所关注的，正是自沙皇俄国经苏维埃历史以迄于今的这一遗产。

在当今的俄罗斯，倾诉后帝国怀旧之情的事例数不胜数。这里仅举其中数例。亲近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技术专家 C. 别尔科夫斯基宣称："2004～2008年应当奠定俄罗斯民族的基础。我们的民族有着共同的命运——帝国的命运。"[2] 作家 A. 普罗哈诺夫认为："这就是当年的各大帝国超越各大共和国的原因。这些帝国都怀着善于聆听和体现上帝旨意的人类大同的意图。这正是当今自由主义的、令人深恶痛绝的俄罗斯较之有缺陷的伟大苏联更为糟糕的原因，苏联曾是一个帝国，我们却不明智地遗弃了它。"[3] 地缘政治专家 A. 杜金则说："苏维埃国家被人民看作建设'新帝国'、'世界王朝'、'精神栖息所'的工程，而并非要建立最为合理的行政管理和对大量个体进行掌控的机构。"[4]

苏联的垮台被视作20世纪最后一个世界性帝国的消亡，与此相关的种种看法在描述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广为传播。[5] 俄罗斯总统弗·普京在致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2005 年）中将苏联的覆亡称为本世纪最重大的地缘政

---

① 在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所进行的谈判中，列·勃列日涅夫指责被捕的捷共第一书记亚·杜布切克，称后者未能向莫斯科呈送自己历次政治报告的草案，这清清楚楚地表明了苏联领导层对待其东欧卫星国的态度。根据捷克当局的情报，大约 30% 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人员在为克格勃工作。见 K. 戴维沙：《克里姆林宫与布拉格之春》，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伯克利、洛杉矶、伦敦版，1984，第 6 页、53 页。

② 《共青团真理报》，2004 年 1 月 19 日。

③ A. 普罗哈诺夫：《赫克索根先生》，阿德马迪嫩出版社莫斯科版，2002，第 426 页。

④ A. 杜金：《地缘政治学原理》，阿尔克中心莫斯科版，2000，第 195 页。

⑤ 例如可参见 R. 斯特雷尔：《苏联为什么崩溃？对历史变迁的理解》，纽约、伦敦、缅因州等地夏普股份有限公司版，1998。权威的俄罗斯政治学家 И. 雅科文科写道："自伊凡雷帝［即伊凡四世（1530～1584），"全罗斯"大公，俄国首位沙皇。——译者注］时代开始，莫斯科王朝即作为一个帝国而存在。起初帝国思想鼓舞着一心建设'强国'的莫斯科维亚（15～17 世纪外国人对俄罗斯国家的称呼。——译者注）的精英们。随后的四个世纪期间，全俄社会缔造了一个帝国，生活于其中，享受帝国存世的种种福祉，也遭受其种种苦难。帝国意识深深扎根于社会，渗透到各种层次的文化之内，在民众心理中打下了烙印。帝国本身无所谓好坏。这只是适应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巨大版图政治一体化的一种特殊方式。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它在我国大地上已经寿终正寝。然而这样的认识只是一种干巴巴的分析判断。对于具有帝国存续期间所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的人们而言，帝国就是整个宇宙空间，就是生活方式、世界观体系和对世界的感知。正是这一空间局限着他们，使他们不知道、不承认其他空间。因循守旧的人倾向于将固守传统的东西视作永恒不变之物。何况国家意识形态一直对他们宣称苏联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从这样的观点看来，帝国的瓦解纯属偶然，是一种反常的时事潮流，是在（转下页注）

治灾难。[②]

帝国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但对它们的研究眼下却正时髦。历史上常常会这样。这与种族之间冲突的尖锐化及其在后帝国时期的蔓延有关。[③]记述各帝国灭亡的文献浩如烟海。我们只消回忆一番夏尔·孟德斯鸠[④]的《罗马盛衰原因论》或爱德华·吉姆[⑤]论述罗马帝国衰亡的六卷雄文便可明白：与帝国崩溃、后帝国综合征有关的种种话题已了无新意。17 世纪初一部表露出后帝国怀旧情绪迹象的伟大著作在西班牙面世，这便是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

在你之前许多人都患过同样的病症——这倒让人聊以自慰。这种情形在别人那里早已有之。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当今的现实而已。

彼得大帝接受全俄罗斯皇帝尊号之时，他只不过宣布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欧洲强国而已。伟大和帝国当时是同义词。如果考虑到现今帝国一词在政治论争中使用得何等频繁，便很难理解它为何并无一个切合当代语境的能普遍为人所接受的定义。达里[⑥]词典将帝国定义为统治者享有皇帝尊号、名分最高、掌握无限权力的国家。[⑦]按照奥热果夫词典的语法，帝国就是以皇帝为首脑的君主制国家。[⑧]科学院俄语词典为帝国下了两个定义：以皇帝为首脑的君主制国家或帝国主义殖民大国。[⑨]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定义都与当代俄罗斯所赋予“帝国”一词的含义很少有共同之处。在历史上，这个术语的内涵几经变化，成为一个优雅的字眼。我想对这一概念下一个

（接上页注⑤）‘我们的’社会内部觅得支持力量的敌对势力施展阴谋的结果。”见 И. 雅科文科：《乌克兰与俄罗斯：相关性话题》，载于《欧洲公报》第 16 卷，2003，第 64 页。

② 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普京致俄罗斯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2005 年 4 月 25 日。

③ M. 冯·哈根：《描述俄罗斯作为帝国的历史：联邦制透视》，载于《喀山、莫斯科、圣彼得堡：俄罗斯帝国的多重面貌》，莫斯科版，1977，第 393 页。

④ 夏尔·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哲学家。——译者注

⑤ 爱德华·吉姆（1737～1794）美国历史学家，著有叙述 2 世纪末～1453 年罗马和拜占庭历史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译者注

⑥ 符·伊·达里（1801～1872）俄国作家、辞书编纂家、民族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译者注

⑦ 符·伊·达里：《现代大俄罗斯语详解辞典》第 2 卷，俄语出版社莫斯科版，1989，第 42 页。

⑧ 谢·伊·奥热果夫：《俄语词典》第 1 卷，1991，第 662 页。

⑨ 苏联科学院俄语研究所四卷本《俄语词典》，俄语出版社莫斯科版，1981，第 248 页。

接近于当今语境的自己的定义。在本著作中，“帝国”这一术语可以理解为：支配权集中于宗主国，而民主设置（如果有的话）抑或至少选举权未能普及到其掌控下的全部领土的强大的多民族国家类型。

在20世纪，两类帝国——跨海帝国[①]（英国、荷兰、葡萄牙等）和领土毗连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等）——所遇到的问题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后一类帝国中没有海洋将殖民地与宗主国分隔开来，宗主国与附属领土上占主要地位的民族共同体比邻而居，相互影响密切。

历史，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的经验显示，当帝国已经解体，大国情结和帝国心态交织，使得昔日宗主国的民族意识要适应强国地位的丧失成为一项并非容易的任务。利用后帝国综合征是获取政治支持的有效手段。帝国作为强大的君临其他民族之上的国家这一概念成为一种产品，有如可口可乐或纸尿布一般易于销售。为其做广告宣传并不需要绞尽脑汁。

发生后帝国综合征国家的问题在于，很容易激起对业已沦丧的帝国的怀旧之情，可将其复兴的号召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讲讲“复兴帝国是人民之幸”并不困难，这种口号肯定可以做到家喻户晓，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重建帝国已绝无可能。

独一无二的机会是：恢复到俄罗斯帝国1917～1921年期间那种共产主义的、几乎难以辨识的另类形式。这是一个例外，整个问题就在于另类形式。它们使得严谨的研究者对“恢复”一词也不得不打上引号。苏联是因为一场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兄弟相残、牺牲了数百万人的内战的结果才诞生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帝国复辟不可能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长期趋势所造成的环境而实现。

先前的宗主国对昔日属地所犯的许多错误的根源就存在于这种矛盾之中。英国和法国为了恢复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而决定入侵埃及（1956年），这酷似2004年俄罗斯当局试图在乌克兰所做的事情。

帝国的形成是社会生活中种种基本变化的产物。这些帝国在历史环境的影响下兴起和灭亡。恢复到那个时代的愿望只能是幻想。想要做到这点

---

① 准确地说是拥有海外领土的殖民帝国（如上所述），但这一术语已经根深蒂固，所以我们将在提请读者关注的本著作中加以使用。

的企图必定归于失败。2003～2004年俄罗斯在格鲁吉亚、阿扎里、阿布哈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遭到失败的经验，正是很久之前别的帝国所制造的“错误标本”的继续。然而，有后帝国意识的人们却难以接受这一事实。相信战胜我们的不是格鲁吉亚人或乌克兰人，而是隐藏于他们背后的“世界阴谋”，这要更为容易。如若在这一模式的范围内采取决定，便可能怪罪所有的人，继续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

对领土毗连帝国的怀旧感较之对跨海帝国的怀旧感更为强烈、持久和深刻。对于将近300万苏台德德国人而言（在奥匈帝国中他们是统治民族的代表），要适应在新的捷克国家内的少数民族地位并非易事。有关他们地位的花言巧语，是希特勒宣传部门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之前的主要话题之一。在领土毗连帝国（奥匈、德意志、俄罗斯、土耳其、苏联）瓦解的过程中，类似苏台德德国人所遇到的问题层出不穷。不认识到这一点，便很难理解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发生战争的起因以及波斯尼亚的悲剧。[①]

帝国的没落是一个经年累月的渐进过程，当各界精英和全社会都意识到冀图保全它已是无望和缺乏理智之时——宗主国社会对此比之骤然崩溃较易承受。[②]

德意志帝国的灭亡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18年秋季到来之前，德国当局一再要人民相信胜利已为期不远。因而当10～11月德国战争机器的毁灭变得显而易见，投降已无可避免之时，社会却对此并未做好准备。由此，关于“德国从未在战场上被战胜”、“敌人在背后捅刀子”的神话便轻易形成了。后一种说法或明或暗地在暗示社会党帝国的崩溃应归罪于欧洲的革命者和战争末期在德国组织罢工的、被莫斯科所收买的“叛徒们”。按照这种说法炮制者的看法，正是那些人迫使德皇退位[③]。这种论调在1920年代中期为德军前领导人所利用，这些人1918年9～10月间曾向政府当局报告，称战争已不可能继续，必须不惜以任何条件缔结和约。

许多德国人很快便忘记了在那场战争的最后年头他们曾多么憎恨帝

---

① 20世纪末南斯拉夫解体后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之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或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之间均发生战争。——译者注

② G. 阿诺德：《1945年以来的不列颠：选择、冲突和改变》，布兰德福出版社伦敦版，1989，第41～49页。

③ M. 布罗扎特：《希特勒与魏玛德国的瓦解》，冰山出版社纽约版，1987，第45页。

制，忘记了1918年10月德皇和最高统帅部欺骗人民的事实昭然若揭之时他们的种种感受。他们不了解，正是埃·鲁登道夫将军[1]在1918年要求德国新首相马尔克斯·巴登斯基亲王签订停火协定，以防止西线发生军事灾难。假如德国社会当时不相信旧制度已经破产，霍亨索伦王朝[2]的帝制便不会在1918年10月迅即瓦解。

类似的事情总是很快便从历史的记忆中消逝。社会不愿意回忆此类事情。有谁会对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感兴趣呢？遭受战败伤害的社会意识很容易被种种神话迷惑。希特勒声称，1918年8月的失败与此前德军所取得的历次胜利相比不过是一场儿戏，那并不是导致投降的原因。照他的说法，一些人在10年期间从事的消灭德意志民族赖以生存的政治、道德规范和力量的活动才是失败的原因之所在。[3]

不禁令人想起普希金的诗句："咳，蒙骗我很容易，我为受骗而高兴。"魏玛共和国历史的研究人员认为，共和国领袖们不愿意将德国领导层应当对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的材料公之于众，乃是导致共和国垮台的最重要因素之一。[4] 关于德国纯属无辜、不可战胜、被人叛卖、受到凌辱的神话，乃是共和国政府领导人提供给那些不相信民主价值之徒使用的武器。

看似不可动摇的帝国骤然间迅猛地分崩离析，令人对所发生之事产生不真实感。这种虚幻感类似于相信任何奇迹都能发生的非理性状态[5]。要想让社会相信一个如此突然瓦解的国家亦可同样迅速地复兴并不困难，可那是一种错觉，而且是危险的错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血流成河就是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苏联是一个领土毗连的帝国、世界超级大国之一。在它解体之前数

---

① 埃利希·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陆军上将，1916～1918年指挥全德国武装力量，1923年与希特勒一道在慕尼黑发动武装暴乱。——译者注

② 该王朝1415～1701年统治勃兰登堡，1701～1918年统治普鲁士王国，1871～1918年统治德意志帝国。——译者注

③ M. 布罗扎特：《希特勒与魏玛德国的瓦解》，第55、56页。

④ 这些材料直至1960年代才由德国历史学家Ф. 费舍尔加以发表。1920年代社会民主党政府曾拨出不菲的财政资金，用以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并无过错的论点。见S. 德尔默：《魏玛德国：民主的尝试》，麦克唐纳公司纽约版，1972，第52页。

⑤ 帝国迅猛而出人意料地分崩离析被当做意外的灾难，但灾难是可以克服的。见Б. 波德温采夫：《保守意识的后帝国适应性：有利的因素》，载于《城邦》2001年第3期总62期，第25～33页。

年，几乎谁也不可能相信会有1988～1991年所发生的那种事情。苏联崩溃之后，俄罗斯境外留下有2000余万俄罗斯人。他们是这些国家的居民，其中绝大多数国家的精英都未能温和而理智地妥善解决这些从前将所住国视为自己的祖国、如今却成了少数民族的人的问题。这加剧了宗主国的后帝国综合征，也成为当今俄罗斯的难题之一。[①]

这是一种病症。俄罗斯正在经历病症的危险阶段。不应当受数字魔力的影响，但德意志帝国灭亡与希特勒上台相隔约15年，而苏联溃灭距2006～2007年的俄罗斯也是同样多的年头，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И. 雅科文科指出："社会意识对帝国的解体从未进行反省，也未恰如其分地细加研究。在俄罗斯，未见有负责任的社会力量勇敢地宣称：就俄罗斯人民自保和重生的观点而言，苏联解体乃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成功。倒是发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它们已开始助长怀旧情绪并将其用于政治目的。此类花招的特别糟糕之处在于，那些具有政治能力的人在利用缅怀帝国的意念之时清楚地知道，任何形式的复辟都是不可能和灾难性的。"[②]

医学上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如果人的一条腿被截除，疼痛的感觉一直不会消失。后帝国意识也是如此。苏联消失了——这是现实。是现实，也是社会性的苦果：家庭被割裂、同胞在国外遭受折磨、有关昔日的辉煌、熟悉的祖国地理、已缩小和失去的熟识的轮廓等等怀旧性的记忆，全都引发着痛苦。从政治上利用这种痛苦易如反掌。只消发表若干动听的空话，中心意思是"我们被人从背后捅了刀子"，"全都怪那些掠夺我们财富的异族人"，"现在我们向他们夺回财产，就能过上好日子"——于是就大功告成。这些漂亮言词无须自己去冥思苦想，读一读专供纳粹宣传使用的教科书足矣，必定能稳操胜券。

这是政治上的核武器，它很少加以使用，使用之人的结局照例都很悲惨。这样的领袖人物总是将自己的国家引向灾难。很遗憾，潘多拉盒子近

---

① 关于民主制度稳定之后的帝国综合征所激发的激进民族主义具有危险性，见A. 格申克伦：《德国的面包与民主》，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洛杉矶版，1943。关于当今俄罗斯后帝国政治与专制倾向的关联也可参阅《后帝国综合征的克服》，载于2005年4月21日"自由使命"基金会"帝国之后"项目框架内的讨论会速记记录。

② И. 雅科文科：《乌克兰与俄罗斯：相关性话题》，载于《欧洲时报》第16卷，2005，第65、66页。

年来在俄罗斯已经打开。呼唤后帝国怀旧情绪、民族主义、排外、习惯性的反美思潮，甚至呼唤很不习惯的反欧思潮，业已成为一种时髦，说不定还会变作一项准则。明白这种情况对国家和世界何等危险至关重要。

后帝国怀旧情绪是一种可治之症。曾为帝国的沦丧而难过的法国的经验表明：需要数年强劲的经济增长，才足以让危及国家、几乎毁掉民主制度的歇斯底里发作，转变而为对失去的辉煌的温和而浪漫的怀想。不过为了在这数年中保全民主则需要进行斗争。历史上常常有个人作用特别巨大的时候。1960 年代初夏尔·戴高乐为防止激进民族主义者取得政权所作出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在 1920 ~ 1930 年代的德国，事态的发展则背道而驰。

爱·吉姆是对罗马帝国的覆亡有着透彻研究的专家之一，曾从长期历史回顾的着眼点出发分析所发生的事件，却不敢明确地判定其原因。当历史的距离较为短近之时，要做到这点就更为繁难。不过与苏维埃帝国溃灭和后帝国综合征有关的问题对当前的俄罗斯和全世界都太过重要，尽可留待未来数百年的历史学家们去进行研究。

现实生活使得我较之其他研究帝国衰亡的人有着某种优势。我曾是与帝国有关的一些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是记录20 世纪最后一个帝国苏联解体这一事实的别洛韦日协议[①]的起草人之一。本书并非回忆录，而是分析与帝国解体有关之事及其所产生之问题的一种尝试。

不应当夸大别洛韦日协议的意义。该协议从法律上确认了国家分裂的既成事实。无力控制自己的边境以及货币、税收和司法系统，不能抑制民族冲突的国家（1991 年 8 月事件[②]之后的苏联正是处于这一状况）是无法生存的。

南斯拉夫的经验表明，国家分裂的过程可能充满血腥。1991 年 12 月的别洛韦日协议并未能消除一个领土毗连帝国解体的阵痛，但有助于避免大规模的流血和一场核灾难。根据这些协议，绝大多数原先布设在其他各共和国领域内的危险的（这是由决定启用核武器的流程所造成的）战术核

---

① 1991 年 12 月 8 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乌克总统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在别洛韦日国家公园的密林中签署《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世称别洛韦日协议，宣告苏联在事实上解体。——译者注

② 指 1981 年 8 月苏联所发生的一次未遂政变。——译者注

武器，已于 1992 年 5 月之前集中到了俄罗斯。[①]

我再说一遍：对于帝国解体实际发生的情形以及宗主国当局势必遇到的各种问题，我比许多人了解得更为清楚。尽管如此，如若不是我看到当前俄罗斯政界利用后帝国综合征的做法在政治上何等危险，不了解那些利用我国国内后帝国怀旧情绪的人的浮夸言词已经与纳粹分子在魏玛德国最后年代的宣传标准引人注目地明显类似，我便不会着手这部著作。

人们常常将俄罗斯与魏玛共和国进行对比。我本人也属于那些 1990 年代初在俄罗斯政治辩论中进行这种类比的人之列。但并非所有的人都理解这些辩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很少有谁记得，德国在帝国垮台 8 年之后的 1926 年恢复了帝国的象征[②]，而俄罗斯恢复帝国象征则是在 9 年之后的 2000 年。没有多少人知道，纳粹分子最重要的经济口号正是许诺恢复 1922～1923 年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德国中产阶级所失去的存款。[③]

纳粹分子 1933 年取得政权时，其在经济方面的蛊惑宣传的作用不容低估。反犹太主义、激进民族主义和排他性一向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头领们的思维要素。不过在 1937 年之前他们只是小心翼翼地利用与这类情绪有关的口号[④]。利用失去存款的德国人的感情是一种效果卓著的政治武器。所以如今那些许诺恢复苏联财政灾难期间贬值的存款的人正是在逐字重复 1930 年代初戈培尔的花言巧语。

纳粹分子掌握政权之后却并未能恢复原有的存款。他们将国家引向战争和另一场货币灾难，后来只好由德国经济改革之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财政部长路·艾哈德为之负责，于 1948 年解除对价格的冻结。不过这已是后来的事情了。

在俄罗斯的条件下，出乎本书作者的预料，夹杂着激进民族主义的后

---

① 有关这些事件的相互联系将在第 8 章内详述。

② 1926 年 5 月，保罗·兴登堡总统［德国总统（1925～1934），德国元帅。1933 年 1 月授命希特勒组织政府，将政权交付法西斯分子。——译者注］发布命令规定，德国驻外外交代表机构上空必须同时飘扬共和国国旗和帝国国旗。

③ S. 德尔默：《魏玛德国：民主的尝试》。关于德国 1922～1923 年恶性通货膨胀对中产阶级瓦解的影响还可参阅 B. 魏斯博德：《资产阶级社会在战时德国的危机》及 R. 贝塞尔：《法西斯意大利与纳粹德国·比较与对照》，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第 30 页。

④ W. 布鲁斯泰因：《邪恶的逻辑：纳粹党的社会根源，1925～1933》，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版，1996。

帝国综合征的兴盛并未出现在紧接着苏联瓦解之后，而是在更晚一些的时候。我和我那些在俄罗斯启动改革的同事都明白：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适应自己在世界的新地位以及一批新的独立国家已经存在的事实，这个进程非同寻常。然而我们认为，克服转轨时的退缩、开始经济增长、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这些对自身福利讲求实际的关注会取代恢复帝国的无望幻想。但我们错了。

经验表明，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时，当不清楚养家糊口的钱是否足够用到下一次发工资、还能不能发工资、明天还会不会有工作的时候，大多数民众都顾不上考虑帝国的伟业。相反，当福利开始增长时，你会确信今年的工资一定会高于往年，如果不是生活在不景气的地区，失业便与你无关。日子已经改变，但重新具备了稳定的特点。回到家里可以坐下来与家人一道看看苏联电影，片中我们的侦察员都比别人的间谍高明，我们总能取得胜利，银幕上所描绘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也可以议论议论敌人如何推翻了一个伟大的强国，我们如何能再向所有的人证明谁才是主要角色。[①]

对帝国庄严象征的呼唤是一种操控政治进程的有力手段。俄罗斯官方宣传力图将伟大卫国战争说成是领袖胸有成竹，运筹帷幄而取得的一连串胜利，越这样说，有关斯大林镇压行为的记忆便会消逝得越快，便会忘记批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②]公约的斯大林本人在引发战争方面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斯大林肯定性的评价自 1998 ~ 2003 年已从 19% 增长至 53% 。“如果斯大林在世并被选举担任俄罗斯总统一职，你会投他的赞成票与否?” 对于这一问题，26% ~27% 的俄罗斯居民回答说：“是的，我会投赞成票。”[③] 我认为，要想明白我国后帝国综合征引发威胁的严重程度，单凭这样一个事实就已经足够了。

试图重新将俄罗斯变为帝国——这就意味着让俄罗斯的存在成为一个

---

① 俄罗斯社会相当大一部分人将俄罗斯联邦看作临时的过渡性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要么扩大，要么解体。只有 28.4% 被社会学者询问到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应当继续成为独立的国家，与谁都不进行合并。” 见 Ю. 索洛佐博夫：《后帝国时期的俄罗斯：我们会应用英国的后殖民经验吗?》

② 约阿西姆·里宾特洛甫（1893 ~ 1946），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之一。1938 ~ 1945 年任外交部长，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译者注

③ И. 古德科夫：《俄罗斯人关于战争的记忆和群众性的趋同》，载于《应急储备》2005 年第 40 ~ 41 期，第 46 ~ 57 页。

问题。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风险性很高。正因为如此，弄清最近数个世纪期间形成的各帝国情况如何，它们为何纷纷土崩瓦解，与它们解体相关联的都有些什么样的关键性问题，这一点至关重要。提请读者关注的这部著作便进行了这项工作，前数章是在分析世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而其后各章则以研究 20 世纪最后一个帝国苏联的覆灭为根据。

帝国瓦解的机制很独特，由宗主国和前殖民地的政治、经济问题相互结合所形成。在苏联，危机就是在集权政治制度对正统基础的侵蚀和石油价格下跌的背景上发生的，1980 年代初，预算状况、消费市场、支付平衡都取决于石油价格。本书有几章用于分析专制集权制度不稳固的原因和经济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市场行情的国家所遇到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对于理解 1980 年代初期 ~90 年代中期苏联所发生的事情的前因后果颇为重要。

苏联曾是一个俄罗斯人仅占全国居民半数的多民族国家，这对与其垮台有关事件的发展有实质性影响。不过更为重要的则是另一点——这是一个统治权力在日常生活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无论行政当局或社会都绝对相信，国家能够运用不受限制的暴力手段镇压种种不满表现。这样的国家体制让肤浅的观察者觉得坚如磐石，实际上却脆弱不堪，原因就在于它不具备富有弹性的调适机制，以使之能适应当今世界不断变化的现实。以苏联的遭遇为例揭示与此相关的种种风险，就是呈请读者过目的这本书的基本内容。

魏玛共和国政府当局不肯披露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真相，乃是促使其垮台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我看来，关于苏联崩溃的原因和机制的真相并未系统地得到说明。近来，开放足以阐明苏联经济危机爆发的档案文献重又受到限制。尽管如此，1990 年代初解密的材料仍可以澄清我国当年实际所发生的事情。关于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被异族敌人葬送的传说乃是危害国家未来的神话。在呈献给读者的这部著作中我试图表明往事的虚幻景象距离现实是何等遥远。希望再也不要重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1920 年代所犯的错误了。类似错误的代价在一个存在着核武器的世界上未免太高。

俄罗斯社会舆论中目前占据主要地位的是如下一幅世界图景：（1） 20 年前存在着一个稳定的蒸蒸日上的强大国家——苏联；（2） 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可能是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忽然心血来潮要在国内进行政治和经

济改革；（3）这场改革的结果酿成了灾难；（4）1999～2000年掌握政权的是一些心系国家利益的人；（5）此后生活开始步入正轨。这是严重失实的神话，与1920～1930年代末期德国社会上流行的关于德国不可战胜的传说如出一辙。

呈请读者过目的这本书的任务便是指出这幅世界图景并不符合实际。轻信其真实性对国家和世界都是有害的。很遗憾，这是一个神话经由健全理智加以强化的事例。向15世纪的欧洲人解释地球是绕着太阳转而非太阳绕着地球转，曾是一项颇为艰巨的任务。他们可能会走出家门去证明情况正好相反。要想让他们对眼见的事产生怀疑，需要向他们提供有力的论据。

当你试图对符合健全理智的事情进行描述时，不应吝于提供各种证据。呈请读者关注的这本书的任务便是表明，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问题仅仅在于它将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崩溃。上述论点毋庸置疑，作者对其正确性坚信不疑。但要认识它并不容易。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使用相当多的能显示1985～1991年苏联国内事件发展状况的档案资料。对某些读者而言，摘自苏联各部门之间往来公文的引文的数量可能显得冗赘。我的出发点是一个假设：我们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作为证明材料的文献充分一些，比之证据不足的过错终归要小。读者愿意的话，尽可以忽略那些文献资料的引文。

我要感谢H. 巴若夫、Ю. 博贝列夫、Ц. 戈兹曼、H. 格拉瓦茨卡娅、Э. 沃罗比约夫、B. 沃伊诺维奇、B. 库德罗夫、Л. 洛巴帕特尼科夫、B. 马伊、A. 马克西莫夫、A. 摩尔达维斯基、Б. 萨尔诺夫、C. 西涅利尼科夫、E. 谢罗夫、B. 岑巴乐、B. 雅罗申科、E. 雅辛，他们承担了通读和注释手稿或个别章节的辛劳，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也感谢O. 卢戈沃夫、B. 达什克耶夫、U. 马扎耶夫在搜集和分析历史统计资料工作中所给予的极为宝贵的帮助。还要感谢E. 莫兹戈瓦娅、H. 扎伊采娃、T. 列别杰娃、N. 莫兹戈瓦娅、E. 邦达列娃、M. 克里桑和A. 科列斯尼科瓦在本书技术工作方面所提供的协助。本书与我先前的著作一样，没有我心爱的妻子玛丽亚·斯特鲁加茨卡娅的帮助是不可能完成的。

自然，对可能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则应由作者承担责任。

第一章
帝国的辉煌和衰落

拄着刺刀可以，但不能坐下。

——塔列兰[①]

公元前1世纪，自由农民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弱化和职业军队的形成，破坏了古罗马的共和制度，为由军人愿意接受的人充当统治者的制度铺平了道路。由此而形成的国家体制开始被称为帝国（“帝国”这一术语本身来自拉丁文 imperium——政权）。由于那个时代罗马政权扩张到了当时已知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这个词也获得了另一个含义：在欧洲，“帝国”一词开始用来指称以征服手段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西罗马帝国瓦解之后，继承自它的各种法规和传统一直影响着先前归入帝国、地理上与宗主国邻近的区域内所发生的事情。这影响了欧洲历史随后的整个进程。

一　现代经济增长与帝国时代

帝国是联合了许多民族的极权主义的强大国家，其思想与基督教会一样都是中世纪欧洲继承自古希腊罗马遗产的一部分。神圣罗马帝国历史的著名研究人员之一 Ш. 布赖斯写道：“逝去的古代遗留给后世两种思想：世界性的君主制思想和世界性的宗教思想。”[②] 警句式的说法通常都能使所发生的事情得到简化。这里也是如此。古希腊罗马制度和罗马法的遗产对

---

① 夏尔·塔列兰（1754～1838），法国外交家，曾多次出任外交大臣，是19世纪资产阶级外交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② Ш. 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U. 马蒙托夫公司印刷所莫斯科版，1891，第71页。

欧洲发展的影响比世界性君主制思想更具重要意义。但帝国理想本身与罗马传统的联系也是毋庸置疑的。

许多统治者都试图为自己赢得皇帝的尊号。但罗马帝国瓦解之后的许多世纪中，只有拜占庭被其他欧洲国家公认为罗马皇家传统的继承者。[①]无论对罗马帝国的东方部分还是西方部分而言都是如此。拜占庭的统治者认为他们只不过暂时失去了对部分帝国领土的控制。当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时，能否获得拜占庭当局的承认对他而言是一个严重的问题。[②]

拜占庭的日渐衰落，使得后罗马区域内对帝号的要求愈来愈缺少说服力。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谁是这种权利的享有者的问题重新变得迫切起来。在这方面，俄罗斯当局希望莫斯科充当第三个罗马的角色、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倒也符合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时代精神。然而俄罗斯距离发展中心过于遥远，这种要求很难在欧洲受到认真对待。

神圣罗马帝国历经9～14世纪期间的多次变迁，大多为时短暂，及至15世纪末终于被欧洲各宫廷承认为拥有合法权利这样命名的唯一国家。但帝国思想本身仍富有生命力，继续对欧洲的各种事件产生影响。

腓力二世有时自称印度皇帝。在16世纪末的政治辩论中，西班牙的帝国使命思想、驾驭欧洲神圣任务的思想备受关注。卡斯蒂利亚[③]的精英们自15世纪末起便将罗马帝国视为仿效的楷模，将自己视作罗马人的继承者。他们是被挑选出来担当重建世界性帝国美好使命的一部分人。[④]脱离这一背景便很难理解，为何西班牙的国王们要在16～17世纪的战争中耗费如此之多的人力和财力，试图拓展自己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

15～16世纪之际，欧洲经济和军事的崛起及其对周边国家占有的军事

---

① 关于在比利时、西班牙、非洲、意大利的残暴国君心目中如何才能保持与无上权力密不可分的皇帝尊号的威严，见Ш.迪尔：《拜占庭帝国史》，国立外文书籍出版局莫斯科版，1948，第26页。

② G.巴拉克卢格：《中世纪帝国·理想与现实》，乔治·菲力普父子出版社历史学会版，1950，第9～11页。

③ 11～15世纪王国，在今西班牙境内。——译者注

④ J.H.埃略特：《西班牙及其世界，1500～1700·论说文选》，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伦敦版，1989，第9页。

优势日益明显。欧洲国家开始向其他大陆扩张。这方面最重要的动因便是希望补充用以支持战争的贵重金属资源储备。只是从通向美洲的贵重金属之路开通时起，这个洲对西班牙才变得宝贵起来。

欧洲各帝国正是在那时开始形成。这是重商主义贸易政策时期。各国都限制加工部门的产品进口，促进本国产品出口。占有殖民地便能扩大可控的关税区，被征服国无法阻止商品自宗主国涌入。对于殖民地，宗主国则可以随心所欲地实行限制性的贸易政策。殖民地地域扩大的同时，也爆发了各帝国之间在重新瓜分领土方面以及与殖民地打交道的贸易公司相互竞争方面的激烈斗争。

19 世纪中叶，中国、日本、奥斯曼帝国表面上并不是欧洲殖民地的组成部分，然而 1809 年 1 月 5 日英国与土耳其之间签订条约、1840 ~ 1842 年发生鸦片战争、1853 年佩里海军准将[①]的舰队抵达日本之后，低效率的进口政策便也强加给了这些国家。[②]

甚至帝国的辩护士们也都承认，那个时代利用行政手段强迫被征服国正是宗主国工业发展政策的特点。1813 年印度纺织和丝绸工业在英国市场出售产品，价格比英国生产的商品低 50% ~60% 还有利润。但高关税（价格的 70% ~80%）或直接禁止进口印度商品使这成为不可能的事。如果印度是独立国家，作为回敬，它完全可以对英国商品征收禁止性关税。印度是纺织工业的祖国——这个行业在该国已存在了长达六千年之久。从事这一行业的有数百万人。沦为殖民地之后，世世代代靠纺织为生的家庭中数十万人失去了工作。诸如达卡和穆什拉巴德之类的城市，原本都是纺织工业的中心，现在却变成一片荒凉。特里维廉爵士向议会委员会报告说，达卡的居民已由 15 万减少至 3 万 ~4 万人。自 1814 ~ 1835 年，英国纺织品对印度的出口额从每年的 100 万码增至 5100 万码。同一年代期间，印度向

① 马修·佩里（1794 ~ 1858），美国海军军事活动家。以武力胁迫日本政府签订 1854 年条约，规定向美国舰船开放函馆和下田两个日本港口，打破了日本与外界的隔绝状态。——译者注

② L. M. 卡伦：《日本史，1582 ~ 1941》，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第 178 ~ 182 页；E. 伊萨诺柳编《奥斯曼国历史，社会和文明》第 1 卷，IRCICA 出版社伊斯坦布尔版，2001，第 73 ~ 76 页、80 页；《远东的国际关系》第 1 卷，思想出版社莫斯科版，1973，第 58 ~ 62 页。

英国出口的纺织品却减少了将近3/4。时至1844年，更减少了4/5。[1]

18~19世纪之交开始的经济增长，扩大了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的移民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除外）在经济、金融、军事等方面实力的差距。邻近欧洲的最大农业国之一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2]中的失败鲜明地显示出了这一点。

19世纪中叶的世界是一个严酷的世界，其中没有温情的地位。这里通行的是罗马人熟知的规矩："痛苦归于被战胜者。"当时殖民大国对待被征服民族的态度根本谈不到宽大为怀。为了证明这点，必然会援引西班牙占领美洲后那里人口灾难性地剧减或对北美印第安人进行灭绝这样的事实。也可以回想一下充满自由思想的不列颠帝国当年曾有过的一条禁令：禁止印度各民族的代表担任国家公职。

欧洲各帝国兴亡的历史是一个进程的组成部分，这一进程与经济增长史无前例地加速和18~19世纪之交在西北欧开始的社会经济变化密切相关。该进程为各宗主国的经济、金融和军事扩张，为它们扩大地域控制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增大了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基础可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上遭到破坏的风险。

19世纪中叶主要的欧洲国家，首先是英国，在距离本国国境数千公里之外使用军事力量也不会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这是制定帝国政策的基础。英国首相、自由党领袖温·格莱斯顿写道："帝国感觉是每个英国人天生就有的。这是我们遗产的一部分，这种遗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只有我们死后才会消失。"[3]

临近1914年时，英国控制着生活着将近1/4人口的地域。[4] 它那具有悠久传统的帝国使大多数同时代人觉得牢不可破。然而19世纪末世界秩序发生崩溃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现代经济的增长和与之相联系的各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巨大变化使之无可避免。

---

① R. 戈帕尔：《英国在印度的统者：一种评估》，亚细亚出版社伦敦版，1963，第17~19页。

② 1853~1856年俄国与土耳其、英国、法国等国之间的战争。——译者注

③ P. 帕尔姆·达姆：《英国和英帝国的危机》，外文书籍出版局莫斯科版，1954，第14页。

④ 历史统计资料不够准确，因而无法对此作出确切的评价。根据A. 麦迪逊资料计算的结果为22.6%（见A. 麦迪逊：《世界经济·历史统计资料》，OECD出版社巴黎版，2003），切合实际的说法是20%~25%。

加入现代经济增长进程晚于英国的追赶性发展国家，可以利用被A. 格尔申克隆称之为“追赶性发展的优势”的因素。[①] 这些国家在人口数量方面往往超过早于它们开始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随着向工业化道路的不断迈进，它们已能动员财政和人力资源，从而形成强大的武装力量。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德国和日本在经济、金融和军事方面的崛起便是这方面最明显的例证。

笔者在自己的著作《漫长的时间》中曾经关注一事：在最近一个半世纪期间，俄罗斯与世界最发达国家——现代经济增长领先国家拉开了半个世纪即两代人的距离。[②] 在讨论当前的俄罗斯问题时，记住世界各帝国衰落的时代开始于大约半个世纪之前这一点是有益的。

20 世纪初所有号称帝国的国家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自愿或被迫）放弃了殖民地，还其以自由。这很难以种种情况不期然巧合来进行解释。这一经验对俄罗斯至关重要。如果能从中吸取教训，它将有助于不再重犯导致政治失败的错误。

20 世纪之初，对 19 世纪英国享有金融和海洋军事霸权时代所形成的版图进行硬性控制与瓜分世界时未分到一杯羹的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矛盾，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和平地调节这一问题并非易事。以武力方式加以解决则意味着爆发一系列流血战争。正是这一点构成了1914～1945年的现实。[③]

二　跨海帝国的危机和瓦解

19～20 世纪的诸帝国是欧洲崛起、现代经济增长的产物，数十年的增长造成了世界财政、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不对称。然而这都是一些脆弱的结构，很难发生转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适应其他一些关

---

① A. 格尔申克隆：《历史展望中的经济滞后》，哈佛大学出版社所属贝尔纳普出版社剑桥、马塞诸塞版，1962。

② 叶·盖达尔：《漫长的时间·俄罗斯在世界上：经济史随笔》，实业出版社莫斯科版，2005，第 36～46 页。

③ 英国政治精英未能寻找到适应英国已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国这一世界现实的途径，这成了 20 世纪一系列世界大战的前提条件。见 A. 甘布尔：《英国的衰落·经济警察、政治战略和不列颠国家》，灯塔出版社波士顿版，1931。

于合理政治体系的认识、适应另一种武装力量配套体系和使用武力的新形式。

20世纪期间，世界变成了另一种模样。“白人的压迫”被当做现实予以接受的主导思想，已让位于另一幅世界图景：将民族划分为统治者和奴隶的观念是无法接受的。19世纪固有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模式，在20世纪中期已成为不可能之事。在1940～1960年代的精神氛围中，要解释清楚为什么英国应当统治印度及其另外一些殖民地，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宗主国为维护自身统治可以采取行动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19世纪初那个严酷的世界不懂得怜悯弱者。20世纪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现实迫使人们接受新的行为准则。英国人1950年代初在马来西亚采取严酷的手段镇压起义者（扣留人质、毁坏不屈服的村庄的庄稼），这种做法在议会受到谴责，被称为反人类的罪行。19世纪初可以容许的事情，20世纪中叶的社会已经不能接受。

领土毗连的帝国中，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生存下来（以改变了的形式）的只有俄罗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拥有海外领土的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等帝国开始接连瓦解。时至1990年代初，最后一个领土毗连帝国苏联崩溃的时期亦已到来，同时崩溃的还有南斯拉夫，虽说这个国家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帝国，但也遭遇到了那些领土毗连帝国崩溃的类似问题。

1914～1945年的危机急剧地改变了世界。植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意识中的关于欧洲不可战胜的神话，被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①]所打破，继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殖民帝国在东南亚的溃败，更使之变得丝毫不足置信。欧洲人再也不可能指望被征服民族继续相信征服者拥有统治它们的神圣权利。[②]

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帝国”和“帝国主义”这些字眼本身渐

---

① 关于俄罗斯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败北对英国殖民地事件发展的影响，见H. G. 罗林森：《英国在印度的成就》，威廉·霍奇股份有限公司伦敦、爱丁堡、格拉斯哥版，1948。

② R. 阿隆：《法国的不变与变化：第四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剑桥版，1960。

渐变得不复时髦。1947 年英国首相克列门特·理查德·艾德礼说过："如果当今什么地方还存在着帝国主义，我用这个词指的是一些民族服从于另一些民族的政治和经济统治这层意思，那么这样的帝国主义在英联邦内肯定没有。"①

帝国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臣民们没有普选权。② 亚当·斯密③曾著文论述给予北美殖民地选举权的合理性。这并未成为英国政治家认真讨论的话题。"没有选派代表就不得征税"的口号曾是美国革命史上的主要口号之一，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在奥匈帝国的匈牙利地区，年满 21 岁的将近 1100 万人中只有 120 万人享有投票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王国的非匈牙利地区应征入伍的军人能不能享有选举权，这一问题曾引发一场激烈的政治辩论。政府未能就此通过决议。匈牙利首相蒂斯伯爵坚决拒绝给予那些不属于有封号的民族的军人以选举权。旨在挽救帝制的奥匈实行联邦制的尝试，遭到了匈牙利政治精英们的顽强反抗，他们拒绝对各斯拉夫民族作出任何让步。④

世界的经验证明，如果事情关系到全体臣民真正的民主选举权，则帝国和政治自由是不相容的。⑤

1950 年代初法国拒绝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欧洲居民和土著居民选举权平等原则，视其国土为自己的一个省。两个选举委员会的规则表明，欧洲人的一票被认为相当于穆斯林的 8 票。1954 ~ 1958 年间，法国当局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它终于意识到赋予普遍选择权的无可避免，明白非如此不足以保住阿尔及利亚。然而当时比起完全的独立来，任什么都已不能让解放运

---

① P. 帕尔姆·达姆：《英国和大英帝国的危机》，外文书籍出版局莫斯科版，1954，第 31 页。

② 关于帝国结构与民主体制的不相容性，见 C. 蒂利：《帝国为何灭亡·后帝国、多民族社会和国家的建立——苏联和俄罗斯，奥斯曼和哈布斯堡王朝》，砾石出版社纽约、伦敦版，1997，第 3 页。

③ 亚当·斯密（1723 ~ 1790），苏格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著名代表人物。——译者注

④ E. V. 格赖斯—霍斯特劳：《奥匈帝国的瓦解》，J. M. 登特父子有限公司伦敦、多伦多版，E. P. 杜顿股份有限公司纽约版，1930。

⑤ B. 索格林：《当代俄罗斯政治史（1985 ~ 1994）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进步研究院莫斯科版，1994，第 101 页。

动的领袖们满意了。[1]

限制殖民地居民的选举权切合16~17世纪的现实，当时欧洲各帝国刚刚开始形成；也符合18~19世纪的世界形势，其时现代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尚在酝酿之中。但是这种限制却与20世纪后半叶特有的合理国家体制的观念相矛盾。当时一个信念在全世界业已根深蒂固：政权机关若不建立在普遍选举权和各种政治力量平等竞争的基础之上，就是不合法的。无论企图保住自己殖民地的宗主国还是殖民地的精英们都熟知这一点：要想保住帝国只有一个办法——必须强迫生活在殖民地的各族人民将现有制度当做无可争辩的事实予以接受。但是帝国却遇到了拿破仑的战友之一塔列兰所指出的那个问题："拄着刺刀可以，但不能坐下。"

在2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演说中，那些主张保留殖民地的人的论据很大程度上强调的并不是这多有利于宗主国，而是保留帝国对殖民地本身的好处，是宗主国帮助它们建立了法律制度、发达的基础设施。

帝国发挥功能的财政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公认的看法是，殖民地应当在财政上保证自给并支付殖民地行政当局履行职能的费用。受到发达国家国内日渐变化的精神氛围的影响，1920年代这一传统在这些国家已成为历史。新出现的模式是：宗主国应当拨付资金用于加快殖民地的经济发展。[2] 力图证明帝国有益于臣民的政府，被迫不断增加对属地基础设施项目和社会计划的投资。[3] 这势必要依靠宗主国纳税人的钱来进行，纳税人则对类似的做法持怀疑态度。不得不为帝国掏钱，时间越长便掏得越多。社会日益相信，许多宗主国有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援助殖民地只好予以推延。时至20世纪后半叶，无论帝国的精英还是社会大众都确信：帝国这样做的代价过于昂贵。

从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政治精英不再相信既有的规矩切合现实的时刻起，帝国的命运便已决定。问题仅仅在于，它们将以何种形式在什么样的期限内瓦解。

---

① R. 阿隆：《法国的不变与变化：第四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剑桥版，1960。

② W. H. 莫里斯—琼斯、D. 奥斯丁编《非殖民地化及其以后：英国和法国的经验》，载于《联邦政治和历史研究》1980年第7期，弗兰克·卡斯出版社版，第121页；D. 高尔斯华绥：《1945~1961年英国政治中的殖民地问题》，克拉伦登出版社牛津版，1971。

③ D. 高尔斯华绥：《1945~1961年英国政治中的殖民地问题》，克拉伦登出版社牛津版，197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苏联及其卫星国为一方与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另一方的对抗，成为殖民制度瓦解的重要因素。苏联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帝国，有理由以财政、政治和军事等方式支持反对欧洲国家传统帝国的民族运动。美国是与苏联相对抗的军事同盟的首领，往往以类似欧洲强国对待殖民地的态度对待拉丁美洲国家，但是从来不曾宣称自己是一个帝国，也不派遣自己的代表经常性地管理附属国家。

由于各种原因，无论美国或苏联都不喜欢传统的帝国。至少它们都不准备支持这些帝国，往往还直接促使其瓦解。单单这一点就使得保留帝国成为不能之事。[①] 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国和法国政府以为入侵埃及可以恢复对运河的控制，并且凭借自身的力量便可以做到这点，无须与美国或苏联商量。结果它们打错了算盘，不得不退却，容忍运河归埃及政府控制。

战后世界发生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一个进程：富国的军事技术迅速在邻国和潜在对手间扩散。20 世纪后半叶现代游击战技巧被广泛掌握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宗主国需要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来对付这种挑战。

在 16 世纪，欧洲拥有明显的军事技术优势，派遣数百名征服者便可以占领美洲。20 世纪后半叶，调遣 40 万法国军人到阿尔及利亚仍不足以镇压依靠和平居民支持的 2 万起义者的抵抗。

葡萄牙的国防支出至 1971 年已占到预算拨款的 43%，国家不堪重负。1961～1974 年有 11 万葡萄牙青年为逃避征兵而移居国外。1967 年的一项法令将义务兵役期限延长至 4 年。军事院校无力培养足够数量的指挥员，这迫使葡萄牙政府大量征召民用大学军事讲座结业后获得军衔的尉官入伍。正是这些人成了准备推翻集权制度、结束殖民战争运动的核心。[②]

越南从来不是美国的殖民地。美国是在法兰西殖民帝国崩溃和“冷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英国对美国的欠债，使美国政府当局获得了可以影响英国殖民地政策的手段。见 D. 高尔斯华绥：《1945～1961 年英国政治中的殖民地问题》，克拉伦登出版社牛津版，1971。

② D. L. 拉迪：《葡萄牙的法西斯主义与抵抗运动：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军人持不同政见者与萨拉查（在葡萄牙建立法西斯制度的独裁者——译者注）的对抗，1941～1974》，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8；D. 波奇：《葡萄牙武装部队与革命》，克鲁姆·赫尔姆、胡佛公共机构出版社伦敦、斯坦福版，1977；N. 布鲁斯：《葡萄牙·最后的帝国》，大卫和查理出版社伦敦版，1975。

战”的背景下卷入越南战争的。美国积极参与越南战争的初期事情即已很清楚，在与游击队对抗的条件下为了有效保障对国土的控制，需要数量上超过游击队大约10倍的兵力。保有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代价太高了。

民族感情在不具备民主法规传统的社会乃是最强有力的政治动员手段之一。康·列昂季耶夫非常明白民族团结的感情对帝国是一种威胁：“在19世纪，这样的民族思想是一种包含着许多破坏力却没有任何创造力的思想。”[①]

借助于白人老爷剥削者与被压迫被侮辱的殖民地土著居民的对抗，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武器。在欧洲人不可战胜的神话烟消云散之际，反对殖民制度斗争的暴力方式得到了广泛推广。参与其事的人可以得到苏联集团的财政和军事支持。新独立的国家又为仍然是欧洲大国殖民地国家的游击队提供了广阔的后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帝国解体的必然性显而易见。问题仅仅在于哪个宗主国能更早地意识到这点，让非殖民化的进程变得更为温和而不致造成严重后果。[②]

英国的精英与法国的精英不同，并未忍受过1940年的投降之辱。这个身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的国家，对帝国解体引发的危机有着相当充分的准备。1945年时英国是拥有450万军队、统治着遍布各大洲的海外领土的世界三大国之一。在其国土上太阳永不降落。时至1961年末，这个帝国已几乎一无所剩。尽管如此，英国领导人与俄罗斯领导人不同，并未将这一进程视作地缘政治灾难。在致力于殖民帝国解体的大部分工作中，英国首相能够理解20世纪后半叶世界的构成情况，这应该成为可供效法的榜样。

英国议会通过的关于1909年印度事务委员会的法令，并未对帝国行政管理机构作出根本的改变，却是通向印度独立国家体制道路上的重要一步。[③] 关于印度独立的决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的。确切地说，从这时起大英帝国的历史已经结束。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只是拖泥带水的附

---

① 康·列昂季耶夫：《东方、俄罗斯和斯拉夫人》第1卷文集，И.Н.库什涅列夫铅印及平印公司莫斯科版，1855，第106页。

② W.H.莫里斯—琼斯、D.奥斯丁编《非殖民化及其以后：英国和法国的经验》，载于《联邦政治和历史研究》，弗兰克·卡斯出版社，1980年第7期。

③ H.G.罗林森：《英国在印度的成就》，威廉·霍奇股份有限公司伦敦、爱丁堡、格拉斯哥版，1948，第189页。根据新法律，帝国立法会议内选举产生的成员人数增加至一半，而各省立法会议的成员大多数均由选举产生。

笔。不过早在1950年代初利用对帝国的怀旧情绪就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过程，至少在将自身与帝国辉煌等量齐观的保守党拥护者中间确是如此。关于往昔的传统、帝国对英国的意义、关于不可能将其放弃、关于准备走上使其解体道路的工党的“叛卖政策”等等的议论，乃是这一时期保守党政治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种政策的思想基础便是丘吉尔1942年11月10日的声明：“我们打算保住一直是我们财产的那些东西……我成为陛下的首相并不是为了在消灭大英帝国的时候充当主角。”① 1951年他重新进入政府之后，也曾不止一次表达过类似的想法。

与保留帝国的必要性有关的话题、准备沿着帝国解体道路前进的人活动的有害性、求助于后帝国怀旧情绪和反美思潮——这些就是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保守党公共政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② 这一时期的许多英国政治家都把联合国（而不是苏联）看作自己国家的主要敌人。在1951年，要向刚刚赢得选举的保守党的大多数积极分子说明帝国的日子已屈指可数是不可能的。③

时间总是能让万事万物各归其位。1956年苏伊士战役的溃败，1958年力图控制塞浦路斯局势的徒劳之举，都显而易见地向英国社会表明，保存帝国的梦想颇具浪漫色彩，但却无法付诸实现。

自1959年起，此前数年发誓忠于帝国理想的保守党政府开始加速帝国的解体。当时主管殖民地事务部的亚·麦克劳德这样概括时局：“据说自从我担任殖民地事务大臣之后，便开始了一场有意加速独立的运动。我同意这一说法。我想象得出，奉行其他任何政策都会在非洲导致骇人听闻的屠杀。”④

解散帝国之后，英国在北爱尔兰遭遇了延续10年之久的艰难的恐怖战争。这显然与俄罗斯极其相似，后者于1991年未经流血放弃了帝国，同时却又遭到了棘手的车臣问题。顺利解散帝国谁都不可能办到。

帝国能符合宗主国政府的战略计划、有条有理、按部就班地解体，这

---

① 温·丘吉尔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伦敦版，1952，第88页。

② D. 高尔斯华绥：《1945～1961年英国政治中的殖民地问题》，克拉伦登出版社牛津版，1971。

③ G. 阿诺德：《1945年以来的英国：选择、冲突和改变》，布兰德福出版社伦敦版，1989。

④ W. H. 莫里斯·琼斯、D. 奥斯丁编《非殖民化及其以后：英国和法国的经验》，载于《联邦政治和历史研究》，弗兰克·卡斯出版社，1980年第7期，第23页。

仅只是例外而非常规。[1] 更为常见的情况则是，宗主国未能及时派兵保卫帝国的领地而陷入政治危机，无法制定出和平重建与前殖民地关系的政策。在这方面，葡萄牙的例子颇具代表性，该国在 1974 年 4 月 25 日的革命之后，派遣到殖民地的军队彻底丧失了作战的意愿，士兵和下级军官一心只想尽快回家。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政权移交程序的漫长而复杂的谈判已超出政府的能力。[2]

在法国，由于背负着与 1940 年败北相关的沉重遗产，社会适应新的现实的进程较英国更为缓慢，对帝国的怀旧情绪也更为强烈。法国的政治精英们坚信，只有帝国才能让国家保持大国地位和世界影响。[3] 为此而斗争所牺牲的人数比欧洲其他宗主国都更为巨大。但这并未能改变结果——帝国解体。

以欧洲各帝国的陨灭为背景，出现了一场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危机。[4] 在所有的帝国之中，法国从 1940 年代末到 1950 年代初曾经为保住殖民地尽了最大的努力；为此耗费了更多的金钱，损失了更多的生命。在印度支那，从 1945～1954 年共牺牲 9.2 万名远征军官兵，14 万人负伤，3 万人被俘。战争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法国政府却并未下决心再向印度支那派遣哪怕一名法国的志愿应征者。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法国家庭坚决不愿送儿子们去印度支那丧命。

法国军队在奠边府认输，1 万官兵投降当了俘虏。当时大部分法国军事领导人宁肯将失败的责任推到文职政治家们身上，这些人不肯支持军队的努力，从背后对其实施打击。在东南亚的失败也是由于拒绝派遣应征服兵役者前往那里所决定的，这成了拥护其他法国殖民地首先是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人的最重要因素。既然宗主国保不住自己在亚洲的领地，那么还有

---

① 就英国而言，帝国解体也堪称顺利，只需与其他类似的政治实体相比便知。后帝国综合征对 1950～1960 年代英国政府所执行的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使其长期未能确定国家对欧洲一体化问题的立场。

② H. G. 弗瑞拉、M. W. 马歇尔：《葡萄牙的革命：持续 10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版，1986。

③ Л. Л. 切尔卡索夫：《殖民帝国法兰西的解体》，科学出版社莫斯科版，1985。

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根据民族传统取消了征兵制，这是足以解释大英帝国解体相对容易、并未流血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950 年代英国政府开始明白，借助于武力保存帝国至少需要恢复征兵制。出于政治的动机这种做法被排除了。

什么可以保证能留住在北非的领土呢？

一个历史的悖论是：结束印度支那战争、1954 年与胡志明签署协议的人和着手大规模增加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武装力量的人正是同一个人——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在 1954 年 11 月 12 日的国会辩论中他曾说过："让任何人都不要期望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妥协，当问题关乎保卫国内和平与共和国完整的时候，我们决不会妥协。阿尔及利亚各省是共和国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它们也就是法兰西。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分界线。任何时候法国、任何一届国会或政府都不会放弃这一基本原则。"① 内政部长、后来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同样坚决，他说："阿尔及利亚也就是法兰西。"②

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的人数比越南游击队的兵力要少。阿尔及利亚在地理上更靠近法国。那里居住着一百余万法国移民。他们在宗主国的院外活动集团颇具影响力。该国集中了相当可观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1955 年 5 月，法国政府采取了应当为印度支那战争负责的历届内阁未能下决心采取的一个步骤。它征召 8000 名预备役人员，宣布 10 万应征入伍者延期服役的计划。当年 8 月又对推迟应召服兵役做出了限制。1955 年法军在阿尔及利亚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从 1 月份的 7.5 万人增至 12 月份的 18 万人。1956 年秋，三分之一的法国军队集中到了北非。1956 年底在那里服役的法国军人已达 40 万之多。

根据 1952 年 8 月 22 日的法令征召入伍的大部分年轻人都超过 23 岁，其中许多人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开始了职业生涯。1941 年法国大规模征召中年人入伍的时候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并未遭到社会反抗。祖国处于危险之中这点得到了理解。1950 年代中期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被全世界和法国社会都看作是非正义的殖民战争。宗主国处于和平状态的时候，征召来的军队不曾用来进行过这样的战争。1955 年 12 月，在被征召入伍派往阿尔及利亚的人中发生了骚乱。温森特、南特、马赛等地都出现了群众性的抗议演讲。

---

① J. 塔尔博特：《一场没有名义的战争·法国在阿尔及利亚，1954～1962》，阿尔弗雷德 A. 诺普夫出版社纽约版，1980，第 39 页。

② J. 塔尔博特：《一场没有名义的战争·法国在阿尔及利亚，1954～1962》，阿尔弗雷德 A. 诺普夫出版社纽约版，1980，第 39 页。

应征服兵役者通常都不参与积极的战斗行动，他们由外籍军团和职业军人率领。应征服兵役人员的基本任务是保卫法国移民的农场。尽管如此，自从往阿尔及利亚派遣应征服兵役者之时起，法国的社会舆论便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一个民主国家的居民即便还怀恋往昔的辉煌，也不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去为了维持帝国的幻想而战。根据社会调查询问的资料，1960～1961 年 2/3 的法国人都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在 1961 年 1 月 8 日的全民公决中，全国 75.2% 的居民投票赞成给予国家领导人在解决独立方式问题时的行动自由。①

其实，无论法国在 1960～1961 年或葡萄牙在 1973～1974 年往殖民地派遣大批应征服兵役人员保卫帝国时，都没有遭遇直接军事失败的威胁，也根本没有类似于 1954 年在奠边府发生的那种事情危及他们。决定解散帝国有着另外一些原因。问题在于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流血战争所造成的国内政治后果，战争的目的变得越来越难以令社会理解。20 世纪后半叶帝国已不再时兴。前去送命抑或送自己孩子参战以保卫昔日辉煌的象征，现代社会并不认为有此必要。

得到 2/3 以上选民支持的解散帝国的决定，即便在具有稳固民主传统的法国也并非易事。少数人在 1958～1962 年对法国民主制度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是来自各殖民地的法国移民、参加过战争并认为被文职政府出卖了的职业士兵。当激进民族主义者 1958 年对科西嘉②实行管制时，针对法国当局是否打算使用武力恢复秩序的问题，法国国防部的一名代表回答说："什么武力?"他毫不含糊地宣称，文职政府当局没有任何可供制止暴乱的武装力量。③

法国经历了帝国解体之后，仍能在昔日宗主国保持民主制度，对此发挥影响的是一系列因素：社会普遍意识到无视大部分居民意志的专制制度早已不合时宜，法国积极参与其实现欧洲一体化计划；既能解散帝国，又能提高对强力机构保持控制的戴高乐将军其人的威望。

---

① J. 塔尔博特：《一场没有名义的战争·法国在阿尔及利亚，1954～1962》，阿尔弗雷德 A. 诺普夫出版社纽约版，1980，第 202 页。

② 地中海北部岛屿，法国省份。——译者注

③ P. M. 威廉斯：《战后法国的战争、阴谋和丑闻》，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版，1970，第 151 页。

在1960～1962年积极探讨停止战争、给予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问题期间，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帝国解体将会导致法国政治上的长期不稳和混乱。这种预测并未应验。强劲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使具有潜在危险的后帝国综合征化为乌有。正如今天的俄罗斯一样，当年法国的后帝国综合征的高峰也与福利增长的年代相吻合。不过它的经验也表明，这种病症是可以逐步治愈的。

三　领土毗连帝国解体的问题

在多民族的农业国，民族种类的不同通常不具有原则性的意义。最主要的问题是专门从事强制活动、国家管理和宗教管理并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与占多数的农民之间的隔阂。16世纪中期哈布斯堡王朝除卡斯蒂利亚和奥地利之外，还囊括了许多不同的组成部分，例如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荷兰、勃艮第，更不消说西班牙在非洲的殖民地了。18世纪初号称帝国的俄罗斯的民族之多大概并不需要说明。由于语言上的差别，很难确定当年奥斯曼国是否曾自称为帝国，但至少现代欧洲人曾不止一次地这样称呼它。

也有一贯奉行民族大一统政策的农业君主制国家。在中世纪早期，英国和法国都是民族种类繁多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耗费了数百年的时间。但是，如果在英国和法国这种事情能够实现，那么，这样的战略在臣民属于决然不同语系的奥匈帝国却不可能实现。[①]

现代经济增长的开始和与之相关的急剧变化使社会生活发生了改变。新的就业结构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已成为现实。传统政治制度的合法基础开始遭受侵蚀。在这样的背景下，多民族的领土毗连帝国遇到了种种极为复杂的问题。

约翰·赫尔德[②]很好地表达了19世纪初不断提升的民族意识的精神，他写道："上天用森林和高山、海洋和沙漠、河流和不同气候的地区将人们分隔开来，但它首先是用不同语言、爱好和性格将人们区分开来……大

---

① 关于奥匈帝国民族发展的特殊性和在该国不可能重复英国和法国所经历的道路，见D. 贾兹：《哈布斯堡王朝的瓦解》，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版，1961。

② 约翰·赫尔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狂飙突进派"理论家。——译者注

自然以家庭来养育人们，而最自然的国家应该是具有相同性格的同一民族生活在一起的国家……如此，再没有比让不同族群的人混居在一个皇权之下，任由国家自由扩展更违背管理本意的事情了……这样的王国……仿佛先知想象中的君主制国家的象征：狮首、龙尾、鹰翅、熊爪。"[①] 民族自我意识的提高和按民族特性实行联邦化的要求，使得领土毗连帝国的情况变得特别复杂。借助于炮舰建立起的跨海帝国可以抛弃。余下的问题是移民，只好将他们遣送回国，但他们所涉及的只是居民中一个狭小的群体。与跨海帝国灭亡有关的最严重的问题当数在阿尔及利亚的百万法国移民的命运。毕竟事情关系到将近2%法国人口的命运。

1990年代中期葡萄牙帝国解体时，被遣送回国的人在宗主国人口中所占的份额达到各跨海帝国的最大限度——将近该国人口的10%。[②] 不过这一问题并未对年轻的葡萄牙民主政治构成爆炸性危机，未能妨碍其稳定。

在领土毗连的多民族帝国中，帝国解体过程中涉及的产生民族共同体居住分散的问题更为尖锐。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溃的各帝国的经验中便清晰可见：俄罗斯、日耳曼、奥匈、奥斯曼等帝国的情形均是如此。

帝国政府将武器交到绝对不是始终忠于政府的千百万农民手中，打发他们长年累月地钻进战壕，无暇顾及向他们说明打仗的必要性，这使得保卫帝国成了难以完成的任务。战败、旧秩序的毁坏、国土的分崩离析都是一些有着相互联系的过程。

领土毗连帝国崩溃所产生的无政府状态的情景，通过描写俄罗斯国内战争的书籍和影片广为人知。但这绝不只是俄罗斯的特点。下面就是一位同时代人对奥匈帝国瓦解时期的现实的描写："绿色团伙（逃兵帮）变成了强盗集团。他们攻进村庄、城堡和车站并大肆劫掠。他们毁坏铁路，让火车排队等候，以便进行洗劫。警察和军队与强盗们同流合污抑或无力与此辈抗衡。刚刚获得的自由在被焚烧的房屋和村庄的浓烟之中毁于

① 约翰·赫尔德：《人类历史的哲学理念》，科学出版社莫斯科版，1977，第226页、250页。

② E. 索尔斯滕编《葡萄牙：一个国家的研究报告》，国会图书馆联邦研究处华盛顿特区版，1994，第137页。

一旦。”①

在奥匈帝国国务会议的声明中，军队是多民族的，那些并非奥地利和匈牙利人的部队不肯为帝国而战这一事实，成了赞成投降最重要的论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纷纷解体的经验，对于理解20世纪末世界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至关重要。专制制度崩溃之后出现了政治和社会的真空状态。旧制度的警察离开了，新的却还没有出现。那些觊觎政权的人并没有确保制度合法化的传统，也不存在公认的政治游戏规则，于是便产生了大革命特有的局面：政府软弱、无力收税并向那些从国家预算中领饷的人支付薪酬、无力维持秩序、保证履行合同义务等。②

在这样的条件下，利用最简单的社会本能便成了获取政治成功的可靠途径。只消讲讲民族的伟大、具有历史地位的本民族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提出对邻国的领土要求——就保准能取得政治上的成功。③ 民主传统和政党都还很弱的时候，宣扬激进民族主义、要求民族平等、诉说民族屈辱、找出万恶的民族敌人——这都是夺权斗争中的可靠武器。1918年的奥匈帝国就是帝国民族的精英领袖人物们利用这类政治工具的经典例证。甚至在帝国崩溃前夕，奥地利的泛日耳曼主义人士仍坚决反对将国家改为联邦制。表达他们观点的颇具影响力的报纸《新自由报》在旧制度瓦解之前数日写道：“奥地利的德国人任何时候也不容许让国家土崩瓦解。”④

波兰诗人亚·密茨凯维奇在奥匈帝国消亡之前100年曾写道：它的3400万居民中只有600万德国人，却让其余的2800万人臣服于他们。1830年，奥地利诗人弗·格里尔帕策指出：如若世界遭遇突如其来的考验，那时只有奥地利会因此而化为散沙。奥匈帝国的精英们明白帝国的脆

① E. V. 格赖斯—霍斯物劳：《奥匈帝国的瓦解》，J. M. 凳特父子有限公司伦敦、多伦多版，E. P. 杜顿股份有限公司纽约版，1930，第270页。

② U. B. 斯塔罗杜布罗夫斯基、B. A. 梅伊：《大革命：从克伦威尔到普京》，瓦格里乌斯出版社莫斯科版，2001，第25～29页。

③ 研究19世纪欧洲民族运动的M. 克罗赫注意到，所有这些运动都经历三个阶段：探索和启蒙阶段；爱国主义精神活跃阶段，此时拥护重振爱国主义精神的团体认清了自己在传播民族自我意识中的使命；第三阶段则是群众性民族运动的高涨。M. 克罗赫：《欧洲民族复兴的社会先决条件—欧洲小国中爱国主义团体的社会结构的比较分析》，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版，1985，第23页。

④ E. U. 鲁宾施泰因：《奥匈君主制国家的灭亡》，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版，1963，第325页。

弱性，试图通过激化被控制的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来保全它，结果造成了匈牙利人仇视捷克人、捷克人仇视德国人、意大利人则仇视其他一些人的局面。当帝国溃灭成为无可避免之事的时候，相互仇恨使得各后续国的民族问题很难调解。[①]

宗主国的精英们试图将民族认同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多民族帝国国家体制的基础，这在客观上促使少数民族的反帝国情绪激化。杰出的俄罗斯人口学家A. 维什涅夫斯基教授写道："乌克兰分裂主义者在与较温和的联邦主义者的争论中，像俄罗斯其他的分离主义者一样，有着同一个强有力的帮手——帝国的大国主义中央集权制。它那僵硬的不肯认可任何让步的一元集权制的立场，常常使得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要求反过来变得更加强硬。新的乌克兰精英以及参与运动的乌克兰各阶层居民感到在帝国的经济、政治舞台上丧失了地位，这在客观上使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升温。当俄罗斯爱国主义者承认乌克兰人是俄罗斯人民的一部分却又根本不愿意听乌克兰说话的时候，他们无异于承认希望永远保留这样一种缺陷和乌克兰的二等地位。"[②]

1918年匈牙利政治宣传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是不容许丧失其在奥匈帝国中的特权民族地位。克罗地亚宣传的关键性话题则是不能接受匈牙利的控制和匈牙利对克罗地亚的领土要求。对于奥地利的德国人而言，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居住着苏台德德国人的那个捷克斯洛伐克地区的命运，对捷克而言则是保持领土的完整。

这些冲突很难得到合理的解决。从合理性的观点出发无法说明什么更为重要——是保持波西米亚[③]的完整呢，还是苏台德德国人并入德国的权利？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境内占少数的匈牙利人又该怎么办？协约国部队占领前奥匈帝国最富争议的地区，对于相对和平地解决这些矛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未能避免武装冲突。其他领土毗连帝国崩溃之时事态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更为血腥的道路。

1870年在未来的保加利亚国的大部分地区，穆斯林、土耳其人、操保

---

① O. 贾兹：《哈布斯堡王朝的瓦解》，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版，1961，第325页。

② A. 维什涅夫斯基：《镰刀与卢布：苏联保守的现代化》，国家出版社联合公司莫斯科版，1998，第331页。

③ 历史上形成捷克国家的地区的最早名称。——译者注

加利亚语的波马克人、俄罗斯迁移来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切尔克斯人在数量上并不比信奉东正教的保加利亚人少。19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至 20 世纪前四分之一期间，有数百万土耳其人从保加利亚、马其顿、色雷斯移居西安纳托利亚。及至 1888 年，穆斯林在保加利亚人口中的份额已降至约1/4，1920 年时则仅占 14%。类似的过程 1912 ~ 1924 年间也发生在马其顿和西色雷斯。[①]

奥斯曼帝国的彻底瓦解成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败北的结果。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领袖们被迫于 1920 年 1 月承认帝国中阿拉伯居民占优势的地区的自决权。但他们坚持保持土耳其宗主国的完整。奥斯曼帝国灭亡之后，紧接着发生了希腊土耳其战争。战争的起因是围绕后帝国领域内新建的各个国家的边界所发生的争论。战争中的胜利成为新的土耳其国家合法性的重要因素，使其得以在 1924 年相对顺利地废除了穆斯林哈里发政体。然而即便在该国，1920 年代末和 1930 年代初进行民主化的最初尝试时，已取得合法地位的反对派仍迅即开始利用对于哈里发制度、穆斯林的重要性和失去了的帝国的怀旧感情。[②]

帝国在亚洲的使命是 19 世纪俄罗斯民族自我认同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在欧洲我们是寄人篱下者和奴仆，而到亚洲我们却成了老爷。在欧洲我们是鞑靼人，在亚洲我们则是欧洲人。使命，我们在亚洲的文明传播者使命定会感动我们的心灵，将我们吸引到那里去，但愿开始行动……但愿能造就一个可以让老俄罗斯再生、复活并逐步认清其道路的俄罗斯。"[③] 但领土的扩张、将居住着传统和语言完全不同的民族的地区并入帝国版图，这也导致一旦出现制度危机征兆时，国家就将面临很大的风险。

俄罗斯的国内战争并不具有单纯的民族性质，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成分对其爆发也有着很大的作用。土地所有权和余粮收集制问题在其中所起的

---

① Y. P. 布鲁贝克：《后帝国形势和历史比较前景中的民族分离》，http://www.hrights.ru/text/b3/chapter2.htm。

② R. D. 鲁滨孙：《第一个土耳其共和国 · 民族发展研究的实例》，哈佛大学出版社剑桥、马塞诸塞版，1963。

③ 费 · 米 ·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第 3 章，写于盖奥克泰佩（在今土库曼斯坦境内——译者注）的《亚洲是什么?》，见 30 卷本全集，第 27 卷，1984 年思想出版社列宁格勒版，1881，第 26 ~ 28 页。

作用并不比民族因素小。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对我国1917～1921年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估计不足。①

A. 贝藏松正确地指出，如果认真分析俄罗斯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情况，便可以证实它有着调节社会矛盾和经济发展问题的重大机会，但却无法解决民族问题。这种情况严重限制了制度演进的可能性。自由、民主、现代化的抉择这一解决社会政治发展的手段增大了帝国瓦解的可能性。②

俄罗斯是能够在1918～1922年重建崩溃了的帝国的绝无仅有的国家。为此需要使用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的暴力。但布尔什维克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不止于此。救世论般的共产主义思想使得政治冲突的中心由民族矛盾转换为社会阶级的斗争，预先取得非俄罗斯地区部分居民的支持，发动他们为开辟通向光明未来的道路的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而战，这些都对在像俄罗斯帝国这样的疆域内建成苏联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这是绝无仅有的种种情况的巧合。谁也不可能在20世纪再次做到类似的事情。

被迫在多民族帝国条件下适应政治竞争现实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正面评价民族问题在动摇现存制度时的潜力，懂得积极利用族际问题这颗可以投向现有政权基础的炸弹。③ 列宁以其关于民族有权自决直至分离的论点激化并构成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他们认为民族运动是帝国制度最严重的威胁之一，但又希望这一制度能按联邦制的方式加以改造，使其得到延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民族自决权的思想被欧洲权势集团接受，作为凡尔赛和约的基本原则得到确认。这成了日耳曼、奥匈、奥斯曼帝国解体的一种方式。条约的起草者显然没有想到其中所形成的思想对其他欧洲帝国会产生久远的宣传效果。

1914年10月列宁在苏黎世向社会民主党听众发表了《战争与社会民主党》的讲演，内中对比了乌克兰人在俄罗斯和奥匈帝国的地位。他说:

---

① 关于民族因素在俄罗斯革命和内战中的作用，见 Г. Н. 谢沃斯季亚诺夫编《20世纪的俄罗斯·改革和革命》卷1，科学出版社莫斯科版，2002。

② A. 贝藏松:《俄罗斯帝国与苏维埃统治——帝国的概念》，PUF出版社巴黎版，1980，第367～368页。

③ O. 鲍威尔:《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党》，新月出版社圣彼得堡版，1909。

"乌克兰在俄罗斯成了爱尔兰之于英国那样的角色，它遭受残酷的剥削，反过来却什么也得不到。"列宁认为："俄罗斯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争得乌克兰的国家独立。"①

即使在夺取政权之后他也并不拒绝民族自决原则以及分离的权利，那时候他在革命前宣传的许多东西（言论自由、召开立宪会议）已经被遗忘。为何唯独这一点仍然成为列宁政治基本信念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正在广泛进行讨论，但未必有朝一日会得到彻底解决。起到关键作用的大概是，他随时从准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上考察俄罗斯的事态发展，明白激进民族主义能够成为动摇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些国家实体的极其强有力的手段。②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领土毗连帝国崩溃与跨海帝国瓦解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后者的移民可以返回宗主国，而由此所产生的政治问题一般都能通过文明的途径加以调节。

领土毗连帝国的情况却要复杂一些。这里所说的不是一两代人之前来到海外领地的移民，而是其父辈和祖辈数百年间在同一地方与其他民族比邻而居的那些人，是千千万万至少将自己当做国家里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而且往往还自认为是特权阶层的那些人。帝国灭亡之际，宗主国的代表有时候会成为被歧视的少数民族。奥匈帝国溃灭之后，超过 300 万匈牙利人在相邻的各后继国家落入少数民族的地位：170 万在改属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将近 100 万在并入捷克斯洛伐克版图的斯洛伐克和外喀尔巴阡罗斯，约 50 万在转归南斯拉夫的伏伊伏丁那；将近 500 万德国人从奥匈王朝奥地利部分和德意志帝国一系列东部省份的统治民族，变成了捷克

---

① R. 塞尔宾：《列宁与 1914 年的乌克兰问题：苏黎世的"分离主义"演说》，《复数》杂志第 25 期，1981，第 83 ~ 84 页。

② "与共产主义思想相类似，民族主义思想具有政治的和动员的巨大潜力。大批民众不能适应变故，一心怀恋过去，怀恋往日的民族隔绝状态，怀恋可以没有竞争地拥有特权等等，民族主义思想总是能将这些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使他们朦胧的倾向明确起来，激起他们的不满情绪，用难以兑现的诺言将他们团结起来。所有这一切使民族主义变成了值得重视的思想力量和政治力量，正在进行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的斗争的社会集团很难经受住与其结成联盟的诱惑。" A. 维什涅夫斯基：《镰刀与卢布：苏联保守的现代化》，国家出版社联合公司莫斯科版，1998，第 317 页。

斯洛伐克、波兰和意大利的少数民族。[①]

无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个问题：可否将帝国各地区任意划分的边界视作各新独立国家的国界？需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少数民族的意愿：他们希望在帝国瓦解后出现的哪些国家实体中生活？对于这些问题，民族自决权的概念并未给出答案。这也可以理解。该概念并不是为了解决与多民族帝国瓦解相关的问题，而是作为可以安放到这些帝国基座下的炸弹而创造出来的。在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前景中会出现什么情况，对于概念的创立者并不太重要。帝国瓦解时这些问题变得具体起来，往往还沾满鲜血。

以争取民族独立和推翻帝国为任务的各种运动，往往将利用对先前处于优势地位的民族的反感作为其政治思想的基础。这并非那种对属于特权民族的人玩弄权术的政治结构。新独立的国家中先前代表宗主国的少数人对激进民族主义思想的支持也大多可以用这一点进行解释。

四 南斯拉夫悲剧

20 世纪末，在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事件，使其成为显示出领土毗连帝国瓦解种种问题的国家之一。[②] 它实际上是与苏联同时解体的。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对于理解 1980 年代末 ~ 1990 年代初苏联的事态发展颇为重要。

自然，南斯拉夫并非大国，并非经典意义上的帝国。但是其国家结构的某些特征，使它自 1918 年建国之时起便与帝国相类似。无论在卡拉乔治维奇王朝，[③] 还是共产主义统治之下，这都是一个由许多不同的民族、但

---

① Y. P. 布鲁贝克：《后帝国形势和历史比较前景中的民族分离》，http：// www. brights. ru/ text/b3/chapter · 2 htm。

② 南斯拉夫对我而言并不算陌生的国家。我曾在那里度过许多年。我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1994 年秋波斯尼亚战争最紧张时，我曾在帕拉与未来的塞尔维亚总理 3. 金季奇一起待过许多个小时，他后来被恐怖分子杀害。他曾试图让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领导人卡拉季奇相信在塞尔维人军事上取得胜利之时达成妥协的必要性，拒绝相互让步的代价将会很高昂。1999 年轰炸期间我也曾去过贝尔格莱德，试图就停火条件达成协议。现在我还能想象南斯拉夫悲剧的有关事件的发展情况。但本书并非回忆录，只是试图分析帝国建立和崩溃的机制、后帝国综合征的形成过程。因此在涉及与南斯拉夫瓦解以及其后的流血战争等问题时，我宁肯不依靠个人的回忆来进行讨论。

③ 先后统治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等国家的王朝。——译者注

被毗连的领土结合在一起的专制制度国家。

将南斯拉夫建成南部斯拉夫各民族联合体的思想本身，在1830～1840年代即已开始酝酿。[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无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领袖还是协约国各国领导人都得出结论：要保持巴尔干的稳定、防止局部战争，最好建立一个理所当然以塞尔维亚王朝为基础的国家。[2] 居住在南斯拉夫的各族人民民族利益的脆弱平衡，在1929年被一场政治变故打破，当时非塞尔维亚各民族的权利受到限制，国家变成了塞尔维亚人的小帝国。[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得以恢复。掌权的是结构特殊、相对温和的共产主义专制制度。塞尔维亚人是国内人口最多的民族。国家首都与塞尔维亚首都在同一个地方，因而塞尔维亚人在政府机关和军队中不可避免地居于主要地位。与此同时，50年期间国家的元首却是一位克罗地亚人，他明白为了保持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必须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进行斗争。他将这一点在宪法中加以确认，深知维护国家统一取决于联邦体制的现实。

约・铁托的政策旨在使企图将南斯拉夫变为塞尔维亚帝国的危险减小至最低限度。为了让这样的结构保持稳固，就需要有这位能在1941～1945年与希特勒、1948～1953年与斯大林相对抗的领袖的威望和意志力。铁托去世之后，南斯拉夫逐渐陷入政治和经济危机。

一位目光敏锐的南斯拉夫危机研究者C. 爱德华写道："南斯拉夫社会得以维持并非借助于铁托的超凡能力、政治独裁或对民族感情的压制，而是基于国际利益的综合平衡以及权力和交叉主权的开放性体系。民族的认同不仅未受到压制，反而被制度化为可以保障各共和国近似主权国家的权利的联邦体制，为单个民族的自决权提供了多种权利。"[4] 这是对的，但并不全面。这种制度只能在对政治异端的一切表现进行严厉控制的条件下发挥作用。专制制度合法性的危机使得保持这种结构显得不切实际。

---

① И. И. 列希洛夫斯卡娅：《南斯拉夫冲突的历史根源》，载于《历史问题》杂志第5期，1994，第40～56页。

② С. А. 罗曼年科：《南斯拉夫：诞生的历史、危机、解体、一批独立国家的建立》，莫斯科版，2000，第57～59页。

③ Е. Ю. 古西科娃：《南斯拉夫危机的历史（1990～2000）》，出版人A. 索洛维耶夫，莫斯科版，2001，第53～54页。

④ S. L. 伍德沃德：《巴尔干悲剧——冷战后的混乱和解体》，布鲁金斯学院华盛顿版，1995，第45页。

南斯拉夫核心部分的实质是，中央政府随时准备使用为保住政权和国家领土完整所需的各种规模的暴力，这个核心一旦消失，国家便变得失去控制。种种规章法令，包括正式宣布的东西，在强有力的专制政权治下可以发挥作用，但在铁托生前事实上起作用的各共和国边疆区对联邦政府所做决定的否决权，在政权日渐弱化的条件下对于管理国家便不中用了。

外部的问题常常被置于内部问题之上。南斯拉夫得以保持其1945年建国后的稳定状态，最重要的因素乃是其国家地位：根据《雅尔塔协定》，无论苏联或西方都不承担对它进行监督。铁托很善于利用与此有关的优势。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的冲突过程中所中断的关系恢复之后，他便打通了苏联和东欧市场，又与经互会国家签订了非现金结算协议，这些都促进了南斯拉夫经济的增长。当时南斯拉夫能吸引西方贷款的条件颇为良好。国家可以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提供的低息贷款。如果将这一时期的南斯拉夫对外政策方针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达，则可以借一句古老的俄罗斯谚语进行描述："乖牛犊吃两个妈妈的奶。"

1940年代末期以来全民保卫南斯拉夫的概念建立在欧洲两个政治军事集团对立的基础之上，为的是保障国家的安全。南斯拉夫领导人明白，在其国土遭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华沙集团进攻的情况下，要赢得战争是不可能的，不过可以组织游击队的抵抗基地，给进攻一方制造麻烦并依靠与之对立的集团的支持。于是便一心指靠预备役士兵的军事培训，指靠将武装人民的概念作为国家防卫的基础，这在后来南斯拉夫危机的爆发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情报分析家们1989年都将南斯拉夫视为在最大限度上准备建立完全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南斯拉夫领导人开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商，随后又进行旨在奠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基础的改革。1955年他们为公民往来和相对自由的对外贸易开放边境。1965年时业已完成关于南斯拉夫关贸总协定成员资格条件的谈判。该国早就有了与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自由贸易区进行合作的协议，当时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就签订类似条约的可能性开始讨论。

甚至在1979~1989年不平常的十年之后，南斯拉夫的福利水平、出国工作机会、文化多元化似乎已使其成为经历过社会主义发展时期、有着融

入欧洲富国俱乐部重大机遇的国家中无可争辩的领先者。

肇始于1989年的苏维埃帝国在东欧的瓦解，对南斯拉夫而言意味着巴尔干力量平衡独一无二的参与者的地位毁于一旦。除此之外，作为制度合法基础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吸引力亦已削弱。

米·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冷战”的中止、1980年代末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的解体，改变了南斯拉夫生存的对外政策和经济的环境。它丧失了作为位居欧洲关键地区但既不依赖苏联也不依赖北约的国家优势。它参与其中的经互会框架内的非现金结算贸易归于瓦解，使南斯拉夫经济遭受重创。另一个挑战则是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享有特权的借债人地位的丧失，由于政治的原因它一直以优惠的条件获得贷款。国内经济问题引发了南斯拉夫经济的危机。

南斯拉夫的经济问题自197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不断加剧。通货膨胀加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下降（表1－1）。

表1－1　南斯拉夫的GDP增长率、通货膨胀和失业状况

年　份	GDP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	失业者占经济自立人口总数的份额（%）
1978	9.0	14.1	12.0
1979	4.9	20.5	11.9
1980	2.3	30.3	11.9
1981	1.4	40.6	11.9
1982	0.5	31.8	12.4
1983	-1.4	40.8	12.8
1984	1.5	53.3	13.3
1985	1.0	73.5	13.8
1986	4.1	89.1	14.1
1987	1.9	120.3	13.6
1988	-1.8	194.6	14.1
1989	1.5	1258.4	14.9
1990	—	580.6	16.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署（http：//unstats.org/unsd/cdb）；B. R. 米歇尔：《国际历史统计·欧洲1750～1993》，麦克米伦参考书目股份有限公司伦敦版，1998。

事情很清楚，以工人自治为基础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市场模式在工业

化社会条件下运转不佳，认为它不富有生命力的一些著名的经济学论据反映了南斯拉夫经济的种种现实问题。①

铁托的去世使有关税收、预算、外贸的决策机制陷于瘫痪。同时包括外债增加等成堆的问题要求联邦政府机关采取行动，要求各共和国同意分担重担，以适应恶化了的外部经济环境。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却不肯就由谁、在多大程度上勒紧裤带达成协议。

富有经验的马尔科维奇 1989 年试图进行一系列经济改革，实现南斯拉夫经济基础转变和财政、货币的稳定。旨在使南斯拉夫市场一体化的这一计划的主要之点是取消对外国人财产所有权、抽回利润权的限制。1989 年 1 月 19 日，这位总理将废除继承自社会主义的所有权制度的法案提交议会审议。取消了土地拥有数量和进行买卖的限制，扩大了老板雇用和开除工人方面的的权力。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批准或否定对企业领导人的任命特权不复存在。1989 年 12 月为 50% 的通货膨胀率至 1990 年 5 月时实际上已降为零。②

权力集中到联邦一级是实现这一计划的必要前提。然而铁托为了防止将南斯拉夫变为塞尔维亚帝国而制定的全联邦宪法却不允许实施这样的计划。宪法规定的联邦政府可以强行让共和国机关接受其决定的权力极小。

马尔科维奇政府出于严峻的经济现实考虑所提出的要求、旨在挽救国家经济的行动激发了机制的政治危机，结果导致南斯拉夫瓦解。两年后这个国家已不复存在。其国土成了族际流血冲突的战场，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造就了数百万难民。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冲突期间牺牲了 2 万人，20 万人沦为难民，35 万人处于流亡国外的状态。波斯尼亚战争期间牺牲了 7 万人，200 万人成为难民或流离转徙。③

1990 年代南斯拉夫危机的历史在文献中有着详尽的描述，并不是本

---

① B. 沃德：《伊利里亚的公司：市场工团主义》，载于《经济评论》第 48 卷，第 4 期，1958，第 266～289 页；B. 沃德：《社会主义经济：有组织选择的探讨》，兰登书局纽约版，1967。

② S. L. 伍德沃德：《巴尔干悲剧·冷战后的混乱和解体》，布鲁金斯学院华盛顿版，1995，第 129 页。

③ S. 科瓦谢维奇、P. 达吉：《1942～1993 年的南斯拉夫大事年表》，IES 出版社贝尔格莱德版，1994，第 248 页。

书的目的所在。[①] 从所分析的问题角度看来，重要的是这段历史表明，在多民族国家中专制制度崩溃的条件下，无论是在宗主国，还是联邦内自认为受损害的地区，民族主义都成了居于主要地位的话题。

自从 1912～1913 年巴尔干战争以来，讨论有关南斯拉夫各民族相互之间的领土要求是一种非正式的道德上的禁忌。这种忌讳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数年才被打破。在专制制度条件下，这一禁忌往往由严厉的政治制裁予以强化。[②] 1990 年代制度的自由化和各共和国议会的民主选举，使得利用这一武器成为无可避免之事。它太富有政治功效了，不可能忽视它而又同时指望在争取选票的斗争中获胜。

利用激进民族主义思想的进程中，最积极的参与者当数塞尔维亚领导人。当时领导塞尔维亚共产党的是 C. 米洛舍维奇，他才华横溢，能力非凡，文化教养极高而又富有市场经济工作经验。1980 年代末期，共产主义理想吸引力的削弱为他控制塞尔维亚政局提供了一个机会——利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内部受到损害的地位和在科索沃、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居于少数的塞尔维亚人的问题等大做文章。[③] 当时在贝尔格莱德，通过谈论南斯拉夫各共和国边界系克罗地亚人铁托人为划定、塞尔维亚人必须联合成为领土毗连的统一国家等话题积累政治资本并非难事。

1986 年由塞尔维亚科学院起草的一份文件的初稿中，核心内容就是塞尔维亚人的利益在南斯拉夫如何受到损害——这是一个专制制度正遭遇危机的多民族国家中政治家们不可能不要求的那些原则的宣言。这个文件的摘要以《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人民的地位》为题刊登在 1986 年 9 月的贝

---

① 例如，可参见 C. 贝特：《南斯拉夫的流血溃灭：起因、过程和结果》，纽约大学出版社纽约版，1955；B. 丹尼奇：《种族国家主义・南斯拉夫的悲剧性灭亡》，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明尼阿波利斯、伦敦版，1996；V. 格利戈罗夫：《国家何以瓦解？南斯拉夫案例》，乌普萨拉大学乌普萨拉版，1994；T. 奥伯沙尔《南斯拉夫的衰亡》，载于《布达佩斯经济科学大学学报》第 18 卷（3），1992。

② 1971 年，当克罗地亚共产党领导人开始积极利用民族主义思想时，铁托几乎让他们一律退休。

③ 关于民主传统缺乏和专制主义历史遗产对南斯拉夫各共和国激进民族主义发展的影响，见 Д. 亚尼奇：《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民族自决危机和民族冲突》，载于《转型社会中的社会冲突》，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的资料打字文本，1996 年 5 月 15～17 日，第 13 页。

尔格莱德报纸《晚间新闻》上。评论该文件的一篇文章的作者们当时已意识到，这里涉及一整套想法，试图实现这些想法必将导致“自相残杀的战争和新的血流成河”。[①] 诉诸民族自大和民族受压的感情——这在那些旧制度正在走向没落而又缺乏民主政治制度发达体系的国家的政治进程中无异于引爆核弹。[②]

多民族国家中新出现的民主制度的问题在于，那些在政治方面最容易向缺少经验的选民“推销”实际上尚未付诸现实的口号是很危险的。1980年代后期贝尔格莱德反对“塞尔维亚理当伟大”和“我们不允许任何地方杀害塞尔维亚人”是一项政治上明显失败的任务。在政治市场上推销塞尔维亚过去和将来都很伟大、共和国领导人永远也不会让其他共和国和自治区的塞尔维亚人受欺负等思想——这很容易。如果塞尔维亚领导人不占领这块地盘，无可避免地会有别的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将其利用起来。1989年5月，塞尔维亚议会选举米洛舍维奇为总统。在同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86%的选民对他表示支持。[③]

不难预见，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和萨拉热窝的政治家们也会热情地接过这些口号，只需将“塞尔维亚人”这个字眼换成“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等词语即可。自从塞尔维亚领导人同意接受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思想作为政治思想基础的计划之时起，南斯拉夫的命运即已预先决定。塞尔维亚领导人向邻国提出领土要求，为利用对塞尔维亚称雄及其领土野心的恐惧心理的其他共和国民族主义领导人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争已成为无可避免。伴随着数万人丧命和数百万人被迫流离失所的一个进程的机器已经发动起来。

各民族原本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的边界大多约定俗成，已由不民主的制度随意加以确定，基于各民族对抗的政治宣传便成了流血冲突的序

---

① K. 米哈伊洛维奇、B. 克列斯季奇：《AHY 备忘录：批评劝阻》，CAHY 出版社贝尔格莱德版，1995，第150页。

② 这类问题的典型事例是2005年伊拉克进行的选举。无论在什叶派、逊尼派还是库尔德人之中，都有不少经济和社会目标极端不同的政治运动。尽管如此，选举在人口调查上也有所表现，它可以表明国内什么人更多，但逊尼派伊拉克人却不予理睬。他们确切地知道自己的这派人少。问题在于人口调查并不能消除族际冲突的尖锐性。

③ V. 梅尔：《南斯拉夫灭亡的历史》，劳特莱奇出版社伦敦、纽约版，1995。

幕。南斯拉夫25%的塞尔维亚人生活在塞尔维亚境外。不难理解大塞尔维亚思想的宣传会如何影响他们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那些共和国对他们的态度。克罗地亚共和国对一贯生活在该国的塞尔维亚人进行镇压，便成了对大塞尔维亚高论和对该国提出领土要求的回答。对这类镇压的回应则是南斯拉夫人民军（其下级军官大多为塞尔维亚人）采取保护居于少数地位的塞尔维亚人的行动。接下来则是一场战争。

与专制制度解体有关的政治进程影响了现行的经济政策的效果。1990年在各共和国开始举行的民主选举激起了被R. 多恩布什和S. 爱德华兹称为“民粹主义经济”的浪潮。[1] 相互竞争的各政党比赛谁向选民许诺的福利更多。联邦政府机关对预算和货币政策的监督开始削弱。1990年春实际上已经停止的通货膨胀到夏秋之际重新扶摇直上。不过，在日益加剧的政治混乱的情况下这已经是次要的因素了……

※ ※ ※

20世纪帝国的解体乃是被称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全球化进程的组成部分。跌入历史飞轮的人们并未因此而感到轻松。利用对帝国的感情成了政治斗争的有力手段。这里可以回忆斯大林的一句口头禅——“兄弟姐妹们”。这些字眼出自一个杀害自己同胞的人之口，听起来未免亵渎神灵。尽管如此，这是一个政治上效果卓著的进程。它恰似利用处于俄罗斯境外的俄罗斯人的问题或诉诸后帝国意识。

有些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各多民族实体中大肆煽动激进民族主义、拒绝接纳比邻而居的外族，要大家念念不忘同族人曾经遭受的历史屈辱，这些人应当记住，他们这是在为民族清洗和千百万人受苦受难开辟道路。遗憾的是，即便是自身的经验也未必能提供什么教益，至于旁人的经验，则更近乎毫无用处。然而如若我们不肯从我国和20世纪其他帝国所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那么，我们便可能成为世界的威胁。这正是俄罗斯可能发生的最为可怕的事情。

---

① R. 多恩布什、S. 爱德华兹：《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微观经济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版，1991。

第二章
专制主义制度：不稳定的缘由

一个最强有力的人如果不能将自己的力量变为权力，而让服从于他成为一种义务，则他永远也强大不到始终充当统治者的地步。

——让·卢梭：《论社会契约·协定》

专制制度是一种政治结构，这种结构所依据的既不是传统的合法性，也不是政府和议会应在竞争性选举基础上组成的这一社会公认的程序。这种制度的领袖人物清除政治竞争对手、镇压反对派、将大众传播媒介置于监控之下，就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他们认为自己所掌握的强制手段足以保障政权的稳定。这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幻想。这样的政权组织形式内里是不稳定的。这与附带的各种情况或偶然性无关，而是其本质使然。

仰赖于传统（现今在世的父辈、祖辈的统治方式怎样，今后也仍将怎样）的君主制国家能够保持稳定数百年之久。在最大的农业文明社会——中国，朝代周期可长达 300～400 年。也有一些共和国和君主立宪制国家（这也是某种民主制[①]），它们显示出适应各种史无前例的挑战的能力，引发这些挑战的是工业化、都市化、人口流动、纳税人的民主制向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国家结构转变。这些国家都能在若干世纪期间保持政治稳定。

专制制度稳定超过 75 年（这是三代人的时间）之久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在这方面，欧洲的帝国传统之源罗马是个例外。但它的政治结构中混杂着专制制度和农业君主制的各种特点。

---

① 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国家元首行使各种礼仪功能，而关键性的政治问题（权力执行机构、财政、立法）则由议会进行监督，就其实质而言这也是民主制度。

按政治结构的形式而言，大多数可以称为帝国的国家或者是君主制，或者是民主制，但这种民主制仍限制了殖民地居民的权利与自由。甚至在宗主国是民主制国家的情况下，它也不肯赋予被征服领土上的居民在解决全帝国问题上的表决权。

在这方面，极权主义的苏联和专制主义的葡萄牙有着共同之点，它们的政权既非依据君主制的传统，也不依据宗主国的民主程序。尽管所发生事件的规模并不相同，但苏联制度的崩溃与葡萄牙帝国的灭亡两件事在时间上却相互吻合，这绝非偶然。专制制度和极权制度内不稳定的原因，乃是在讨论苏联 1980 年代 ~ 1990 年代初所发生的事情时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在传统君主制的合法基础被社会变化所动摇、而形成稳定的民主制的先决条件又尚未具备的时期内，普遍流行的专制制度都具有不稳定性，这正是本章的主题。

一　现代经济增长早期的挑战与专制主义

农业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生产的组织方式、居住分散的状况和人们从事的职业都长期稳定。[①] 恪守传统、效法父辈和祖辈的榜样是这种体制的基本要素。要说变化，就是被烧毁的村落、被踏坏的庄稼。在农业社会，以延续数百年的、简单明确的王位继承顺序的传统支撑的君主制是一种合乎情理的政治体制。

M. 奥尔松写道：在王权的继承过程中，国王的长子比所有的人都能更好地履行统治者的职能这种几率并不大。然而百姓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国家元首按照继承程序移交权力时能够以国家的长远利益为重，则他们必将受惠。在由什么人继任统治者的问题上看法一致，对所有的人都有裨益。[②] 稳定的君主制时代在君主逝世之后，很少为争夺王位继承权

---

① 农业社会通常指的是一种社会组织类型，它是在经过新石器时代的大变革、耕作和牲畜饲养的技能得到普遍掌握和传播之后形成的。数千年间这种社会在全世界都居于主要地位。它在世界上一直存在到 19 世纪现代经济开始增长之前。见叶·盖达尔：《漫长的时间·俄罗斯在世界上：经济史随笔》，第 127 ~ 170 页。

② M. 奥尔松：《权力与繁荣——过时的共产主义专政和资本主义专政》，基本图书出版社纽约版，2000。

发生流血的破坏性农民战争。虽然偶尔有发生，但那是例外而非常规。君临天下的王朝的稳定使君王视国家为可以传诸子孙的私产，因而必须对保持臣民的富足予以关注，不可课以令人破产的捐税使其贫弱不堪。政治体制的稳定可以形成涉及有德明君、遵循传统和关心国家繁荣的统治者等观念的行为准则。孔子学说便是论证这种治理思想的鲜明例子。

农业社会中的权力转移规则、代表机关（国民议会、贵族会议）在确定君主去世后的继承顺序方面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不过就农业世界的大部分而言，在位君主的长子充当王位继承人的王朝仍属常规而少有例外。

在欧洲城市国家以及随后的领土毗连而非城市的政治实体中形成、以纳税人的民主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制度体系，为史无前例的经济高涨开辟了道路。在农业世界千百年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这是对传统君主制最为严重的挑战。[①] 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破坏了世袭君主制政治稳定的基础——传统。[②] 如果说还为君主留下了位置，那也只是履行礼仪的功能，而与治理国家无关。

18 世纪初期，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荷兰和英国成为效法的榜样，它们都是有着对执行权进行监督的强大议会的国家。彼得一世正是去那里学习先进技术操作经验。他当然并不想将荷兰或英国的制度移植到俄罗斯本土，建立起具有权威的议会。但他却很清楚应当到什么地方学习有用的最现代化的军事技术。

在西欧国家以及它们的某些殖民地，议会势力强大的发达国家（首先是英国和荷兰）的经验使人们对君主制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对于 18 世纪末的美国思想家和政治家托马斯·潘恩而言，君主长子是最佳统治者的思想令人觉得滑稽可笑。[③]

---

① 详见叶·盖达尔：《漫长的时间·俄罗斯在世界上：经济史随笔》，第 7 章。

② 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社会动员和国家制度合法性传统基础破坏所引起的各种社会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见 K. W. 多伊奇：《社会动员与政治发展》，载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 55 卷，1961 年 9 月，第 494、495 页；S. W. 艾森斯达特编《比较社会问题》，格伦比科自由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纽约版，1964；S. W. 利普塞特：《政治人。花园城市》，双日股份有限公司纽约版，1960。

③ 托·潘恩写道：如果说君主制贬低公民，那么继承权就是公然的侮辱。所有的人生来平等。任何人按照出生权都无权取得高人一等的地位。有的人可以希冀受到同时代人的尊敬，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的继承人也理应得到这种荣誉。见托·潘恩：《普通观念及其他政治著作》，普特南出版社纽约、伦敦版，1783。

17～18 世纪的欧洲大陆兴起一股思想浪潮，破除了认为君主专制政体这一政治制度方式合乎情理的信念。在欧洲的社会意识中，选举产生的议会是合理政治制度结构中必不可少因素的模式已经扎根；人们日益深信，正是应当由议会规定税收、决定如何花费国家财政资金和组建权力执行机关。别的社会组织方式都被认为不符合健全的理智。所有这一切便为政治生活中的大规模变革、法国大革命及其思想在欧洲的传承做好了准备。

关于社会体制的这些观念的传播，通过远离欧洲发展中心的俄罗斯的例子也看得很清楚，尽管比在西北欧要缓慢。十二月党人坚信，保留十足的君主制与争取获得文明、发达国家的地位互不相容。

破除传统君主制各项制度的合法地位，并不能保证民主制度立即便能获得巩固。[①] 甚至在议会已有上百年传统的国家，其作用也是有限的：这只是定期开会，就有关征税数额、国家资金开支等问题通过决议的机关。身为这样的机关，它们已是司空见惯、固定成型的机构了。让它们转化为最高权力机关乃是与传统决裂。这种转变常常伴随着纷争和混乱。

当君主制法规已不合法而民主法规尚不稳定之际，有一种可能性便会增长：能够依靠武力的执政者候选人可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而不顾及多数公民认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合理和可以接受。诸如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制度之类的欧洲专制制度[②]的政治基础就在这里。这类事态发展的威胁在已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进程的国家中曾长期存在。西欧虽有许多个世纪的议会传统，最后一批专制制度却直至 1970 年代中期才得到民主化并由民主制度所取代。[③] 东欧在这方面更加落后了 15 年。

专制制度容易掌握政权的因素之一，是与现代经济增长起始阶段有关

---

① 我将民主制的普遍定义用作一种政治制度的定义，在该制度的范围内治理国家的人是在竞争性选举中被选出来的。以这样的观点来看，民主制度就是执政党在例行选举中没有不失败保障的一种政治制度。见 A. 普泽沃尔斯基等：《民主与发展 · 世界政治制度与福利，1950～1990》，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版，2000。

② 人们将这样的政治制度称为专制制度：权力移交给新的执政者不是在确定的、社会公认的规则的基础上进行，不是按照王位继承法或在民主程序的基础上进行，而是由一个有权威的人的特权所决定；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却得不到维护。

③ 希腊是在 1973 年，葡萄牙是在 1974 年，西班牙是在 1970 年代中期。

的社会混乱。从农村来的头一两代移民适应城市生活很困难，社会援助的传统方式遭到破坏而又缺乏符合城市化社会条件的方式，这都构成了居民中低收入群体政治动员的基础。通常在欧洲政治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私有者和纳税人一般都尚未对此做好准备。①

也有一些国家在民主制度发展的进程中显示了解决此类问题的能力。英国的政治制度就具有弹性和适应能力，不致产生严重的危机，可以逐步将全体居民都纳入选民之中。然而并非各处的情况都是如此。唯恐从政治上发动工人和农民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尝试和财产的重新分配——这是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中产阶级之所以支持专制制度最重要的一个因素。②

在非欧洲的地区，由于缺乏具有权威的议会的久远历史，又不可能再依靠古老的传统，要保持现代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政治稳定是一个比在西北欧更为复杂的任务。传统制度军事上的软弱与先进西方的强大形成的对比（军事失败和强加的条约使非欧洲大国成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极为惊人。这使得传统君主制合法基础的动摇无可避免。对于富有文化修养的那部分精英而言事情已经十分清楚，借鉴欧洲的榜样和政治组织方式乃是民族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可是要想进行这样的转变，社会上既没有可依据的规章制度，也没有可以依赖的传统；没有继承自中世纪欧洲的关于居民结社的自由和保卫他们具有免遭统治者恣意妄为之害的权力等观念；没有在确立自由社会现代概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反抗统治者专横属于合法这类根深蒂固的信念。③

这就是长时期不稳定和制度性危机的个中原因。传统制度的合法性已被破坏，而政治生活中新的民主的组织方式尚未得到巩固。这就是直接使用暴力（内战中获胜、国家发生政变）可以开辟通向政权之路的条件。

1960年代初期在非殖民地化导致出现数十个新国家之际，许多研究者认为无可置辩的是，专制的统治方式对这些国家最为有利。德·施韦尼茨

① 英国1624年的议会法令规定："没有财产的人不是自由人。"见C. 希尔：《革命的世纪(1603～1714)》，W. W. 若顿公司纽约、伦敦版，1982，第38页。

② S. P. 亨廷顿：《第三次浪潮——20世纪的民主化》，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诺曼、伦敦版，1993，第16～18页。

③ 关于欧洲中世纪制度的继承性和自由社会概念的形成，见B. 小摩尔：《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灯塔出版社波士顿版，1967，第415页。

在1959年写道：为了经济增长，必须限制社会公众参与政治事务。[①]

如上所述，专制制度通常都是通过暴力途径掌握政权。也有一些例外。有时未来的独裁者们通过民主程序成为国家元首，随后却利用职权限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可以依仗国家机构的潜力或者在缺少来自国家方面的反对时获得对反对派使用暴力的机会。希特勒就是同时使用这两种战略的政治家之一。

无论专制制度以何种方式形成，暴力在其体制中的作用都很巨大。至今国家领导人、强力机构和社会都仍然相信，为了维持政权、镇压反对派，统治者可以对人民使用武力，专制政权能够保持政治稳定。既然政府和社会都相信这一点，采取镇压手段就只是控制有度和如何选择的事了。在对抗情况下，镇压便需要大规模地进行。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帮助独裁者长期维持政权。

二　专制主义制度的不稳定性

依靠使用暴力夺取和维持政权的制度，就其长远前景而言（所说的时间以十年计算）通常都是不稳固的。关于武力是否足以使政权被承认合法的争论，至少从修昔底德[②]时代起即已在进行。对马基雅弗利而言，单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政权显然是不稳定的。[③] 卢梭在其著作中也发表过同样的看法。[④]

专制制度的领袖人物缺乏掌管国家的合法性和能够被社会理解并接受

---

① K. 德·施韦尼茨：《工业化、劳动监督和民主》，载于《经济发展和文化变化》第7（4）卷，1959，第385～404页。

② 由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400年的古希腊历史学家——译者注）记述并流传至今的关于建立在暴力基础上且不被臣民承认为合法的制度是否稳固的最初对话，是发生在梅格斯人与雅典人之间的一场辩论。见修昔底德：《历史》，拉米尔、ACT出版社莫斯科版，1999，第344～349页。

③ 尼·马基雅弗利（15世纪至16世纪的意大利思想家和作家。——译者注）在自己的著作《君主论》中写道："……莫名其妙获取的权力与自然界的万物一样，诞生和生长得太快，没有根底和枝杈。因而一遇到恶劣天气便会死亡。"见尼·马基雅弗利：《选集》，里波经典作者出版社莫斯科版，1999，第385页。

④ 让·卢梭：《论社会契约·协定》，A.Д. 哈尤京、B.C. 阿列克谢耶夫—波波夫译自法文，卡农出版社莫斯科版，1998，第18页。

的解释，乃是这一制度不稳固的原因。政府既无世代相续的传统，又无确认权力合法性的合理而公认的程序。此类政治结构的领袖人物所遇到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此。[①]

君主都有继承人；民主国家的总统或总理则是在合理的、社会公认的规则范围之内接管权力。对于绝大多数专制制度而言，建立继承的规则是不可能的。正式的继承人是对独裁者的威胁。这种制度在创立它的领袖人物去世或无行为能力时，就会出现动荡的危机。

时间表明，专制制度的存续期都不长。[②] 但是当新兴的民主制接替传统的君主制，随而又被专制制度取代的时候，由于旧制度已经破除而新制度又暂付阙如所造成的政治不稳定期却可能绵延数世纪之久。

如上所述，专制制度的领袖人物往往真诚地坚信他们已一劳永逸。然而临时的和不稳定的乃是这种结构性政权的一个典型特征。即便类似的政治结构是在大众已对按照民主程序执掌政权的那些政治家们的浅薄无知和贪污腐化感到失望的条件下而获得社会支持时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会被社会视为不合法，于是便会爆发一场关于何时及如何重建民主制度的讨论。[③] 当这样的讨论已产生相当作用时，就会发现，无论这种制度的领袖还是他的亲信所要做的不过是所谓的“出路战略”——一整套能确保他们下台后自由、安全和福利的行动。

20 世纪最卓有成效的独裁者之一奥·皮诺切特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他执行明智的经济政策，奠定了智利“经济奇迹”的基础。根据他的倡议曾对智利宪法进行了相应的修改，这些修改应该能保障他退休后

---

① 有关专制制度发挥功能机制的经典著作出自 Д. L. 林兹的手笔，见 Д. L. ·林兹：《专制制度·西班牙》；E. 阿拉特、Y. 莱塔嫩编《分裂、意识形态的政党制度：对比较政治社会学的贡献》，载于《西马克学会之刊》第 10 卷，1964，第 292、343 页。同样的论述见 S. N. 艾森斯达特：《现代化：反对与变化》，初学者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恩格尔伍德悬崖出版社新泽西版，1966，第 69 页。

② A. 普泽沃尔斯基等：《民主与发展·世界政治制度与福利（1950~1990）》，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版，2000，第 50 页。

③ A. C. 瓦克斯：《阿根廷独裁主义的崩溃和重新民主化》；J. M. 马洛、M. A. 马洛伊、M. A. 塞利桑伊编《独裁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拉丁美洲的制度变迁》，匹兹堡大学出版社匹兹堡版，1987，第 15~42 页。

的安全。经验表明此举无济于事。[1]

奥·皮诺切特并不是考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个独裁者。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现实性后，专制政权上层的亲信圈子加紧大肆贪污受贿。局势的不稳和政府的不可靠使得当权的精英们都对未来做短期打算。历史上尚无专制统治者之流尊重所有权的先例。统计数据可以表明民主制度存续的稳定性与保障合同权利的可靠性之间的相互联系。[2]

专制制度的国家政权结构简单。不过正如 Э. 伯克所正确指出的："统治的简单方式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如果不说得更坏的话。"[3] 缺少制约和平衡体系，无法对腐败分子出于一己利益而做出的决定进行公开听证，并将这些信息公之于众，就会损害社会（甚至政权本身）对这个政权管理国家合法性的本已很脆弱的信任。

应对专制制度不稳定所产生的挑战的尝试之一，是实行范围有限的或可控的民主制度。这是这样的一种政治制度：形式上保留民主的法规和程序，但由当权的精英们商定权力继承原则，控制选举过程，预先确定其结果。我在先前的著作中曾论述过这种政治组织形式。[4] 为了不再重复，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就总体而言，这种解决办法是行不通的。20 世纪建立了有限民主制的国家都被迫加以放弃，转而着手建立确能发挥功能的民主制度。这种情况既发生在意大利和日本，也发生在墨西哥，它们都被视作类似制度的范例。

对于专制制度特有的不稳定所产生的挑战，也有另一种应对方法——建立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5] 就其实质而言，这是专制制度的亚种。它同样既不是在王位继承的传统基础上形成，也不是根据有竞争的民主程序建

---

① 1964 年政变后掌权的巴西军人政权是对自己领导国家的权利缺乏信心，不得不解决"出路问题"的典型例子。见 S. R. D. 巴雷塔、J. 马科夫：《巴西的阿伯图拉：从未知到未知》，J. M. 塞利桑编《独裁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拉丁美洲的制度变迁》，匹兹堡大学出版社匹兹堡版，1978。

② M. 奥尔松：《权力与财产·过时的共产主义专政和资本主义专政》，基本图书出版社纽约版，2000，第 21 页。

③ E. 伯克：《对法国革命的思考》，雷格内里出版社芝加哥版，1955，第 92 页。

④ 叶·盖达尔：《漫长的时间·俄罗斯在世界上：经济史随笔》，第 15 章。

⑤ 极权主义制度通常被理解为力求确保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政治制度。关于极权主义制度的特点，可参见诸如裴民新：《从改革到革命：共产主义在中国和苏联的消亡》，哈佛大学坎布里奇版，1994。

立起来的。在其形成和运作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是国家政权机关随时准备不受限制地使用暴力。其突出的特征为：对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行比专制制度领袖人物视为合理的程度更为严密的监控，以及专门用来保障该制度正当性的救世论般的意识形态。在一个专制国家里，对于当局最紧要的是让民众不要干预公共政治，不参加示威游行，不进行请愿，不向境外报刊揭露政府的罪行，人们在厨房里说些什么并没有关系。而在极权主义制度下，仅仅因为在家里讲几句对该政权领袖失敬的闲话便可以锒铛入狱。

救世论般的意识形态是极权主义制度一个独有的重要特点。专制主义制度在为其必要性辩解时使用的是讲求实际的论据：民主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够完善啦，大力发展经济至关重要啦，必须抵制过激主义啦。而极权主义制度则借助于宗教的或伪宗教的象征：千年德意志帝国、全球性共产主义、世界性哈里发[①]制度等等。

各种意识形态结构的类似问题在于，它们都是不正当地强加于当代世界的现实。基于以往的经验，令人很难相信其效果。千年德意志帝国的思想酿成了世界大战、彻底失败和屈服投降。建设世界性共产主义制度的意愿造成了缺乏效率的不稳定的经济。时间将会表明，建立世界性哈里发制度的企图又会导致什么、又要戕害多少人的性命。

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环境，必须帮助或至少不要阻碍全球化进程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变革：城市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就业结构的变化、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消除落后于先进国家差距的必要性，成为专制制度为自身存在辩解的意识形态结构的基础。经验表明，成功地达到这些目的并不能保障政治上的稳定。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墨西哥，就是快速发展影响专制制度政治上不稳定的典型例子。在 1910 年之前的 20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一直很高。矿物原料和粮食的生产增长了 3 倍，建立起了纺织工业，发展了石油开采，建成了一批冶金工厂和铁路。本国货币始终稳定，获得外国贷款的条件良好，对外贸易规模和税收收入增长 9 倍，所有这一切仍未能防止革命。[②]

---

① 封建的伊斯兰教神权国家中集教权和政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注

② H. F. 克莱因：《美国与墨西哥》，哈佛大学出版社坎布里奇版，1963，第 52 页；H. B. 帕克：《墨西哥史》，霍顿米弗林出版社波士顿版，1950，第308 页。

发展动摇了不民主政体政治制度的基础。在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国家，专制制度可能很稳定，社会不会提出自由的要求。对自由感兴趣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少数，而且这些人往往明白，自由可能意味着居民中缺少保障的社会群体要求会升级，意味着他们自己可能成为再分配狂热的受害者。统治集团可以依靠从农民中征招来的对城市知识分子思想漠不关心的军队的支持。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和教育水平的提升，情况将会产生变化。

中国台湾就是专制制度遭遇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社会转型引发的合法性危机的例子。1970年代末台湾已拥有高度工业化的经济，以相当大的规模出口高质量的技术装备和信息技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政治控制的传统方法不再起作用。镇压只能破坏当局的威信，增强被迫害人士的声誉。贪污腐败成为社会讨论的话题。封杀越轨的大众传媒引发了群众集会和抗议者与警察的冲突。知识分子中一种信念日渐增长：现存政治制度有着严重的缺陷，必须建立以政党之间的竞争为前提的社会规章制度。大学中组建了对“政府”持反对意见的团体。无党派议员为抗议“执政党”的恣意妄为而离开议会会场。1980年代后期台湾领导人开始明白，继续维持独裁制度已不可能。1987年，“执政党”国民党被迫取消非常状态，允许其他政党的存在。[①]

西班牙专制政权的领袖人物们相信，1960年代快速的经济增长会形成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保守社会。实际上它却促进了文化、社会和政治变革，动摇了政权的稳定。[②]

有一些福利和生活质量的因素无法用按人口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来衡量。迁徙自由、选择居住地点、参与解决国家各种问题的权利、阅读和收听你认为需要的东西的机会、言论自由——这些都属于非物质福利，不能用货币表现形式进行评价。随着福利的增加，对这些权利的要求、它们对于社会的重要意义都在不断增长。

要把这类事情向一直在稳定的民主制度下生活的人们解释清楚颇为困

---

① A. F. 拉林：《两位总统，或台湾迈向民主的道路》，学园出版社莫斯科版，2000，第139页。

② K. 梅德赫斯持：《西班牙从专制向民主演变的曲折道路》，G. 普里德汉姆编《新的地中海民主：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的制度变迁》，弗兰克卡斯出版社伦敦版，1984，第30、31页。

难。他们在教科书中读过谈论自由的文章，也多次听到与此有关的说法。但对他们而言，这些权利像人能呼吸一样理所当然。尽管很难理解此事的重要，但也不能每天都去考虑这样的事情。我曾不止一次遇到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总是试图证明邓小平是多么正确，他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分开，先从建立作用明显和不断壮大的市场经济着手，而没有提出政治自由化的任务。对于他们自己准备以什么样的代价出卖言论自由的问题，他们不知何故不予回答，反而觉得受到了侮辱。看来，他们认为与别人不同的是，在拥有稳定民主制度的国家中，这些权利之于他们是与生俱来的保障。只有那些生活在专制制度或极权主义制度国家的人们，才更容易懂得这类自由的意义。

在缺乏民主传统、处于独裁者强权之下的国家，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对自由的要求也日益增长。遏止这种要求可以使用此类制度的主要资源——暴力。政府当局的问题在于，在日益现代化的社会中使用暴力的可能性正在减小。

专制制度在韩国的溃灭是与保障这类制度政治稳定有关的一个例子。崩溃是在经济高速增长 10 年的背景下随即发生的。

社会经济的变化将各阶层广大居民首先是青年在政治上发动了起来。当局使用暴力遏制这种政治积极性的能力业已受损。① 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城市社会。受过教育的民众懂得，他们与非法的、不民主的、贪污腐败的制度息息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得所有准备为推翻这一制度献出包括生命在内的少数人联合起来。已经很难找到愿意为这个制度卖命的人了。

※ ※ ※

1950 年代末富・巴蒂斯塔统治下的古巴，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1950 年代的古巴，经济以相当高的速度（按拉丁美洲的标准而言）不断发展。1950～1957 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按人口计算年平均增长率为 2.3%。遭遇

① 在伊朗学潮期间，沙赫近卫军的一名军官针对“我们是否会使用武力对付他们”的问题回答说：“不，我们不能这样做。他们终归是我们的孩子。”见《纽约时报》1961 年 12 月 4 日，第 10 版。引文据 S. P. 亨廷顿：《正在变化的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伦敦版，1968，第 211 页。自然，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此前伊朗的沙赫制度是否是一种专制制度。按形式而言这可是传统的君主制，但是只需要回忆一番即可：数代出身皇族的伊朗人并不拥护礼・巴列维。

国内武装反抗挑战的政权决心采取自我保全措施。国内实行了严格的大众传媒检查制度，有一支实力强大的秘密警察。巴蒂斯塔感到自身权力岌岌可危，便大大增加了军队的数量。被怀疑对现政权有越轨行为的民众遭到大规模刑讯和杀害。军队和警察的领导都是来自于与巴蒂斯塔关系亲密之人。他们关心的是保持现状。

起义者登陆之后，巴蒂斯塔采取了坚决行动：政府机关所在的各大楼周围都布置了警察巡逻队；飞机和军舰在沿海巡逻；政府军对居民支持起义者的村庄进行轰炸；成百上千的民众被投入监狱；被当局怀疑为同情现政府反对者的人陈尸街头。[①]

这仍然不足以阻止革命者。1956 年 12 月，82 名革命者登陆后仍活着的仅余 12 人。1957 年春天记者还在争论造反者究竟还有多少：是 50 人还是 100 人？到了当年秋天已经说是 1000 人了。1958 年年中谈到的数目更增至 5000～10000 人。[②] 决定古巴革命命运的并不是政府军士兵数量与起义者实力表面上的对比，而是社会认为巴蒂斯塔政府贪污腐化和有失公平。[③] 指责贪污腐化是菲·卡斯特罗宣传中的重要内容。[④]

自然，古巴和韩国一样，从来都不是帝国。之所以将它们与帝国合并在一起谈，是因为作为现有制度合法性的基础都是强权。它们的例子表明，在现代世界上这是一种多么不可靠的基础。

三　专制主义崩溃的机制

预测专制制度危机开始的时间颇为困难。有时它很长时间都不到来，

---

① 《迟延的反叛·古巴》，载于《时代》杂志 1957 年 1 月 7 日，第 33 页。

② R. H. 菲力普斯：《古巴说造反者仅 50 人》，载于《纽约时报》1957 年 3 月 2 日；H. L. 马修斯：《卡斯特罗的造反者面对古巴军队的攻势节节胜利》，载于《纽约时报》1958 年 6 月 9 日，第 1、13 版；《古巴的造反者——安德鲁·乔治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访谈》，载于《瞭望》1958 年 2 月 4 日，第 30 页；R. H. 菲力普斯：《古巴选举前夕卡斯特罗的权力达到顶峰》，载于《纽约时报》，4E 版，1958 年 11 月 2 日；《巴蒂斯塔镇压造反者的努力遭到失败》，载于《纽约时报》1958 年 7 月 2 日，第 1 版；《古巴进入第三年》，载于《时代》杂志 1958 年 12 月 1 日，第 32 页。

③ 切·格瓦拉：《革命战争片断》，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莫斯科版，1974，第 210～217 页。

④ H. L. 马修斯：《古巴反叛势力频频得手，但巴蒂斯塔处于有利地位》，载于《纽约时报》1957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一；L. 哈伯曼、P. M. 斯威齐：《古巴：一场革命的剖析》，每月评论出版社纽约版，1960，第 59、60 页。

但一旦开始便进展急速，比任何人所能预料的都要快。专制制度领袖人物们自己往往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伊朗最后一位沙赫[1]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便对1978年事件的发展感到惊讶，曾经问过美国驻伊朗大使乔治·萨利文："令我不安的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超出了克格勃[2]的能力范围。也就是说，这是英国秘密机关或者美国中央情报局干的。为什么中央情报局决定干这种反对我的事情呢？"[3]

专制制度瓦解的机制多种多样。这往往与独裁者的个人遭遇有关。这种政治结构的稳定性取决于专治统治者的生命或健康状况，政治精英们都聚集在他的身边，这位统治者一死，往往上层统治集团中的内讧阶段便开始了。例如，蒋介石的去世（1975年）就为"台湾"的民主制度开辟了道路，1979年10月韩国总统朴正熙被谋杀也加快了该国的民主化进程。

有时候危机爆发的机制与军事失败有关。这方面的鲜明例证便是阿根廷争夺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战争[4]之后的事态发展。

信息全球化是动摇专制制度稳定的重要因素。20世纪初世界上绝大部分居民都很难想象他们的村庄之外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别的社会机构是如何组成的。20世纪使世界连成了整体。有关发达国家政治制度构成情况的知识尽人皆知。要向民众特别是向其中年轻的受过教育的一部分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们的同龄人在其他国家享有自由和参与解决国家问题的权利，而他们却没有，必须由大权在握的长官们替他们去做这种事情——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导致专制制度瓦解危机的原因之一是民族之间的冲突。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制度在民族和宗教多种多样的国家都不太稳定。[5]

也有另外一些不同的情形。伊朗沙赫制度瓦解之前既没有经历军事上的失败、专制统治者的去世，也没有民族之间的尖锐冲突。它是在石油市

① 沙赫是某些伊斯兰教国家国王的称号，最早用于波斯（伊朗），即波斯（国）王。伊朗最后的沙赫礼·巴列维于1979年被人民革命推翻。——译者注

②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称。——译者注

③ W. H. 萨利文：《出使伊朗》，W. W. 诺顿出版社纽约版，1981，第156页。

④ 指1982年阿根廷与英国争夺该群岛领土主权的战争。——译者注

⑤ A. 普泽沃尔斯基等：《民主与发展——世界政治制度与福利（1950～1990）》，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版，2000。

场行情良好和福利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不过终究更常见的还是专制制度解体之前发生了经济危机。

现代经济增长的世界充满曲折变化，很难加以预测。准确可靠地预告原料资源的价格或世界货币的汇率，这超出了经济科学的能力范围。生活迫使人们适应外部的挑战。这些挑战很难预见，对它们无法预作准备。20世纪的历史上，让国家政权或国际共同体都深感意外的危机事件比比皆是。这是不得不加以考虑的现实。1994年墨西哥所发生的危机，无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验丰富的领导人还是美国智库都不曾料到。1997～1998年发生在东南亚、随后又蔓延至后苏联区域和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同样出乎专家们的意料。[①]

1990年代末出版了一部以很高的专业水平写成的书，讲的是石油开采国在1980年代石油价格下跌的情况下所遇到的问题。印度尼西亚在该书中被作为顺利适应世界发展环境变化的范例。[②] 在该书成功问世之前，印度尼西亚政权却由于东南亚事件而倒台。[③]

政府一旦遭遇经济危机，就不得不削减预算支出，提高税率，宣布本国货币贬值，限制进口，减少国家补贴，所有这一切都是难以忍受的不得人心的措施。为了实行这些措施，政府必须确信社会可以接受或者政府能够使用暴力制止可能出现的骚乱。

专制制度遭遇类似危机时的软弱无能在于，它们既不拥有第一种资源，也不拥有第二种资源。社会公众认为这种制度并不合法，而且贪污腐败，要想向他们解释清楚采取一整套实质是要人们“勒紧裤带”的经济措施的必要性颇为困难。贪污腐败在福利增长的情况下被视为令人厌恶的然而又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而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它则成为对于社会制度是

---

① J. B. 德隆：《1990年代的国际金融危机分析》，2001年11月。R. 多恩布什：《新兴市场危机浅析》，载于美国国家经济调查局工作文件，2001年第8326期；M. 戈德斯泰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性方案》，为美国国家经济调查局新兴市场经济中的经济金融危机会议草拟的文件，2000年10月19～21日，伍德斯托克，弗蒙特。

② J. 阿马泽加：《管理石油财富：欧佩克的横财和陷阱》，I. B. 托里斯出版社伦敦、纽约版，1999。

③ R. 本内迪克特、G. 安德森编《暴力和苏哈托的印度尼西亚现状》，东南亚计划出版物，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纽约版，2001；霍尔·希尔：《印度尼西亚：老虎经济奇怪而突然的毁灭》，载于《牛津发展调查报告》第28（2）卷，2000，第117～139页。

否合理而公正的这种认识的挑战。

专制制度瓦解之前常常出现一个不稳定的时期，其时这个制度正在失去最后一点合法性。回想起来，确定其开端并不困难。譬如说，在伊朗便是起始于1970～1978年，当时沙赫政权加强了秘密机构对于公民日常生活的监控，大力镇压反对派领导人。1970年在伊朗没有由于政治原因而爆炸过一枚炸弹。1972年出于政治理由的爆炸则多达13起。1974年发生了学潮和与食品供应有关的德黑兰骚乱。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激进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思想的吸引力不断增长。1977～1978年，一系列群众性的示威游行以及随之而来的使用暴力成为该国生活的典型特征。[①]

如果专制统治者一直掌控着强力机构，他便能采取专制制度惯用的手段压制社会的不满情绪，表明他为了保住权力，可以想让人们流多少血就流多少血。然而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认为现政权不合法和不稳固的看法往往也扩散到列兵、军士和下级军官之中。在专制统治者特别需要忠诚的强力机构之际，它们却按兵不动。

专制制度不稳定的问题并不因其崩溃而结束。在缺少合法的政治程序和对社会生活有影响力的负责任的议会的情况下，最简单的一些口号便成了反对派吸引人的核心。其实质千篇一律："让寡廉鲜耻的反人民制度灭亡"；"公正和重新分配"（将一切拿来瓜分）；"对卖国政权说不"（激进的民族主义）。将诸如此类的口号结合起来，便成了反对现有制度的强有力的斗争手段。例如，这一手段对1950年代古巴菲·卡斯特罗所领导的"7·26"运动便很典型。实现这些口号的意愿并不就是建设稳定的民主制度的最佳保障。[②]

专制制度尽管不合法，总归还是在行使职能的政权。街道上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如果国家比较发达，孩子们都能上学，在医院里可以获得医疗救助。经历过专制制度瓦解的人很难理解的是，这种制度的寿终正寝却意

① H. 宾嫩迪克编：《专制制度变迁》，美国国务院对外服务研究所华盛顿版，1987。

② 革命后在古巴政府机关中工作过，后来又移居国外的不少人都对我说，他们是在明白了菲·卡斯特罗对古巴并不感兴趣之后采取这种决定的。对他而言，古巴在最低纲领的范围内只是发动拉丁美洲反美革命的手段，而在最高纲领的范围内则是消灭美国的工具。

味着多多少少还能保障某些法律和秩序的规章制度也随之瓦解。[①] 2003 年夏天美国当局决定在伊拉克取缔复兴社会党、解散萨达姆政权的警察和军队，并未估计到这样做对于保障街头秩序、保证能源供应、保护国家机关财产的后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政府垄断使用暴力的能力是稳定国家制度极为重要的因素，这一点至少从马·维贝尔的经典著作发表以来便广为人知。[②] 专制制度瓦解时新当局使用暴力维持秩序的能力是有限的，有时会遭到破坏。甚至在原有的强力机构并未解散的时候，它们也失去了继续执行其职的兴趣。对它们而言，新政权稳固到何种程度，旧政权能否卷土重来，它们是否会因与新接替的执政者合作而受到惩罚，这一切统统还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理所当然的战略便是袖手旁观。

取代专制制度的政治制度没有历史的合法性和足以保证政权稳定的传统，这就构成了一个与专制政治制度崩溃有关的基本问题：什么也不能确保这之后紧接着就会形成稳定的民主制度。[③]

经验表明，外部因素对于解决这一问题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苏联的控制在东欧结束之后，欧盟的影响、加入团结了高度发达国家群体的这一组织的前景便是民主制度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拉丁美洲，“冷战”结束之后，“可能他也是个狗崽子，但这是——我们的狗崽子”这种实用主义的原则已经过时，美国的影响有助于保证民主制度的稳定。但这些因素并非在世界各个地区都起作用。

---

① 沃·李普曼（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译者注）正确地指出：“对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生活在可以管理的人群中更为重要的了。如果是自我管理，很好；如果管理得好，更妙。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是可以管理的。”见《纽约先驱论坛报》，1963 年 12 月 10 日。由尼·卡拉姆津（俄国作家、历史学家——译者注）创刊、米·斯塔秀列维奇（俄国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译者注）继续出版的《欧洲通报》1918 年 1～4 月的最后一期，鲜明地显示出了俄罗斯自由知识分子社会意识中特有的困惑：不完善的腐败的制度崩溃可能导致国家各种制度的瓦解、经济和社会的混乱，使得习以为常、虽不完美但还正常的生活难以为继。Б. 诺尔德：《国内生活问题》，载于《欧洲通报》，彼得格勒版，1918 年 1～4 月号，第 374～396 页。

② 马·维贝尔：《政治职业》，慕尼黑版，1919（马·维贝尔是 19、20 世纪之交的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译者注）。

③ 关于专制制度崩溃之后民主制度稳定化的困难，见 G. 奥多内尔、P. C. 施密特、L. 怀特黑德编《从独裁统治过渡：关于难以预料的民主政治的初步结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巴尔的摩版，1986。

西班牙是具有悠久议会传统的欧洲发达国家，它的政治精英们实现了专制制度向民主制的和平过渡。1980年代它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尽管如此，在元首佛朗哥下台之后将近10年期间，国家领导人仍不得不解决保证文职政府当局控制军队的棘手问题。国家不止一次处于军事政变的边缘。[①] 这就是一个例证，说明即便在良好的条件下由专制过渡到民主也是何等的复杂。

在论述后专制主义转变的政治文献中，有一点被视为公理：为了保证顺利过渡，应当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分开进行，不能将二者混淆。必须让社会相信：企图将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的根本改变结合起来，这是一项无法解决的任务。[②] 后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在于，与其他的专制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体制的结构与日常经济生活的组织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政治上的不稳还要加上另一种情况：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体制离开了极权主义的政治权力便无法运作。当国家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监控减弱的时候，这种体制便会瓦解。

---

① J. 马拉瓦尔：《西班牙向民主的过渡》，克鲁姆赫尔姆、圣马丁出版社伦敦、堪培拉、纽约版，1982；D. 吉尔莫尔：《西班牙从佛朗哥君主立宪制的转变》，夸体特书局，伦敦版，1985。

② G. 奥多内尔、P. 施密特编《从独裁统治过渡：关于难以预料的民主政治的初步结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巴尔的摩版，1986，第41页。

第三章
“石油冤家”

我们最好去开采水！

——沙特阿拉伯前石油大臣

舍赫·艾哈默德·扎基·亚马尼

再过10年或者20年你们就会发现，石油必将害得我们破产。

——委内瑞拉前石油工业部长

胡安·巴勃罗·别列斯·阿尔丰索

1985～1986年石油价格几次下跌。但苏联并不是因为在石油市场上趁跌吃进而垮台。

对此，布拉特·奥库贾瓦1995年6月23日在巴黎举行的他的最后一次音乐会上说得很好。他朗诵了这首短诗：

“普天下的经验一再表明，
一个个王国的覆灭
并非由于日子艰辛
抑或可怕的颠沛流离……
覆灭的原因仅仅在于：
（而且拖得愈久愈令人痛心）
百姓对自己的王国
已不再心怀崇敬……”

导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的苏联经济危机，以及它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爆发——所有这一切都与石油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那

么，为什么事情会如此发生呢？当然，首先要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解释。不过我曾亲眼目睹，苏联的崩溃对于美国当局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意外事件，令它感到何等震惊，于是我不再相信诸如此类国家结构的可靠性。

但是，如果假定关于"预谋"的说法准确可靠，那么事情只会更糟。那就不得不谈论苏联几代领导低下的智力水平、不负责任和对国家利益的背叛，他们竟然让国家的经济和命运取决于美国所做出的决定，而美国一向被视为主要的潜在敌人。

苏联并非第一个和唯一一个资源丰富却遭遇严重危机的国家，此种危机是由这些国家用于出口的最重要的原料商品的价格难以预测地发生变化所引起的。为了能理解苏联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所发生的事情，重要的是对与原料价格波动有关的实质问题以及它们对出口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而这是一段相当久远的历史。

一　西班牙序曲

原料资源开采带来的滚滚财源影响国家经济的典型事例，当数 16～17 世纪发现美洲后的西班牙的事态发展。开发黄金、白银矿藏，引进能使金银加工达到按当时标准而言很高效率的技术，所有这一切都导致流入欧洲的贵重金属史无前例地增长。

在 1503～1660 年的将近 160 年间，运抵塞维利亚[①]的白银多达 16000 吨。这种金属在欧洲的储备翻了两番。同一时期运入的黄金多达 185 吨，使欧洲的这种金属资源增加了将近 20%。[②] 图 3－1 所引用的就是关于贵金属流入西班牙的资料。

金银供应的增加，在尚属缓慢增长的欧洲经济的条件下导致商品价格急剧地（按照已经习惯于价格稳定的社会的标准）上涨。[③] 在贵金属首先

---

① 西班牙省名。——译者注

② J. H. 艾略特：《1469～1716 年的西班牙帝国》，爱德华·阿诺德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伦敦版，1965，第 174 页。

③ 与萨拉曼卡大学有关系的经济学家马丁·德·阿斯波尔库埃塔大概是当时欧洲最早注意到物价水平上升与金银自美洲流入有关联的人。见玛·格赖斯—赫钦森：《萨拉曼卡学派·西班牙货币理论读本（1544～1605）》，克拉伦登出版社牛津版，1952，第 91～ （转下页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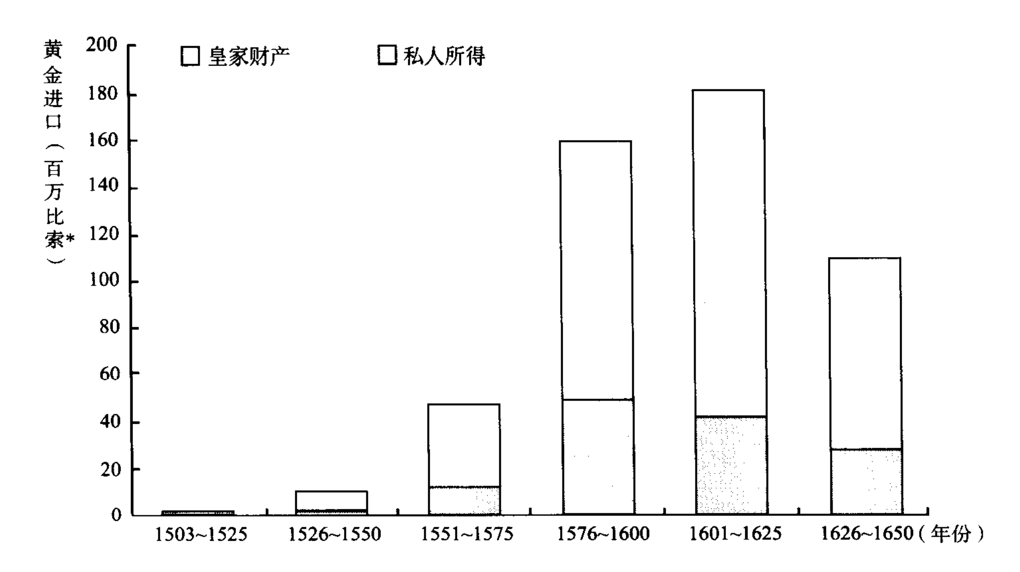


图 3-1 1503~1650 年西班牙贵金属进口总量

＊以 1850 年固定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计算法据 E. J. 哈密尔顿：《美洲的金银财宝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1501~1650》，哈佛大学出版社坎布里奇版，第 34 页。价格指数引自 D. O. 弗林：《财政危机与西班牙（卡斯提尔①）的衰落》，载于《经济史杂志》第 42 卷，1982，第 142 页。

（接上页注③）96 页。论述美洲黄金流人对西班牙经济的影响的经典著作出自 J. 哈密尔顿手笔。E. J. 哈密尔顿：《美洲的金银财宝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1501~1650）》，哈佛大学，坎布里奇版，1934。像经济史上类似的复杂问题常有的情形一样，这部著作也屡受批评。例如，可参见 J. O. 纳达尔：《16 世纪西班牙的价格革命》，载于《西班牙（1959）》第 19 卷，第 303~529 页。嗣后的研究表明，16 世纪~17 世纪初的价格革命不仅仅与美洲的金银流人有关。自 15 世纪 60~70 年代开始，葡萄牙便向欧洲大规模出口苏丹黄金。1470~1500 年间的出口总量多达 17 吨。见 L. 威尔克斯：《15 和 16 世纪的万加拉人、阿坎人和葡萄牙人》；I. 威尔克斯编《黄金森林：阿坎和阿桑蒂王国随笔》，俄亥俄出版社雅典版，1993，第 1~39 页。15 世纪末在南日耳曼开始开采的银矿显著增加了欧洲的白银供应，这也发挥了作用。见 J. 默罗：《“价格革命”的货币起因：南日耳曼银矿、商业银行业务和威尼斯商业（1470~1540）》，多伦多大学经济系工作论文，1999 年 6 月第 8 号；R. B. 奥斯威特：《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英格兰的通货膨胀，经济和社会史研究丛书》，麦克米伦出版社伦敦版，1969；P. 伯克编《早期现代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编年史随笔》，罗特利奇和凯甘保尔出版社伦敦版，1972，约翰·内夫估计 1526~1553 年南日耳曼、奥地利、波希米亚、斯洛伐克、匈牙利的白银产量在每年 80~90 吨之间。见约·内夫：《中欧的白银生产（1450~1618）》，载于《政治经济学杂志》第 49 卷，1941，第 575~591 页。所有这些成为经济史讨论有趣话题的事实，都掩盖不了一个最主要之点——欧洲 16~17 世纪物价上涨与贵金属供应增长的关系。见玛乔里·格赖斯—赫钦森：《萨拉曼卡学派·西班牙货币理论读本（1544~1605）》，克拉伦登出版社牛津版，1952，第 95 页。

① 古王国名，在西班牙境内。——译者注

进入的西班牙，价格上涨得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快（图3－2）。这种情况使得西班牙的农业失去竞争力。卡斯蒂利亚数十年间都成为粮食输入大国。[①]西班牙纺织工业的危机同样是因为贵金属从美洲流入引起物价水平反常高位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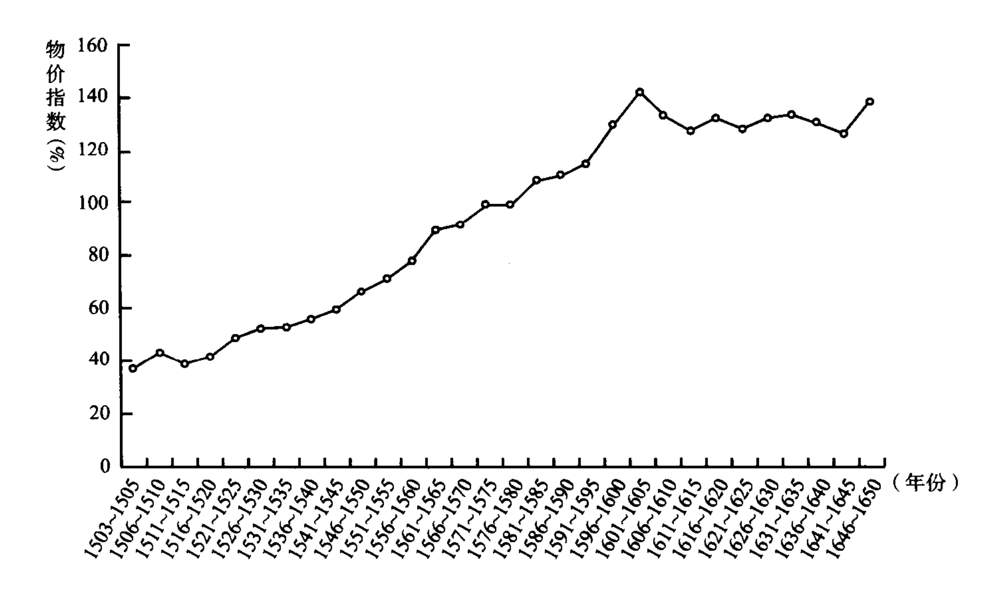


图3－2　1503～1650年西班牙（卡斯蒂利亚—雷翁王国）

物价水平动态，每五年平均值

注：设1580年的价格为%。

资料来源：D. O. 弗林：《财政危机与西班牙（卡斯提尔王国）的衰落》，载于《经济学史杂志》1982年第42期，第142页。

16世纪末在西班牙，抱怨商品的价格昂贵成为众口一词。议会不止一次讨论这个问题。有人提出全面禁止西班牙纺织出口的建议，即便向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出口也不允许。食品和纺织品价格昂贵促使限制物价上涨的措施出台。这些措施反过来又导致了脱销。粮食和纺织品进口的自由化在西班牙已成无可避免之势。

---

① 关于国家调节价格、粮食短缺、刺激出口对西班牙农业发展的影响，见B. 梅伊：《西班牙帝国的教训，或资源丰富的陷阱》，载于《环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05年第1期，第12页。

冈萨雷斯·德·谢利奥里戈对卡斯蒂利亚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之后，将其与发现美洲的后果联系了起来。他于1600年写道：金银流入的影响抑制了投资的增长、工农业和贸易的发展，这证明发现美洲乃是西班牙之不幸。[①] 佛拉芒[②]学者尤斯图斯·利普西乌斯在1603年致自己的一位西班牙朋友的信中写道："你们所征服的新世界征服了你们，削弱并耗尽了你们昔日的勇气。"[③]

与贵金属有关的经济收益在16世纪中叶西班牙国家预算的作用起初微不足道，后来逐渐增加。随着波托西[④]银矿的发现和开采，这种作用变得十分明显。这些收入不受议会支配。它们增大了政府在使用财政资金方面的行动自由。而且美洲的金银实际上是国际银行乐于提供借款的可靠保证。

按照当时的标准，国家将半数以上的预算收入用于军事需要。美洲的金银是旨在保卫基督教、保证西班牙称霸欧洲的外交活动的基础。为了霸权可以拨款进行一系列费用高昂的战争。

16世纪末自美洲流入的贵金属逐渐减少。临近1600年时，蕴藏最丰富的一些银矿已经枯竭。[⑤] 物价上涨实际上也减少了西班牙预算的收入。同时西班牙政府为取得贷款承担了巨额的债务。这正是自16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一系列破产的基础，破产从16世纪后半叶起已成为西班牙财政的典型特征。1557年、1575年、1598年、1607年、1636年、1647年、1653年国家都宣布丧失支付能力。[⑥]

正如常有的情形那样，当局对资金收入波动引起的经济问题的反应很不得当。禁止西班牙学生上外国大学，实行限制贸易的专营，提高毛织品出口税，在王国各边境征收关税——所有这一切都不应当是为军需企业拨

---

① 玛·格赖斯—赫钦森编《萨拉曼卡学派：1544～1605年西班牙货币史读本》，克拉伦登出版社牛津版，1952。

② 居住在比利时北部的民族，荷兰也有少量分布。——译者注

③ 引文据J. H. 艾略特：《西班牙及其世界（1500～1700）（随笔选）》，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伦敦版，1989，第25页。

④ 在玻利维亚。——译者注

⑤ R. T. 戴维斯：《西班牙的黄金世纪（1501～1621）》，麦克米伦股份有限公司伦敦版，1954，第263、264页。

⑥ J. H. 艾略特：《1469～1716年的西班牙帝国》，爱德华阿诺德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伦敦版，1965。

款筹集资金的有效方法。①

事情已经很清楚，帝国的责任承揽起来很容易，必要时想放弃却很难。1609年，西班牙在日益增长的财政困难影响下，被迫与荷兰签署了停战协定。十年后才看清楚，这一步骤并未能解决预算的问题。荷兰人在海上采取行动，他们向西班牙的舰队和殖民地发起进攻，这都要求给武装力量的财政拨款数额不能少于战争时期。

枢机主教黎塞留②的同时代人和竞争对手、西班牙首相（1621～1643年任职）奥利瓦雷斯试图推行自由主义改革（整顿税务系统、减少预算开支和国家机关数量），限制能染指国家收入的政治寡头们的权力，③ 重铸帝国的辉煌。他的见解令人信服，从不贪污腐化，做事精明干练。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解决破产的国家财政与旨在捍卫帝国的军事行动所需经费之间的矛盾。1631年，奥利瓦雷斯明白难以完成所提出的任务后，讲了他那句广为人知的话："既然这个王国的伟大成就使它陷入如此悲惨的境地，那么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没有新大陆它倒可能更为强大。"④

时至1640年，西班牙王国已丧失了它除去比利牛斯半岛之外的欧洲领地，濒临失去对阿斯图里亚斯、加泰罗地亚和阿拉贡的控制的边缘。1640年9月奥利瓦雷斯写道："今年可以认为是王国有史以来最为不幸的一年。"⑤ 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西班牙军队直至1643年之前却连一场陆上大战也不曾输过。

16～17世纪的西班牙历史是一个大国遭到毁灭的例证，它并未在战场上遭受失败，却在过分的妄自尊大的影响下崩溃，而这种自负正是建立在来自美洲的黄金白银收入这样可靠的基础之上的。20世纪在那些实力建立在自然资源开采收入之上的大国，包括我国在内，所发生的事情已是尽人皆知。

---

① P.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兰登书局版，1987，第55页。

② 1624年起任法国首相，实际上是大权独揽的统治者。——译者注

③ 在西班牙遭到许多人憎恨的罗德里戈·德·卡尔德隆于1621年被处死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见J. H. 艾略特：《1469～1716年的西班牙帝国》，爱德华·阿诺德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伦敦版，1965。

④ J. H. 艾略特：《西班牙及其世界（1500～1700）（随笔选）》，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伦敦版，1989，第25页。

⑤ H. 特里沃尔—罗珀：《17世纪的危机》，自由基金出版社纽约版，1976，第51页。

二 资源财富与经济发展

西班牙在16～17世纪所遇到的问题，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现代经济增长开始的前夕广为人知。但有一点长期以来一直俨然像条公理：资源财富、国家拥有对工业化至关重要的矿产的储藏量、大量肥沃的土地乃是发展的重要积极因素。可惜20世纪的经验表明，这种相互关联却更为复杂和更富戏剧性。

1965年与1998年之间，在诸如伊朗和委内瑞拉这样的资源丰富的国家，按人口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减少1%，利比亚则减少2%，科威特减少3%，卡塔尔（1970～1995）减少6%。1965～1998年，在人均收入仅为中、低水平的国家年均增长速度达2.2%的情况下，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全体成员国按人口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却下降了1.3%。[①]

最近10年期间，有不少论述资源财富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著作问世。准确地为资源财富下定义并非易事。有些作者将其定义为原料资源在出口额和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中所占的份额，另一些作者却将其视为全国每一个居民所分摊的领土面积。重要的是，无论定义如何，研究的结果却都颇为近似[②]。这些研究结果显示出经济增长的长期速度与资源财富之间在统计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负相关。[③] 简单地说，拥有自然

① 《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于华盛顿特区出版，2000。

② 关于资源丰富国家的定义，见J.D.萨克斯、A.M.沃纳：《经济趋同与经济政策》，美国国家经济调查局工作论文，1995年第5039号；A.伍德、K.伯奇：《出口产品：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贸易政策》，载于《发展研究杂志》，第34（1）卷，1997，第35～39页；T.吉尔法森、T.T.赫伯茨森、G.佐伊加：《利弊兼有：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载于《宏观经济动态》第3卷，1999，第204～225页；M.瑟昆、H.B.切内里：《发展的模式（1950～1983）》，世界银行讨论论文第41号，世界银行于华盛顿出版，1989。

③ 关于资源丰富国家在保证经济稳定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见A.H.格尔勃：《意外收益：是福还是祸?》，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版，1988；J.D.萨克斯、A.M.沃纳：《自然资源丰富与经济增长》，美国国家经济调查局工作论文，1995年第5398号；J.D.萨克斯、A.M.沃纳：《巨大的推动力，自然资源走俏与增长》，载于《发展经济学杂志》1999年第59期，第43～76页；T.吉尔法森、T.T.赫伯茨森、G.佐伊加：《利弊兼有：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载于《宏观经济动态》第3卷，1999，第204～225页；G.拉尼斯：《发展政策变化的政治经济学》、G.M.梅尔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政策制定：新政治经济学透视》，国际咨询服务出版社旧金山版，1991；D.拉尔、H.迈因特：《贫困、公正和增长政治经济学》，克拉伦登出版社牛津版，1996。

资源不仅不能保证国家未来的繁荣，而且还极有可能使通向繁荣之路复杂化。

这个可悲的行列中的一个典型例子、许多国家中的一个国家便是尼日利亚。该国的一批石油油田于1965年投入运营。其后的35年间来自石油开采的总收入，除去支付各国际石油公司的款项之外，尚有大约3500亿美元（按1995年的价格计算）。1965年按人口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45美元。2000年时依旧停留在这个水平。[①]

研究者一直在争论，与资源丰富有关的因素中究竟是什么因素构成了经济快速增长道路上的最大障碍。[②] 但对与资源财富有关的一系列风险却作了详尽的描述。[③]

自然资源以及因之而取得经济收益的机会，使得得天独厚的国家政府一心扩大预算收入，却丝毫不关心提高一般的税收[④]（表3－1）。

这就意味着，当权者没有必要安排与社会——纳税人及其代表进行的长期对话。那场历史性的对话（导致了妥协），仅仅为形成一整套限制政府恣意妄为、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各种制度铺平了道路。由于这次艰难

① X. 萨拉—马丁、A. 萨勃拉马尼安：《对付自然资源之祸：尼日利亚的例证》，美国国家经济调查局工作论文，2003年6月第9804号，第4页。

② 有一些作者证明，制度性的弱点——许多资源丰富国家的典型特征，才是延缓这些国家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见T. L. 卡尔：《富饶的悖论：石油走俏与产油国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版，1997。

③ 关于经济依赖于原料市场行情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见M. 卡德纳斯、Z. 帕托：《哥伦比亚的石油、咖啡与不断增加的公共问题》，经济研究总网络美洲国家之间发展银行办事处论文，1998，第12～335号。

④ 在资源丰富的国家，与经济收益再分配无关的税收收入的水平通常都低于发展水平相同但缺乏资源的国家。关于一般税收的低水平与资源丰富的联系，见T. L. 卡尔：《富饶的悖论：石油走俏与石油国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伯克利版，1997。在世界最大的石油开采国沙特阿拉伯，1980年代中期90%以上的预算收入与石油的开采和出口有关。见《沙特阿拉伯王国：1970～1986年发展计划的成就》，规划部出版社利雅德版，1986。在资源丰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国家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将与这些资源有关的收入集中到自己手中。П. 苏捷拉注意到，中世纪挪威的丰富资源（盛产大西洋鳕鱼）很难由国家集中支配。因而也就不存在与经济收益再分配的斗争有关的问题。见П. 苏捷拉：《竞争能力——这是一个甜蜜的字眼》，A. 赫兰捷拉、Э. 奥卢斯：《为什么俄罗斯不是芬兰：竞争能力的比较分析》，经济和工业生产研究所莫斯科版，2004。

表 3-1 1971~1995 年委内瑞拉、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预算总收入中石油收入所占的份额每 5 年平均值

单位：%

国　家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1986~1990	1991~1995
委内瑞拉	67.0	61.7	54.7	60.4	—
墨西哥	14.9	19.0	42.7	32.6	—
沙特阿拉伯	—	89.1	74.4	61.0	74.5

资料来源：据下列文献资料计算，R. M. 奥蒂编《资源丰富与经济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版（墨西哥、沙特阿拉伯），2004；J. 萨拉扎：《石油和委内瑞拉在 20 世纪的发展》，普拉格出版商、韦斯特波特、林肯郡版（委内瑞拉），1994。

的对话，才建立起了足以启动现代经济增长机制的游戏规则。[①] 这样一来，要建立约束和平衡体系（叶利钦时代最为流行、如今已不时兴的一套观念），可以限制政府和官员们贪污受贿和为所欲为的可靠制度，资源丰富国家民众的机会比那些缺少同类资源的国家的机会更少。[②] 这里所形成的气氛不一样。连气候也不相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③]精彩地描写过这种气氛：

"当给官员们首先分配西部各省，然后再分配乌法省的时候，我们便亲眼目睹了种种令人极为惊奇的现象。本该最好是：将公家的大馅饼捞上一块儿就跑！可是偏不，这时候偏偏大肆爆发了争吵、仇恨、嘲弄和各种各样的无耻勾当，成为其主要目标的，唉！正是那只不吝施舍的手，这只手往往怀着这样的特殊目的进行分配：让官老爷

① D. C. 诺斯：《制度、制度性变革和经济业绩》，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版，1990。为国家武装力量提供资金的印度尼西亚石油公司进行不透明操作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说明在没有民主制度牢固传统的国家里原料开采企业是如何运作的。见 H. 麦克唐纳：《苏哈托的印度尼西亚》，夏威夷大学出版社檀香山版，1981。

② 关于资源丰富对国家制度质量的影响和这种因素对资源丰富国家发展的低速度的影响，见 X. 萨马—马丁、A. 萨勃拉马尼安：《对付自然资源之祸：尼日利亚的例证》，美国国家经济调查局工作论文，2003 年 6 月第 9804 号；H. 梅赫伦、K. 摩勒、R. 托维克：《制度与资源之祸》，2005，http://www.svt.ntnu.no/iso/Ragnar.Tovik/worldeconomy7.pdf；E. H. 布尔特、R. 达马尼亚、R. T. 迪康：《资源丰富、贫困和发展·世界发展 2005》，http://www.econ.uesb.edu/papers/wp21-03.pdf.

③ 19 世纪俄国讽刺作家、政论家。——译者注

们心满意足，从而自然而然为与这些如愿以偿的人结党营私奠定基础。”①

国际组织所制定的评价国家制度质量的标准是主观主义的。但所有这些评价标准都表明，在政治自由、公民权利、官僚机关的质量、运用法律的实际情况等方面与资源财富方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负相关的依存关系。②

资源丰富国家经济中所进行的收入分配取决于政府机关自行作出的决定。③ 这促使展开一场竞争，但不是比赛谁能以最低的费用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而是比谁善于向官员们行贿，加大 A. 克鲁格在自己的经典著作中称之为行政寻租的费用。④ 此外，资源丰富还会增高为经济收益再分配而斗争所引发的政治不稳定的风险。⑤

甚至在高度发达的民主国家挪威，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自北海油田发现以来迄未改变。石油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增长靠的是缩减其他商品的出口。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中，这一时期与此发展相类似的另一个典型是另一个资源丰富国家——冰岛。鱼类占了其出口总量的一半。⑥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有一些已形成纳税人民主制的、资源丰富的国家，逐渐转变为有普选权的民主国家，那里富有效率，较少贪污腐败的官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都是这方面鲜明的例证。

---

① 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选集 10 卷本，《在国外》，真理报出版社莫斯科版，1988，第 19 页。

② E. E. 利默、H. 毛尔、S. 罗德里格斯、P. K. 斯科特：《自然资源丰富会加剧拉丁美洲的收入差异吗?》，载于《发展经济学杂志》1999 年第 59（1）期，第 3～42 页。

③ J. G. 威廉姆森：《增长、分配与人口学：历史的若干教训》，载于《经济史探索》第 34（3）期，1998，第 241～271 页。

④ A. 克鲁格：《外贸制度与经济发展：自由化的尝试和结果》，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版，1978。关于资源丰富国家中经济收益分配斗争对贪污受贿泛滥的影响，亦可参见 A. 托内尔、P. 莱恩：《贪婪与发展》，载于《美国经济评论》第 89 卷，1999，第 22～46 页；P. 毛罗：《贪污受贿与发展》，载于《经济学季刊》第 90 卷，1995，第 681～712 页；C. 利特、M. 威德曼：《大自然母亲会腐化堕落吗？自然资源、腐化堕落与经济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1999，WP/99/85 号。

⑤ P. 科利尔、A. 霍夫勒：《非洲内战中的贪婪和不满》，牛津大学出版社伦敦版，2004。

⑥ T. 吉尔法森：《自然资源、教育和经济发展》，载于《欧洲经济评论》第 45 卷，2001，第 851 页。

不过这都是一些国内民主机制已形成数世纪之久的国家，国内的各种政治制度已相当有效和牢固，足以对资源财富的挑战应付裕如。[1] 也有一些不具备长期民主传统的国家能够有效地管理资源财富（博茨瓦纳、智利、马来西亚、毛里求斯）。[2] 但是正如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在自然经济收益高的国家建立民主制度，较之在没有这种风险因素的国家更为困难。

自然财富引发的问题在于，资源部门的经济收益使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困难。以荷兰 1960 年代开发的一批大型天然气田对该国的加工工业产生的影响为例，可以详尽地说明这一问题，这样的问题被称为“荷兰病”。[3] 其实，荷兰解决这一问题比其他大多数资源丰富的国家都更为顺利。但这并没有成为改变这个已经固定术语的理由。实际上，这种病同样可以称为“委内瑞拉病”、“尼日利亚病”、“印度尼西亚病”或者（在最近数年间）“俄罗斯病”。[4] 如果说到非燃料类的原料商品，那么这种病也完全可以称作“赞比亚病”或“扎伊尔病”（铜）、“哥伦比亚病”（咖啡）。

“荷兰病”的实质在于，原料部门的经济收益刺激国民经济其他部门

---

① B. 梅伊：《西班牙帝国的教训，或资源丰富的陷阱》，载于《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05 年第 1 期。

② J. 萨克斯、A. M. 沃纳：《自然资源丰富与经济发展》，J. 梅耶、B. 钱伯斯、A. 法鲁克编《自然资源经济学中的发展政策》，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切尔特南—北安普顿版，1999，第 26 页。

③ M. 科顿、J. P. 内里：《繁荣部门与荷兰病经济学概说》，载于《经济杂志》第 92 卷，1982 年 12 月，第 826 ~ 844 页；L. 卡马斯：《荷兰病经济学与哥伦比亚的出口繁荣》，载于《世界发展》1986 年 12 月号；G. A. 戴维斯：《学会热爱荷兰病：来自矿产经济的证据》，载于《世界发展》第 23（10）卷，1995，第 1765 ~ 1779 页；T. 吉尔法森：《荷兰病的教训：原因、处理和祸害》，经济学科研究所工作论文专辑，2001 年 8 月第 01/06 期；P. 克鲁格曼：《狭窄的活动范围、荷兰病和市场研究会富有竞争性的结果》，撒切尔：《面对规模经济学的贸易笔记》，载于《发展经济学杂志》第 27 卷，1987，第 41 ~ 55 页；A. 莫伊谢耶夫：《“荷兰病”和对经济福利课税的影响分析》，工人论文，1999，BSP/99/030；J. J. 斯特鲁特斯：《尼日利亚的石油与汇率：“荷兰病”指标》，载于《发展与变化》第 21（2）卷，1990，第 309 ~ 341 页；A. 贾扎耶里：《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体中的经济调节》，埃弗贝里出版社奥尔德肖特版，1988。

④ 对俄罗斯而言，这类问题尤其尖锐。与波斯湾各阿拉伯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已经工业化。同时加工工业也不可能以高度的竞争能力自诩。由此可见与“荷兰病”这一术语有关的问题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意义。见 П. 卡多奇尼科夫、С. 西涅利尼科夫—穆雷列夫、С. 切特韦利科夫：《1998 ~ 2002 年俄罗斯联邦的进口替代》，经济和工业生产研究所莫斯科版，2003。

的工资和费用增长（国家价格水平对于资源财富在统计上的依赖地位已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明)。[①] 产品和服务遭遇国际竞争的部门在国内和国外市场上都变得缺乏竞争力，不得不减少生产。[②] 这样所形成的经济就有风险，经济越来越严重地被原料的价格波动所左右。

资源丰富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对教育的发展不够重视。个中原因尚不清楚，但许多研究者都将此与各采矿公司所提出的劳动需求结构相联系。[③] 也许这还与正在这些国家涌现的精英们的心理特征有关，对此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曾作过描述：临时的主人不考虑未来，而教育却是对未来的投资。

1950～1960 年代初有一个观念很流行，即：经济依赖原料出口的国家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都与原料的价格有关，相对于加工部门的产品价格，原料的价格呈长期下降趋势。这些建立在 1920～1930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发展经验基础上的观点，曾经在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公布的著作和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 P. 普雷比什[④]的文章和书籍中广为表述。

20 世纪后半叶的事态发展表明，相对于加工部门的产品价格而言，原料商品的价格的确在下跌。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回顾以往一个长时期内，原料价格下跌速度仅约为每年 1%。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原料价格是在一个广阔的难以预测的范围内波动。无论上涨或下跌，这种波动都会同时给出口者和进口者造成严重的问题。[⑤]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P. A. 塞缪尔森写道：“经济学家不

---

① J. D. 萨克斯、A. M. 沃纳：《自然资源之祸》，载于《欧洲经济评论》第 45 卷，2001，第 827～838 页。

② T. 吉尔法森、T. T. 赫伯茨森、G. 佐伊加：《利弊兼有：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载于《宏观经济动态》第 3 卷，1999，第 204～225 页；T. 吉尔法森：《自然资源、教育和经济发展》，向欧洲经济学会年会提交的论文，2000 年 8～9 月于波尔萨诺。

③ T. 吉尔法森：《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荷兰病的北欧视角》，WIDER 工作论文，1999 年 10 月第 167 号。

④ R. 普雷比什：《欠发达国家的商业政策》，载于《美国经济评论》第 49 卷，1949，第251～273 页；R. 普雷比什：《和平共处时代的国际贸易和支付：欠发达国家的就业政策》，载于《美国经济评论》第 49 卷，1995 年 5 月第 2 期。美国经济协会第 71 次年会论文和会议记录，第 251～273 页；《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概况》，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编，联合国纽约版，1964。

⑤ P. 卡申、C. J. 麦克唐纳、A. 斯科特：《商品价格的长期状态：小趋势和大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2004。

可能准确地预见未来……但是，即便大致可以预言，那预言什么都行，就是不能预言价格。”① 就原料商品的价格而言，这一论断在20世纪后半叶实际上非常正确（图3－3、图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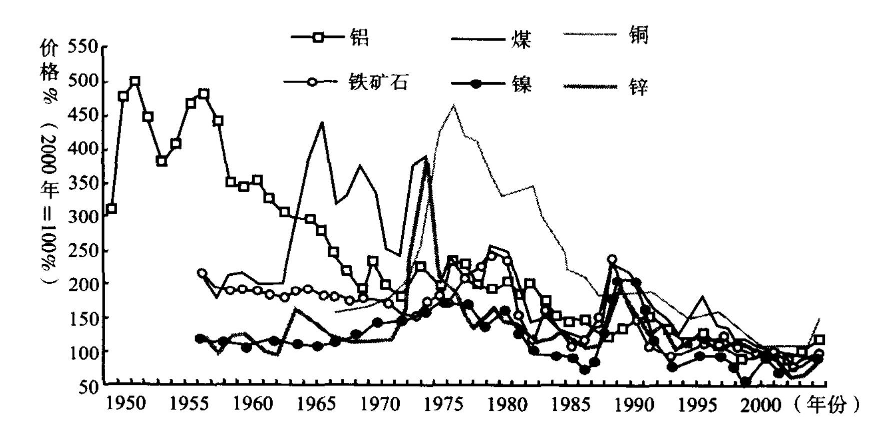


图3－3　1950～2004年某些原料商品实际世界价格动态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5年国际金融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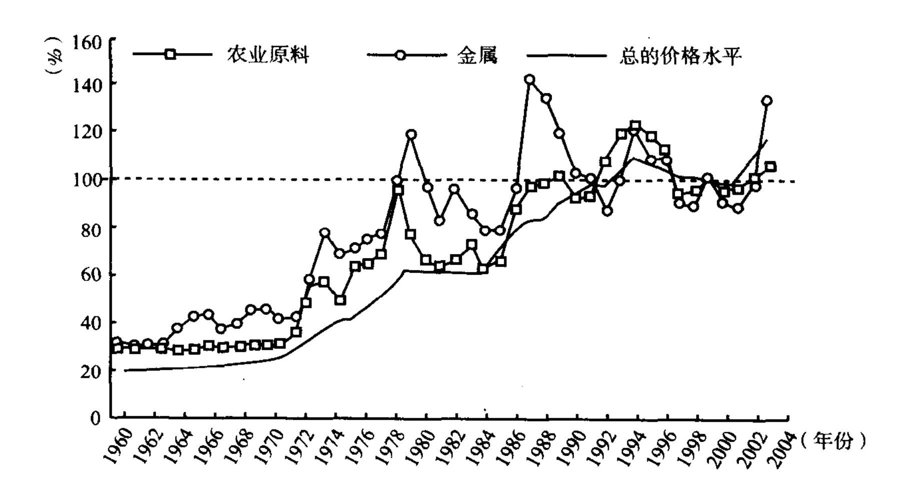


图3－4　世界经济全面的和个别原料商品的价格指数（1960～2004年）

注：世界经济总的价格水平得自名义GDP与实际GDP之比。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调查员联盟2005年的数据计算；世界范围世界发展指标（以后为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

① P. A. 塞缪尔森：《当前经济扩张的教训》，载于《美国经济评论》第64（2）卷，1974，第75～76页。

造成原料价格波动的因素众所周知。原料部门的生产需要大量投资，实现投资计划需要许多年。相对于资本开支，日常开支并不很大。短期内提高采掘量颇为困难或不可能，减少也并非容易，这里既有技术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

引发1980年代中期价格战的因素之一，是沙特阿拉伯1981～1985年期间的石油开采量减少了几乎3/4，政府在保证居民的煤气供应方面遇到了严重问题。减少石油开采量之后，政府不得不相对压缩天然气的产量，而这是维持全国公用事业部门运转的能源。这只是原料经济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中的一个例子。[①]

在未来的短时期内，原料的产量不大会受世界市场价格的支配。对原料商品的需求与世界经济状况密切相关。这种需求在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时增大，在其速度趋缓时则减小。[②] 在原料部门能力有限时增加或减少开采量，原料价格的波动要比加工部门产品剧烈得多。（图3－3至图3－9）的数据显示，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即便略为减缓，对原料价格动态的影响也会十分强烈。

世界气候难以预测的变化，同样会对原料市场产生影响。[③] 原料市场上发生的事情能影响全球的发展。自1970年代初开始，石油价格的变化对世界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比汇率波动的影响更大。[④] 资源丰富国家必须解决国家财政状况依赖的那些出口商品剧烈而不可预料的价格波动所产生的问题。原料资源价格上涨对世界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较之价格下跌时为大，[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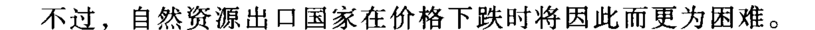
① I. 斯基特：《欧佩克：价格和政策的2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版，1988，第195页。关于行情不利的条件下能使缩减采掘量复杂化的原料部门的特殊性，见E. T. 道林、F. G. 希尔顿：《1980年代的石油：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看法》；S. 肖贾、B. S. 卡兹编《1980年代的石油市场：10年衰退》，普雷格出版社纽约版，1992，第77页；以铜的开采为例说明资本支出和日常支出的相互关系、在全球需求减少的条件下压缩生产的困难，见R. F. 迈克塞尔：《世界铜工业·结构和经济分析》，由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以“用于未来的资源”在伦敦出版，1957。

② L. 普里切特：《经济增长的类型：丘陵、高原、山区和平原》，政策研究工作论文1998年第1947号；R. 马勃罗：《1960～1998年的欧佩克状况：文献评论》，载于《能源文献杂志》1998年6月第4（1）期，第3～27页。

③ A. D. 布鲁纳：《厄尔尼诺与世界初级产品价格：温水还是热空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2000，第3页。

④ D. K. 巴卡斯、M. J. 克鲁西尼：《石油价格与贸易期限》，美国国家经济调查局工作论文1998年8月第6697号，第24页。

⑤ J. D. 汉密尔顿：《何为石油冲击?》，美国国家经济调查局工作论文，2000年第7755号。


不过，自然资源出口国家在价格下跌时将因此而更为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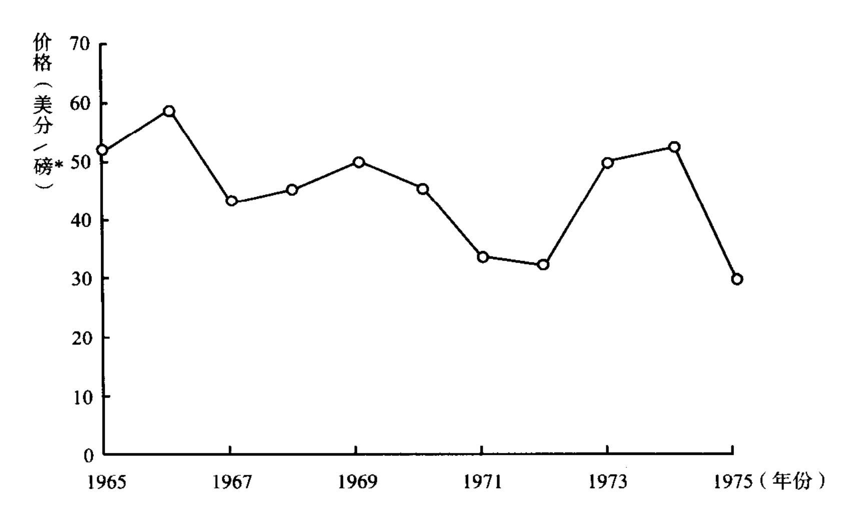


图 3-5 1965~1975 年伦敦交易所铜的年平均价格动态

＊以 1957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R. F. 迈克塞尔：《世界铜工业·结构和经济分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巴尔的摩版，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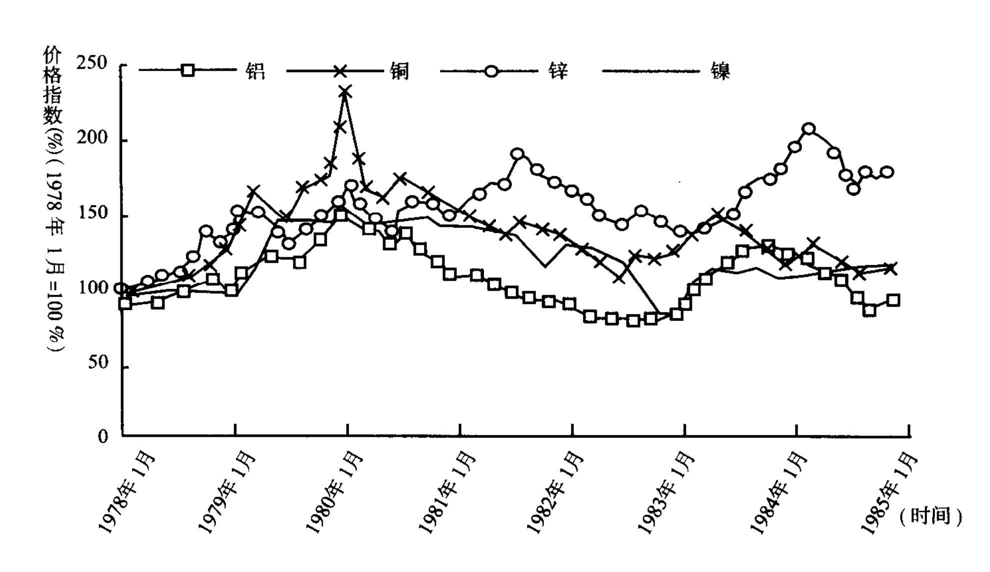


图 3-6 1978~1984 年国际市场有色金属日常价格月动态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4 年国际金融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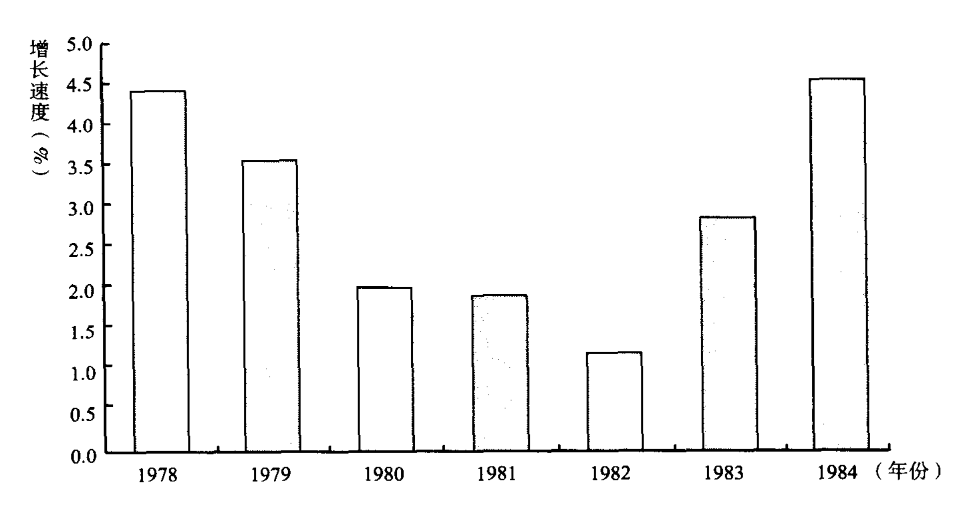


图 3－7　1978～1984 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计算法据 A. 麦迪森：《世界经济：历史统计》，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巴黎版，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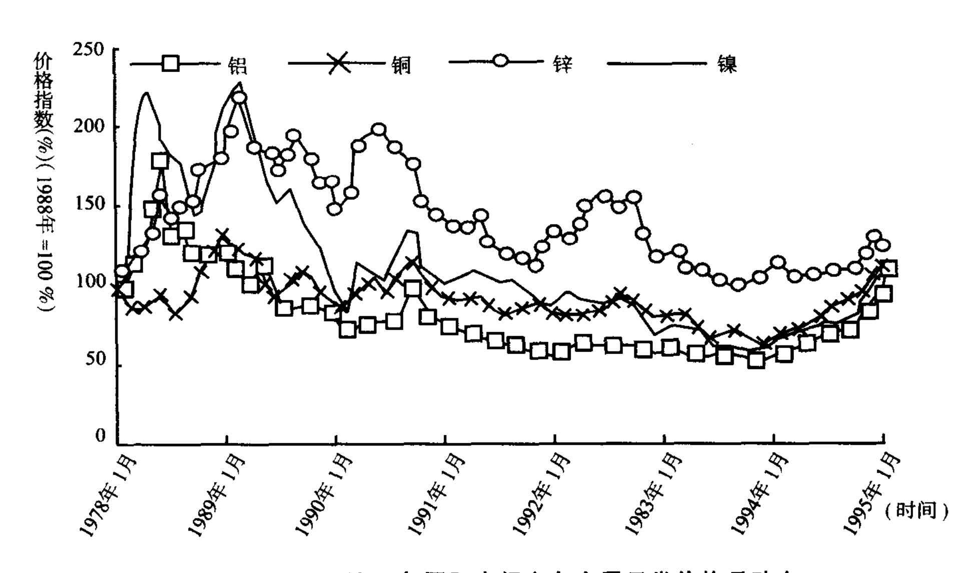


图 3－8　1988～1995 年国际市场有色金属日常价格月动态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4 年国际金融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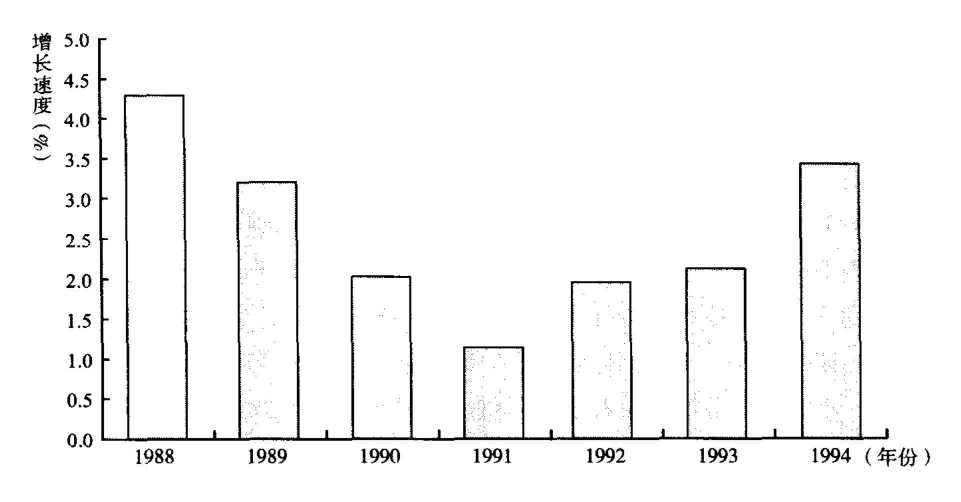


图 3-9 1988~1994 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计算法据 A. 麦迪森：《世界经济：历史统计》，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巴黎版，2004。

国际行情导致的价格不稳定更增加了原料部门的问题。技术发明和新的生产方法的应用改变了需求规模。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20 世纪后半叶大量采用替代铜的材料。[①] 由于汽车工业对排放废气的清洁度要求提高而导致对钯的需求增长。

要预测能否发现和投产比现有矿山开采条件更为优越的原料新矿并非易事。若能这样，随着它们开始开采，便会出现价格下跌的风险。然而世界也难以避免面对另一种情况：这样的矿床数十年期间都不能被发现，资源短缺将导致这些原料的价格长期上涨。

原料市场还有一个不稳定因素——市场对政治的依赖。1940 年代末至 1950 年代初铜市场的事态发展便是典型的例证。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军事工业对钯的需要增加，导致对这种金属的需求不断增长。迅速增加其开采量是不可能的。于是 1950 年代初其价格暴涨，而战争结束之后又随即下跌。

1973 年以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为背景，石油价格以史无前例的涨幅飙升。战争本身与其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如说是一个借口。此前 10~20 年间世界石油工业的形势急剧变化。国际石油公司调整本部门

① M. 法尔科夫：《现代智利 1970~1989：一段关键性的历史》，业务出版公司新不伦瑞克、伦敦版，1989。

工作条件的能力减小，石油开采国的实际权力增大。1977 年的危机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扣动了早已上膛的枪支的扳机而已。

1973 年阿以战争引发的事件之后数年，伊朗的混乱局面日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的石油产量 1978 年 10 月由每天 550 万桶锐减至每天 240 万桶。次年 1 月阿亚图拉[①]霍梅尼返回伊朗，沙赫制度瓦解以后，石油产量更降至每天 50 万桶。[②] 伊朗新的国家政权机关建立，秩序得到一定的恢复之后，1979 年 4～7 月产量稳定在每天 390 万桶的水平，仍大大低于沙赫制度稳定时期的水平（1977 年为每天 570 万桶[③]）。1980 年伊朗—伊拉克战争爆发时，两国都不得不削减石油开采量。国际市场上的油价翻了好几番。

许多观察家都认为，油价跃上新水平后将会保持很长时间。这一错误让石油开采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中也包括苏联。1980 年代中期事情已经很清楚，1979～1981 年的价格是由于各种情况的暂时巧合造成的。1985～1986 年油价即已猛跌（见图3－10、3－11）。在 1980～1981 年要预见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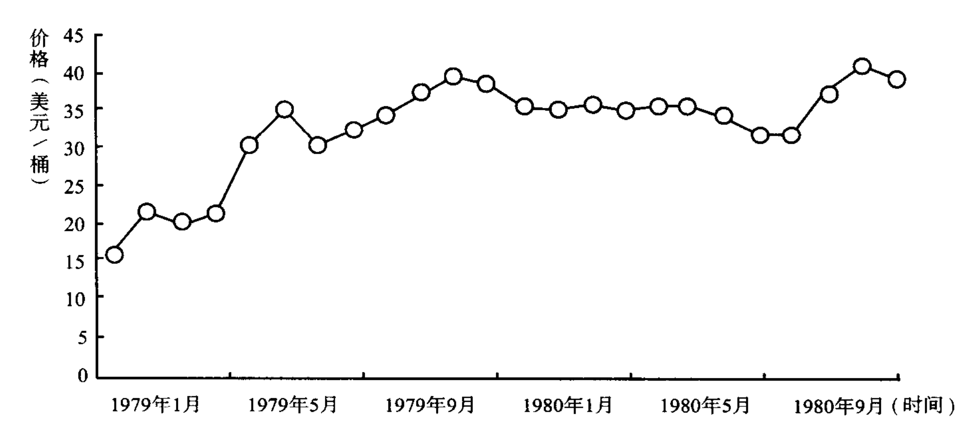


图 3－10　1979～1981 年国际市场石油日常价格月动态

注：此处和后文所引数据均根据国际市场原油平均价格。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4 年国际金融统计。

---

① 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最高教职和宗教领袖。——译者注

② I. 斯基特：《欧佩克：价格和政策的 25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版，1988，第 157、158 页。

③ E. 卡诺夫斯基：《地区和世界石油市场的经济关联》，载于 E. 卡什编《伊拉克—伊朗战争：影响和关联》，麦克米伦出版社伦敦版，1989，第 24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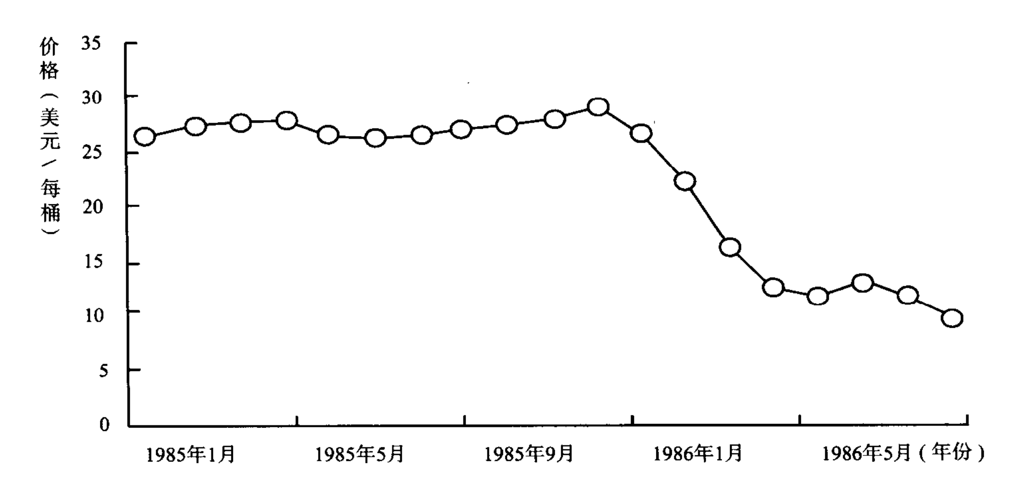


图 3-11 1985~1986 年国际市场石油日常价格月动态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4 年国际金融统计。

在原料只是一个国家经济中有限的一部分时，原料价格的波动会对这个国家的某些部门构成问题。但有许多国家其经济严重依赖于原料市场上所出现的状况（表 3-2）。

表 3-2 1971~1990 年一些石油出口国石油出口在总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每 5 年平均值

单位：%

国 家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1986~1990
委内瑞拉	90.9	85.4	81.3	80.9
伊 朗	77.5	85.0	85.0	92.5
伊拉克	91.1	91.4	97.3	89.8
尼日利亚	85.6	92.3	95.7	89.5
墨西哥	3.7	21.9	55.7	20.5

资料来源：计算所根据的资料为，J. 萨拉扎—卡里洛：《石油与 20 世纪期间委内瑞拉的发展》，普拉格出版公司韦斯特波特、林肯郡版，1994；B. R. 米切尔：《国际历史统计》，麦克米伦参考书股份有限公司伦敦版，1998；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在原料价格难以预料地迅速变化条件下，甚至国家经济状况的基本指标——按人口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会非同寻常地大幅度波动。原料市场

不稳定对预算收入的影响更为严重。[①] 众所周知，由于石油价格上涨而增加的国家收入不能视作稳定的收入。石油价格极不稳定时，与经济无关的事件也可能急剧改变价格的水平。因此产油国政府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便是，不容许出现履行预算承诺、保持财政稳定都依赖于难以预测的参数变化这样的局面，那种变化是谁也无法控制的。在市场情况良好的条件下增加预算开支很容易。当市场形势发生变化时，要缩减预算便相当困难了。

在遭遇金融危机的多样化的市场经济中，稳定的计划很少预留超过实际计算 10% 的缩减预算支出。为了实现这样的计划，需要有勇气和为采取稳定国家经济必不可少的决定付出代价的决心。这要以高昂的代价为前提。然而在依赖原料生产和出口的国家，在经济收益屡屡下降的情况下便会产生另一种规模的问题。[②]

市场情况良好时，原料生产国通向国际金融市场的大门是敞开的。它们往往大规模地吸引外国贷款，试图在此基础上加快经济发展，着手实施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在市场情况变化时，不久前还极易到手的信贷资金变得极其珍贵，有时候根本就没有。结果靠新债抵旧债已不可能办到。偿还借款只有靠价格下跌时业已减少的预算收入。

在行情不利的条件下，资源丰富的国家要冒风险，可能遇到经济危机、收支平衡和外汇储备减少等问题，无力应付和偿还外债。这种事态发展在经济史上并不罕见。

要从高价位出口原料所产生的社会心态转而面对严峻的经济状况并非易事。此种转变往往导致政治制度的更替。发生这类事情的情形各有不同：在墨西哥是政治自由化，在尼日利亚是军事政变，在阿尔及利亚是内战，在委内瑞拉则是民主危机。

石油在这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就国际市场的交易量而言，铜是紧随石油之后的原料资源，其价格变化对智利、巴布亚新几内亚、扎伊尔和赞比

---

① E. 贾德雷西克、R. 扎勒：《智利在 1990 年代的快速发展：好政策、好运气还是政治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2000 年 WP00/53 号。

② D. 罗德里克：《为什么越开放的经济有着越大的政府?》，载于《政治经济学杂志》第 106（5）卷，1988，第 997 ~ 1032 页；J. A. 丹尼尔：《回顾政府的石油价格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2001；《华盛顿邮报》1991 年 3 月 27 日。

亚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它也给出口国带来不少意外的礼物。但是石油对世界经济的意义比这更为巨大。

三　石油市场的特殊性

石油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商品，在开采其他矿物资源的时候，原料储量丰富的地区平均开采费用与国际市场上的售价之间的差价即经济收益，在很长的时期内通常都不及石油部门的高而稳定。[①] 市场上的价格动态和成交量一般都取决于破费最多的参与者的行为。他们的决定可在高价位时期使生产扩大，在低价位时期则使其缩减，而一旦出现亏损，则可由他们确定价格的水平和生产的规模。

石油市场上则完全相反。日常费用支出最低的国家最近数十年间通常都担当操纵者的角色，随时准备在行情不利的情况下削减开采量，而行情有利时则增加产量。[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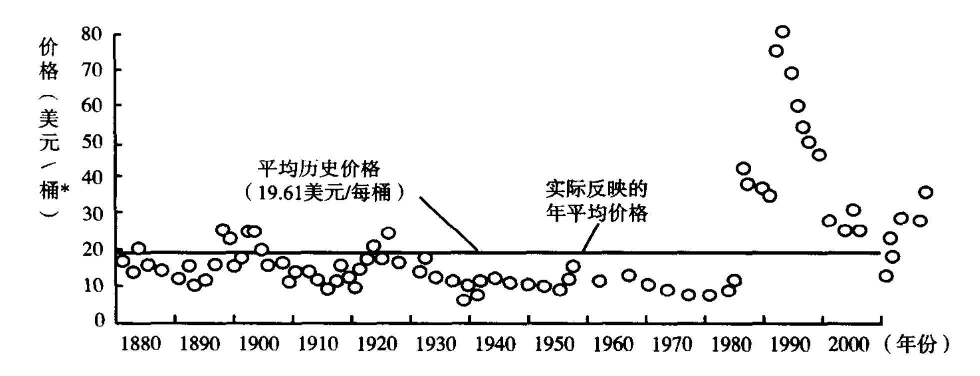


图 3－12　长期历史透视中的石油价格动态（1880～2004 年）

＊以 2000 年的固定价格计算。此处和下文（若不另行指出的话）均用美国 GDP 扣除通胀因素的指数换算为 2000 年的价格。

资料来源：计算法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4 年国际金融统计；美国能源部能源效率和再生能源网站（http：//www. eere. energy. gov）。

---

① J. 阿马泽加：《管理石油财富：欧佩克的横财和陷阱》，国际银行陶里斯出版社伦敦、纽约版，2001，第 12 页。

② R. A. 德·桑蒂斯：《原油价格波动与沙特阿拉伯的举措》，基尔工作论文，2006 年 10 月第 1014 号，第 6 页。

在本书作者所知的关于石油价格的论述之中，A. 克鲁格教授基于丰富经验和清醒理智的话语最合乎情理。按照她的意见，当大多数的市场参与者相信石油价格只能在短期内保持高位的时候，价格的确就会这样。当认为价格已达到一个新的稳定水平、并会保持很长时间的意见开始占上风时，则价格必将下跌。价格长期高位的前景会促使消费者减少消费，而对生产者而言，扩大投资和生产规模便会变得有利可图。当石油价格下跌时，情形则截然相反。前页（图 3 - 12）所示便是实际计算中石油价格长期波动的情况。

四 20 世纪石油市场的调控

20 世纪的石油市场一直既不是完全自由的，也不是受到硬性调控的。1928 年在苏格兰城市阿克纳卡里签订的协议，确认了七个最大的国际纵向一体化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得克萨斯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莫比尔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法国石油公司”）之间对市场的瓜分，它们将这种资源的勘探、开采、加工和销售集于一身。这项协议确定了日后数十年的行业游戏规则。

当时的世界还是按照现代经济增长早期阶段特有的规矩生活。强权主宰一切。“炮舰外交”确保可以染指军事上软弱的欠发达国家的原料资源，将有利于国际公司的租让条件强加于这些国家。[①] 在石油产品开采、加工或销售的哪个阶段获得利润，对于纵向一体化公司倒无所谓。它们感兴趣的是增加市场份额，并不太关心石油开采国政府所收取的开采权使用费。它们对自己采油所在国家承担的财政义务，并不取决于石油加工和燃料油销售阶段获得的收入。这样能保证原油的价格始终不高，而石油加工和石油产品销售却可以带来尽可能大的利润份额。因 1990 ~ 2000 年代初俄罗斯所发生的丑闻而广为人知的通过转账制定价格的做法，根本算不上红色经理和寡头们的发明。所有这一切在经济史上都早已有之。

1950 ~ 1960 年代各石油公司竞相比赛，看谁能更快地将石油的出产价降得比协商一致的水平低，并向消费者提供最优惠的贴息条件。这时苏联

---

① D. 耶金：《价格 · 对石油、金钱和权力的大肆追求》，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纽约版，1992。

出现在世界石油市场。它力求增大自己在这项资源贸易中的份额，实行倾销。1960 年代在苏联以易货贸易方式向西欧、首先是意大利提供石油的合同中，油价比国际参考价格低了近一半。单凭这类合同很难判定能否以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来解释这种价格的差别，抑或事情仅仅涉及纯粹的倾销。但国际石油公司对内幕并不感兴趣。这类做法存在本身就是压低油价的一个因素。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殖民和半殖民国家、“炮舰外交”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一个世纪之前公认的东西，在变化了的世界上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英国石油公司”控制的曾被迫与美国人瓜分部分产权的伊朗石油资源物归原主，便是已成为过去的那个时代的回声。1956 年法国和英国出兵苏伊士运河失败之后，事情变得更清楚：想要使用武力威胁那些希望增加自己在石油开采收入中的份额或将石油生产国有化的产油国家，已经几乎没有可能。其后 15 年期间，产油国政府在涉及该行业各项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提高。从 1950 年代开始，它们逐步改善了与国际公司所签合同的条件。

这一过程中的里程碑便是委内瑞拉政府与各石油公司达成的关于彼此之间按 50：50 的比例分享利润的协议。这些条件经委内瑞拉领导人以非正式方式通报其他产油国后，逐渐获得举世公认。②

拥有石油资源的国家在与国际石油公司的对话中，必须制定共同的立场，交流可以评估石油开采和石油市场所发生事情的经验。这就创造了建立欧佩克这一组织的前提条件，从而可以扩大对话，将相互关系制度化，协调一致共同努力。欧佩克由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的代表于 1960 年 9 月建立。卡塔尔加入该组织是在 1961 年，印度尼西亚和利比亚在 1962 年，阿拉伯酋长国在 1967 年，阿尔及利亚在 1969 年，尼日利亚在 1971 年，厄瓜多尔在 1973 年，加篷则是在 1974 年。欧佩克成立的最初数年还只是一个咨询组织，并没有以自身的名义与石油开采公司进行过谈判。

欧佩克成员国政府所达成的旨在改善合同条件的协议，建议产油国政

① J. 阿马泽加：《管理石油财富：欧佩克的横财和陷阱》，I. B. 陶里斯出版社伦敦、纽约版，2001，第 24 页。

② J. 阿马泽加：《管理石油财富：欧佩克的横财和陷阱》，第 25 页。

府协调一致改变出口价格，扩大石油加工规模，建立国有公司。[①] 1968 年欧佩克通过《石油政策指导原则》。该组织要求各国参与采油公司股权，争取参加地质勘探和石油开采，监督价格发布。1970～1973 年所采取的旨在实现这些原则的措施，重新配置了石油领域的力量平衡。[②] 1960 年代末欧佩克国家即已做到不让采油公司针对官方发布的价格自行压低油价。[③]

1970 年代初所形成的价格水平按照历史的尺度来说是偏低的，反映了已经成为过去的行业内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④] 1970 年代初美国的石油储备减少，美国经济对进口石油的需求增加，美国再也无法对世界石油市场进行调控。自 1971 年 3 月起，美国动用了 100% 的现有设备能力开采这一资源。[⑤] 1967～1973 年之间，美国石油消费量中的进口份额从 19% 增长至 36%。[⑥] 1973 年 4 月美国政府取消了石油进口定额制度，[⑦] 美国变为石油净进口国之事加固了生产国的立场。[⑧]

美国货币政策的放松是决定原料市场发展最重要的因素。该国在 1960 年代对各种社会计划承担起广泛的责任，同时还不得不为与越南战争有关的开支提供经费。这就改变了世界的行情。原料商品价格的上涨于 1973 年油价提升之前即已开始。[⑨]

1973 年 10 月 17 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商定削减石油的开采和出口数

---

① L. 斯基特：《欧佩克：价格和政策的 25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版，1988；P. H. 安德烈亚相：《1973～1983 年的石油和阿拉伯国家·经济的和社会的分析》，科学出版社莫斯科版，1990，第 80 页。

② E. 彭罗斯：《石油与国际经济：跨越国家的方方面面（1900～1973）》，载于 R. W. 弗里尔、A. 弗森科编《世界经济中的石油》，柔特莱奇出版社伦敦、纽约版，1989，第 14 页。

③ J. 阿马泽加：《管理石油财富：欧佩克的横财和陷阱》，第 28 页。

④ 按 2004 年的价格计算，自 1869 年以来的多年平均石油价格为每桶 18 美元 59 美分（以 2000 年的价格计算则为 18.43 美元）。相当于 1958 年每桶 16 美元（以 2004 年的美元计算）的石油价格，至 1970 年时每桶不到 13 美元（2000 年相应为 15 美元和 12 美元）。见《石油价格的历史和分析·2004》。http：//www. wtrh. com/prices，htm。

⑤ D. 耶金：《价格·对石油、金钱和权力的大肆追求》，第 567 页。

⑥ J. 达姆斯塔特、H. H. 兰兹伯格：《经济背景》，载于 R. 弗南编《石油危机》，诺顿出版社纽约版，1976，第 31 页。

⑦ L. 斯基特：《欧佩克：价格和政策 25 年》，第 84 页。

⑧ T. M. 里布尊斯基、G. F. 拉伊：《世界能源危机的历史背景》，载于 T. M. 里布尊斯基编《石油危机的经济学》，麦克米伦出版社、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伦敦版，1976，第 2 页。

⑨ R. B. 巴斯基、Z. 卢兹：《我们真的知道石油引发大滞胀吗？货币的抉择》，美国国家经济调查局工作论文，2001 年 7 月第 8389 号，第 5、14 页。

量。阿拉伯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宣布减少开采量10%，并禁止向美国提供石油。1973年11月22日该国政府提出警告，如果美国不放弃支持以色列，它准备缩减开采量80%，一旦美国试图使用武力，则油田将被炸毁。[①] 相对于1960～1970年代初反常的低价位，石油价格的猛涨已成既成事实。

1970～1974年之间，欧佩克国家来自石油出口的收入增长了10倍。正如欧佩克一位财政部长的文章所说，石油开采国三年多时间里收入的钱，比最美好的幻想所能想象的还要多。伊拉克与石油有关的出口收入从1972年的每月10亿美元增至两伊战争开始前的每月330亿美元（按年度计算）。[②] 输出国石油美元的滚滚洪流产生了福利稳定增长的希望、实现民族辉煌梦想的信心。产油国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可以依靠石油收入为其他部门的发展提供资金。[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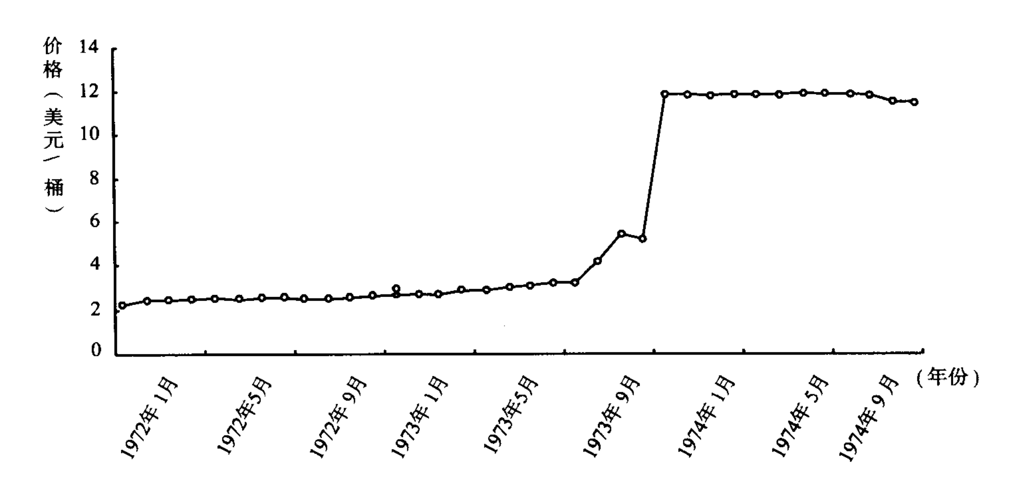


图3－13　1972～1974年国际市场石油月平均价格动态

注：换算为2000年的美元，1972年的石油价格为8美元8美分。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年国际金融统计。

---

① L. A. 索贝尔编《能源危机》第1卷，1969～1973年，事实存档股份有限公司纽约版，1974，第199～206页。

② E. 卡诺夫斯基：《地区和世界石油市场的经济牵连》，载于E. 卡什编《伊朗—伊拉克战争：影响和牵连》，麦克米伦出版社伦敦版，1989，第231页。

③ 特里·卢恩·卡尔：《富饶的悖论：石油走俏与石油国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伯克利版，1997。

1973～1981年欧佩克的影响达到顶点。在此期间许多分析家都觉得，该组织调控石油开采量和价格的能力是无限的，碳氢化合物的进一步涨价无可避免。①

石油消费国自1973年以来遭遇石油价格急剧上涨，由此引发通货膨胀加速，经济增长减缓，于是它们开始降低生产和消费的能源消耗量（表3－3）。

表3－3　1975～1985年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和美国GDP能源消耗量动态（与前一年相比的变化）

单位：%

年份	法国	德国	日本	英国	美国
1971	0.1	—	0.1	－0.2	－1.1
1972	1.2	－0.4	－1.4	－2.7	－0.6
1973	2.1	1.2	3.9	－3.2	－2.0
1974	－6.1	－2.3	1.7	－2.5	－1.8
1975	－5.1	－3.5	－8.0	－4.4	－2.0
1976	2.2	2.7	2.1	－0.7	1.3
1977	－4.9	－2.7	－2.5	－0.3	－1.2
1978	1.8	0.4	－4.3	－3.6	－2.7
1979	0.8	0.3	0.2	2.3	－3.3
1980	－1.8	－3.7	－5.0	－6.6	－3.5
1981	－3.4	－3.5	－5.3	－2.1	－5.2
1982	－4.9	－2.6	－2.5	－2.3	－2.2
1983	1.1	－1.5	－1.5	－3.6	－4.2
1984	1.9	1.0	4.3	－2.6	－2.7
1985	3.5	1.0	－4.7	2.1	－2.9

资料来源：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资料计算。

欧佩克在世界石油贸易中的份额在减少。高涨的油价促进了对人迹罕至的矿区的勘探。欧佩克并无有效的机制足以对其成员国超过最高限额规定进行的开采量加以制裁。

1981～1982年世界的发展减缓，降低了对石油的需求（见表3－4）。这更增加了由于伊朗—伊拉克战争爆发而出现的油价投机性上涨的不稳定性。欧佩克自1973年以来首次遇到艰难的选择。如果它的成员国继续增加

① P. H. 安德烈阿相：《1973～1983年的石油和阿拉伯国家·经济的和社会的分析》，科学出版社莫斯科版，1990，第124～130页。

石油开采量，油价就会狂跌。为了稳住价格水平，必须减少产量。但这又意味着降低欧佩克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与欧佩克无关的公司利用这个卡特尔所出现的问题，借机增加自己在石油贸易中的份额（见表 3-5 和表 3-6）。1983 年 2 月 17 日英国国家石油公司将北海开采的石油每桶降价 3 美元。欧佩克成员国尼日利亚的石油一直与英国和挪威竞争，也不得不紧随它们降价。苏联同样加入了石油降价的比赛。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停战，两国都力求恢复它们在 1970 年代中期占有而开战期间减少了的市场份额——这一切都成为挑起 1985~1986 年价格战的因素。

表 3-4 1970~1985 年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美国 GDP 单位石油消耗量

单位：桶/千美元

年份	法国	德国	日本	英国	美国
1970	1.15	—	0.77	1.06	1.44
1975	1.13	1.03	0.75	0.87	1.39
1980	0.97	0.91	0.65	0.72	1.21
1985	0.69	0.74	0.50	0.61	0.96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情报局。http://www.eia.doe.gov/emeu/internafional/petroleu.htm/，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表 3-5 1973~1985 年英国、挪威、墨西哥的石油开采量

单位：千桶/天

年份	英国	挪威	墨西哥
1973	2	32	465
1974	2	35	571
1975	12	189	705
1976	245	279	831
1977	768	280	981
1978	1082	356	1209
1979	1568	403	1461
1980	1622	528	1936
1981	1811	501	2313
1982	2065	520	2748
1983	2291	614	2689
1984	2480	697	2780
1985	2530	788	2745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情报局。http://www.eia.doe.gov/emeu/international/petroleu.htm/。

表 3-6 1973~1985 年欧佩克成员国在世界石油开采量和贸易中的份额

年份	欧佩克占世界石油开采量的份额(%)	欧佩克占世界石油出口量的份额(%)
1973	55.4	86.1
1975	50.5	83.3
1980	44.4	75.6
1985	28.5	51.2

资料来源：欧佩克2004年年度统计公报，欧佩克，2005，第22、24页。

沙特阿拉伯拥有最大的石油储藏量。开采的成本低廉。1981~1985年，当已经清楚1979~1981年达到的价位不能稳定时，这个国家就成了最主要的市场操纵者：它准备削减产量以稳住价格，从而对欧佩克其他成员国的超限额、世界需求的降低、未参加欧佩克的国家开采量的提高进行弥补。

尽管如此，石油价格从1981年第一季度起仍然开始下跌。起初这个进程发展缓慢。1982年的价格为31美元76美分，1983年为28美元67美分。时至1984~1985年，已降至27美元（现价）。[①] 临近1985年时，沙特阿拉伯将石油产量减少至每天250万桶。这比1981年的水平减少了将近3/4。[②]

1983年3月，欧佩克决定将石油的官方价格由每桶35美元降至29美元。由于主要的世界货币汇率波动，对1983~1985年石油的真正市值进行估计颇为困难。自1983年开始，这一资源的价格以美元计算一直在下跌，但以欧洲的货币计算却始终很稳定。[③] 自1985年初开始，油价下跌也成为决定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而易见的事实。

① E.T. 道林、F.G. 希尔顿：《1980年代的石油：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视角》，载于S. 肖贾、B.S. 凯兹编《1980年代的石油市场：10年衰退》，普拉格出版社纽约版，1992，第74页。

② T. 尤素夫·哈桑·穆罕默德：《欧佩克垄断石油利润的策略》，载于S. 肖贾、B.S. 凯兹编《1980年代的石油市场：10年衰退》，第37页；P. 维克汉姆：《石油价格的飙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1996。

③ 西哈克·帕克：《下跌的石油与汇率波动》，载于S. 肖贾、B.S. 凯兹编《1980年代的石油市场：10年衰退》，第6页。

1985年9月13日沙特阿拉伯石油工业大臣阿拉维·亚马尼宣布，他的国家不打算继续减少石油开采量，而是增加生产。[1] 1985～1986年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开采量猛增三倍以上，大大改变了市场的形势。石油开采国竞相比赛谁降价更快，以便保住自己所占有的市场份额（见图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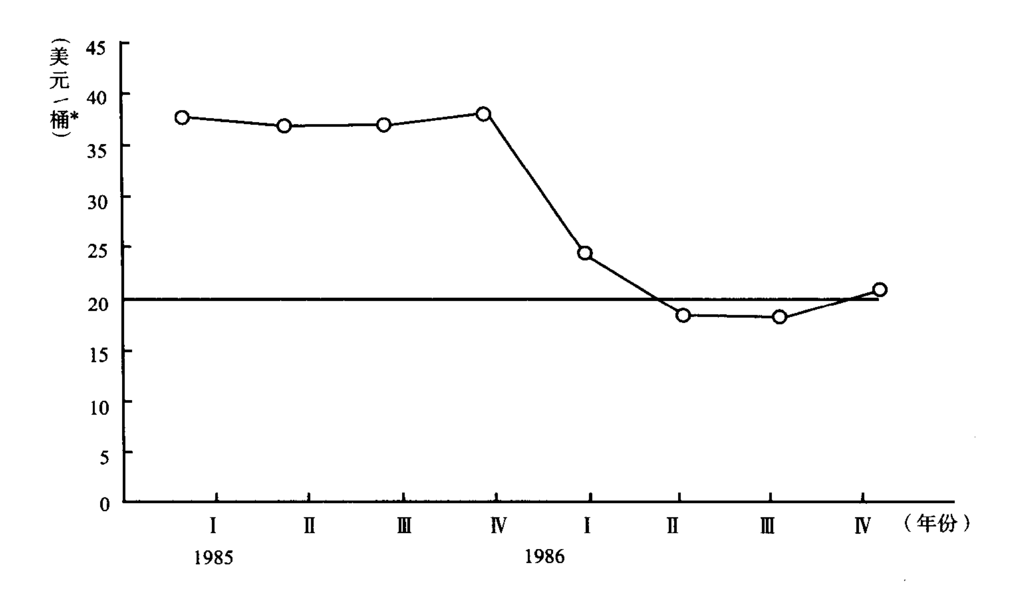


图3－14　在历史平均水平背景下1985～1986年石油价格的季度动态

* 价格以2000年的固定水平为准。

资料来源：2004年国际金融统计。

1986年价格下降至此前数十年史无前例的低水平——每桶时价不足10美元。[2] 1980年与1986年之间委内瑞拉来自石油开采的收入（按实际价格计算）减少64.5%，印度尼西亚减少76.1%。各石油开采国不得不大幅度减少国家开支。[3]

临近1986年底时，欧佩克成员国都明白，需要有一项关于价格纪律和

---

① L. 斯基特：《欧佩克：价格和政策的25年》，第207～208页。

② S. 肖贾、B. S. 卡兹编《1980年代的石油市场：10年衰退》，普拉格出版社纽约版，1992，第13页。

③ 特里·卢恩·卡尔：《富饶的悖论：石油的走俏和石油国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伯克利版，1997，第32页。

开采水平的协议，否则它们的经济只能崩溃。市场上类似的秩序逐渐恢复。1986年12月欧佩克通过一项关于空前减少石油开采量的决议，目的在于使价格回升。开采量降到每天158万桶，① 这是该组织历史上最低水平。1980年代末期，油价已接近多年平均水平。不过正像当年国际石油公司影响力的巅峰那样，欧佩克的影响力最高点已经过去。从这时候开始，能够决定石油市场事态发展的机构已不复存在。油价一直大幅度地波动着（见表3-7）。

表3-7　1986~2005年世界石油价格动态

单位：美元/桶*

年　份	平均价格	年　份	平均价格
1986	19.9	1996	21.7
1987	24.9	1997	20.2
1988	19.5	1998	13.6
1989	22.8	1999	18.4
1990	28.2	2000	28.2
1991	22.9	2001	23.8
1992	22.0	2002	24.0
1993	19.0	2003	27.3
1994	17.7	2004	34.6
1995	18.7		
2005Ⅱ季度	45.5	2005Ⅰ季度	41.6

* 以2000年固定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5年金融统计。

2000年之前，政治事件（波斯湾战争）和金融震荡（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引起的价格骤然下跌和上涨，仅仅导致短期偏离多年平均水平（见图3-15和图3-16）。

① J. 阿马泽加：《管理石油财富：欧佩克的横财和陷阱》，第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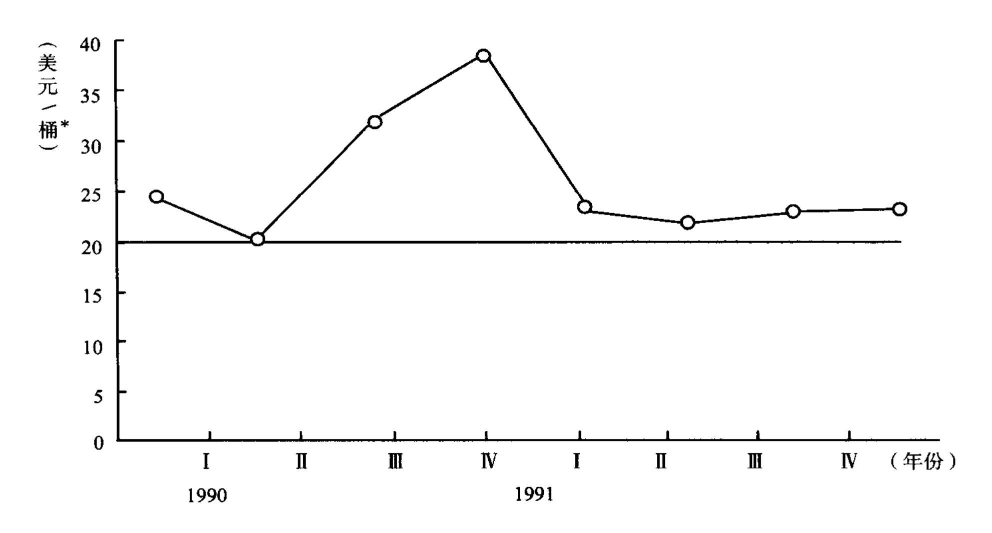


图3-15 在历史平均水平背景下1990~1991年石油价格季度动态

*以2000年固定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2004年国际金融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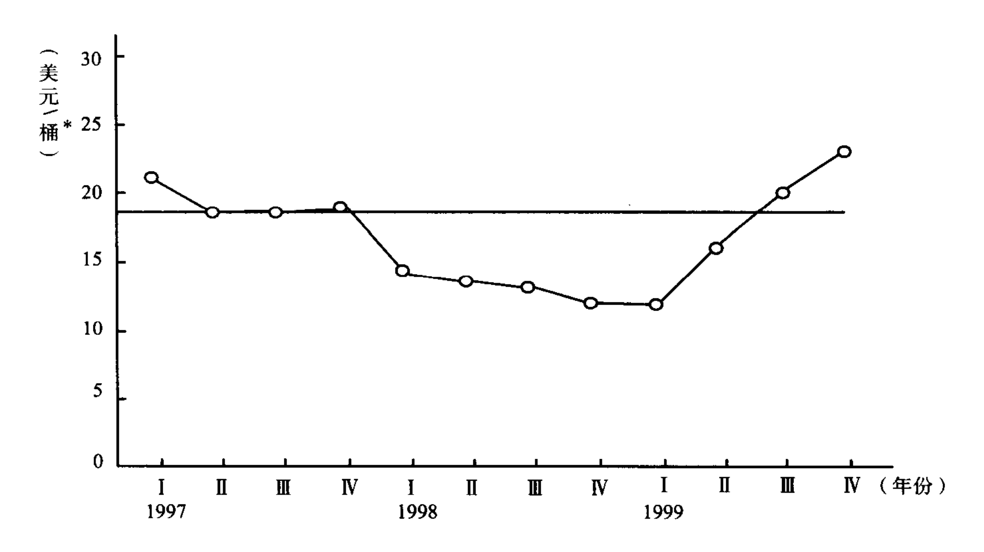


图3-16 在历史平均水平背景下1997~1999年石油价格季度动态

*2000年固定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2004年国际金融统计。

五 原材料价格波动引发的挑战：墨西哥和委内瑞拉

1970年代初期以来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国内事件的发展，形象地说明了石油开采国在石油收入波动不定的条件下所遇到的问题。委内瑞拉和墨西哥当时都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苏联同年代所达到的指标水平相当的国家（见表3-8）。

表3-8 墨西哥、委内瑞拉和苏联1970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国家	按人口平均计算的GDP，以1990年的国际美元价格计算
委内瑞拉	10672
墨西哥	4320
苏联	5575

资料来源：计算法据A. 麦迪森，《世界经济：历史统计》，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巴黎版，2004。

石油这个20世纪初期国民经济结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970年在墨西哥经济中并未发挥关键性的作用。石油开采量约为每天7000万桶。1950～1970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石油无关。委内瑞拉1970年代初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开采国之一，石油收入对于预算的收支平衡原则上说是重要的。但是在该国1973～1981年价格飞涨之前的数十年间，与石油无关的部门的生产也都迅速增长。

墨西哥在数十年期间都是一个政治上封闭的民主国家。委内瑞拉在1990年代初期之前是拉丁美洲为数不多的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一。无论两国中的哪一国，财政部都享有高效机构的声誉。许多年中它们都由熟知原料资源价格不可预料将引发风险的人领导。

1973～1974年石油价格的飙升与墨西哥发现一批新的大油田的时间相

吻合。[①] 从1970年代后半期开始，无论石油的开采数量还是与之相关的预算收入都急剧增加（见表3－9）。临近1970年时，石油部门创造了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的2.5%，提供了联邦政府收入的3.5%。1983年时这个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增加至14%。[②] 1974年石油在墨西哥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仅约0.5%，1980年时石油和天然气已经提供了全国出口收入的67.3%。加工部门在出口中的份额则减少至16.5%。[③]

表3－9 1975～1985年墨西哥石油开采量及其在国家收入中所占份额动态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年平均石油开采量（千桶/天）	703	831	981	1209	1461	1936	2313	2748	2689	2780	2745
石油收入在预算总收入中的份额（%）	14	14	15	17	21	27	31	40	51	48	44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情报局，《国际石油月刊》http：//www.eia.doe.gov/emeu/ipsr/supply.htm/，R.M.奥蒂编《资源丰富与经济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版，2004。

来自石油出口收入的增长引发了替代进口工业化模式的危机，延缓了1970年代前半期墨西哥的经济增长。1976年执政的墨西哥总统L.波尔蒂利奥决定利用归于政府支配的财政资源，以便加快国家经济发展。[④] 一整套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开始实施。但是有效利用石油资金的能力有限，国家机关素质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其中许多项目要么未能完成，要么效益不高。[⑤]

---

① 1970年墨西哥的石油储藏量估计为40亿桶，1982年则为57亿桶。见E.T.道林、F.G.希尔顿：《1980年代的石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视角》，载于S.肖贾、B.S.卡兹编《1980年代的石油市场：10年衰退》，第76页。关于1976～1980年墨西哥已证实的石油储量的急剧增加，亦可参见F.J.P.博利奥：《墨西哥的石油和政治变化》，载于《拉丁美洲观察》第9（1）卷，1982年第32期，第65～78页。

② S.埃弗哈特、R.杜瓦尔—赫南德斯：《墨西哥对石油横财的处理·历史的经验和对未来的政治选择》，工作论文，2001年4月第2592号，第2页。

③ R.E.卢内：《墨西哥的经济政策制定：突出1982年危机的因素》，杜克大学出版社达勒姆版，1985，第40页。

④ O.古兹曼：《“墨西哥石油公司”的财源》，载于O.古兹曼、R.古铁雷斯编《墨西哥的新能源政策》，西方观察出版社博尔德版，1988。

⑤ A.托内尔、P.莱恩：《横财是祸吗？一种非典型的活期账户和财政政策代理人模式》，美国国家经济调查局工作论文，1994年第4839号。关于墨西哥的资源性经济收益、封闭式民主制度和高效腐败之间的关系，见E.G.戴维斯：《墨西哥经验》，载于S.肖贾、B.S.卡兹编《1980年代的石油市场：10年衰退》，第45页。

国家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在1960年代末期仅占20%，到1982年则已接近50%。依靠石油开采和外债提供经费的投资增长速度1978～1981年将近20%，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则为8.4%。[①] 如果这样的经济政策能够坚持下去，仅此即足以让国内生产总值在10年内翻上一番。经验再次证明，试图利用对长期稳定发展有害的资金加快增长速度，无论对经济或社会都代价昂贵。

政府不断增借外债。债权人深信石油的高价是投资安全的保障，便也不断提供借款。1981年墨西哥的外债中国家部分高达400亿美元，私人部分亦已达到200亿美元。[②]

1980年代初期墨西哥来自石油开采的收入约为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国家领导人坚信1979～1981年石油价格的上涨反映了长期的发展趋势，其水平在许多年内都不会下降。[③]

1981年墨西哥政府通过一项转而采取更为进步的财经政策的决定。其基础是假定中期远景内来自石油开采和出口的收入每年增长12%。[④] 像许多事情一样，采取这种决定的时机极不适宜。

1981～1982年行情发生了变化。油价的涨势暂时停止。美国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的努力，加大了包括墨西哥在内的全世界外债的举债负担。对偿还国家债务的能力信心不足促使资本流失。1982年2月墨西哥政府被迫将比索贬值70%。这又加剧了与外债偿付有关的问题。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危险的步骤：实行双重汇率制度、拒绝偿还所借贷款、强化对货币流动的监督、将银行进行国有化，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石油价格下跌的背景下发生的。[⑤]

---

① W. G. 奇斯莱特：《墨西哥财政危机的原因和可供吸取的教训》，载于菲力普编《墨西哥的政策》，格鲁姆·赫尔姆出版社悉尼版，2001，第1、3页。

② R. E. 卢内：《墨西哥的经济政策制定：突出1982年危机的因素》，杜克大学出版社达勒姆版，1985，第49页。

③ R. M. 奥体：《资源丰富的大国滥用它们的优势：墨西哥和阿根廷》，载于R. M. 奥体编《资源丰富与经济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版，2004，第208～223、218页；A. H. 格尔勃及其同事：《石油横财：是福还是祸?》，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版，1988。

④ R. 豪斯曼：《对付消极的石油冲击：委内瑞拉80年代的经验》，美洲内部发展银行工作论文系列307，1995，第12页。

⑤ S. 埃弗哈特、R. 杜瓦尔—赫南德斯：《墨西哥对石油横财的处理·历史经验和对未来的政治选择》，工作论文，2001年4月第2592号，第5页。

自 1983 年起，政府试图稳定财政，中止未完成的投资项目，提高税收，削减预算承担的责任。与此同时，石油价格愈来愈低。从而出现了一批已经启动却未能完成的稳定计划，经济增长停止。1980 年代墨西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处于负值范围（-0.54%）。[①]

在新油田发现前夕，墨西哥是一个已融入全球金融世界的市场经济国家。L. 波尔蒂利奥冒险政策的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政府成功保持了政治稳定，但 1980 年代的危机却成了墨西哥不能继续实行封闭式民主制度的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

委内瑞拉政府数十年间与石油市场打交道，曾倡议建立欧佩克，还设立了稳定基金，他们比墨西哥领导人略胜一筹之处在于，业已准备好对付油价上涨之后预算收入随即增加所引发的各种挑战。他们十分清楚石油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见表 3-10）。

表 3-10　1971～1990 年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在总出口量中的份额（每 5 年的平均数值）

年　　份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1986～1990
总出口额中石油出口的份额（%）	90.9	85.4	81.3	80.9

资料来源：计算所根据的资料，J. 萨拉扎—卡里洛：《20 世纪期间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发展》，普拉格出版公司西港、肯林郡版，1994；B. R. 米切尔：《国际历史统计·美洲（1750～1993）》，麦克米伦参考书股份有限公司伦敦版，1998。

1973 年价格刚刚暴涨之后，他们便执行谨慎的预算政策，不容许迅即固定本国货币的汇率。然而在民主制度条件下抵制随预算收入增长所产生的民粹主义浪潮，要比在专制制度的条件下更为困难。于是关于如何将石油收入用于各种不同计划的想法层出不穷。杰出的民粹主义者卡洛斯·安德列斯·佩雷斯正是借助这类主张在 1974 年的选举中获胜。他开始将一系列投资项目付诸实现。这些项目的根据就是必须使委内瑞拉的经济多样化、改善基础设施的状况。国家的社会责任扩大了，与石油开采无关的税收降低了。1980 年代中期开始的世界行情的变化，使得这种政策的执行难

① 计算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在线数据库，http：//devdata，world bank. org/dataonline/。

以为继。

从1950年到1980年，委内瑞拉按人口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34%，1980年与1989年之间却减少18.1%。数十年间相对稳定的本国货币的汇率在这一时期下跌了九成。1989年年度通货膨胀率高达84%。1974年实际上没有的外债到1989年时则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4%，相当于3年的出口总额。在1980年之前的60年间，委内瑞拉与石油无关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6.7%。1920~197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6.4%。1980年之后的20年间与石油无关的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节节下降，1990年代末已降至相当于1950年各种指标的水平。1978年委内瑞拉的信用等级为三个“A”，1983年它却宣布停止偿付外债。[①]

执行“勒紧裤带”政策数年之后，1989年选民们重新让卡·佩雷斯掌权。想起他就联想到诸事顺遂的时期，其时石油价格高企不下。然而时移势易，现在总统本人明白，除了执行最严格的预算政策别无出路。他说，如果政府的开支不能显著减少，国家必将遭遇极其严峻的预算危机。[②] 这可不是他所期待的事情。1992年Y. 查韦斯发动政变的尝试结束了委内瑞拉民主制的稳定时期。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委内瑞拉成了资源丰富国家难以有效对付原料商品价格波动引发的挑战的例证。

六　寻求出路：应对原料价格不稳定带来的威胁

原料商品泛滥，其价格极不稳定，这并非刚刚为人所知的事情。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都试图觅得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风险的套期保值，签订预约合同，此类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案，就经济的观点而言都合乎情理，但在政治上却很危险。如若价格变化比预约合同所规定的更为有利，则向社会解释预算何以蒙受损失便颇为困难。总会有一些人乐于证明，交易分明

---

① R. 豪斯曼：《委内瑞拉的成长性内幕：一个新经典故事?》，哈佛大学工作论文，2000年8月，第1~11页。

② L. K. 特里：《富饶的悖论：石油走俏与石油国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伯克利版，1997，第179页。

对国家的经济有害。[1]

这并不意味着此类问题无法解决。调节原料价格不稳定产生的问题时，所采取的最为普遍的措施就是建立稳定基金，在行情良好时进行充实，价格下跌时则加以使用。[2]

1970年代末期智利的收支平衡和国家预算严重依赖铜价的动态。1976年铜的出口收入超过出口总额的50%。1980年代这一份额依然很高（大约40%）。至1990年代初国营铜业公司支付的款项占到预算收入的20%。尽管如此，智利政府并没有急于实施可使国民经济多样化的大规模投资方案。而是在与铜无关的部门建立可发展具有竞争能力产品的制度性基础，设立严加控制的稳定基金，不允许匆匆固定本国货币的汇率，为20世纪末拉丁美洲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提供条件。

挪威稳定基金的管理被视作楷模，成为其他资源丰富国家仿效的目标。阿拉斯加州基金、科威特储备基金和未来数代人基金、阿曼国家储备基金——这些都是此类制度的例证。[3] 各国政府建立基金的动机显而易见，因为它们深知资源丰富国家预算收入不稳定所产生的风险的规模和严重性。

这样的制度有两种：预定用于保护国家经济免受资源价格波动之害的基金；为了自然资源枯竭时维持福利而设立的未来数代人基金。有时候它们按照法律的规定发挥功能，这种法律规定基金规模的计算以出口资源的价格为转移。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进款的规模取决于所批准的年度预算。经验表明，这是调节因资源价格不稳而引发的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不过也不能夸大其可靠性。[4]

至于对本国货币可行汇率的确定和解决与非原料部门发展有关的各种问题，则稳定基金的作用有限。向清偿力高的可靠国际资产投入更多的财政资金，可提高本国有价证券的投资吸引力，刺激短期资本的流入。

---

① J. A. 丹尼尔：《政府规避石油价格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2001。

② 关于促使资源丰富国家建立稳定基金的原因，见 P. 阿柔、S. 克莱森斯：《商品稳定基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1992年1月 WPS 835 号。

③ U. 法萨诺：《某些国家对待石油稳定和储备金的经验述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文件 2000年 wp/oo/112 号，第3页。

④ 关于建立稳定基金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见 J. A. 丹尼尔：《政府规避石油价格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文件，2001，第12页。

然而稳定基金发挥功能所引发的政治矛盾显得日益尖锐。在非民主国家（许多资源丰富国家均属此类），将国家资金投入到效率低下的项目中风险巨大。其中相当一部分被陆续盗窃一空。尼日利亚稳定基金的历史就是这种事态发展的一个典型例证。①

在民主国家，稳定基金的巨大财政资金使得在原料价格不稳定条件下对预算责任进行必要的限制变得很困难。内行而又富有责任心的委内瑞拉财政部长 1978 年 10 月曾说："一位遇到大量财政需求的财政部长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他有能力说'没有钱'。可是在有着如此大量资金的时候，我怎么能说这种话呢?"② 向花费预算资金的各部门领导人、政治上的院外活动集团、国会议员们进行解释，说政府因为没有钱不能向某些目标拨款，这是一项很不容易的任务，但也是可以解决的任务。而要证明不能这样做是因为要确定本国货币的可行汇率，就要困难得多；汇率的确定反过来又会损害原料部门的竞争力，构成一些预算责任，在原料市场行情不利的情况下履行这些责任绝无可能。

挪威是一个合理而负责任地支配石油收入的国家。发现北海石油资源之后已经过去 20 年，该国依旧让国家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保持着比丹麦、芬兰和瑞典都要低的份额。③ 挪威的稳定基金享有透明、管理完善的声誉。不过自从它建立以来，却连一个执政联盟也未能在选举中获胜。

声称政府坐在钱袋上却不肯解决对社会很重要的问题，这种浮夸的言词已成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2005 年 9 月初联合国将挪威命名为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这并未能帮助执政联盟赢得选举。反对派在竞选运动中的主要话题，都涉及油价高企的情况下如何花费收入、应该以何种规模和为了何种目的将其用来为各种社会计划提供资金。

相互竞争的各个政党在挪威已有多年的历史，政治上很负责任。它们在选举中获胜并组成政府后便会向选民说明，它们过高估计了花费稳定基金经费的可能性，未能考虑到与此相关的风险。反对派则可以指责它们不

---

① S. 蒙特内格罗：《尼日利亚的宏观经济风险处理：对付外部冲击》，载于《宏观经济风险处理——结果和选择》，世界银行西非部第 11983 号报告，华盛顿特区版，1994。

② L. K. 特里：《富饶的悖论：石油走俏与石油国家》，第 160 页。

③ T. 吉尔法森：《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对荷兰病的北欧视角》，为联合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撰写的论文，研究项目为"资源丰富与经济发展：增进资源丰富国家的业绩"。1999，第 33 页。http：//www. hi. is/ – gy/ – fason/pdf/unuwider13. pdf。

履行选前的诺言，就此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在稳定的经济和高效率的民主制度的条件下，这一切都并不那么可怕。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资源丰富国家都拥有这样的政治体制。

※ ※ ※

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进程，很难加以预测。世界发展环境的变化向各国提出新的问题，要求给予适当的回答，要求能够改革各种社会性规章制度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在那些经济依赖原料商品的国家，这些商品价格的不可预料性使情况变得很复杂，通货膨胀水平、居民收入、偿还外债的能力都取决于原料价格的动态。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并非所有的资源丰富国家都有能力对此做出回应，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并不拥有资源财富的国家。解决由于原料市场不稳定所产生的问题的经验，并不是提供如何对付自然财富引发的问题的简单药方。这种经验所显示的重要性无疑是：政治精英们准备改变世界行情、深知本国安全的现实威胁与他们息息相关。

20 世纪后半叶和 21 世纪初期，战争已经变得更像是一种例外，而非常规。近 60 年以来大国之间从未发生武装冲突。但源自 19 世纪司令部文化的军事传统迫使各国必须具备被称为“战斗性使用武装力量军事作战的计划”——即制定出一套在遭到潜在敌人进攻或进攻威胁时采取措施的方案。20 世纪的经验表明，对于遭遇不利行情风险的资源丰富国家而言，重要的是预先知道政府在原料价格下跌时将会做些什么，这对预算、收支平衡、消费市场、偿付外债、银行系统的稳定又会有些什么后果，同时要有一套在类似情况下能够使用的详尽而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苏联在 1980 年代初期就没有这样的计划。其后果已是尽人皆知。

第四章
基础上的裂痕
——1980 年代初期的苏联

丹麦王国里有些什么事情不太对头。

——威·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罗马帝国已是日薄西山，
看上去却依旧秩序井然；
恺撒稳居宝座，战友环侍，
奏章都说，生活无限美满。

——布·奥库贾瓦[①]

一　稳定背景下的低效率

列·勃列日涅夫时代末期，绝大多数分析苏联局势发展的西方观察家都坚信，苏联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已失去动力，效率低下，但仍然是稳定的。研究它的专业人士认为，它将长期存在。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苏联的专家们探讨这一问题的条件有限。但即便是他们这些比西方专家更为了解本国经济运行情况的人，绝大多数也都同意：这一制度虽说缺乏效率，却仍然稳固。

这个制度的政权倚仗的是富有效率的秘密警察，何况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典型特征便是稳定。迫使政府当局动用军队的群众性骚乱的数量，自

① 苏联俄罗斯作家。——译者注

1960年代中期开始减少。1963～1967年仅有个别的风潮出现反复，需要使用武装力量进行镇压。例如，1967年在车臣、伏龙芝、斯捷班纳克特[①]就是如此。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兴盛时期，政府学会了将反政府事件引发的风险减小至最低限度。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反对现存制度的9起群众性事件中，有7起都发生在他上台的头几年。1969～1977年一起类似的事件也不曾出现。如果说尼·赫鲁晓夫掌权期间在镇压骚乱时，11起事件中有8起政府都动用了军队，那么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9起事件中，只有3起动用了军队。自1968年开始直至勃列日涅夫去世，[②]一次也没有动用过军队镇压骚乱。统治集团学会了不以暴力的极端方式处理事情，不必用开枪来镇压不满表现的爆发。[③]

诚然，建造大众化住宅（“赫鲁晓夫房”），划拨园子地供私人使用，这些做法迅速导致国家政权机关丧失对个人私生活的全面监控。十年之间经历了一条从公社方式的生活（安德烈·普拉托诺夫的《基坑》、阿列克谢·格尔曼的《我的朋友伊万·拉普申》和《赫鲁斯塔廖夫像机器》）到另一种生活的道路，后一种生活虽说也是苏维埃式的，但与国家已经分离开来（尤里·特里福诺夫的城市散文）。很大一部分居民获得单独的成套住房之后，便出现了自由思想的领域——厨房。园子地则让普通人得以从国家所安排的繁忙的集体生活中暂时脱身。

1950年代初期与1980年代中期之间，国内容信息环境大大改变。1950年代仅只2%的苏联公民拥有短波收音机。到1980年时，可以获得这种收音机的人已增至居民的半数。苏联领导人采取各种措施，让国产收音机很难收听到西方广播电台，还对它们进行干扰。[④]然而完完全全被监控的信息世界到1980年代时已经成为过去。苏联公民中活跃的一部分人，已经获得国家监控渠道之外可供选择的有关所发生事件的信息。1970年代中期，克格勃曾将青年中广泛流传的改革派修正主义思想情况上报苏共中央。事情首先涉及高校人文学科的大学生，据称已

---

① 伏龙芝为吉尔吉斯斯坦城市，斯捷班纳克特为阿塞拜疆城市。——译者注

②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逝世于1982年。——译者注

③ B. A. 科兹洛夫：《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1953～1980年代初期）苏联的群众性骚乱》，西伯利亚年代记录出版社新西伯利亚斯克版，1999，第8页。

④ 总编辑 A. A. 富尔先科：《苏共中央主席团·1954～1964》第1卷，会议记录草稿，速记记录，决议，第2版，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莫斯科版，2004，第702页。

发现受到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43个在校青年学生代表小组。克格勃的情报中说："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相当大一部分做出政治上有害表现的人都受到直接来自国外的思想影响。收听外国无线电台广播，阅读邮寄到苏联的资产阶级报纸、书籍和其他出版物，与敌视苏联的外国人交往和通信，诸如此类的因素对47%的（2012）人都产生了影响。所有的因素之中，最主要的当数外国无线电广播宣传的影响……材料分析证实，青年中对外国广播感兴趣的情况很普遍。例如，根据苏联科学院社会调查研究所应用社会调查部所进行的'莫斯科西方无线电台听众'的调查资料，80%的大学生和将近90%的市立职业技术学校、中等技术学校的高年级学生都或多或少地经常收听无线电台广播。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收听外国广播已经成为习惯（32%的大学生和59.2%的中专生每周收听外国无线电广播不少于1～2次）。"①

1970年1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呈送苏共中央的分析报告中称："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圈子中所谓的'私自出版'书籍的分析表明，'私自出版'近年来已发生质的变化。如果说五年前的特点主要是传阅有错误思想的文艺作品，那么目前愈来愈流行的则是获取具有政治纲领性质的文件。1965年以来一个时期内，已出现400种以上各式各样的关于经济、政治和哲学问题的学术著作和文章，内容是从各个方面批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修正苏共的内外政策，推出反对派活动的各种纲领……在科学技术界和一部分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中间，流传着宣传'民主社会主义'各种理论的文件……大约在1968年末～1969年初，由具有反对派思想倾向的分子组成了一个名叫'民主运动'的政治核心，据他们自称，这一运动具有三个反对派特征：'有领导人、积极分子并以数量相当多的同情者为依托……'传播未经检查的材料的中心仍然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高

① 尤·安德罗波夫（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呈报苏共中央的《关于中专学生和大学生青年中负面表现的性质和原因》的情况分析，1976年12月12日，第2798—A号。http：//www. 2nf/. com. /archive/pdfs/ideolog/ct37b. pdf. 此处和后文我们均转引了B.布科夫斯基书中所引用的材料，这些材料目前在俄罗斯各档案馆公开的馆藏中尚无法查到。我们引用时信赖作者的负责态度，我们之所以使用这些材料是因为，在我看来公布这些材料的人的声誉不允许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在引用苏联时期的各种档案文件时，拼写法和标点符号均保留原貌。

尔基、新西伯利亚斯克、哈尔科夫。”[①]

“私自出版物”和“那边的出版物”获得广泛的流传。至少在各首都城市对于有文化修养的人而言，不了解诸如安·萨哈罗夫或亚·索尔仁尼琴等人的被查禁著作是有失体面的。不过，在知识精英阶层中享有道德威望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并未对统治集团构成严重的威胁。封锁边境、限制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和人文联系——所有这一切足以确保政治上的控制，而且似乎还能使危及政权的反对派运动无法组织起来。

1958～1966 年期间，以鼓动反苏宣传罪名被判刑的人数为 3448 名。1967～1975 年期间则为 1583 名。1971～1974 年，如果使用克格勃的术语，被“预防性处置”者更多达 63100 人[②]——国家政治机关用这一术语表示对那些被怀疑为异端的苏联公民所采取的措施。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应当意识到，他们的活动已为各种机关所知晓，现有的选择非此即彼——锒铛入狱抑或对政府当局表示忠诚。

民族之间的冲突依然具有潜在的爆炸性危险。公认处于紧张状态的主要地点为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阿布哈兹[③]。1965 年 4 月 24 日，亚美尼亚发生了若干起有 3000～8000 人参加的自发性群众集会。发言的人要求让纳戈尔诺—卡拉巴赫[④]回归亚美尼亚版图，释放与他们观点一致的人。在阿布哈兹，1967 年的骚乱持续了两周时间，[⑤] 不过并没有转化为民族之间武装对抗的形式。

二　日益增多的问题和错误的解决方法

1930～1950 年代苏联的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将来自农业的资金向工业

---

① 尤·安德罗波夫（克格勃主席）1970 年 12 月 2 日致苏共中央的第 3461——A 号报告，对 5 年内“私自出版”的书籍的分析。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55. д. 1. л. 2～4。

② 尤·安德罗波夫（克格勃主席）呈送苏共中央的报告，内容为关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在苏联就人权所发表的意见，1975 年 12 月 29 日，编号为 3213—A。http: //www. 2 ntl. com/archive/pdfs/dis70/kgb/75-g. pdf。

③ 自治共和国，当时属格鲁吉亚。——译者注

④ 自治州，当时属阿塞拜疆。——译者注

⑤ B. A. 科兹洛夫：《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1953～1980 年代初期）苏联的群众性骚乱》，第 401、404 页。

配置作为保证。农村大规模地为在建企业提供劳动力。国内生产总值中基本建设投资的份额异常之高。1930年代农产品的出口，使得大规模地采购成套进口设备得以实现。1940~1950年代末期所形成的工业潜力和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刺激在建企业中国产设备供应份额的提高。

社会主义制度所倾向的发展模式是建立新的大型企业。如果企业中找不到人干活，投资就没有效益。1960年代劳动力涌向工业的势头减弱。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补充投资替代劳动力流入并非易事。灵活机动地运用投资以达到有效利用生产能力的目的并非这种制度的优点。时至1960年代末期，那些为党的高层领导草拟报告的人也都明白了这一点。①

国家领导人意识到苏联经济效率低下所引发的问题日益增多，这促使他们于60年代中期尝试进行经济改革。苏共中共和苏联部长会议1965年10月4日的决议认为，可以扩大企业的权利，增加留归它们支配的用于发展生产和奖励员工的资金额度；实行劳动报酬不单取决于个人劳动的结果，同时也取决于企业工作的结果的制度；在以彼此承担物质责任为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加强利润在激励员工方面的作用。②

这里所宣布的各种措施的规划，较之南斯拉夫所实行、匈牙利所规定、若干年后中国所采取的做法都更为谨慎。尽管如此，它终归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深刻危机开始之前所发起的最新一次试图寻求改变苏联经济管理体制途径的认真尝试，为恢复1920~1930年代之交废除的市场机制开辟道路。很难说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改革派努力的结果，但1966~1970年关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五年计划，却是苏联存世的最后30年间最为成功的五年计划。

表明苏联经济效率低下的事例尽人皆知。苏联开采的铁矿石比美国多

---

① 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1969年12月15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因此，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基本任务，就是显著提高（约2~2.5倍）现有的劳动和物质资源以及新的积累的使用效率，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见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ф. ȥ. ОП. 3. Д. 168. P. 11688. Л. 42。

②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1965年10月4日的决议《关于完善规划和加强对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载于《党和政府有关经济问题的决议》第5卷，政治书籍出版社莫斯科版，1968，第658~685页。

出7倍，用这些矿石所炼出的生铁只多出两倍，再用这些生铁炼出钢则仅仅多出1倍。以这些金属生产出的机器，就价值而言与美国大致相等。但是按单位最终产品计算，苏联所消耗的原料和能源却相应的较美国多出0.6倍和1.1倍。苏联工业企业的平均建设时间超过10年，美国则不到两年。[①] 按单位最终产品计算，1980年苏联所耗费的钢比美国多出0.8倍，水泥多出1.3倍，矿物肥料多出6.6倍，林产品多出0.5倍。[②] 苏联生产的谷物联合收割机比美国多15倍，与此同时，收获的谷物却要少得多，使自己只好依赖进口所提供的谷物。[③]

米·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6月16日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说："国家收入、工农业产品在现有条件下的每一分增长，都要求我们提供更多的资金……目前单是在工业部门就有大约70万个工作岗位缺少人手，而且这实际上还是在设备单班运转时的情形。轮班工作率达到1.7人次时，工业部门空缺的工作岗位数量将会超过400万个。而创造这些岗位花费了数亿卢布。"[④]

上马规模宏伟、足以骄人、不算经济账项目的念头，在苏联领袖们的头脑中不时闪现。1963年我国开始从国外购买粮食的时候，赫鲁晓夫还提出恢复自阿穆尔河（黑龙江）畔的共青城通向萨哈林（库页岛）的铁路建设项目。[⑤]

投入相当巨大资金的许多项目，到头来要么效果不大，要么毫无意义。土壤改良工程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就基本建设的投资规模而言，这个领域超过了轻工业（见表4－1、表4－2）。

---

① E. 叶尔马科夫：《放眼过去和未来》，载于《真理报》1988年1月8日。

② B. M. 库德罗夫：《苏联经济回顾》，科学出版社莫斯科版，2003，第19页。

③ 叶·盖达尔、O. 拉齐斯：《是量入为出吗?》，载于《共产党人》1988年第17期，第26～30页。在本章和以下各章中，我引用自己的一些发表于《共产党人》杂志的文章作为第一手材料。根据党的领导人的决定，曾责成苏共中央统计局以及后来的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审查《共产党人》杂志所发表的全部统计资料。所以那些年《共产党人》所反映的苏联官方统计机关有关美国内情况的看法，可靠程度并不低于这些机关所公布的材料。

④ 米·谢·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关于1986～1990年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和党组织实现这一计划的任务》，1986年6月16日，《党和政府有关经济问题的决议》第16卷第2部分，政治书籍出版社莫斯科版，1988，第323、324页。

⑤ 1963年12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见《苏共中央主席团·1954～1964》，会议记录草稿，速记记录，决议卷1，第2版，第794页。

表 4－1　1971～1985 年对土壤改良和轻工业的投资占苏联国民经济总投资的份额

单位：%

年　份	轻　工　业	土 壤 改 良
1971～1975	4.2	6.0
1976～1980	4.3	5.6
1981～1985	4.3	5.2

注：数据按照 1976 年以来对轻工业的投资份额——B 组计算。
资料来源：历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汇编，《苏联农业》，财政和统计出版社莫斯科版。

表 4－2　1971～1985 年苏联对土壤改良领域的投资

年　份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对土壤改良措施的投资（10 亿卢布）	29.6	40.0	43.9
对土壤改良措施的投资，占 GDP 的（%）	1.3	1.4	1.2

资料来源：《苏联农业》统计汇编，财政和统计出版社莫斯科版，1988。占 GDP 份额的计算据 C. T. 西涅利尼科夫：《俄罗斯的预算危机》，欧亚大陆出版社莫斯科版，1995。

出于土壤改良工程的需要，1986～1990 年计划生产 35000 台挖掘机，32000 台推土机，10000 台 K－7＞00 型拖拉机，4400 台 10 吨以上牵引拖拉机，22000 台铲土机，6300 辆汽车起重机等等。中央和地方报纸编辑部、国家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委员会、国家电影艺术委员会都奉命要保证在报刊上和通过电影、广播、电视阐述土壤改良工程的成就、土壤改良对实现苏联粮食规划的效果。[1] 这一声势浩大的活动成效却微乎其微。久而久之，报废的灌溉和排水面积规模几乎与尚能使用的规模相当（见表4－3）[2]。

---

①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 1984 年 10 月 23 日《关于土壤改良、提高已改良土壤的使用效果以稳步增加国家粮食储备的决议》，（转述），《党和政府有关经济问题的决议》卷 15 第 2 部，第 113 页。

② “1986～1988 年每年有 100 万公顷以上土壤经过改良的土地投入使用。用于这类目的和生产项目工程的投资达 80 亿卢布。然而相当大一部分可灌溉土地建成于供水不足的地区，从而每年有将近 100 万公顷土地无法浇水，只能作为旱地使用。另一方面，灌溉系统和设施维护不善和浇水过多，使得土地盐渍化或变为沼泽——现在 1/5 的水浇地已经盐渍化，更大面积的经过土壤改良的土地已被废弃，退出耕作。由于此种原因而退耕的土地1986～1988年全国合计将近 200 万公顷……土壤改良的高花费低产出使 （转下页注）

表 4-3　1971~1987 年不同时期苏联可排水和可灌溉的土地面积的增长

单位：百万公顷

时　　期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1986	1987
可排水土地	4.4	3.6	2.5	0.70	0.63
可灌溉土地	4.5	3.8	3.3	0.61	0.55

资料来源：《苏联农业》统计汇编，财务与统计出版社莫斯科版，1988。

苏联存世最后数十年间所实施的规模宏伟的项目之中，人们已见惯不惊但却十分典型的事例，当数将卡拉博加兹戈尔湾与里海分隔开来。为了阻止里海的水位下降，修筑了一道大坝。不久就发现，里海水位上升，大坝破坏了对国家经济至关重要的企业卡拉博加兹硫酸盐厂的生产。于是又将大坝挖开，重新把水放入海湾。[①]

关于停止从北方和西伯利亚的河流向国内南方地区调水工作的决议通过之后，不得不决定冲销用于制订这一计划方案时的大量费用。[②]在形式上，所有这些开支也都构成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

尖锐的生态问题已成为苏联经济的现实。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便是使用滴滴涕。[③]在发达国家早已被禁止使用之后，苏联多年来仍在大规模地使用。[④]

在苏联农业中大量使用杀虫剂的计划，是苏联经济体制的典型反映。签署禁止化学武器的协议之后，需要利用 1940~1950 年代在这方面所形成的生产能力。1980 年代中期内部研究的结果表明，数千万人已成为含有化

（接上页注②）水浇地和已排干的湿地的经济效益急剧下降。”见农工综合体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总局《1988 年和第 12 个五年计划的三年期间苏联国营农工综合体的社会经济发展》，1989 年 1 月 20 日，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650. ОП. 1. Д. 38448. Л. 9。

① O. 拉齐斯：《我们过去怎么了，今后又会怎样》，欧亚出版社莫斯科版，1955，第 37 页。

② 《关于冲销北方和西伯利亚河流部分调水工程方案制订有关费用的决定》，1988 年 11 月 17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4g. Д. 727. Л. 137~148。

③ 英文为 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的缩写），一种杀虫剂，因有积累性残留，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有害，我国和许多国家均已停止生产和使用。——译者注

④ M. 费什巴赫、A. 弗伦德利：《苏联的生态灭绝·处于戒严状态的健康和自然界》，莫斯科版，1992；A. Ю. 皮贾科夫：《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初期的苏联生态政策》，圣彼得堡财经大学出版社圣彼得堡版，1994；L. A. 费多罗夫、A. V. 亚布洛科夫：《杀虫剂：残害生命的化学武器（苏联的悲剧性经验）》，彭索夫特出版社索菲亚、莫斯科版，2004；ф. Л. 亚宁、ф. U. 梅卢阿：《生态失误的教训》，思想出版社莫斯科版，1991。

学毒剂的食品的受害者。[①] 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和今后数十年的国家人口形势。但在1980年代初期之前，这些问题并未对政权的稳定造成短期威胁。

1930～1950年代所形成的那套统治制度始终有效，直至依靠大肆进行恐吓和以遍及全社会的严厉制裁相威胁。1953年之后，笼罩全社会的面临镇压的恐惧感日渐消退，传统的社会主义统治方法的效力逐步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纪律不断松弛。赫鲁晓夫视察顿巴斯后，1956年8月24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讲述当时所出现的形势时，曾经透彻地指出："人们什么都偷。"[②]

苏联居民的普遍酗酒自1960年代初以来已导致生产停滞，然后又导致男人的平均寿命减少。这种现象是在城乡酒类消费种种恶习相结合的背景下流行的。城里人喝酒的固有方式传播到了农村：乡下原先偶尔才喝酒（主要是逢年过节时候）的特点，业已变成了日常性的习惯。城市文化中则掺杂了农村节庆日长时间聚众宴饮并且胡闹、斗殴的传统。1984年苏联在可以进行社会监督的场合（咖啡馆、餐厅、酒吧）所消费的酒类份额只有5.5%，当时发达国家则为50%～70%。在户外饮酒的传统根深蒂固。这使得在同等酒类消费量情况下的违法概率增加1.3倍。20年之间，含酒精饮料的人均消费量增加1.1倍，由于狂喝滥饮而造成的违法数量增加4.7倍，酒精中毒的病人数量则增加6倍。[③] 约有90%的旷工与纵饮无度相关。[④] 1986年苏联进过麻醉品成瘾学习班的酒鬼人数多达400万之众。每年进醒酒所的人将近900万。[⑤]

执行计划的纪律水平节节下降。当一个部门或企业无法完成计划时，

---

① L. A. 费多罗夫、A. V. 亚布洛科夫：《杀虫剂：残害生命的化学武器（苏联的悲剧性经验）》，彭索夫特出版社索菲亚、莫斯科版，2004。

② 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ф. 3. оп. 12. д. 1005. л. 21～23，引文据《苏共中央主席团·（1954～1964）》，会议记录草稿，速记记录，决议卷1，第2版，第160页。

③ Г. Г. 拉伊格拉耶夫：《爱心攻势的失算，或为何戒酒运动遭遇失败？》，载于《科学院通报》1991年第8期，第30、34页。

④ 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1969年12月15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ф. 2. оп. 3. д. 168. Р. 11688. л. 58。

⑤ Б. М. 列文、М. Б. 列文：《苏联的饮酒改革：成绩、问题、困难》，载于《饮酒改革的成效：某些社会学观点》（1988年11月1～3日在巴库举行的国际会议），苏联科学院社会研究所莫斯科版，1988，第3页。

任务就会减少。苏联国家计委原主任 H. 拜巴科夫证明说："我从克里姆林宫回来时，总爱回忆在斯大林那里举行的会议。我作为人民委员必须与会。会上尖锐地提出许多问题，政治局委员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规定了负责完成的期限。我们都知道，如果斯大林发了指示，对于我们那就是法律，无论如何你也得执行。为什么现在政府的决议却执行得很糟糕？哪来的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①] 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既然从一种以对统治集团的恐惧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中去掉了核心部分，它自然会开始运转不灵。[②]

自 1950 年代末至 1960 年代初，经济体制逐渐发生变化，形成 B. 奈舒尔所说的"协商经济"。[③] 本书作者则将其称为"等级交易体系"。[④] 生产活动方针、资源分配制度的制定并不都是以上级机关对下级的命令为基础，而是经过一个分级协商的过程。上级机关的根据便是它所掌握的资源、对下级领导人进行制裁的能力。下级领导人的根据则是有关实际生产问题和他们所拥有的产能信息。这些信息能让上司知悉的数量有限。

已解密的文件表明，即使在 1930 年代也并非纯粹命令式的制度，其中还有等级交易的过程。[⑤] 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质的差异，而是逐步地演化，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权的上级机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下级的能力在缩小。下级管理机关在等级交易中作用的增强，并没有提高社会主义制度运行的效率，并不能解决因缺乏市场手段所产生的问题。

以行政方法提高苏联经济效益的尝试无果而终。计划纪律的削弱显而易见。劳动资源的增长日益下降。不可能用增加投资的方法加以弥补。苏联国家计委副主任 Л. 沃罗宁于 1984 年 2 月 23 日致函苏联部长会议说，与

---

① H. K. 拜巴科夫：《从政 40 年》，共和国出版社莫斯科版，1993，第 123、124 页。

② 关于大规模恐怖手段的停止和苏联经济政治制度效率的降低，见 A. 达林：《苏联瓦解的原因》，载于《前苏联事件》卷 8（4），1992，第 282、284 页。

③ 这个术语首次运用于 B. 奈舒尔未发表的手稿之中，后来它开始在论述后期社会主义现实的经济学书籍里广泛使用。例如，可参见 П. O. 阿文、B. M. 希罗宁：《经济机制的改革：可以预计的变革的真实性》，载于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院报，《经济学和应用社会学》丛书第 3 辑，1987 年第 13 期。

④ 叶·盖达尔：《经济改革与等级制度》，责任编辑 C. C. 沙塔林，科学出版社莫斯科版，1990，第 44 页。

⑤ 1930 年代苏联经济中的交易关系的资料，在已解密的苏联材料中已予以揭露，有关情况见 P. R. 格列戈里：《在斯大林命令经济的背后》，胡佛学院出版社斯坦福版，2001。

现有劳动资源相比较，工作岗位的数量持续增多，由此引发的劳动力不足导致劳动效率下降。[①] 在现有体制下资本投资不可能减少对劳动力增长的需求，这被 C. 费舍尔和 Y. 韦斯特利视作苏联经济崩溃的主要因素。[②] 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往往被拖延，数十年间困难不断增加，从类似的趋势进行推论，足以预料到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停顿，但并不会崩溃。

经济增长速度确实是在下降，[③] 但这并未对既有经济政治制度构成威胁。在有关长期预测苏联经济发展的著作范围内进行的计算表明，这种趋势仍将保持下去。将增长速度衰减的预测写入送交国家领导人的总结性文件是冒险的，但专业经济人士所见到的图景正是如此。1970 年代末 ~ 1980 年代初研究苏联经济的大多数西方专家认识到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如果停留在这种视界之内，那么到苏联经济增长出现停滞还有 20 ~ 30 年时间。

1980 年代后期共产党领导人中的思想家之一，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瓦・梅德韦杰夫这样评价苏联的经济状况："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 ~ 1971 年）大概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最后一个顺利时期。在 60 年代的经济改革和较为有利的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发展速度甚至比此前数年还略高一些……此后经济发展开始迅速地不断恶化。近期的两个五年计划，包括其中的社会计划，全都破产。经济局势暂时依靠燃料能源和原料资源的国际高价位来维持。只有一个经济部门始终处于繁荣状态，这就是军事工业综合体。国家在力不从心的军费开支负担重压之下疲于奔命。"[④]

共产主义的效力到此时已荡然无存。国家领导人采取惯用的意识形态公式和口号作为世代相传、必须遵守的宗教仪式。社会则对这一套要么不

---

① 关于为职工创造机会能对某些享受优惠条件和特权的有竞争力的企业进行选择的问题，见 Л. А. 沃罗宁（苏联国家计委副主任）1984 年 2 月 23 日致苏联部长会议的函件《关于进一步改进经济管理工作的组织问题》，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 Д. 3. Л. 44.

② Y. 韦斯特利、S. 费舍尔：《苏联经济的衰退》，载于《世界银行经济评论》，第 9（3）卷，1995，第 314 ~ 372 页。

③ 苏联问题专家都认为，自 1950 年代初以来，每 10 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降低约一个百分点（从 1950 年代的 6% 降至 1970 年代的 4%），预计这一趋势在今后仍将持续。见 F. G. 怀特豪斯、D. R. 卡兹默：《产量趋势：展望和问题》，载于 H. 亨特编《苏联经济的未来：1978 ~ 1985》，西部评论出版社博尔德版，1978，第 9 页。

④ 瓦・安・梅德韦杰夫：《在戈尔巴乔夫的团队里・内情窥探》，壮士歌出版社莫斯科版，1994，第 6、7 页。

予理睬，要么将其当做日常笑话的素材。数十年中奉行的不以智力水平挑选共产党领导人的路线，至1970年代末形成的是一个由老年人掌控的、没有能力做出任何明智决定的苏共中央政治局。[①] 不过当一切都是处于惯性的作用、遵循着已经定型的规则而运动的时候，那些领导国家的人也无须乎具备高智力水平。

三　国家的粮食供应问题

正如早已得到证实的那样，社会主义——是一种短缺经济。[②] 向那些没有接触过这种经济的人说明它是如何运转的颇为困难。关于可以获取短缺资源的社会主义等级制的构成情况；在商店里有一个熟识的售货员，最好是一位部门主任，对于一个家庭的重要性；一个月一次乘车两三百公里，带着优惠供应证进城，花费数小时排队等候，一般人并不满足于购买300克香肠，而是能买到多少东西就买多少——关于这一切，一个不曾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过的人几乎无法想象。

我们所能见到的社会学著作都说明，消费商品不足所引发的种种问题的尖锐程度从1960年代后半期开始增长。自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习以为常的短缺已转变为1980年代末真正的粮食供应危机，政府无力保证履行资源分配的职责，哪怕是在凭卡定量供应的范围内进行分配——这些正是人们对社会制度失去信任并导致其瓦解的最重要的经济原因。

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政治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

---

① E. 恰佐夫院士是直接为苏联领导人的健康负责的人，曾经担任卫生部第4局局长，后来他写道："归根结底，国家丧失了具体的领导。并不是指即刻解决某些组织问题的，而恰恰是指负有保障社会未来发展和福利使命的领导……既然A. H. 基里连科都被选定为党内第三号人物，那么，还需要深入探究党和国家危机的原因吗？与人交往时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可爱的人，但根据我们向苏共中央领导提交的资料，此人大脑皮层内已发现病变……正是从党的二十五大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作为国家领导人和政治领袖的勃列日涅夫无活动能力进行记录……今天已很难记清，我们究竟在勃列日涅夫有生之年的最后六七年中向政治局报告了多少次有关他健康状况的正式信息。也许这些信件还保存在某些档案里。不过安德罗波夫的不动声色是有充分根据的——任何一封信都不但没有得到回应，而且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曾对这些消息表现出哪怕最低限度的兴趣。"见E. 恰佐夫：《健康与权力·一个"克里姆林宫医生"的回忆》，新闻出版社莫斯科版，1992，第117、144、149页。

② Q. 科内纳伊：《短缺经济》，经济出版社莫斯科版，1990。

大战期间沙皇政府就曾遇到过这一问题。当时并未能加以解决。1917 年的革命便是其结果。粮食供应在 1918～1921 年的国内战争历史上也是个首要问题。布尔什维克实行余粮收集制①，让鲜血流成了河，表明他们懂得如何保障粮食资源的供给。

1928～1929 年之交，城市的粮食供应危机重新处于尖锐的经济政治辩论中心。斯大林选择的行动方案是：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和土地，实行集体化，恢复余粮收集制——这也确定了日后数十年国家发展的轨道。

卡尔·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常常会重演两次，一次是悲剧，另一次是讽刺喜剧。② 与马克思的论述相反，苏联的事态发展表明：历史不仅可能重演两次，而且不一定非以讽刺喜剧的形式重复。1980 年代后半期大城市的粮食供应再次成为经济政策的关键性问题。国家的命运取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过在分析这场危机是如何爆发的之前，首先需要对危机的原因作一番剖析。

在 18～19 世纪之交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增长加速之前还发生过一个享有"农业革命"称号的过程。对于当时的欧洲而言，所使用的技术装备仍然是传统的。但关于改良农作物的技术性措施的知识迅速传播，越来越多论述这一主题的书籍和文章纷纷面世，土壤耕作技术和轮作制不断改进，从而使得农业生产的效率比此前各世纪都空前迅速地提高了。这就有了可能将农村腾出来的资金用于建立工业、向日益增多的城市居民供应粮食。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低于工业。但以时间来衡量，这种速度堪称高而稳定，是以往漫长的各个时期中都未曾有过的。③

在肇始现代经济增长的各国，国家为工业提供资金的作用有限。至于依靠向农民征税，再将在此基础上筹集的资金用作国家投资，从而保障工业化，这样的事情根本无从谈起。

农民的长子继续务农，他的弟弟则到城里找工作。从欧洲迁往海外的

---

① 1919～1921 年苏联的农产品收购制度，农民必须按固定价格向国家交售一切余粮（即超过个人和生产需要规定的粮食）和其他产品，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机关、征粮队会同贫农委员会、地方苏维埃一起执行，省的国家计划任务分派给县、乡、村、农户。——译者注

②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18 日》，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版第 16 卷，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莫斯科版，1961，第 377 页。

③ 关于现代工业增长领先的国家中农业发展的作用和工业化前提条件的创造，可参见诸如 D. G. 约翰逊：《再谈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载于《农业经济学》第 8 卷，1983，第 421～434 页。

大批移民，大多以继续保留农民和农场主地位为条件，并不愿意成为产业工人——这清楚地证明了工业化最初的数十年间对农业劳动的正面评价。

在追赶性工业化的国家中，事态的发展全然不同。国家在加速工业发展中的作用更大。国家投资需要提供经费。既然绝大部分经济活动都集中在农村，那么农民自然就成了实施国家投资方案所需税款的征收对象。

1870～1913年的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对农民的过度征税维持工业发展，是从事经济史研究的专业人士多年来争论的题目。但在废除农奴制之后的数十年间还保留村社[①]，这与国库的意图、力求利用连环保作为征税手段以帮助保障铁路建设的财政资金之间的关系，却是一目了然的。

追赶性工业化的模式构成了种种政治风险。其危险性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充分显示了出来。不过即便在这个时期，沙皇政府的政策也并未导致工业生产依靠缩减农业生产来增长的农业危机。每10年平均的粮食收获量稳步上升。俄罗斯仍然是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见表4－4、表4－5）。

表4－4　1891～1913年俄罗斯的年平均粮食产量

单位：百万吨

时　期	产　量	时　期	产　量
1891～1900	47.7	1911～1913	74.6
1901～1910	55.6		

资料来源：П. U. 利亚先科：《俄罗斯国民经济史》，国家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版，1930。

表4－5　1896～1913年粮食年平均出口量

单位：百万吨

年　份	1896～1900	1901～1905	1906～1910	1911～1913
俄罗斯	5.21	6.81	7.54	6.76
美　国	2.88	2.45	1.77	1.70
加拿大	0.35	0.71	1.24	2.76
阿根廷	0.98	1.68	2.19	2.58

资料来源：俄罗斯的数据见 П. U. 利亚先科：《俄罗斯国民经济史》，其余国家的数据见 B. R. 米切尔：《国际历史统计》，麦克米伦参考书股份有限公司伦敦版，1998。

---

① 村社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期俄国基层的社会行政单位，由一个或几个占有村社农业用地的村庄组成，由村会管理，而村会则由户主和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包括拥有有限的行政和警察权力的村长）组成，若干村社组成一个乡。——译者注

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在苏联形成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乍看似乎继承了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国家组织、依靠农村出资的追赶性工业化的路线。然而从农村掠夺资金的强度和规模都已变得无可比拟地更加巨大。就其实质而言，这里所说的已经是另一种发展类型了。

集体化，剥夺农民迁徙、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点的自由，强迫从事无偿劳动，必须依靠个人副业养家糊口，而1940年代后半期对副业征收的实物税和货币税却很高——这一切都无异于恢复了农奴制。差别仅仅在于，国家并非充当农奴主之一，而是变成了唯一的老爷。在拥有监控和实施暴力的现代手段的条件下，在缺少道德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坚信，较之对工业基础建设投资的增长，农村所发生的事情无关紧要。所有这一切都突破了农业社会特有的向农民索取资源的最大限度，而将资金从农村向城市实行再分配的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先例。

如果在社会生产部门中的劳动是强制性的，如果劳动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劳役地租——几代俄罗斯农民十分熟悉的经济组织方式，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恢复俄罗斯文学中所描写的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前的劳动道德标准。像对待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徭役一样替老爷干活，这在农奴制的环境下是合理的。这种态度在15～16世纪经历过再度被奴役的东欧国家表现得很明显。在俄罗斯它反映在诸如此类的谚语里："活儿不是狼，没法往森林里藏"，"傻瓜才爱干活儿"，最后也表现在"奴隶"与"活儿"都是同一个词根。[①] 在俄罗斯民间口头创作中，正如其他东欧民族的口头创作一样，表现人民对待强迫劳动的智慧的例子为数不少。

从1930年代初开始，1860～1920年代[②]在俄罗斯形成的劳动道德开始弱化。这种道德的体现者是那些吃苦耐劳的农民，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为家人干活，这样的劳动与替老爷干活不是一回事，即使在保留村社的情况下也可以致富；他们懂得，为此必须多多干活，让孩子受教育，掌握新的操作技术。消灭这个阶层是对废除农奴制之后才在俄罗斯形成力量的尚不够强大的农民劳动道德史无前例的打击。1928～1929年所采取的那项决定[③]的长期后果，那些至今仍在从事俄罗斯农村社会经济问

---

① 俄文中"奴隶"为раб，"活儿"（劳动、工作）为работа，词根均为раб。——译者注

② 指俄国废除农奴制（1861年）至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这一时期。——译者注

③ 指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决定。——译者注

题研究的人最为了解。

1928～1938 年的 10 年之间，苏联农业的生产要素产品率比通常的计划（每年增长 1%）减少约 1/4。此前的现代经济增长史上从未发生过类似情况。仅有 1950～1954 年的粮食收获量达到过 1925～1929 年的水平。如此漫长时期的停滞，对已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进程的国家而言也是史无前例的。[①]

这一时期农民的社会地位显著下降，无法与工人的地位相提并论。1930～1950 年代，占苏联人口大多数的集体农庄庄员是一个公然遭受歧视的阶级。他们全年的现金收入仅仅与工人一个月的工资相近。自 1940 年代末期开始，个体经济被课以高额的现金税和实物税，目的在于迫使农民更加专注于集体农庄的劳动。农民开始宰杀奶牛，砍伐果树。到 1950 年时，40% 的农家已经不再饲养乳畜。[②]

如果说在现代经济增长领先国家中，农民和产业工人地位的区别仅仅在于生活方式、工作性质的不同，而不是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那么，在苏联这种差距则十分巨大。由此也就出现了有别于领先国家的另一种性质的向城市迁移以及参与这一进程人员间的差别。

在现代经济增长领先的国家，选择以农为业与缺乏能力、不够勤劳、适应性不强绝无关联。通常情况下留在乡下继续务农的年长儿子，与进了城的年纪较小的儿子一样，在同样的家庭里被抚养成人。选择是由出生的环境决定的。农村里传统的劳动道德并未遭到破坏。工业不断增长，农业的发展也日新月异。许多现代经济增长领先的国家都曾经是而且至今依然是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见表4－6）。

在现行的种种限制性规定情况下，苏联仍然一直存在着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渠道。但留在农村和迁移出去的人员，却有别于未曾经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促使最有文化和身强力壮的农民孩子产生不惜以任何代价想方设法迁往城市的动机。

---

① D. G. 约翰逊：《农业的性能与计划经济的潜力：历史的视角》，芝加哥大学农业经济研究处，1997 年 3 月 21 日，论文第 97（1）号，第 3、4 页。

② 尼·谢·赫鲁晓夫：《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和农业的发展》，讲话与文献，5 卷本，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莫斯科版，1962，第 1 卷，第 155 页。

表 4-6 1961~1990 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年平均粮食贸易结余

国家	百万美元，票面表现形式			百万美元，2000 年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美国	1395	11768	15504	6042	27858	22604
加拿大	511	1159	2563	2200	2900	3746
澳大利亚	1830	4710	7882	7800	11596	11185
法国	-730	923	5625	-3227	2232	7777

资料来源：2005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署数据。

因农村人口外流而产生的农业发展问题，在未曾经历过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同样存在。但其规模与 1950 年代初在苏联所形成的规模之大无法相提并论。

1940 年代末，农民逃离农村的现象日益严重。当时，1932 年那项农民未经特别准许不得离开农村的法律依然有效，但是规避它的方法也尽人皆知。工业、建筑业都需要劳动力，而可供动员的劳动力唯独农村中才有。

四 粮食短缺——战略性的挑战

临近 1953 年斯大林去世之时，苏联农业的衰弱已变得显而易见。党的领导人对此也心知肚明。请看尼·赫鲁晓夫如何概括当时所形成的局面："我来引用一些数字。1940 年储备粮食 22.25 亿普特,[①] 1953 年却只有 18.5 亿普特，亦即减少 3.75 亿普特。同时由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和实际工资的提高，食品消费也逐年增加……用于出口的粮食，无论食品用粮还是谷物饲料，需求量都在增长，可是由于粮食不足，不得不将 1954 年的出口数量定限为 1.9 亿普特（312 万吨），其实本来确定的出口需求量是 2.93 亿普特（480 万吨）。"[②]

当时国家领导人中所争论的并不是应不应当增加用于农业发展的资金。大家都同意有此必要。分歧的核心是这些资金优先用到哪里的问题。

① 普特即俄担，系俄国实行公制前的重量单位，等于 16.38 公斤。——译者注

② 1954 年 1 月 22 日尼·谢·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报告。见尼·谢·赫鲁晓夫：《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和农业的发展》，讲话和文献 5 卷本，第 1 卷，第 85、86 页。

讨论了两种方案：将补充资金用于传统的农业地区，或者开始实施大规模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计划。结果后一种方案被认可优先执行。

大规模开垦荒地的计划作为解决粮食问题、为国家筹集所需粮食的方法，首次予以讨论是在1920年代末期。当时这一计划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吸引他的是可以利用工业化过程中运用过的那些方法的优越性：集中资金、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在农业中建立给予优惠的国营农场部门。专家们表示怀疑，提醒说，大规模开荒会使得收成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料，对此斯大林则认为无关紧要。

后来垦荒土地上的粮食收获量和国家收购量的剧烈波动使苏联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在初始阶段，垦荒对提高国家监督下的粮食储备量发挥了作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国营农场所出售的粮食在国家储备总量中的份额已占到将近10%。[①]

1950年代初尼·赫鲁晓夫倡议大规模开垦荒地，倒也符合苏联经济发展的传统。就社会主义经营体制运行逻辑的观点而言，赞成这种选择的论据并未失去根据。被苏联数十年农业政策彻底破坏的非黑钙土地区[②]的振兴需要实行农村经济自由化、提高农民的物质利益，也许，还需要解散集体农庄。1970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也走上了类似的道路。俄罗斯经济在1950年代开始垦荒之前的发展水平，比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的水平要高。尽管如此，苏联大部分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1930年代的苏联和1980年代的中国，发展的指标相同。1950年时发展水平的指标已经判然有别（见表4－7）。当时苏联按人口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中国1980年指标一倍。但是大部分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

集体农庄制度存续时间之长可用一代人的寿命来衡量。劳动道德被新的农奴制扭曲，但在乡村中仍然生活着千百万这样的人：他们还记得什么是个体农民经济，并未丧失从事这种经济所必需的种种技能。然而1950年代初苏联那场废除集体化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政治现实的界线。而不肯采取这样的决定则可以预料，国家增加对非黑钙土地区的投入只能得到难以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一点后来在1970～1980年代初的实践中得到了证实。在非黑钙土地带耗费了大量的资金之后，苏联所得到的只是极为有限的回报。

---

① И.Е. 泽列宁：《苏联大规模垦荒的首个计划（20年代末至30年代）》，载于《祖国历史》1996年第2期，第55、56页。

② 苏联欧洲部分的大农业工业区。——译者注

表 4－7　苏联和中国在其发展的战略抉择年代人均 GDP 的数量、在农业中所占份额和都市化状况

国　家	年　份	人均 GDP（国际美元 1990 年）①	城市人口的份额②③（%）
苏　联	1930	1448	20.0
	1950	2841	44.7
中　国	1980	1462	19.6

资料来源：① A. 麦迪森：《1820～1992 年世界经济监测》，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巴黎版，1995；A. 麦迪森：《世界经济：历史统计》，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巴黎版，2003。

② 1950 年、1960 年数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问题人口部，人口估计和规划，联合国统计部，http：//unstats. un. org. /unsd/cdb.

③ P. 拜罗奇：《城市与经济发展：从历史开端到当今》，芝加哥版，1988。

在做出另外一种优先选择（开垦荒地以增加国家掌握的粮食储备）的时候，可以对优先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进行这项工作就要在荒地上建立国营农场，向那些在农场里干活的人提供有别于集体农庄庄员的种种特权，那是工人们才可以享受到的。还可以实现对农村流向城市的一部分劳动力资源的再分配，用以实现开垦荒地的计划，而这种流动却是由于工人和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而产生的。

这样做产生了苏联领导人所希望的结果，粮食产量增加了。已开垦的地方成了巨大的产粮区；依靠它们国家可以弥补传统农业地区日益减少的粮食供应量。1958 年尼·赫鲁晓夫正是利用这些论据来证明农业政策进行的优先选择的正确性。[①]

大部分荒地都属于风险农作物地带。这里的收成依赖于变化莫测的天气条件，其依赖程度更甚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传统的耕作地区。这样，1958 年后垦荒地上的收成便停止增长，1963 年更是急剧下降。1963 年的人均粮食产量比俄罗斯 1913 年时还要低：分别为 483 公斤和 540 公斤。[②] 收成的不稳定加剧了正在增长的风险：在不顺利的条件下大城市的粮食供应面临威胁。此外，可供开垦土地本身的空间也有限。然而日益城市化的社会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在开荒之后仍是一个长期

① 尼·谢·赫鲁晓夫：《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和农业的发展》，5 卷集第 2 卷，第 506、507 页；第 3 卷，第 7，374、375 页。

② 《苏联农业统计汇编》，财政和统计出版社莫斯科版，1988；《1979 年的苏联国民经济·统计汇编》，统计出版社莫斯科版，1980。

的无休无止的进程。

尽管作出了种种努力，但国家的粮食储备在 1953～1960 年期间仍然一直在减少，消耗的数量超过国家采购到的数量。这对于苏联领导人而言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征兆。

看来，对于保障居民粮食供应日益增长的困难，一个合乎自然的应对办法就是利用已经造就的工业潜力增加对农业经济部门的投资。自 1950 年代末至 1960 年代初，正是这一方针占据了主要地位。[①] 用于农业发展的基本建设投资份额，自 1950 年代初直至 1980 年代初开始持续不断地增长（见表 4－8）。

表 4－8　1946～1990 年苏联对农业生产项目的投资在经济总体投资中的份额

年　份	农业投资的份额（%）	年　份	农业投资的份额（%）
1946～1950	11.8	1971～1975	20.1
1951～1955	14.3	1976～1980	20.0
1956～1960	14.3	1981～1985	18.5
1961～1965	15.5	1986～1990	17.1
1966～1970	17.2		

资料来源：历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汇编，财政和统计出版社莫斯科版。

政府增加对农村的资金投入，试图弥补 1920 年代末～1950 年代初农业政策长期对农业造成损失的后果。然而有效地利用专供乡村发展的拨款却不可能。不得不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最初阶段所做的一切付出高昂的代价。农村社会结构的恶化，注定了拨付给那里的基本建设投资效果低下。1920 年代与 1930 年代之交执行种种决定的结果，造成了日后数十年间对苏联至为关键的一些问题。

粮食的需求量继续超过收购量，储备日益减少。1960 年全国的粮食收购量、消耗量和国家储备量分别为 4670 万吨、5000 万吨和 1020 万吨，

① 关于 1960～1980 年苏联农业投资的空前增长，见 D. G. 约翰逊：《农业》、J. 克拉克拉夫特编《今日苏联：翻译指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版，1983，第 195～207 页。与 1961～1965 年的五年计划相比，1966～1970 年对农业的投资增长 62%。见 P. 汉森：《苏联经济的起落》，朗曼出版社伦敦版，2003，第 112 页。

1963 年则为 4480 万吨、5120 万吨和 630 万吨。[①]

1960 年代农业产量的增长率为每年 3%，1970 年代则为 1%[②]。自 1971～1985 年，国家对农工联合体的投资为 5796 亿卢布。农业纯产量的增长降到最低点。[③] 1981～1985 年粮食的平均收获量不曾超过 1971～1975 年的指标（表 4－9）。

表 4－9　苏联的粮食收获量

单位：百万吨

年　份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平均粮食收获量	149.5	161.7	184.5	161.7

资料来源：2005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署数据。

Г. 沙赫纳扎罗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 1960 年代中期他与尤·安德罗波夫所进行的一次谈话。这里我引用就这个来源自安德罗波夫所讲的一番话："你知道，政治局越来越坚定地认为，我们的整个经济部门都需要好好振奋精神。农业尤其糟糕：今后再也不能容忍连国家都养不活，年年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的粮食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要饿着肚子过日子了。"[④]

从 1960 年代中期起，全国大部分地方就已经买不到自由出售的肉了。从那时候起就只能到合作社商店或集体农庄市场上以大大高出国有定价的价格去买。只有首都和享受特权的一些城市例外。[⑤]

饲养业饲料需求的增长，使得国家越来越难以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得到粮食。这是 1960 年代后半期关键性的经济政治问题之一。勃列日涅夫在 1969 年曾讲过："这样，1966 年所收获的 17100 万吨粮食之中，9500 万

---

① И. Е. 泽列宁：《尼·谢·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与我国的农业》，载于《祖国历史》2000 年第 1 期，第 84 页。

② D. G. 约翰逊：《农业的性能与计划经济的潜力：历史的视角》，芝加哥大学农业经济研究处，1997 年 3 月 21 日论文，第 97（1）号，第 5 页。

③ 叶·盖达尔、D. 拉齐斯：《量入为出了吗》，载于《共产党人》，1988 年第 17 期，第26～30 页。

④ Г. 沙赫拉扎罗夫：《同领袖们相处和没有他们的日子》，瓦格里乌斯出版社莫斯科版，2004，第 109、110 页。

⑤ О. 拉齐斯：《要么就讲一点价格的本性》，载于《消息报》，1991 年 5 月 7 日。

吨以上都留给了集体农庄和农场，1967年仅收获14790万吨，留下的仍然将近9000万吨，1968年的16950万吨中有10000万吨留给了农村，而1969年的16050万吨中留下的超过10000万吨。"① 与此同时，城市化的过程在继续，依靠个人副业满足自身食品需求的居民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见表4-10、表4-11）。

表4-10　苏联城市人口数量

年　　份	苏联城市人口数量（百万人）	苏联城市人口份额（%）
1956	88.2	45.0
1970	136.0	56.0
1975	151.9	60.0
1980	167.3	63.0
1985	180.1	65.2
1990	190.6	66.0

资料来源：历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汇编，财政和统计出版社莫斯科版。

表4-11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城市人口数量

年　　份	苏俄联邦城市人口数量（百万人）	苏俄联邦城市人口份额（%）
1956	54.6	48
1970	81.0	62
1979	95.4	69
1990	109.8	74

资料来源：历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汇编。

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城市居民的供应有赖于国家的农产品储备。含有市场因素的机制——集体农庄市场、消费合作社等，在大城市居民供应中的作用有限。国家收购量停止增长及其不稳定性，对于国家领导人已成为越来越尖锐的问题。② 城市的粮食供应在苏联政权的数十年中，一直是经济政治讨论的关键性话题。

① 《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1969年12月15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2. ОП. 3. Д. 168. р. 11688. Л. 49～50。

② 临近1980年代末，用于农产品零售的价格补贴已占到GDP的10%～12%，见《前苏联的食品和农业政策改革：转变的日程》，世界银行华盛顿版，1992。

五 苏联——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农业生产的危机及其低下的效率，即便在市场经济中也会构成种种问题。不断增长的需求与有限的供给之间比例失调，会导致食品价格上涨，食品需求的增长速度下降，最坏的情况下还会导致这种需求的绝对萎缩。这对社会和政府都是不愉快的事，但在工业化国家一般都不会导致无法调控的危机。在高度发达的社会里，饥馑并不是歉收的后果。如果发生这种意外的灾难，与之有着必然联系的通常是供应体系产生了混乱，国内或国外战争爆发，城乡之间商品流通瘫痪引起货币流通系统出现灾难性状况，收支平衡产生赤字。单是农产品供应量有限本身不会导致类似的后果。

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利用市场机制调节粮食供需之间比例失调的条件。苏联农业的低效率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所决定的。正是工业化注定了城市对粮食的需求随着城市化而不断增长。既然苏联 1960 年代初在经济上仍然与世界隔绝，苏联领导人就只能眼看着食品短缺的形势日趋尖锐，国家保障居民需求的能力与社会对政府的期望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眼看着平常百姓排队所需的时间越来越长，实行消费品票证制度的城市数量越来越多，眼看着越来越多的凭国家规定标准提供的商品亦无法保证供应——只能眼看着这一切，却只能等待，直至社会政治形势变得无法控制。[①]

市场经济中对付类似的结构性问题时，理所当然的做法是改变零售价格，而苏联则不同，要采取这样的决定简直不可思议。1930 ~ 1950 年代初，共产主义制度稳定的基础是社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恐惧。这种恐惧感的产生缘于实行大规模的镇压，缘于禁绝人们对国内所发生的事情表露不满，即使在家人的圈子中表露也不行，更不消说参与抗议行动。而且当时共产主义思想还尚未丧失其吸引力。1960 年代，对大规模镇压的恐惧感已

---

① “……50 ~ 60 年代之交，政府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窘境。无法解决经济问题，就不可能不引发民众的愤怒，不可能不为对立情绪的增长制造前提条件，不可能不促使人们在所宣扬的目的（建设共产主义等等）与令人沮丧的现实之间进行不利于政府的对比。工资与消费品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是 50 年代后半期对工人让步所造成的，现在却使得苏联一贯的短缺问题更加尖锐。在农产品处于低价位而工资却相对增长的情况下，短缺便变成了灾难性的问题，并且引起了不满的窃窃私语。”见 B. A. 科兹洛夫：《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1953 ~ 1980 年代初）苏联的群众性骚乱》，第 231 页。

成为往事。政治精英自身的利益促使他们放弃国家恐怖手段，不愿重复他们先辈在1930～1950年代初成为牺牲品的命运，这对居民们的行为逐渐产生影响。政权仍然被承认为一种现实，但不再使人感到心惊胆战。已经可以在厨房里对它进行讨论，而不必替家人的命运担忧。救世论般的共产主义思想变得愈来愈缺乏说服力。

关于工人政权和作为现政权合法性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神话，是1950年代末苏联领导人信奉的宗教仪式之一。通过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例子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直至最后一刻，苏共中央领导人仍然相信不必动用大批苏联武装力量也可以挽回局势，仅需号召匈牙利工人施以援手即可。只是在他们确信这是幻想之后，方才做出了使用军队镇压起义的决定。[①]

苏联在1928～1929年的那场经济政治讨论中，关于一支农民军队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被用来强迫农民以低于市场价格向国家提供粮食这一点曾是关键性的话题之一，并不总是可以公开地大声进行讨论，但却足以使人意会。[②]

斯大林相信军队很可靠，一声令下便会开枪制胜，这一点是对的。这个政权正是依靠这支农民军队的忠心耿耿，才得以对农民进行新的奴役，从农村掠夺它认为需要多少就拿多少的粮食，甚至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也继续将其用于出口。然而工业化本身、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国家发展水平的提高，客观上限制了行政当局对本国人民使用暴力的能力。

取代以往政治合法化形式的是政府和社会的新契约。谁也不曾签署过这样的契约，但事情的实质却十分清楚：你们政府要向我们人民承诺不会取消执行各种社会分配计划，即便在它们变得代价更为高昂的时候也要执

---

① A. A. 富尔先科主编《苏共中央主席团（1954～1964）》，会议记录草稿，速记记录，决议卷1，第2版，第176～177页。

② Г. 索科利尼科与尼·布哈林1928年6月11日的谈话摘录。布哈林的话是："斯大林的政策会导致内战。他势必使起义淹没在血泊之中。"在1929年4月16～23日的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合全会上阿·米高扬曾说："对布哈林1925年在农民问题上的背叛行为起了直接推动作用的正是格鲁吉亚起义。布哈林将格鲁吉亚起义当做第二次全俄喀琅施塔特叛乱的信号。"见《他们如何破坏新经济政策：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5卷本，A. H. 雅科夫列夫编，国际文献联合会莫斯科版第4卷，2000，第563、241页。

行，你们要保证最重要的大众消费品零售价格的稳定。为此，社会才准备容忍你们（政府），接受令人厌恶而又摆脱不了的现实。

这种契约被破坏时会发生什么事情，1962年的新切尔卡斯克事件作出了说明，那次事件是在根据日积月累的比例失调程度对关键性大众日用消费品零售价格作出一定调整之后发生的。肉和肉制品的价格从1962年6月1日起平均提高30%，动物油则平均提价25%。

苏联中央统计局预算统计处处长向苏共中央报告说："……如上所述，肉和肉制品消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这些产品的价格提高了……肉和动物油提价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按人口平均收入较低的家庭的消费，这从下列1962年5月和6月产业工人按照家庭人均收入预算分类数据即可看出……在家人平均月收入为35卢布的产业工人家庭中，1962年6月肉和肉制品的消费较5月份减少15%，与此同时，在家庭人均收入为50～75卢布的家庭中，肉的消费减少8%。"[①]

新切尔卡斯克爆发了有数千人参加的骚乱。士兵和民众相互友好。请看那些援引事件参与者证言的人对事态发展的描述："工作日快结束时，新切尔卡斯克卫戍部队的第一批军队抵达卫生局附近的广场。他们没有携带武器。快到广场时，士兵的队列一瞬间被大批民众所湮没。罢工者和士兵彼此友好，相互拥抱、亲吻。是的，是的，就是亲吻。军官们费力地让士兵与民众分离开来，整队集合，带着他们离开了罢工者。"亚美尼亚军队被认为不可靠，便从顿河河畔罗斯托夫紧急调遣内务部队入城。只是在接到莫斯科的直接命令之后，内务部队才开火造成了伤亡。[②]

苏联官方报刊上对这起事件只字未提。然而领导人对情况却一清二楚，而且明白，既然这种事能在新切尔卡斯克发生，谁也不能保证它不会在其他城市发生。

苏联部长会议直属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谢米恰斯内在1962年的一

---

① И. 马秋哈（苏联中央统计局预算统计处处长）呈送苏共中央的调查总结报告。内容为居民在1962年的9个月中的家庭预算和肉、肉制品、动物油零售价提高对家庭预算的影响，1962年12月21日，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5. оп. 20. д. 310. л. 122，125～128。

② Д. 曼德尔：《新切尔卡斯克1962年6月1日～3日——罢工和开枪》，载于《俄罗斯》，1998年第11～12期，第160页；И. 马尔达尔：《未公布的一次屠杀纪实》，报刊服务出版社新切尔卡斯克版，1992。

项命令中说："今年上半年，国内散发的反苏传单和匿名信件达 7705 件……比 1961 年同期多出一倍……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提高畜产品价格的决定发布之后，匿名信大量增加。仅当年 6 月登记在案的散发反苏传单和题词事件即达 83 起。同一时期从党和政府机关、报刊编辑部送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反苏匿名信件超过 300 封，其中对我国居民的生活条件表示不满，号召组织群众性演讲、罢工、示威游行、群众大会，举行要求降低食品价格和增加工资的抵制活动。散发这类材料的事情主要发现于国内各工业中心。"[①]

自从新切尔卡斯克事件发生以来，苏联领导人唯恐像 1917 年那样，士兵拒绝向民众开枪并和反对现有制度的人联合起来——这是苏联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1970 年、1976 年和 1980 年波兰提高物价后随即发生的群众性骚乱使苏联领导人深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也不能迈出这一步。[②]

在这一背景下，货币系统的问题开始增多。[③] 研究苏联消费市场状况的专家们争论，苏联总的货币需求超过商品提供量是什么时候变得明显起来的。[④]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在估计未能满足需求的数额时，是从这一问题自 1965 年开始产生的假定出发的，此前消费品的需求和供给总体上尚属平衡。根据这个组织所进行的统计，消费市场上的比例失调如表4－2 所

---

① 弗·谢米恰斯内：《1962 年的新切尔卡斯克悲剧》，载于《历史文献》1993 年第 4 期，第 170 页。

② 关于赫鲁晓夫时代以来苏联领导人所面临的与稳定消费品物价有关的问题，见 J. R. 米勒：《经济概述》、J. 克拉克拉夫特编《今日苏联：翻译指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版，1983，第 173～186 页。

③ 1961～1985 年货币量，广义货币总量每年以大约 10% 的速度增加。60 年代初国内名义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约为货币量增加速度的 2/3，60 年代后半期，特别是 70 年代，则约为后者的 1/2，80 年代前半期已经只及后者的 1/3 了。于是出现了经济中货币高度饱和的状态，这在广义货币的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快速增大方面表现了出来。如果说 1961 年广义货币总量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22.8%，1970 年为 29.5%，1980 年为 44.2%，那么，1984 年即已达到 52.6%。1980 年时集体农庄市场的价格水平，按照可比的商品清单已超过国家规定的零售价水平 1.57 倍，见 A. 伊拉里奥诺夫：《苏联和俄罗斯执行财政稳定政策的尝试》，1995，www.budgetrf.ru. 集体农庄市场只是苏联消费市场的一小部分。在其他的市场环节，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则导致商品短缺的尖锐化。

④ A. O. 沃罗诺夫：《论短缺的克服问题和调节市场的方法》，载于《经济问题》1990 年第 1 期，第 26～32 页。

示。196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变得日益尖锐，这已是显而易见之事。[①]

表4-12 居民的被迫储蓄（未满足的需求）

年　份	未满足的需求（10亿现今卢布）	未满足的需求的每年增长速度（%）	未满足的需求，占GDP的（%）
1970	17.5	—	4.6
1980	29	5.2	4.7
1985	60.9	16.0	7.8

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5446. ОП.163. Д.185. Л.100，GDP份额计算据 С.Г. 西涅利尼科夫，《俄罗斯的预算危机》，亚欧出版社莫斯科版，1955。

实际上，增长的不仅是短缺，而且还有价格。1981～1985年面包的平均零售价上涨6.6%，土豆上涨7.9%，蔬菜上涨4.4%，糖果点心上涨11.6%。同年代中非食品商品方面的情形则是：棉布上涨17.9%，电视机上涨10%。

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相关决议，自1979年6月1日起黄金制品零售价提高50%，白银制品提高95%，天然皮毛制品提高50%，地毯和地毯制品提高50%，轻型汽车提高18%，进口成套家具提高30%，苏联贸易部和拥有下属公共饮食企业的各个部，都奉命提高晚间食堂和咖啡馆的定价，平均增幅达100%。苏共中央书记处致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和各边疆区、州党委第一书记的信件中说："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采取这些不得已的措施，是由于在平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与大众消费品产量和劳务规模方面出现了种种困难；同时也是出于整顿短缺商品交易和加强与投机倒把、行贿受贿作斗争的需要。众所周知，尽管早些时候已经提高了金银制品、地毯、毛皮制品和汽车、进口家具的价格，对这些商品的需求仍然未能得到满足。买到这些商品需要排号等候很久，常常有人破坏规矩套购。"[②] 但是在涉及日用消费品的时候，国家却试图避免采取需要承担政治

① 关于苏联领导人深刻理解必须变革价格形成体系可同时又不准备走上这条道路，以避免触及与基本消费品价格有关的任何事情，见 В.А. 克留奇科夫：《私事》，奥林波斯 ACT 出版社莫斯科版，1996，第一部，第271、272页。

② Б.И. 戈斯捷夫（苏联财政部长）、М.А. 科罗廖夫（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主任）、В.С. 帕夫洛夫（苏联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呈送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内容为关于食品和非食品的价格动态，1988年11月4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5446. ОП.149. Д.304. Л.18。

责任的不得人心的决定。

1980 年代进行调查所得的数据，显示了在苏联获得食品的条件差别。当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可以利用价格最低的国营商业的购买者占 97%，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则占 79%。这些地方有 17% 的购买者接受消费合作社的服务，10% 的人在集体农庄市场上采购（总数并不等于 100%，因为有些被询问的人同时利用数种不同的渠道）。在州中心，仅有 36% 的被询问者能够在国营商店购买肉和香肠，37% 的人可以利用消费合作社商店，35% 的人则在集市上购买东西。按人口平均总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在国营商店按享有补助的价格购买的肉类制品就越多（大多是不公开的——在机关、军事工业综合体企业内部）。[①] 供应制度令人气愤地不公平。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契尔年科[②]致函苏共中央书记处（1981 年 2 月）称："……公民来信中有时以尖锐的方式提出一些临时性的要求，希望能保障居民的面包和谷物产品的供应，反映面包制品的品种单调、质量低劣……过去一年中从一些城市收到的关于供应劳动人民的面包屡屡断货或质量低劣的警告已经得到证实，这些城市是：伊尔库茨克、乌拉尔斯克、车里亚宾斯克、阿尔乔姆（滨海区）、米努辛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区）、乌曼（切尔卡斯克州）、罗斯拉夫利（斯莫棱斯克州）、乌留平斯克（伏尔加格勒州）、别洛戈尔斯克（阿穆尔州）、基洛夫（卡卢加州）、库列巴基（高尔基州）、尤里诺镇（马里自治共和国）以及其他许多城市。"[③]

苏联的政治领导处于危险境地，而且旷日持久地难以自拔。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所必需的速度增加农产品的生产绝无可能。不提高价格让这种需求与供给相适应同样不可能，而且决定提价意味着破坏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隐形契约。日益增高的农产品收购价与零售价之间的差额在加大。由此产生的预算问题日趋严重。农业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份额的被迫增大，制约了高技术部门发展的机会。

---

① A. 绍欣、A. 古扎罗夫、Л. 利别尔曼：《居民看物价》，载于《文学报》，1988 年 9 月 14 日第 37 期，第 11 版。

② 契尔年科于 3 年后的 1984 年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译者注

③ 第 250 号命令第 9 项第 3 款附录。康·乌·契尔年科致苏共中央的信函《关于劳动者就涉及居民面包供应和认真对待其储备的某些问题的来信》，1981 年 2 月 17 日，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43. Д. 58. Л. 4 ~ 7。

苏联当局对于东欧附庸国内的骚乱，传统的对应方式不单是使用武力，还要加大经济援助的规模。[①] 1950 年代苏联以提供粮食的方式支持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农业日益严重的危机影响之下，供应有所减少。但仍然一直持续至 1960 年代初期（见表 4－13）。

表 4－13 1955～1963 年苏联粮食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量

年 份	出口量（千吨）	年 份	出口量（千吨）
1955	1642	1960	4162
1956	995	1961	2743
1957	4677	1962	2793
1958	2926	1963	2602
1959	4439		

资料来源：《苏联的农业贸易》，美国农业部，1991。

提供这些粮食在政治上是有理由的。那是换取东欧附庸国稳定的一部分代价。典型的例子就是，1956 年波兰事件之后，尽管向东欧出口的粮食在减少，但向这个国家供应的粮食仍保持原有的水平。只是在 1963 年苏联领导遭遇严重的粮食供应危机之后，才决定停止以苏联的粮食出口支持东欧国家。

1963 年 11 月 10 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谈到不得不向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发出的一封函件时说："我想，信应当这样写：亲爱的同志们，正如你们所知道的，今年苏联农业的形势十分严重（进行论证：冬天是如此这般，夏季又很干旱），你们的国家也遭了灾……我们的储备粮已经没有剩余，苏联农业出现这样的不利条件，你们是有目共睹的。你们罗马尼亚的农业多年来不能自给，所以你们经常来找我们，我们也总是决定满足你们的请求——当时你们根据合同和超过合同规定向我们要粮，我们的储备因而消耗殆尽，结果事情弄到了今年我们只好拿出最后的一些储备粮来援助你们，满足你们的请求。我们希望条件会好起来，那时候我们就能不仅恢复并且增加自己的储备。可是现在的情况却是，我们

① 1956 年 6 月 12 日关于波兰局势的会议记录（第 28 a 号）摘录："一切商品都给，黄麻织物、毛料全都给。如果他们想要黄金——那就连金子也给。" 见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3. оп. 12. д. 1005. л. 1～20б。数字据《苏共中央主席团（1954～1964）》，会议记录草稿，速记记录，决议卷 1，第 2 版，第 148 页。

连自己也无法保障，因而迅即进入国际市场，采购多达1200万吨。这马上就在国际粮食市场引发了投机活动。对我们而言，不仅粮食采购出现困难，运输也很棘手。大家都明白，我们再不能继续面对这种局面了，因而我们希望说出我们的想法，并且认为无论是我国的利益还是你们的利益都促使我们这样做（计算数目）。可能要3～4年，我们请求正确地理解我们，我们已无法承担任何提供粮食和棉花的义务。我们将从满足自身的需求和储备一定数量备用粮出发，而这不仅是苏联的储备，同时也是你们的，希望在我们积累的过程中，最好能看到，那些粮食不能自给的国家立即到国际市场去购买粮食，以免重复我们今年遇到的局面。为此我们现在还要依靠其他部门拨出资金，用于提高化肥的产量，通过施肥增加粮食的收成，从而保证粮食的产量能够满足需要，创造储备用粮的条件。不这样我们将无法生存。"①

1963年的歉收和国家储备粮的减少，迫使苏联领导人做出在国外大量购买粮食的决定。为达此目的而拨付的黄金达372.2吨，超过苏联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一。② 当时苏联领导人将所发生的事视作屈辱，但也认为纯属天公不作美而造成的偶然情况。赫鲁晓夫在1963年11月10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说："我们应当在7年内储存下一年的储备粮。苏维埃政权再也不能忍受今年这样的耻辱了。"③

其后数年事情逐渐清楚，在国外采购粮食乃是现存经济管理模式范围内无法克服的农业危机之合乎规律的结果。1965年苏联领导人迫不得已再将335.3吨黄金用于支付购粮费用。④ 1970年代初期苏联农产品的进出口交易在一定程度上还算平衡。时至1980年代初期，这类商品的进口额已超过出口额150余亿美元。

---

①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4～1964）》，会议记录草稿，速记记录，决议卷1，第2版，第778页。

② P.Г. 皮霍亚：《苏联1945～1991年的政权史》，俄罗斯国家公务学院出版社莫斯科版，1998，第370页。有关黄金储备减少的问题，苏共中央主席团早在1956年就进行过讨论。见《苏共中央主席团（1954～1964）》，会议记录草稿，速记记录，决议卷1，第2版，第118页。

③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4～1964）》，会议记录草稿，速记记录，决议卷1，第2版，第769页。

④ P.Г. 皮霍亚：《苏联1945～1991年的政权史》，第370页。

粮食和苏联需求日益增加的其他种类的食品，进口量逐年增加，虽因天气条件的不同而有所波动，但长期的趋势则是持续增长（见表 4－14 和图 4－1）。

表 4－14　1961～1990 年苏联粮食和农业产品的贸易差

单位：百万美元

年　份	粮食贸易差	农产品贸易差	粮食贸易差	农产品贸易差
1961	445	-114	2091	-536
1962	505	88	2341	408
1963	188	-144	862	-661
1964	-353	-1027	-1595	-4641
1965	-160	-1061	-710	-4707
1966	-303	-829	-1307	-3576
1967	252	-247	1055	-1034
1968	255	-213	1024	-855
1969	443	-284	1694	-1086
1970	285	-1006	1035	-3654
1971	391	-798	1352	-2760
1972	-571	-1969	-1892	-6524
1973	-1038	-3236	-3259	-10160
1974	162	-2602	466	-7492
1975	-2228	-6791	-5863	-17871
1976	-2808	-7450	-6985	-18532
1977	-982	-6725	-2297	-15731
1978	-2313	-8116	-5055	-17736
1979	-3107	-10824	-6270	-21845
1980	-5183	-14923	-9591	-27615
1981	-7712	-18199	-13045	-30783
1982	-6255	-16970	-9971	-27052
1983	-5038	-16182	-7726	-24815
1984	-6602	-16941	-9759	-25042
1985	-5750	-15695	-8248	-22515
1986	-2776	-12914	-3896	-18125
1987	-2445	-13352	-3340	-18240
1988	-3838	-14556	-5071	-19231
1989	-5043	-17052	-6419	-21706
1990	-4606	-17117	-5645	-20979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署数据，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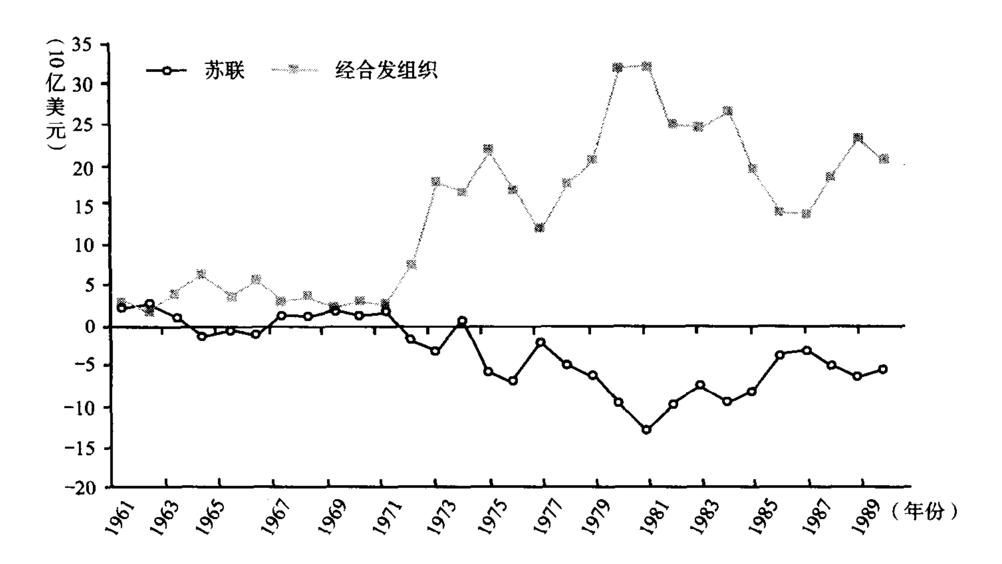


图4-1　1961~1990苏联及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成员国的粮食贸易差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2005。

俄罗斯在世纪之初曾是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现在已变成最大的粮食进口国（见表4-15）。

表4-15　20世纪初俄罗斯粮食出口额和20世纪末苏联粮食进口额

时　期	份额（%）	世界排名
1907~1913	在世界粮食出口之中	
	45.0	1
1980~1990	在世界粮食进口之中	
	16.4	1

注：俄罗斯在世界出口额中所占的出口份额系利用俄罗斯、丹麦、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出口谷物的数据和加拿大、美国、阿根廷、印度、澳大利亚出口小麦的数据（纯出口额）计算得出的该时期平均份额。这些国家是20世纪初（1907~1913）最大的谷物出口国。这一时期的数据对欧洲国家的粮食出口额具有代表性。而亚洲、南北美洲则只有小麦出口的数据，小麦是它们粮食出口的基础。

资料来源：计算所根据的文献资料为，B. R. 米切尔：《国际历史统计：欧洲1750~1993》，麦克米伦参考书股份有限公司伦敦版，1998；B. R. 米切尔：《国际历史统计：美洲1750~1993》，麦克米伦参考书股份有限公司伦敦版，1998；B. R. 米切尔：《国际历史统计：非洲、亚洲和大洋洲1750~1993》，麦克米伦参考书股份有限公司伦敦版，1998；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署数据，2004。

苏联的粮食采购量1970年为220万吨，1982年即增至2940万吨，

1984 年更达到最大数量 4600 万吨。

1980 年代苏联的采购量相当于全世界粮食进口额的 15% 还多。就小麦进口额而言，它远远超过其他各进口国（见表 4-16）。

表 4-16 苏联、日本、意大利、联邦德国、埃及、中国的粮食进口额

单位：百万吨

年 份	苏 联	日 本	意大利	联邦德国	埃 及	中 国
1970	2.2	15.8	6.7	8.1	1.3	5.4
1975	15.9	19.0	7.2	6.8	3.8	3.7
1980	29.4	24.7	7.8	5.2	6.1	13.4
1983	33.9	25.5	6.4	4.5	8.0	13.4
1984	46.0	27.2	7.3	4.8	8.7	10.4
1985	45.6	26.9	7.5	7.0	8.9	6.0

资料来源：《1986 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统计汇编，莫斯科版，1987。

1980 年代中期，每 3 吨粮食食品中就有 1 吨是用进口的粮食加工出来的。畜产品的生产也以粮食进口为基础。苏联被迫签订粮食长期协议，保证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 900 万吨，从加拿大购买 500 万吨，从阿根廷购买 400 万吨，从中国购买 150 万吨。①

与其他许多可以从经互会国家以易货贸易方式获得的商品不同，购买粮食必须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进行支付。进口粮食所需的大批费用无法削减、本国农业的长期问题和天气条件造成种种难题、加工工业产品缺乏竞争力、可以为粮食进口提供支付能力的原料价格难以预料——所有这一切相结合，便构成了 1980 年代中期苏联经济的致命弱点。

1981～1985 年期间，受居民粮食供应日益困难的影响，苏联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机器设备的份额从 26% 降至 20%，粮食和大众消费工业品的份额则增至 44%。

出售黄金是解决歉收所产生的问题最重要的办法。1973 年、1976 年、1978 年、1981 年向国外出售的黄金急剧增加便可以证明这一点。1970 年代初布列塔尼——布达协议失效之后黄金价格上涨，帮助苏联解决了采购粮食所需的资金。然而即便在黄金涨价的背景下，苏联从 1974～1975 年开始仍然

① 《粮食进口：老问题和新问题》，1989，叶·季·盖达尔的私人档案资料。

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净负债者。在所欠贷款的总额之中，为时一年的最短短期信贷占有很高的份额。1975 年的歉收重又迫使苏联增加粮食进口，为此不得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规模举债，并动用自身的外汇储备。①

无论苏联的黄金开采还是国家的黄金储备或外债，都不可能成为农产品进口所需资金的稳定来源。196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苏联领导人只是在进口粮食需要增加的歉收之年才采取出售黄金的做法。依靠这个办法来保证常年采购数百万吨、后来多达数千万吨的粮食，是不可能的事情。

1930～1950 年代初从农村夺取的资源使苏联建立起工业化的基础。特别是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加工工业部门企业的建设。这些部门的产品构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当 1960 年代初期国家急需进口食品的资金之时，国家领导人本该可以指望依靠出口加工工业的产品作保证。然而这种可能性根本就不曾被认真加以考虑。因为领导人十分清楚，民用机械制造的大部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都缺乏竞争力（表 4－17）。也可以向附庸国政权提供军事技术装备，但期待对方用可自由兑换货币支付却绝无可能。

表 4－17　1961～1985 年苏联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设备贸易

年份	机器设备出口额				机器设备进口额				机器设备出口余额			
	百万卢布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2000 年	机器设备占出口总量的份额%	百万卢布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2000 年	机器设备占进口总量的份额%	百万卢布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2000 年	进口额超过出口额，倍数
1961	17	19	87	1.9	417	464	2180	26.7	-401	-445	-2092	25.0
1965	37	41	181	2.5	450	500	2220	18.6	-414	-460	-2039	12.3
1970	84	93	339	3.3	1003	1114	4048	26.5	-919	-1021	-3709	11.9
1975	262	364	958	5.2	3627	5042	13267	39.6	-3365	-4677	-12309	13.8
1980	294	453	838	3.5	4661	7178	13283	30.7	-4367	-6725	-12445	15.9
1985	354	425	609	3.5	5437	6524	9359	21.0	-5083	-6100	-8750	15.4

注：根据苏联国家银行官方汇价换算为美元。出口发达国家的机器设备中相当大一部分（1985 年为 30%）供应芬兰，与该国的贸易属易货贸易，而非可自由兑换货币的交易。

资料来源：计算依据《苏联的对外贸易》历年统计汇编。财政和统计出版社莫斯科版。

苏联与当年的俄罗斯一样，在自身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都是传统原料商品

① M. 查德维克、D. 朗、M. 尼桑克：《苏联的石油出口：贸易调节、改进限制和市场行为》，牛津能源研究所出版社牛津版，1987，第 91、85、105、107 页。

的一大供应国。在大批进口粮食之前，这些供货贸易连同农产品出口足以保证筹集到采购成套机器设备所需的资金，并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进行支付。

苏联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提供各种金属，但同时却又进口高质量的冶金产品。其他许多工业部门的情况也是如此。这类相互关系已经成为苏联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结构的特点。确保原料出口的急剧增长并非易事。拒绝采购进口设备则会导致技术水平方面落后于现代经济增长领先国家的差距加大。

1960年代苏联变成了最大的粮食净进口国，这种状况给苏联领导人制造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由于下述情况而更加严重：苏联从未创造出巨额外汇储备，并使其保持在足以为当前贸易周转服务的水平上。

国家领导人深知粮食供应依赖被视为潜在对手的国家所构成的威胁。[①] 但无论农业危机还是本国机器制造业缺乏竞争力都是现实。要想解决数十年中所积聚起来的问题，苏联领导人能做的并不多。

六　西西伯利亚的石油——摆脱困境的幻想

1960年代在西西伯利亚发现石油油田，这些油田有可能进行开采，然后依靠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石油来支付大规模进口农产品的费用，这样似乎足以使粮食问题获得解决。

苏联于1950年代开始以相当大的规模开发石油。1950年代和1960年代之间的石油产量依靠伏尔加河沿岸的油田，增长迅猛。然而当时苏联主要向社会主义国家供应石油，出口换汇有限。

西西伯利亚的第一口天然气井是1953年发现的。[②] 大规模的地质发现则是在1961～1965年。1961年发现梅吉翁和乌斯季巴勒克油田，1963年发现费奥多罗夫卡油田，1965年发现马蒙托夫和萨莫特洛尔油田。已开采的油田的特点是出油量都很高，通常每口井一昼夜超过100吨，井深可达

---

① B. 克留奇科夫写道：“美国没有我们暂且还能平安无事地过日子，可我们在粮食方面却要依赖他们，这种该死的状况搞得我们苏联成了……这种关系的人质。”见B. A. 克留奇科夫：《私事》第二部，奥林波斯ACT出版社莫斯科版，1996，第95页。

② B. П. 穆拉夫连科、Ю. Б. 法因等编《西伯利亚的石油》，地下资源出版社莫斯科版，1973，第13页。

1.8 千米～2.5 千米。[1] 1972～1981 年西西伯利亚石油天然气地区的石油产量从 6270 万吨上升至 33470 万吨（增长 4.3 倍，见表 4－18）。

表 4－18　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开采量

单位：百万吨

年　份	秋明石油天然气总局	托木斯克油田	西西伯利亚油气区合计
1965	1.0		1.0
1966	2.8	0.05	2.8
1967	5.6	0.2	5.8
1968	11.7	0.5	12.2
1969	19.8	1.5	21.3
1970	28.0	3.4	31.4
1971	40.0	4.7	44.7
1972	56.8	5.9	62.7
1973	81.0	6.7	87.7
1974	109.8	6.6	116.4
1975	141.4	6.6	148.0
1976	175.0	6.7	181.7
1977	211.2	7.1	218.3
1978	245.7	8.4	254.1
1979	274.4	9.1	283.5
1980	302.8	9.8	312.6
1981	323.5	10.8	334.3
1982	341.5	11.4	352.9
1983	358.2	11.9	370.1
1984	365.4	12.5	377.9

资料来源：M. B. 斯拉夫金娜，《辉煌成就与悲剧：1960～1980 年代苏联石油天然气综合体的发展》，第 69 页。

那些年中苏联石油开产量的增长幅度在该部门历史上极为巨大（见图 4－2）。许多已经进行开采的油田，按国际分类法都属于不同反响的、出油量异常之高的那类油井。

---

① M. B. 斯拉夫金娜：《辉煌成就与悲剧：1960～1980 年代苏联石油天然气综合体的发展》，科学出版社莫斯科版，2002，第 45、7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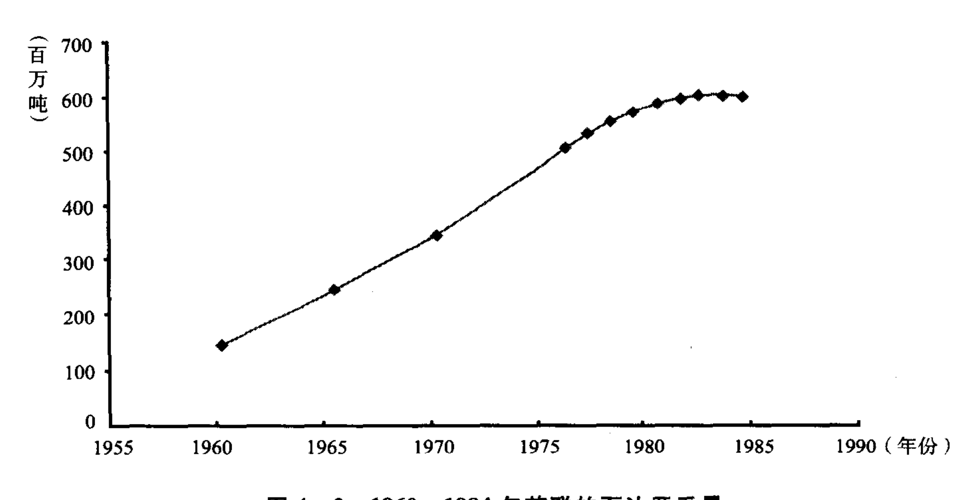


图 4-2　1960～1984 年苏联的石油开采量

资料来源：历年《苏联的国民经济》，统计汇编，财政和统计出版莫斯科版。

苏联迅速增加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石油出口。对外汇的需求促使其运用开发并经营矿藏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快速见效，但也构成了随后若干年间开采量下降的风险。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在那些为苏联经济运行总规模负责的人与从事西西伯利亚石油天然气地区开发的人之间，就一个问题展开了争论：以什么样的速度可以增加开采量而又不致对油田开发的长期远景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有时候争论以相当尖锐的方式进行。当时的石油工业部长 B. 沙申，据其同事们证实，曾不止一次对国家计委和党的机关代表说过，他们只管提高增产的能力，而不考虑这一政策的后果。①

然而日益严重的粮食供应困难促使苏联领导人选择了加紧利用资源的战略。部长会议主席阿·柯西金不止一次向秋明石油天然气工业生产管理局局长 B. 穆拉夫连科提出大致这样内容的请求："粮食告急——计划外再给我 300 万吨吧。"②

---

① 据 H. 沃罗宁证实："对一位负责干部他也会当面不客气地说：'您是个冒险主义者，您要把国家引向哪里去？您想过自己建议的后果吗？'" 见《纪念 B. Д. 沙申诞辰 85 周年》，纪念大会材料，2001 年 6 月 22 日于莫斯科，莫斯科版，2002，第 38、39 页。

② 与 B. И. 格赖费尔的谈话，引自 M. B. 斯拉夫金娜：《辉煌成就与悲剧：1960～1980 年代苏联石油天然气综合体的发展》，第 143 页。

1974～1984 年期间，每增产 1 吨石油的开支增加了 70%。从 1970 年代初到 1980 年代初，用于燃料开采的费用翻了一番。①

大力增加石油开采量促使将各种努力向大型的项目集中。运用能够快速提高石油产量但也造成难以预料的风险的经营方法所导致的结果是，若要保持已达到的生产规模，就必须取决于几个大型油田未来的生产状况。②

外贸平衡、收支平衡、居民的粮食供应、保持政治稳定，全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垦荒地的天然气怎样、石油开采的状况如何。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经济和政治稳定的基础，这是不够的。

除了发现大型石油天然气产区之外，1973～1974 年石油价格空前上涨和 1979～1981 年油价飙升，也有助于 1970 年代的苏联经济保持稳定。在以可自由兑换货币销售的石油出口量增长的背景下，自 1973 年起苏联外汇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见图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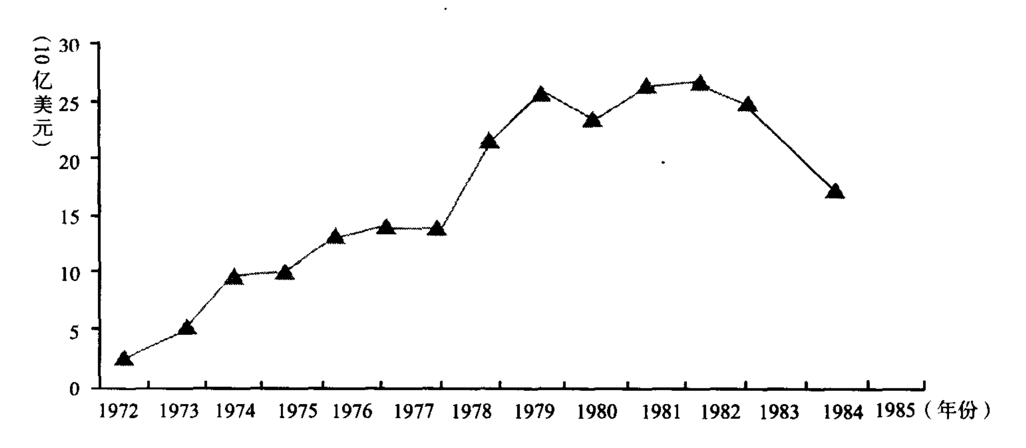


图 4－3　1972～1985 年苏联的石油和石油产品对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的出口额 10 亿美元，2000

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缺葡萄牙和西柏林地区。

资料来源：历年《苏联的对外贸易》统计汇编。财政和统计出版社莫斯科版。

① B. M. 库德罗夫：《苏联经济回顾》，科学出版社莫斯科版，2003，第 31 页。

② 1977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了一份报告，其中预测苏联的石油开采量在 1980 年代会开始下降。见《国际能源形势：展望 1985》，中央情报局，1977 年 4 月；《苏联石油生产展望》，中央情报局，1977 年 4 月于华盛顿特区。

来自出售石油的滚滚外汇储备，使城市粮食供应危机得以缓解，[1] 增加了设备、消费品的采购，保证了加强军备竞赛、取得与美国核均势的财政基础，并有能力开始实施诸如阿富汗战争之类的外交政策冒险行动。[2]

---

① 关于石油收入在暂时克服苏联经济关键性矛盾——日益增长的城市居民粮食需求和农业周期性危机中的作用，见 J. R. 米勒：《经济概述》、J. 克拉克拉夫特编《今日苏联：翻译指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版，1983，第 173 ~ 186 页。

② 1979 年 3 月 17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阿·尼·柯西金做总结："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意见——不能放弃阿富汗。"然而 3 月 18 日他与努·塔拉基谈话之后倾向就改变了，谈话中阿富汗领导人直接提出苏联军队有必要立即进入阿富汗的问题。显而易见，事情不单关系到军事技术的或经济的援助，而且涉及了使用苏联军队。此后安·葛罗米柯说："我完全支持安德罗波夫同志的建议，应排除我国军队进入阿富汗之类的措施。那里的军队不可靠。因此我军进入阿富汗后就成了侵略者。它将针对什么人去打仗呢？那就首先是针对阿富汗人民，就要向他们开枪。"尤·安德罗波夫说："我认为，我们不应当采取出兵的决定。派遣军队就意味着与人民作斗争，镇压人民，向人民开枪。我们会显得像是侵略者，所以我们不能允许这样做。"见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25. Д. 2. Л. 10、15、24. 这一切都不错，但这并不妨碍政治局在 1979 年 12 月作出决定，派遣 4 个师和 4 个旅为数共 15 万人进军阿富汗并消灭阿明。见 B. 布科夫斯基《莫斯科进程》，俄罗斯思想、米克出版社巴黎、莫斯科版，1996。http://www.belousenko.com/wr.Bukovsky.htm. 最终决定是在 1979 年 12 月 26 日由列·勃列日涅夫主持的会议上做出的。见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14. Д. 31. Л. 1. 2。苏军进入阿富汗后的 1980 年 1 月 8 日经政治局决定，苏联武装力量军人数目的限额增加 5 万人。见 1980 年 1 月 2 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增加苏联武装力量人数》的决议。摘自 1980 年 1 月 2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第 117 号。No. П177/239. http://www.2ntl.com/archive/pdfs/afgh/177-80-2.pdf. 关于进军阿富汗的决定让苏联统治集团付出高昂的代价，直至其存世的最后数年为止。在阿富汗被打死的官兵、他们家庭的悲伤、伤残者，所有这一切在一场社会无法理解的战争背景下成为破坏这个社会制度合法性基础的最重要的因素。而经济战争的耗费同样不菲。一份呈送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说："为了弥补阿富汗军队的战斗伤亡，保障其反击不肯妥协的反对派的压力应有的能力……兹建议 1989 年向阿富汗补充提供总计约 9 亿 9 千万卢布的专用器材（其中 2 亿卢布依靠单方面裁军所腾出的和应于销毁的坦克、大炮、飞机）……"见 1989 年 6 月 22 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录《关于向阿富汗共和国补充提供专用器材》。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10. Д 39. "苏联政府在 1989 年拨付的 26 亿卢布之外，于 1989 年向阿富汗再补充提供 9 亿 9 千万卢布……所提供的专用器材费规定以原先的条件进行计算，即支付总值 25% 作为贷款，为期 10 年，年息 2%。"见 1989 年 6 月 22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要。《关于向阿富汗共和国补充提供专用器材》。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10. Д. 39. 爱·谢瓦尔德纳泽和 B. 克留奇科夫 1989 年 6 月 22 日的报告摘录："巩固现有制度生命力的路线要求进一步给予阿富汗政府和总统广泛而全面的支持，其中包括物质的支持……也需要以粮食特别是小麦帮助阿富汗朋友，确保军队和喀布尔居民的供应。同时，鉴于在海拉东的小麦储备即将告终，应紧急向那里运送 1500 吨小麦作为我们对阿富汗的援助。"见 1989 年 8 月 16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要。《关于喀布尔的谈判和我们在阿富汗方面进一步可能采取的措施》。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10. Д. 46。

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初期，石油产量和出口量快速增长，石油价格高企，这个时期苏联政策的典型特征是：苏联领导人依旧不设立可自由兑换外币的储备，不肯采取将源源而来的资金分散为可变现款的手段，以备在石油市场事态发展不利时可以使用。苏联的可自由兑换外汇储备只是保障目前贸易周转的手段。此外，在石油收入空前增加的背景下苏联仍扩大了借债的规模。[①] 这种政策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坚信石油价格在1970年代末涨到按历史尺度衡量反常之高的位置后，仍将居高不下。至于如若价格下跌该怎么办，那些年的苏联领导显然未加考虑。[②]

然而，在油价高企的情况下，1979～1981年苏联仍然遭遇到为平衡目前收支赤字提供资金的问题。原因照例是农业问题：三年歉收，被迫增加粮食进口。

时至1980年，石油和天然气已占有苏联向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出口额的67%。同一时期油价仍然很高，但已停止上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内消费品的匮乏加剧，货币发行量增加，集体农庄市场的物价上涨。预算开支的经费来源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居民的存款。国民经济财政不平衡的加剧，财政比例失调和消费市场商品短缺的日趋严重，都激发了依靠降低质量来弥补食品供应不足的尝试（例如在香肠中增添水分和淀粉）。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大约一半贸易额的增长是靠降低质量和提高价格实现的。国家计委就此向部长会议各位副主席分送了一份报告。第二天这些材料却又被收回加以销毁。[③]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经济犯罪和贪污受

---

① "据蔡斯·曼罗腾·本克估计，共产主义集团各国收支平衡的赤字已从1974年的50亿美元增至本年度的120亿美元。整个赤字总额中将近一半属于苏联……本克估计，今年苏联出售黄金的金额大约为10亿美元，此外，它在西方银行中的外汇资产减少了20亿美元。"这个报告中说，美国银行对于向社会主义国家提供贷款的事持谨慎态度。见《K. 纳扎尔金（国际经济合作银行管委会主席）1975年12月25日致M. A. 列谢奇科同志的信》。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09. д. 60. л. 37～39。

② 关于粮食和加工部门成套设备的进口依赖于石油市场行情所造成的风险，专家们早在1980年代中期即已清楚地了解。见M. 查德维克、D. 朗、M. 尼桑克：《苏联的石油出口：贸易调节、改进限制和市场行为》，牛津能源研究所出版社牛津版，1987。

③ H. K. 拜巴科夫：《从政40年》，共和国出版社莫斯科版，1993，第129～134页。"既然我们已经无法在旧有的资金提供体制内作出安排，就只好采用新的'非传统的'方式：将居民在储蓄所中的存款和企业账户的资金动用一部分作为预算开支。"

贿的大环境下发生的。[①]

苏联领导人向来将外贸活动和外汇储备分配当做一种政治手段。在苏联的对外贸易中，尤其是关系到支持国外志同道合者、稳定东欧各附庸国政权时，经济关系与政治任务常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苏联积极地徒劳无益地运用政治影响力资源，希望在发达的民主国家操纵通过关键政治性决议的过程。行政当局也随时准备利用外贸合同，让这些合同所得的资金都由朋友们赚取。[②] 例如，1980 年 8 月 26 日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便指示对外贸易部会同苏联国家计委以及其他有关的部和部门，就扩大与法国朋友的公司的经济贸易联系制定并落实某些措施。[③]

1980 年 12 月 12 日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阿·切尔尼亚耶夫致函苏共中央领导人称："'马格拉有限公司'属于法国共产党所有，15 年中一直向'机床进口外贸联合公司'购买轴承，在联邦德国进行销售。由于公司投资 280 万卢布扩大自身业务和联邦德国对轴承的需求下降，形成了同样数额的债务。根据外贸部的建议，'马格拉有限公司'在允许其额外延期偿付欠债的情况下，将能够在最近期间增加苏联轴承在联邦德国的销售规模，直至它不但足以清偿欠债，而且还能保证我们继续获得外汇收入。同时，强行追索欠债可能会导致该公司破产，对我们造成外汇损失以及其他一些不良影响。法国朋友的领导也支持'马格拉有限公司'关于延长偿还债务的请求（1990 年 12 月 9 日发自巴黎的密码电报，特字第 3922 号）。"[④]

1983 年 1 月 18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责成对外贸易部（帕托利切

---

① G. 克罗斯曼：《戈尔巴乔夫的问题根源：1970 年代后期的私人收入和支出》、《戈尔巴乔夫的经济计划》，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研究论文，卷 1，华盛顿版，1987 年 11 月 23 日，第 213、229 页。

② 关于苏联向外国共产党所提供援助的分配情况，见 1996 年 6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8 号记录。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51. Д. 25. Л. 1；1968 年 3 月 4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73 号记录。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51. Д. 27. Л. 1；1980 年 12 月 29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230 号记录摘要。No. П230/34。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38. Д. 47. Л. 1；《关于日本社会党的请求》，1967 年 10 月 31 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37 号 §46Гс 记录摘要。No. Ст-37/46. http：//www. 2ntl. com/archive/pdfs/non-comm/cto37-67. pdf。

③ 中央书记处 225，§84Гс 记录摘要，1980 年 8 月 26 日 NoСт-255/84. 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43. Д. 26. Л. 1。

④ 阿·切尔尼亚耶夫（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1980 年 12 月 12 日呈送苏共中央的报告，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46. Д. 78. Л. 2。

夫同志）以优厚的条件向国际进口公司（总经理为Л. 雷米乔同志）出售60万吨石油和15万吨柴油，价格降低约1%，付款期限延长3～4个月，以便让朋友们能够从这笔商业交易中赚取约400万美元。[①]

与此同时苏共领导人得悉，这类出于政治理由的合同效果不大。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87年11月30日）记录中说："各国共产党控制的许多公司经济上很弱小，贸易联系能力有限，有的甚至还亏损。仅只某些兄弟党（法国、希腊、塞浦路斯、葡萄牙）的公司有能力以对它们显著有利的方式发展与苏联对外贸易组织的合作。公司扣做党的预算的利润比例一般都非常低——仅为利润或所签合同的1%～5%……"[②]

1982年3月1～2日，波兰党和国家代表团访问苏联。与苏联领导人会晤时，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沃·雅鲁泽尔斯基谈到波兰经济的艰难状况，说仅有60%的工业潜力得到了利用，失业的威胁对于40万产业工人和20万建筑工人已经迫在眉睫。波兰同志感谢苏联1980～1981年提供的将近40亿转账卢布[③]紧急经济援助，其中包括近30亿美元外汇。结果达成协议，苏联于1982～1983年度向波兰提供27亿卢布贷款。波兰代表团还提出了给予大规模补充经济援助的问题。

1980年10月4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分析研究波兰事件对苏联国内局势发展的影响问题。苏共中央机关所准备的材料中说："对于波兰事件，分析资产阶级宣传，特别是对苏无线电广播，表明这次事件被大肆利用，试图损害社会主义原则，首先是怀疑党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波兰大众传媒中的某些负面进程证明，该国的思想混乱有可能加剧并使我们的宣传报道更难以对波兰居民施加影响。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对报纸、广播和电视活动的监管明显减弱。新闻出版机构愈来愈频繁地发表有争论的抑或完全居心叵测的材料，绝对无助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稳定局势的努力。"1980年12月，苏共中央书记处采取了限制在苏联国内传播有关波兰事件的消息的措施。苏联部长会议直属的国家机密管理总局

---

① 1983年1月18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4号纪录摘要，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ф. 89. ОП. 51. Д. 33. Л. 1。

② 苏共中央，1987年1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要，《苏共中央国际部的问题》，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ф. 89. ОП. 38. Д. 54。

③ 亦称结算卢布、汇兑卢布，系经互会成员国非现金结算的单位。——译者注

表 4－19　1980～1981 年苏联向波兰人民共和国提供的可自由兑换货币援助

提供贷款	百万美元
用于采购食粮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1980. 8. 1 NO. 1518PC（П207，1980. 8. 1）	30
用于解决与资本主义国家结算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1980. 6. 23 NO. 1192PC（П201/30，1980. 6. 23）	250
用于建立援助波兰人民共和国的银行财团 苏共中央决定，1980. 6. 6. No. П199/2	70
用于解决与资本主义国家结算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1980. 11. 11. No. 1019-347（П224/70，1980. 11. 11.）	150
用于采购粮食和食品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No. 1019-347 （П224/70，1980. 11. 11.）	190
总　　计	690
延期支付	
向苏联银行延期支付	219
苏共中央决定，1980. 6. 6. （П199/11，1980. 6. 6.）	
向苏联银行延期支付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1980. 9. 11 No. 1840PC（П214/11，1980. 9. 11.）	280
向苏联银行延期支付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1980. 11. 11 No. 1019-347（П224/70，1980. 11. 11.）	280
延期支付先前提供的所有贷款的基本债务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1981. 8. 16. No. 1630PC（П23/14，1981. 8. 16）	1000
总　　计	1779
无偿援助	
因缩减向经互会国家提供石油，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同无偿援助 苏共中央决定，1980. 11. 28. No. 227/21	465
总　　计	2934

资料来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 1980～1981 年苏联向波兰人民共和国提供的可自由兑换货币援助》的资料，1982 年 9 月 23 日。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66. Д. 8。

奉命没收零售、订购的一些书籍和其他出版物，将其存入珍品库。[1] 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开展外交活动和保全帝国，不得不付出越来越高昂的代价（见表4－19）。

七　石油价格下跌：最后的一击

1981～1984年，苏联政府拥有克服外贸中日益增长的困难的唯一手段——增加石油供应数量。这方面的数量已从1975年的9310万吨提高至1980年的11900万吨和1983年的13000万吨。[2] 然而，1970年代末石油开采量的增长速度却下降了。

决定石油市场形势的不仅有经济的因素，而且有政治的因素，这一点苏联领导人似乎也应该是知道的。他们自己也积极参与了这一市场的操作。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1974年4月23日致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函件中便说："安全委员会自1960年以来一直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委员、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对外作战部部长瓦吉亚·哈达德保持着秘密的事务联系。今年4月，瓦吉亚·哈达德在黎巴嫩与国家安全委员会驻外谍报负责人举行了会晤，在充满相互信任的交谈中他阐述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恐怖破坏活动的远景规划，大体上可归纳如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特别行动的基本目的，在于提高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效果。从这一点出发，组织恐怖破坏活动的主要方向为：继续以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战争'作为反对支持以色列的帝国主义势力的特殊手段；在第三方国家实施针对美国和以色列人员的行动，目的在于获取有关美国和以色列的计划和意图

---

① 为兄弟党提供的信息。1982年3月7日有关以沃·雅鲁泽尔斯基为团长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的消息由托马什·米亚诺维奇提供。http://www.2ntl.com/archive/pdfs/poland/pol-gdr§2.pdf；1980年10月4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No. Ст-231/5С。《关于组织对于波兰事件的宣传和反宣传的若干补充措施》，见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46. Д. 59. Л. 4～7；1980年12月22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No. 242/61rc。《关于监督波兰报刊在苏联传播的若干补充措施》，见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46. Д. 81. Л. 1～26。

② 数据引自历年《苏联的国民经济》统计汇编。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并不可靠。在如此微妙的领域，苏联官方的统计资料可能被有意加以歪曲。然而对于事件发展的总体情形、石油出口的快速增长，所引数字仍然有所反映。

的可靠信息；在以色列境内进行恐怖破坏活动；组织针对主要资本属于以色列、英国、比利时和西德公司的金刚石托拉斯的破坏活动。据此，目前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正在对一系列特别行动进行准备，其中包括对世界各地（沙特阿拉伯、波斯湾、香港等）的大型贮油库实施打击，摧毁油轮和超级油轮；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驻伊朗、希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代表的行动；袭击特拉维夫及其他城市的金刚石中心。瓦吉亚·哈达德请求我们为他的组织提供援助，希望获得实施专门破坏行动所需的某些种类的专用技术器材……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应在例行会晤时完全赞同瓦吉亚·哈达德关于向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提供专用器材援助的请求。”①

入侵阿富汗被波斯湾国家首先是沙特阿拉伯视作潜在的威胁，成为它们急速改变对美国态度的因素之一。获得一个超级大国可能的军事支持很有必要。美国也需要价格更低廉的石油。与这些情况有关的话题，1981 年 4 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Y. 凯西访问沙特阿拉伯的过程中，首先在高层人士之间进行了讨论。②

1981 年秋苏联遭遇收支平衡的严重问题，不得不告知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决定削减每年石油供应量的 10%，意在将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增加对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的出口。但是即便在这种时候也不能置政治上的考虑予不顾。波兰国内的危急形势不容许真正减少对这个最大的东欧卫星国的石油供应。如若要保住帝国的东欧部分，便不能将保障经互会成员国政治稳定的责任置诸脑后。③ 当 1985 年石油开采量在苏联经济史上首次开始下降的时候，这一情况导致了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供应量的急剧减少

① 尤·安德罗波夫（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致苏共中央总书记列·勃列日涅夫的函件《关于克格勃驻黎巴嫩负责人与瓦·哈达德的秘密会晤》，1974 年 4 月 23 日，No. 1071-A/OB。在另外一封致勃列日涅夫的关于向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供应武器的信函中，安德罗波夫将哈达德称为克格勃情报机构所信赖的人。见安德罗波夫致勃列日涅夫的函件《关于交付瓦·哈达德一批国外武器弹药的情况》，1975 年 5 月 16 日，No. 1218- A/OB. http://www. 2 ntl. com/archive/pdfs/frr-wd/plo75d. pdf.

② P. 施韦泽：《胜利：里根政府加速苏联瓦解的秘密战略》，大西洋月刊出版社纽约版，1994，第 218 页。

③ “国际主义的团结，特别是与苏联的友谊——这当然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但如果苏联以相当于国际市场 1/3 或 1/4 的价格提供石油将其加以巩固，它们便会特别牢不可破。我碰巧听到尼·齐奥塞斯库激愤地指责苏联人的一番话：为什么罗马尼亚每年仅仅得到五六百万吨苏联石油，而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却要多获得两三倍。这算什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见 Г. 沙赫拉扎罗夫：《同领袖们相处和没有他们的日子》，瓦格里 （转下页注）

（见表4－20）。继续压缩对经互会国家的出口，苏联领导人却下不了决心。

表4－20　1980～1986年苏联的石油出口额

单位：百万吨

年　　份	1980	1983	1984	1985	1986
出口社会主义国家	84.8	80.0	80.6	77.9	85.3
出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30.7	44.8	44.0	33.3	37.6

资料来源：《1986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统计汇编莫斯科版，1987。

P. 派普斯是1980年代初向美国当局提交的一份报告的执笔者，报告的核心内容为：建议利用苏联经济对石油价格行情的依赖性破坏共产主义制度的稳定。被美国总统罗·里根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Y. 凯西，具有分析和利用敌方经济弱点的工作经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从事这项工作，力图使盟国对希特勒德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最大限度。早在1981年3月26日的里根私人日记中，便出现了有关苏联经济状况及其依赖西方贷款所产生的问题的简要报告。1982年11月，里根总统签发了一项有关国家安全的指示（NSDT-66），其中提出了给苏联经济造成损失的任务。[①] 自然，所提出的任务意在从经济政治方面削弱苏联。至于利用苏联经济的薄弱环节将其搞垮，当年的美国领导人中谁也不曾抱有此种幻想。

如果关于事态发展的这一说法是准确的，那么，它倒很好地说明了1980年代初期苏联领导人的智力水平。要让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将经济和政治都取决于自己的潜在敌人（美国）和石油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沙特阿拉伯，而且瓦哈比教派是这个国家的官方宗教，该教系伊斯兰教的一个教派，一向视反对异教徒的圣战为对虔诚穆斯林的固有要求）所做的决定并等待着它们达成协议，这倒需要长期物色一些特别浅薄无知的人进入国

（接上页注③）乌斯出版社莫斯科版，2001，第119页。也见R. W. 坎普贝尔：《苏联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趋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巴尔的摩、伦敦版，1976，第80、81页。

① P. 施韦泽：《胜利：里根政府加速苏联瓦解的秘密战略》。p. xxvI. 6～12，26～32；R. 斯特劳尔：《为什么苏联会瓦解？理解历史的变化》，M. E. 夏普出版社纽约、伦敦版，1998，第127页。关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石油降价问题上的协议，见V. G. 特里默、M. 埃尔曼：《为什么苏联的经济制度会崩溃?》，载于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无线电自由研究报告》第2（23）卷，1993。

家领导班子才行。

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状况变得越来越窘迫。苏联国家银行货币经济管理局的一封信函中说："1970年代初期，在政治缓和、东西方之间贸易大大扩展、世界经济增长、能源资源和原料价格上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广泛利用西方银行的贷款。然而到1981年时世界经济增长开始减缓，社会主义国家未偿还的债务总额达到当时创纪录的规模1270亿美元，其中有些国家的支付能力处于很低的水平。1982~1983年，除对匈牙利外，各财团已不再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贷款。在这种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被迫削减以可自由兑换货币进行的进口，出口则仍然保持着原有水平或略有增加。"①

苏联科学院1984年初曾向部长会议提供石油市场情况不稳定的信息："石油市场在今年第3季度的短暂稳定之后，第4季度的形势对出口国而言重又困难起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缓慢和发展不均衡，能源经济方面采取措施所产生的效果，欧佩克一系列国家偷偷超过为它们规定的限额进行开采，最后，又适逢一个暖冬，这一切都导致石油储备积压过多。资本主义市场第4季度对石油的需求减少1%，尽管大部分官方的出厂价仍未变动……自由市场上一次性交易的价格已经下跌，至12月中旬北海'布伦特'型石油每吨已低于官方价格9.7美元……事件的这种进程加剧了欧佩克内部的摩擦，这在该组织本年12月初的日内瓦会议上已清楚地显露出来。尼日利亚、伊朗、伊拉克、委内瑞拉都在会上正式要求增加开采量限额，同时对减价和不同质量石油加价的现有结构进行有利于自己的修改。虽然会议最终决定保持原有的价格、各自的限额和欧佩克内石油开采量的总体规模，但它未能采取针对原有协议破坏者的任何制裁或预防性措施。"

当时的官方文件中也鲜明地表现出最重要的原料资源价格的不可预见性。例如，科学院随后一份报告中就谈到了石油市场状况的稳定问题："专家们认为，目前包括西欧在内的石油消费绝对数量进一步减少的可能性已经消失，1984年期间对石油的需求将增长1.5%~2%，这显然足以使欧佩克的官方价格在整个1984年内保持不变的水平。第1季度自由市场的

①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财政状况（1988年中期情况）》，政府决议No.4013.1988年2月24日，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2324，ОП.33.Д.696.Л.4、5。

价格几乎达到了官方售价的水平。欧佩克仍在继续与其他石油输出国就维持现行价格问题进行协商。市场的稳固也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冲突的加剧、担心可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有关。”在科学院随后送交苏联政府的一些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对石油价格猛跌的担忧和不可能准确预测这一参数动态的清醒认识。①

1985 年，新油井投产和维持现有油井开采量费用的增加以及资金不足等因素，导致苏联的石油开采量减少 1200 万吨。与此同时，1981～1984 年开始的石油的实际价值的缓慢下降在沙特阿拉伯决定增加开采量两倍多之后（见第三章），现在已变成了本行业历史上从无先例的价格狂跌。1985～1986 年苏联的资源价格多次下跌，而它的预算、外贸平衡、消费市场的稳定、每年采购数千万吨粮食的可能性、偿还外债的能力、为军队和国防工业综合体提供所需要的资金等等，全都取决于这些资源。

这并不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瓦解的原因。它之所以瓦解，是由于苏联经济政治体制的根本特征注定的：1920 年代末～1930 年代初所形成的各项制度太过僵硬，不能让国家适应 20 世纪末世界发展的各种挑战。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遗产、超常的国防负担、严重的农业危机、加工部门缺乏竞争力，都使得这一制度的崩溃无可避免。1970～1980 年代初期，这些问题还可以依靠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进行调节。但要保全最后的帝国，这可不是足够牢固的基础。

---

① 阿·彼·亚历山大罗夫（苏联科学院院长）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阿·吉洪诺夫同志的述评《1983 年第 4 季度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形势和石油、天然气、黄金市场状况》，由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专家撰写，1984 年 1 月 3 日。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44. д. 1256. л. 5、6。阿·彼·亚历山大罗夫（苏联科学院院长）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阿·吉洪诺夫的评述《1984 年第 1 季度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形势和石油、天然气、黄金市场状况》，由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专家撰写，1984 年 4 月 5 日。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44. д. 1255. л. 113、114。有关 1984 年第 2 季度、1984 年第 3 季度、1985 年第 4 季度、1986 年第 1 季度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形势和石油、天然气、黄金市场状况的述评。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44. д. 1255. л. 131～150；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44. д. 1255. л. 46～66；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46. д. 1079. л. 50～69；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5446. оп. 147. д. 1079. л. 123～141。

八　苏联解体：合乎规律的意外

1982年，美国参议员Y. 普罗克斯迈尔在概括中央情报局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工作报告的成果时曾说："可以从这类研究得出三个关键性的结论：第一，苏联的经济增长逐渐减缓，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的增长仍将继续；第二，经济成果并不令人满意，经济效益欠佳，但这并非意味着苏联经济已丧失活力和动力；第三，虽然苏联经济发展的成果与计划之间存在着差距，但即便从长远上看，苏联经济也未必会崩溃。"[①]

大多数观察家未曾注意到的是1960～1970年间苏联与世界的关系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当时苏联经济表面上仍然是封闭的，实际上却已深深地融入了国际贸易体系，开始依赖于国际市场的行情变化（表4－21）。这一点，通常只有从事粮食和石油市场研究的研究人员才能发现。在大多数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析家看来，这个制度的基础似乎仍很牢固。[②]

也出版了一些著作认为存在着可能会破坏苏联现有制度稳定的风险因素。但这样的文字大多属于例外，它们对未来苏联形象的形成影响有限。[③] 1985年之时很难想象，六年过后苏联、执政的共产党、苏联的经济制度竟然会不复存在。

已存在数十年之久的一种政治经济结构突然崩溃，引起了人们的困惑不解，使念念不忘苏联经济和政治的社会主义者的声誉蒙上一层阴影。[④] 美国中央情报局未能发现苏联即将发生危机和崩溃的征兆，被批评这一组

---

① H. 罗文：《中央情报局介绍会谈苏联经济》；E. 霍夫曼、R. 莱尔德：《当代苏联政治》，阿拉丁出版社纽约版，1984，第417页。

② 关于苏维埃文献中占主要地位的认识——苏联经济是稳固的，见T. 巴克、T. 科尔：《当代苏联经济状况》，贝西尔·布拉克威尔出版社牛津版，1987；T. R. 米勒：《经济概述》，T. 克拉克拉夫特编《今日苏联：翻译指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版，1983，第173～186页；关于1980年代初苏联的政治稳定问题，见Д. 博法：《苏联历史》卷2《从卫国战争到世界第二大国的地位》，《斯大林和赫鲁晓夫·1941～1964年》，国际关系出版社莫斯科版，1944，第538～542页。

③ A. 施特罗马斯、M. A. 卡普兰编《苏联与未来的挑战》卷1《停滞和变化》，模范书屋出版公司纽约版，1988。

④ 关于苏联崩溃使西方研究者感到突如其来，可参阅诸如G. 格罗斯曼：《1991年中期的苏联经济概述》，G. W. 布雷斯劳尔编《苏联和东欧转变的困境》，加利福尼亚大学在伯克利的国际和地区研究项目，伯克利版，1991，第65页。

表 4-21　1950～1989 年苏联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的外贸

年　份	卢布名义形式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2000 年	
	出　口	进　口	出　口	进　口	出　口	进　口
1950	236	204	262	22.7	1586	1371
1960	913	1004	1014	1116	4822	5302
1965	1347	1469	1497	1632	6640	7241
1970	2154	2540	2393	2822	8694	10251
1975	6140	9704	8535	13489	22459	35496
1976	7834	10824	10419	14396	25918	35311
1977	8817	9925	11815	13300	27637	31110
1978	8701	10979	12703	16029	27761	35029
1979	12506	13248	19009	20137	38364	40640
1980	15862	15721	24427	24210	45203	44801
1981	17247	18112	23973	25176	40550	42584
1982	18849	18892	26012	26071	41466	41561
1983	19653	18719	26532	25271	40686	38753
1984	21349	19574	26259	24076	38816	35589
1985	18581	19294	22297	23153	31986	33213
1986	13109	15853	18615	22511	26126	31595
1987	14186	13873	22414	21919	30620	29944
1988	14666	16321	24199	26930	31971	35579
1989	16392	20497	25899	32385	32968	41224

注：按苏联国家银行官方汇率换算为美元。

资料来源：历年《苏联对外贸易》统计汇编，财政和统计出版社莫斯科版。

织的人视作它最重大的工作失误。由此引发许多苏联问题专家的辩护性反应：如果是我们弄错了，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不这样做，要预测苏联的经济危机是不可能的事。这个专家群体中广泛流行的看法是：所发生之事的原因具有主观的性质，是由 1985 年之后苏联领导人所犯的种种错误所决定的。[1]

---

[1] 关于将苏联的崩溃与 1980 年之后苏联领导人的种种主观决定相联系的苏联问题专家们的看法，见 M. 哈里森：《强制、屈从和苏联命令经济的瓦解》，沃里克大学经济系，2001 年 3 月；V. 康托罗维奇：《经济假象》，载于《国家利益》第 31 卷，1993，第 44 页；普赖斯一琼斯《从未发生过的战争：1985～1991 年苏维埃帝国的衰落》，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伦敦版，1995；S. 怀特：《戈尔巴乔夫和他下台之后》，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关于俄罗斯国内所发表的类似观点，见 П. 奥萨奇主编《从灾难到复兴：苏联毁灭的原因和后果》，壮士歌出版社莫斯科版，1999，第 7 页。

这个观点与那些认为所发生之事乃是一场国际阴谋的结果的人相近似。在俄罗斯，相信存在着针对俄罗斯的国际政治阴谋的作者在所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出了这种观点。如果采取这一立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发生在我国的事情便不难解释。也必须考虑到，俄罗斯素来就有将自身的问题归结为外国阴谋诡计的传统。

在俄罗斯广泛流传的关于中央情报局恶魔般无所不能的观念，镜像似地折射出了华盛顿占据主要地位的看法：中央情报局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在与苏联以及在其后的俄罗斯事态发展有关的各方面都显示出了十足的浅薄无知。

还有一个关于苏联经济崩溃实质的说法也广为人知。有些人将这种崩溃与紧随里根政府上台后展开的军备竞赛加剧联系起来，认为苏联被迫迅速增加军费开支，从而无法承受不断加重的负担。[①] 为了评价这种关于苏联瓦解原因的观点的可信程度，必须理解苏联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决定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大量采购武器装备的决策机制。

除去援助社会主义国家之外，[②] 军费开支便是苏联领导人最为重要的优先项目。其规模之大、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之高，甚至连国家和军队领导人也不甚了然。苏联最后一位总统米·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总参谋长B. 洛博夫所引述的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数据相互矛盾，便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③] 对这些数据无法进行准确的评估。它们经由不同的预算项目支出，有关的资料并未汇总。苏联军事技术装备的价格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现实，这一问题也无法解决。不过，根据任何国际性的对比，苏联的军费

---

① 关于将苏联的崩溃与里根政府制定并一贯执行的政策相联系的人的观点，见P. 施韦泽：《胜利：里根政府加速苏联瓦解的秘密战略》，大西洋月刊出版社纽约版，1994，第198页。

② 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B. M. 库德罗夫估计为每年200亿美元。尼·雷日科夫对1986~1989年时期的估计数字与此相近似。根据西方研究人员的资料，单是援助古巴就需要苏联每年花费大约60亿~70亿美元。见B. M. 库德罗夫：《苏联经济回顾》，科学出版社莫斯科版，2003，第59页；尼·伊·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书籍、教育、善心”协会莫斯科版，1995，第232页。诚然，对苏联所提供的援助以实际美元所做的估计是颇富争议的。其重要组成部分为苏联所提供的武器和技术装备。凭这些东西不可能获得可自由兑换的货币。

③ B. 什雷科夫：《是什么葬送了苏联？总参谋部与经济》，载于《军事通报》2000年第9期，第192页。

开支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很高都是无可争议的。如果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经济规模仅仅约为美国的1/4，却要与美国及其盟国保持军事均势，而且还要维持40个师的兵力以控制中国边境的局势，那么，处于清醒理智水平的人即不难明白：所有这一切都代价昂贵。大规模的军费开支制约了苏联经济中民用部门的发展。[①] 不过即便没有军费负担，1980年代前对经济的投资也鲜有效果。

若说1980年代初与美国加紧进行军备竞赛之后苏联才开始迅猛增加军费开支，则缺少令人信服的证据。[②] 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典型特征就是惯性十足。决定武器生产规模的并非军事需求，而是看已经形成了多大的生产能力。如果技术上有可能增加产量，总是可以找到论证这种必要性的方法。针对苏共中央总书记米·戈尔巴乔夫的助手Г.沙赫拉扎罗夫所提问题“为什么必须生产这么多的武器”？总参谋长C.阿尔罗梅耶夫回答说：“因为我们付出巨大牺牲的代价建成了这些第一流的工厂，做得不比美国人差。你难道要下令让它们停止生产去制造饭锅吗？不，这是幻想。”[③]

苏联坦克生产的历史便是苏联决定武器生产规模机制的一个例子。苏联1970年代所生产的坦克比美国多19倍。阿以战争后重新装备以色列军队需要提供大批坦克，美国耗时数年才将坦克的产量增加到苏联产量的1/4。苏军所装备的坦克数量多达6万辆，超过美国及其盟友所拥有的数量许多倍。

如果试图从军事战略的观点分析1970～1980年代初军事建设领域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西方专家们在注意到苏联以何种速度扩充坦克部队后所得得出的理所当然的结论便是：正在为从比斯开湾方向进攻西欧的战役进行

---

① 关于军费负担与延缓经济发展的关系，见A.达林：《苏联瓦解的原因》，载于《前苏联事务》第8（4）卷，1992，第294～296页。

② 关于证明1980年代初苏联军费开支增速的资料缺乏问题，见C.D.布莱克：《革命的抵押品》，外交关系会议出版社，1993，第28页；R.T.麦多克：《苏联国防开支的政治经济学》，麦克米伦出版社贝辛斯托克版，1988，第88～90页；P.汉森：《苏联经济的兴衰》，朗曼出版社伦敦版，2003；R.F.考夫曼：《苏联的国防趋势：人员研究（未知的束缚）》，委员会版，1983。

③ W.E.奥多姆：《苏联武装部队的瓦解》，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伦敦版，1998，第105页。

准备。实际的情况却完全两样。正如后来众所周知的情报所表明的那样，主张在和平环境下以空前规模继续生产坦克的主要理由便是相信，美国拥有更大的在战争条件下增加坦克生产的能力。总参谋部的分析人员一再证明，在战争的前数月中苏军部队在坦克方面的损失可能极其巨大。由此得出结论：必须在和平时期尽可能多地生产坦克。[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间已经变化了的条件下，配套系统更为复杂，美国及其盟国迅速增加这类战车的生产是不可能的——与此相关的理由却并未加以考虑。苏联讨论这个问题时的主要因素并非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是认为坦克厂已经建成，人们在厂里干活，就应当出产品。对其他种类的军事技术装备的态度也是如此。

部署苏联中程导弹 CC—20 的历史便是这方面的明显例证。研制出了一种很好的导弹，可以进行大量生产，于是苏联领导人决定发展新的核武器系统。然而却没有考虑到这会刺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由于潜在敌人的导弹缩短飞行时间，便会增大苏联的风险。当这一点变得显而易见的时候，苏联不得不签署在欧洲取消中程导弹的协议。但这已经是为部署这些导弹花费了大量资金之后所发生的事了。

美国国会于 1980 年代初通过决议，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所提供的苏联军事建设情况评估进行审核。委员会在分析了武器生产规模之后得出结论：其产量之多，如果不从苏联正在准备进攻性战争的前提出发，用军事政治的观点是无法加以解释的。[②] 然而各种文件表明，当年苏联领导人中谁也不曾急切地希望与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殊死较量。武器生产的规模及其对军队的供应，是由充分利用已形成的生产能力所决定的。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在 1980 年代初期并没有能力更大范围地利用投入武器生

① 由于存在战争开始后无法开展新的军事生产的威胁，所以主张在和平时期增加军事技术装备的储备，这方面的论据在享有威望的著名苏联将领瓦·索科洛夫斯基的著作中曾加以引用。见瓦·丹·索科洛夫斯基：《军事战略》，军事出版社莫斯科版，1986，第 387、388 页。前副总参谋长 A. 丹尼洛维奇证实："至于说常规武器，则我们拥有重大的优势。1991 年即有 63900 辆坦克（盟国的坦克尚未计算在内），66900 门大炮，76500 辆步兵战车和装甲运送车，12200 架飞机和直升机，437 艘大型战舰。我们的坦克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出 5 倍。"见 B. 什雷科夫：《是什么毁灭了苏联？美国情报部门论苏联的军费开支》，载于《军事通报》2001 年第 8 期，第 21 页。

② B. 什雷科夫：《是什么毁灭了苏联？美国情报部门论苏联的军费开支》，载于《军事通报》2001 年第 8 期。

产的额外资金，只是竭尽所能在生产。这对苏联经济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不过早已习以为常。

是的，国防工业综合体占用了国家经济大量的资源，调集了最优秀的专家。所有这一切都延误了加工工业民用部门的发展。过重的军事经济负担是造成苏联经济脆弱的因素之一。国防费用的负担注定了苏联 1960 ~ 1980 年代的发展会遭遇许多困难，但这本身并不能解释 1985 ~ 1991 年经济崩溃的机制。

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出论述历史规律的著作之后所积累起来的 20 世纪的经济表明，这些规律并不像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想象的那样确定不变。超前数十年的发展战略选择取决于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更为巨大。

苏联领导人所采取的决定，在 1980 年代末 ~ 1990 年代初苏联的经济政治制度危机发展中产生了相当大的作用。许多事情都取决于国家领导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事情。反过来说也不无道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然而是许多事情。分析 1980 年代中期苏联的处境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新的现实背景下（首先是国际石油价格的猛跌），试图继续执行以往数十年的政策是没有前途的，这种政策的实质就是将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封闭起来，不允许对其进行任何改变。这样的路线不可能让国家不经过重大的经济政治震荡就能赢得油价下跌所引发的挑战。

临近 1985 年时，苏联已经具备了发生深刻经济危机的基础，要想扼制这场危机，就需要做出严格、准确而又负责任的决定，理解其实质，实施一整套可能和必须采取的措施，减少其所带来的损失，至少要力图防止经济崩溃。然而苏联负责对外经济关系的官员们此刻仍然坚信苏联的货币经济状况是稳定的。[①]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位代表着另一代政治精英的新的政治领袖走上了国家领导岗位。对他的选择表明，如今已不得不放弃此前数十年间苏联

---

① 见《Ю. А. 伊万诺夫致 Н. В. 塔雷津同志的信函》中有关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古巴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银行的金融信贷关系问题，以及 1984 年 4 月 28 日在苏联对外贸易银行的会谈中所涉及的其他问题的资料。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44. Д. 79. Л. 36、37。

领导所特有的长老掌权制。[1]他对国内的现实状况知之甚少，也不理解货币金融形势的岌岌可危。能否在这样的条件下采取有力而确当的行动，不犯任何错误地保住苏联—— 没有人能够知道。为了让成功的机会不致变得几乎为零，新一代领导人必须理解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的规模和实质。国家领导人为了哪怕肤浅地弄清苏联经济所发生的情况，需要的时间也得超过三年。在存在危机的条件下，这个期限未免太长。

① 斯大林去世时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为55岁，1980年则超过70岁。见Д. 博法：《从苏联到俄罗斯·无休无止的危机史》，国际关系出版社莫斯科版，1996，第110页。

第五章
外部冲击的政治经济学

集体农庄情况不太妙，
可也算不上是太糟糕，
或许还能说这也很好，
却年复一年越来越乱套。

——B. 沃伊诺维奇

关于苏联瓦解前夕即1985～1991年的经济政治发展情况，人们已经写得很多了。参与决定进程的人们纷纷讲述，加速的政策和改革的战略如何制定，反酗酒运动如何开展，优先发展民用机器制造业的路线如何形成，企业的经济自主权如何扩大，私营部门如何以合作社的形式合法化；他们还论证市场关系和政治自由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关于这些年来什么做得对什么不对、谁正确谁不正确的辩论仍将长期进行下去。在提请读者过目的本章中，我想讨论另一件事情：所发生之事与外部冲击——石油市场行情剧变的关联，苏联在1980年代后半期恰恰遭遇了这场剧变。

一 外贸条件的恶化：政治上的两难选择

“外部冲击”这一概念，即出口和进口价格比例关系的剧烈变化，是生活在发达而多样化的经济体中的经济学家们创立的。表5－1的数据表明，在这样的经济体中，贸易条件的变化每年超过10%属于例外，而非常规。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最近40年间这样的变化仅仅发生过一次（1974年达14%）。

表 5－1　1960～2003 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某些国家的外贸条件

（2000 年＝100％）

年　份	加拿大	德　国	意大利	英　国	美　国	日　本
1960	96	90	110	94	128	185
1961	94	94	109	97	132	176
1962	92	100	108	99	134	176
1963	90	108	107	111	133	175
1964	90	105	108	110	131	175
1965	91	104	105	113	134	178
1966	94	107	103	115	134	174
1967	95	111	103	115	136	177
1968	95	110	102	111	136	176
1969	95	110	105	112	136	177
1970	96	112	106	116	135	179
1971	95	115	105	116	132	176
1972	96	118	106	117	127	179
1973	102	115	96	104	125	162
1974	109	105	79	90	107	130
1975	105	110	84	97	110	116
1976	107	105	81	95	111	109
1977	101	104	83	97	106	109
1978	98	108	85	103	105	123
1979	103	102	83	107	100	106
1980	107	96	78	107	91	80
1981	101	89	74	107	94	79
1982	97	93	76	105	96	77
1983	98	94	78	104	102	78
1984	96	92	77	102	101	81
1985	94	93	78	103	103	82
1986	93	107	90	97	108	109
1987	96	111	92	97	102	112
1988	98	111	93	99	104	115
1989	100	108	92	100	104	112

续表 5-1

年份	加拿大	德国	意大利	英国	美国	日本
1990	97	110	94	101	101	105
1991	95	107	98	101	102	108
1992	93	110	99	102	102	111
1993	93	111	99	104	102	114
1994	93	108	99	103	103	117
1995	97	107	96	100	103	115
1996	98	107	100	101	103	110
1997	97	105	102	103	104	104
1998	103	107	107	104	107	111
1999	110	107	108	102	105	110
20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001	99	102	101	99	103	101
2002	97	104	103	102	104	101
2003	104	107	104	104	103	98

注：对外贸易条件系一个国家2000年的出口和进口结构在固定不变的情况下，所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与所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之比。列入表内的是那些在世界银行1960年以来的数据基础上可以得到其数据的国家。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5。

在那些可以提供范围广阔和品种多样的商品以供出口而其中并无独占优势品类的经济体内，价格波动导致的出口收入变化无足轻重。为了克服这种波动所产生的问题，势必要使预算政策更加严格，有时还需降低本国货币的汇率。进口国遇到经由外贸渠道流入的商品价格升高时，也会经受类似的困难。1973～1974年、1979～1981年、2004～2005年的价格冲击（石油价格飞涨），对燃料能源进口国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日本，见表5-1）。尽管这样，大多数情况下燃料的份额在进口额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即使在价格反常之高的1980年也是如此。甚至在日本这样的对能源具有依赖性的国家，燃料进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也仅占几个百分点（见表5-2、表5-3）。

表 5-2　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燃料进口占 GDP 的份额

单位：%

	1980	1990	2000	2003
美　　国	3.1	1.2	1.4	1.5
德　　国	5.2	1.8	2.3	2.2
法　　国	5.3	1.9	2.6	2.2
意 大 利	6.3	1.8	2.2	1.9
日　　本	6.7	1.9	1.6	1.9

资料来源：计算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5。

表 5-3　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燃料在进口总量中的份额

单位：%

	1980	1990	2000	2003
美　　国	28.7	10.9	9.5	—
德　　国	20.6	7.0	6.9	6.8
法　　国	23.0	8.3	9.4	8.9
意 大 利	25.5	8.9	8.0	7.5
日　　本	45.8	20.1	17.4	18.4

资料来源：计算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5。

绝大部分出口收入依赖于原料商品行情的国家则处于另一种状况。原料价格下跌时即可看出，同样的生产和出口规模却不能保证得到本国经济已习以为常的可自由兑换货币。于是不得不大规模削减进口依赖国外供应配套材料的商品产量，压缩经济活动的规模，放弃固有的消费水平。两难的选择是：或提高非原料商品的产量，或增加其出口。第一种办法由于经济上的局限至少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第二种办法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也不容易做到。

遇到这类问题的政府，往往试图依靠借用外债来加以解决。它们希望行情会逐渐好转，可供出口的资源价格会重新上扬，可以对外债的动态进行监督，使其能够加以控制。在原料市场的事态发展不可预见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危险的战略。它将许多国家引向了破产和严重的经济危机。

如果原料价格长时期内一直很低（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那么久而久之事情就会变得很清楚，偿还国家欠债越来越费钱，举债国的信用度会不断减弱。经过两三年后情况逐渐明显，以任何条件获得贷款都已经不再可能，外汇储备归于枯竭，国家不得不停止偿付外债并削减进口，生产和生活水平下降。国家遭遇外来冲击后其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会消失。它们转而由接替往届行政当局的人继承。但在外债业已增多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当国家在进口中严重依赖由于某些原因占据主要地位的产品的采购量和价格时，情况便可能相应地发展。例如对苏联而言，长时期中粮食就成了这样的产品。

为了刺激农业部门的生产，国家经常通过有区别地对价格进行补贴、对农业技术装备费用实行优惠、降低贷款利率、定期免除欠债、直接给予预算拨款（投资）等等方式，加大对生产者的补贴规模。农产品生产者的收入之中，补贴的总额不断增长。

苏联，包括俄罗斯在内，在其存在的最后数十年中大大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典型的农业生产率指标，亦即落后于农业生产的世界技术进展（见表5－4）。

表5－4　苏联、俄罗斯、西欧、美国和加拿大的农业生产率指标

	西　欧	美　国	加拿大	苏　联	俄罗斯联邦
谷物产量（公担/公顷）	—	—	—	—	—
1970年	27.9	31.6	21.1	15.7	13.7*
1989年	45.8	44.8	21.2	18.9	16.1
1989年是1970年的倍数	1.64	1.42	1.00	1.20	1.18
1头奶牛的挤奶量（公斤/年）	—	—	—	—	—
1970年	3269	4423	3256	2110	2328**
1989年	4059	6533	5806	2555	2773**
1989年是1970年的倍数	1.24	1.48	1.78	1.21	1.19

*1971～1975年平均数。

**个人副业除外。

资料来源：《1985年的苏联国民经济》，财政和统计出版社莫斯科版，1986；《1990年的苏联国民经济》，财政和统计出版社莫斯科版，1991；《世界农业·趋势和指标——1970～1989》，美国农业部华盛顿版，1990。

国家在居民粮食供应方面的政策，使本部门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该项政策的主导思想是坚持为苏联人提供廉价食品的原则，这在社会层面上颇富吸引力，但就经济而言却缺乏充足的理由。多年以来，在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微不足道的情况下，主要食品的价格始终维持在一个低廉的水平上。

为了满足居民对畜牧业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1970 年代初曾采取建立畜牧业综合体的方针，而这种方针又造成了谷物在饲料中的份额急剧增长。本国植物栽培业没有能力保障业已增长了的对复合饲料的需求。国家不仅为建立大型畜牧业综合体耗费了不菲的资金，而且从 1973 年起开始被迫支付越来越大量的外汇储备，用以进口饲料用谷物和豆类。

尽管用于发展农业的开支巨大，产量的增加却仍然不能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需求。对此足资证明的是，居民肉食和奶产品供应的问题日趋严重、到处排队以及食品极度短缺的其他种种迹象。国家由于已承担稳定地保持食品低价的责任，便以不断增长的规模继续对本国的消费者进行补贴。1989 年用于食品需求的补贴金在国家预算中占到支出部分的 1/3 左右，主要食品零售价的补贴份额已高达 80%（表 5 - 5）。

表 5 - 5　1989 年苏联主要食品零售价格中国家补贴的份额

单位：%

食　品	零售价中的补贴份额	食　品	零售价中的补贴份额
面　包	20	牛　奶	61
牛　肉	74	奶　油	72
猪　肉	60	乳　酪	48
羊　肉	79	食　料	14
家　禽	36		

资料来源：《前苏联经济的食品和农业部门中的改革战略》，世界银行华盛顿版，1993，第 253 页。

国家既对农产品的生产者、也对食品的消费者进行补贴。这种类型的补贴带有逐渐增长的性质——为坚持同一政策，在时段 T 内拨付的补贴越多，在时段 T + 1 内不得不支付的费用也越多。国家预算只有在两种情况

下才能应付这种局面：要么有用于食品生产快速增长的后备资金，要么具备抵补不断增加的补贴金的持续增长的国家收入来源。用于农业的资金并未带来相应的效益。从1980年到1990年，农业的用电量增长61%，化肥用量增长22%，基本建设投资增长40%，而农业部门的总产量仅仅增长12%。[①] 1970年代预算中的收入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石油卢布"和"天然气卢布"进行补充。自1980年代初开始，国家主要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下跌。这就导致了国家预算收入的减少。

在市场经济中尽人皆知，遇到出口中占主要地位的原料商品价格下跌时政府应该怎么办。那就必须减少对日用品、粮食、燃料的补贴，压缩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提高天然垄断产品和劳务的价格，加大与原料资源收入无关的税收，宣布本国货币贬值，有时候还要对进口实施直接的数额限制。这类决定会对那些生产活动依赖从国外购进原料和技术资源的企业造成一定的问题。其结果是生活水平下降，生产停滞或产量减少，失业增加，这是痛苦却必不可少的措施。如果外部经济行情变化具有长期的性质，或迟或早都非得采取这类措施不可。然而懂得问题的政治价值的政府都愿意相信，这里牵涉到的只是暂时的困难，向国外借款便可以加以克服。

社会公众并没有义务理解外部冲击所造成的威胁的实质，也不理解生活条件的恶化并非政府当局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对国家所遇到的挑战的回应。这就会对现任政府构成政治风险。试图采取稳定措施的政府往往被迫辞职。有时候这种危机的结果则是国家政权的瓦解。

社会主义国家中外部冲击所引发的挑战的性质，原则上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特征并无区别。它们同样与国际市场相关联，受行情波动的支配。原料价格下跌打破了贸易和收支平衡，这就要求政府当局采取可以使经济适应新的外贸条件的措施。企图依靠外债保持现有的进口规模和结构会增大国家破产的风险。在经济政治制度出现严重危机的条件下，实行稳定的措施可能使制度本身的生存受到威胁。

从对外经济危机演变机制的观点出发，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国家制定价格的情况下，经济行情恶化所产生的问题首先不是表现

---

① 俄罗斯联邦农业和粮食部的数据。

在通货膨胀的速度加快和本国货币的贬值，而是消费市场短缺的加剧。外贸垄断迫使政府承担有关限制进口决定的责任，不可能为市场适应机制发挥作用留下余地。国家力图控制一切，也就不得不为一切负责。这使得各种稳定措施在政治上特别难以承受。此外，既然已存续数十年之久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上就包含一个论点——执政党领导人比社会公众更懂得如何保证国家向前发展，那么转而向社会公众宣称：我们犯了错误，必须采取一些无可避免但会降低生活水平的措施——这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

二　苏联与石油价格下跌——选择的实质

在1980年代中期苏联遭遇外部经济冲击之际，它业已与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结为一个整体（表5－6），不仅是燃料资源的出口国，而且是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和几大食品进口国之一。从社会政治的观点看来，较惯常的水平减少食品供应——这种决定在任何社会里对政权都很危险。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可能大规模地增加与石油无关的商品的出口，或者减少以可自由兑换货币采购的包括与粮食无关的商品的进口［而这些商品此前决定着俄罗斯经济许多部门的生产条件（表5－7）］，那么，采取这样的决定就势在必行。在相反的情况下，一旦黄金外汇储备耗尽而又无法获得外国贷款之后，这种决定将自动地予以实施。

下面就是当时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雷日科夫对19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事态发展的描写："1986年国际市场上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暴跌，而我国的出口传统一向是能源载体占有很大的比重。怎么办呢？最合乎逻辑的办法就是改变出口结构。可惜，能迅速做到这点的只有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我国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比如，就拿机器制造业来说吧，其产品的出口规模在1986年并无变化，但事实上仅只行销到经互会国家。'资本家们'所购买的大概还不到整个机器制造业出口量的6%！这就是我们基本上只能出口原料的原因。"[1]

---

[1] 尼·伊·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书籍、教育、爱心"协会莫斯科版，1995，第229页。

表 5-6　1980~1989 年按国家分类的苏联对外贸易额

指　　标	1980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合　计							
出口（10 亿卢布）	49.6	74.4	72.5	68.3	68.2	67.1	68.7
进口（10 亿卢布）	44.5	65.3	69.1	62.6	60.7	65	72.1
出口（10 亿美元）	76.4	91.5	87.0	97.0	107.8	110.7	108.5
进口（10 亿美元）	68.5	80.3	82.9	88.9	95.9	107.3	113.9
出口（10 亿美元）2000 年	141.3	135.3	124.8	136.1	147.2	146.3	138.2
进口（10 亿美元）2000 年	126.8	118.7	118.9	124.8	131.0	141.7	145.0
社会主义国家							
出口（10 亿卢布）	26.9	42.1	44.3	45.6	44.2	42.9	42.2
进口（10 亿卢布）	23.6	38.2	42.2	41.8	42.1	43.4	44.7
出口（10 亿美元）	41.4	51.8	53.2	64.8	69.8	70.8	66.7
进口（10 亿美元）	36.3	47.0	50.6	59.4	66.5	71.6	70.6
出口（10 亿美元）2000 年	76.7	76.5	76.3	90.9	95.4	93.5	84.9
进口（10 亿美元）2000 年	67.3	69.5	72.6	83.3	90.9	94.6	89.9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出口（10 亿卢布）	15.9	21.3	18.6	13.1	14.2	14.6	14.4
进口（10 亿卢布）	15.7	19.6	19.3	15.9	13.9	16.3	20.5
出口（10 亿美元）	24.5	26.2	22.3	18.6	22.4	24.1	22.8
进口（10 亿美元）	24.2	24.1	23.2	22.6	22.0	26.9	32.4
出口（10 亿美元）2000 年	45.3	38.7	32.0	26.1	30.7	31.8	29.0
进口（10 亿美元）2000 年	44.7	35.6	33.2	31.7	30.0	35.5	41.2
发展中国家							
出口（10 亿卢布）	6.9	10.9	9.6	9.6	9.8	9.6	10.1
进口（10 亿卢布）	5.1	7.5	7.6	4.9	4.7	5.3	7.0
出口（10 亿美元）	10.6	13.4	11.5	13.6	15.5	15.8	16.0
进口（10 亿美元）	7.9	9.2	9.1	7.0	7.4	8.7	11.1
出口（10 亿美元）2000 年	19.7	19.8	16.5	19.1	21.2	20.9	20.3
进口（10 亿美元）2000 年	14.5	13.6	13.1	9.8	10.1	11.6	14.1

注：按苏联国家银行的官方汇率换算为美元。

资料来源：1979~1987 年、1989 年期间的《苏联对外贸易》统计汇编，财政和统计出版社莫斯科版，1980~1990。

表5-7 1980~1985年苏联用于某些工业部门的设备进口量

设备使用部门	进口（百万卢布）		进口（名义，百万美元）		进口（百万美元，2000年）	
	1980	1985	1980	1985	1980	1985
食品制作	455	830	701	996	1297	1429
纺织	392	712	604	854	1117	1225
化工	1244	1043	1916	1251	3545	1795
管道	141	121	218	145	403	208

注：按苏联国家银行的官方汇率换算为美元。

资料来源：1979~1987年、1989年期间的《苏联对外贸易》，统计汇编，财政和统计出版社莫斯科版，1980~1990。

增加苏联机器制造业产品出口换取可自由兑换货币的最大障碍，在于产品的技术水平和质量不高。它们满足不了国外市场的需求。苏联一些部门所进行的分析表明，本国机器制造业仅有12%的产品具有竞争力。这还要考虑到商品售前准备工作中在国外所进行的最后加工。苏联的专家们认为，62%销往国外市场的产品已经无形老化。[①] 1988年上半年国外对机器制造业所出口的产品提出索赔的超过19.4万起。[②]

实现稳定计划过程中经济上的必然性与政治上的不可能性之间的矛盾，才是1980年代苏联所产生的情况的实质。单是家禽饲养业一个部门的数据（表5-8），便可以说明为适应油价下跌带来的外部冲击而严格实施的方案范围内的事态发展。苏联的这个生产部门自1970年代初期开始，实际上已完全依靠进口的大量饲料粮。油价高企时期家禽总数增加之后，紧接着便是油价下跌期间家禽数量的急剧减少。这一过程在1986年即应开始。之所以延迟至1990年，是以外债迅速增加的代价来保障的。外汇储备告罄和对外举债能力丧失之后，家禽的数量便下降到了开始大规模进口粮食之前的水平。

---

① 无形老化指机器、设备及加工方法等因先进的新技术出现而陷于贬值。

② B. 谢罗夫：《发生了朝向最坏方面的变化》，载于《社会主义工业报》，1989年2月28日。

表 5-8　1971~2000 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家禽总数

单位：百万只

年　份	总　数	年　份	总　数
1971	358	1990	660
1976	394	1996	423
1981	564	2000	339
1986	628		

资料来源：历年《苏联的国民经济》，统计汇编，1971~1990；《俄罗斯统计年鉴》，莫斯科版，2004。

石油价格下跌时，不可能猛然削减包括粮食在内的最重要的食品的进口，保持原先的水平同样不可能。1986 年和 1987 年由于风调雨顺而获得的丰收，使苏联领导人得以消除石油价格暴跌所造成的后果，增加了国内的储备量，暂时减少了以可自由兑换货币购买粮食，用于粮食进口的开支减少20 亿~30 亿美元。然而 1988 年表明，这只不过是短暂的喘息（表 5-9）。

表 5-9　国家向苏联生产者收购的主要农产品

单位：千吨

	1981~1985 年（时期平均值）	1986 年	1987 年	1988 年	1988 年占 1981~1985 年时期平均值的%	1986~1988 年（时期平均值）	1986~1988 年平均值占 1981~1985 年时期平均值的（%）
粮食谷物合　计	66643	78787	73347	61375	92	71170	107
其中小麦	33684	43823	35195	34840	103	37953	113

资料来源：农工综合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总局《1988 年和第 20 个五年计划前三年苏联国营农工综合体的社会经济发展》，1989 年 1 月 20 日，见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650. оп.1. д.3848. л.27。

庄稼收成对天气条件的依赖，包括对 1950 年代将开荒作为农业政策优先选择的决策的依赖，以及石油价格的一路走低，都造成了苏联外贸平衡的灾难性局面。苏联政治经济结构危机的起因正在于此，而根本无关乎戈

尔巴乔夫的个人品质和他的团队的失误。[①] 采取克服危机所需要的措施就意味着，不仅对苏联现任领导而且对整个共产主义制度造成威胁。拒绝采取措施呢？如果外部经济行情的变化具有长期性，则会使社会主义经济和苏维埃帝国的崩溃无可避免。

1985～1986 年石油价格下跌之时，苏联领导人还有几种可望克服危机的战略选择。可以参照 1930 年代中期物价上涨的幅度提高零售价格，转而实行食品定量供应，降低加工部门的产量，从而增加对国际市场的原料供应；削弱不能带来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向经互会国家提供的燃料和原料规模，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大量减少从西方购买技术设备；由外部冲击引发的财政危机，可尝试以增加大众消费工业品的进口份额加以调控，再在这一基础上增加预算收入。这样做并不容易，政治上要担风险，但就经济而言却是极为重要的决定。不过，提高零售价格会破坏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基本契约，这种契约关系是 1950 年代末期～1960 年代初期所形成的，其重要意义已为 1962 年的新切尔卡斯克悲剧所证明。

从社会政治的观点看来，在急剧变化的条件下坚持对食品实行固定价格是一条荒谬的路线。绝大部分食品补贴只由十分之一的居民享受，而且重要的是，这都是一些生活最有保障的人。根据预算调查资料（1989 年），人均月收入低于 50 卢布的家庭购买一公斤肉或肉制品所花费的钱，要比人均收入高于 200 卢布的家庭多出一半。[②] 但这里所说的并不是社会经济的合理性问题，固定价格不变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种契约是以居民稳定的生活条件换取政权巩固的保障。

1980 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并未打算认真讨论不加补偿提高物价的问题，这并不难理解。居民对基本食品的需求不大会因价格而变化。即使在

---

① 关于将米·戈尔巴乔夫政治方针的动摇不定与他个人性格特征相联系的人的观点，可参见诸如列·米·扎米亚京：《戈尔比和玛吉·一位大师谈两位著名人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全俄科技信息研究所生产出版联合体莫斯科版，1995，第 115 页；米·涅纳舍夫：《苏联的最后一届政府：人物，证明，对话》，克罗姆股份公司莫斯科版，1993。

② 关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获取肉和肉制品的价格水平，见 A. E. 苏里科夫、B. A. 德布齐娜：《关于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食物问题（根据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关于商品和劳务价格对 9 万份家庭预算和 3 万公民的问卷调查意见的材料写成）》，载于《社会和预算调查公报》1991 年第 1 期，第 62 页。

价格猛涨的情况下，大量减少在国外的粮食采购也可能导致面包和畜产品生产所需饲料发生短缺。国内此前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货币压力，没有机会买到所需商品的苏联民众手中积蓄了许多迫不得已的存款。即使采取大规模提价的决定，苏联领导人也不得不考虑基本日用品照旧短缺的风险。推行这种政策引发的对政权稳定的威胁，在1980年代中期似乎难以消除。

定额供应符合早年救世论社会主义的精神。至1980年代中期之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对消费品的这种分配制度已经习以为常。1986年初苏联商业部部长Г. 瓦先科致函苏联部长会议称："畜产品的销售……今年在全国大多数地区仍然按不同形式的凭卡定量配售制度进行。多种非食用商品也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保障零售和批发交易的商品储备方面，1986年1月1日比去年同一日期减少了3天的交易量……几乎所有的主要食品、服装、针织品、长短袜子和各种鞋的储备都低于规定标准。"[①]

然而适值苏维埃政权70周年之际，在包括享有特权的城市在内的全国各地实行居民供应卡制度，这在政治上是个复杂的问题。而且采取这类决定，就必须在各行各业的居民中普遍实行。但这与在苏联已经定型的一种观念相矛盾，即人们在消费和获得紧缺资源问题上分为三六九等，必须视其社会地位的高低而定。

对全苏居民实行大众消费品凭卡供应的设想大受欢迎。据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早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1991年初）所进行的问询调查资料，支持这一想法的被询问者占60%（支持提价设想以促使商品上货架者占16%）。[②]然而不仅全联盟范围内，甚至在大城市中，国家都不拥有足以让定额供应制度充分发挥功能的资源。1980年代后半期，事件发展的这类方式曾不止一次在国家领导人的会议上进行讨论，每次都被认为难以实行而遭到否定。[③]

减少加工部门的产量，将这方面腾出的一部分原料资源用以增加出口，这是能够办到的。大力压缩军费开支和武器生产同样可以腾出一部分

① Г. П. 瓦先科（苏联商业部部长）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完成第11个五年计划商业发展计划的问题》，1986年1月24日，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47. Д. 958. Л. 85。

② В. Л. 科斯马尔斯基、Л. А. 哈胡林娜、С. П. 施波尔科：《关于转入市场经济的社会舆论》，科学报告，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莫斯科版，1991，第17页。

③《关于改善经济的措施、经济改革的阶段和制定第13个五年计划的原则态度》，见苏联政府向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消息报出版社莫斯科版，1989，第16页。

原料商品，将其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筹集可自由兑换货币。不过，与民用加工业的生产一样，将用于军事工业综合体的诸如镍、钛、钢之类的材料更多地用于供给出口，可能会打破国际市场的稳定，导致原料资源价格下跌。况且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便意味着与军方领导和军工综合体发生直接冲突。

因减少加工部门的生产而在这些部门出现的就业问题所引起的社会政治威胁显而易见。许多军工企业都分布在一体化城市里，那些地方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有限。市场经济体内受到生产周期行情影响而出现劳动需求减少时，往往会导致工潮发生。政府可以推托说它遇到的情况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加以控制，但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若向工人们声称祖国如此需要的工厂应当关闭，则可能要准备面对严重的社会政治动荡。

自 1980 年代中期开始，压缩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石油和石油产品供给，重新分配出口，向能够以可自由兑换货币结算的进口国倾斜，这已成为经常性的做法。同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债务也在增长。时至 1988 年，各社会主义国家所欠西方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外债已高达 2060 亿美元。净债务的总额则增至 1541 亿美元（表 5 - 10）。[1]

表 5 - 10　社会主义国家所欠西方外债

单位：10 亿美元，票面额

年　份	1981	1984	1986	1987	1988
波兰——共计	25.9	26.9	33.6	39.3	38.9
其中纯债务	25.1	25.4	31.9	36.3	36.9
苏联——共计	26.5	22.5	33.1	40.1	41.5
其中纯债务	18.1	11.2	18.3	26.0	27.2
全体经互会国家——共计	99.2	87.6	120.5	142.7	140.5
其中纯债务	83.2	63.3	90.9	111.2	109.8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计	127.8	115.7	163.9	191.2	205.7
其中纯债务	105.0	71.7	119.7	143.4	154.1

资料来源：1989 年 7 月 13 日，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① H. B. 加列托夫斯基（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主任）致苏联部长会议函《社会主义国家货币金融状况概述（据 1989 年初的情况）》，1989 年 7 月 13 日，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50. Д. 33. Л. 69。

为了保全帝国，不得不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国王的最后一个理由"——武力。而这在20世纪末却是稳固控制附庸国的靠不住的基础。

1987年初，政府领导人开始全面理解财政比例失调的规模。政府主席尼·雷日科夫1987年1月27～28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就以财政来说吧。这方面已经形成了极为危机的局面。国家带着严重的财政遗留问题开始执行第12个五年计划。我们早已入不敷出，靠借债度日。日益增大的收支不平衡开始具有长期的性质，已使财政信贷系统濒临事实上分崩离析的边缘。所有这一切都未得到原则性的评价。财政成了某个狭小圈子里的一些人的特有权力。不仅如此，这方面的真实情况被外表的平安无事所掩盖，没有得到深刻全面的分析研究……货币流通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局面，今天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①]已经谈到了。70～80年代初货币流通发生混乱。我们得出结论：我国已开始了通货膨胀进程……国家的外汇状况也并不比这好……对外贸易已变得极易受到各种制裁的伤害。"[②]

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停止从国外大量购买技术设备，以经济的观点看待，这正是对贸易平衡恶化、原料商品价格下跌所引发的危机理所当然地回应。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看，这样做最少争执。然而国家领导人也必须考虑到与政治经济精英尤其是那些已进入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人的关系。类似的措施之于这些人，正如提高零售价格对于社会公众一样，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关于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度、关于什么样的工程应当开工的问题，从1920年代开始便是苏联政治经济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果告诉党委第一书记和部长们说，给他们地区和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将要压缩，他们打算进口的技术设备将不再购进，这无异于直接破坏了公认的游戏规则。试图在这方面取得进展的过程中，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新一代领导人的命运与赫鲁晓夫的命运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并没有立即下台。了解1980年代中期苏联现实的人，这一点未必会让他们产生怀疑。而且为了不单是让危机推延若干时间发生，而是要将其遏止，这样的措施是否足够——要加以判定是不可能的。政治上的自杀是十拿九稳，取

---

① 指戈尔巴乔夫。——译者注

② 政府主席尼·雷日科夫在1987年1月27～28日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工作报告，见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2. оп. 5. д. 45. л. 22～220。

得胜利的可能却大有疑问。尽管财政困难日趋严重，开工工程的数量却仍然在继续增加（表5－11）。

表5－11　1986～1988年苏联新开工的工程项目

年　份	重新开工工程的预算造价（仅就国民经济而言）（10亿卢布）	重新开工工程在国民经济投资中的份额（%）	重新开工工程在GDP中的份额（%）
1986	48.5	25.0	6.1
1987	38.3	18.6	4.6
1988	59.1	27.1	6.8

资料来源：新开工工程预算造价数据来自叶·季·盖达尔的私人档案资料；新开工工程占国民经济投资的份额和新开工工程占GDP的份额，以2000年财政和统计出版社莫斯科版统计汇编《1990年的苏联国民经济》的数据为基础。

甚至在1989～1990年出现的财政部门灾难性状况的背景下，政府也未能下定决心压缩对农工综合体的投资。苏联财政部部长B. 巴夫洛夫在关于苏联国家预算的报告中说："对外经济活动中的财政状况继续恶化，破坏了预算收入的基础，严重削弱了我们消除预算赤字的努力……这方面收入的份额降到了近年来的最低点，仅占预算收入的14%左右。对外债务也在增加。外债规模已经达到既使不借新债，仅仅由于还债支出增加即已不断扩大的水平。1990年为偿付债务和利息便不得不几乎耗尽出口燃料能源综合体的产品所得的全部进款。"然而同时他又说："在预算的社会方针重新定位时，农工综合体统一拨款的增加占有关键性的地位。1990年预算拨付1165亿卢布，高于今年的计划80亿卢布，比五年计划的预定数额则多出104亿卢布。这造成了国家预算和财政进一步的紧张，但为了更快地解决粮食问题，这些开支是必要的。"①

苏联国家银行报告苏联政府称，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专家们的意见，1985年和1986年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收支平衡出现严重恶化，它们的外债构成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偿还期限为一年的短期债务，它们的货币

① B. C. 巴夫洛夫：《关于1990年苏联国家预算和1988年苏联国家预算执行情况》，财政和统计出版社莫斯科版，1990，第9、15页。

财政状况均欠稳定。[①]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在1988年上半年既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可自由兑换货币外债继续在增长。然而1988年9月的支付能力等级评定中，苏联仍被视作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可靠的金融伙伴，在这一指标上超过中国。1985~1988年使苏联更容易进入信贷资金国际市场的因素之一，是西方专家过高估计了苏联的黄金储备数量。他们认为，这方面的储备折合美元约为360亿，然而实际上此前由于大规模采购粮食，其数量已减少至大约76亿美元。[②]

西方观察家注意到，最近三年苏联的国家债务已增加176亿美元。其中短期所占份额将近100亿美元。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家和政府仍然继续以相当有利的条件向苏联提供新的贷款。[③]

这就使得苏联能够继续执行原有的经济政治方针，搁置争论激烈的决定。1989年，未完工工程的增长在国家深刻的财政和货币危机的背景下吞噬了全国收入增长的4/5。[④] 苏联国家银行的资料中称："1989年底未完工工程的规模达1809亿卢布，其中超过定额390亿卢布。4年期间（1986~1989年）未完工工程增加605亿卢布，其中1989年即增加226亿卢布。"[⑤]

仍在继续大规模地购买进口设备。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却并未投入使用。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B. 谢罗夫致函苏联部长会议称："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1989年未安装的进口设备存量增加10亿卢布。同时，交付安装

---

① 苏联国家银行货币经济管理局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财政状况》。ППNO. 4013，1988年2月24日，见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3. Д. 696. Л. 4、5。

② H. B. 加列托夫斯基（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主任）致苏联部长会议函《社会主义国家货币财政状况概述（据1989年初的情况）》，1989年7月13日，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50. Д. 73. Л. 74、75；关于1986年1月1日的黄金储备数量（相当于587吨黄金），见尼·伊·雷日科夫：《大动荡的10年》，"书籍、教育、慈善"协会莫斯科版，1995，第240页。

③ 苏联国家银行《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货币财政状况的报告（据1988年中期的情况）》，1988年12月8日，见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2. Д. 3526. Л. 150。

④ 苏共中央全会，1990年2月5~7日，《关于苏共中央向党的第28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见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2. ОП. 5. Д. 403. Л. 21。

⑤ 苏联国家银行致银行活动规划和协调管理局函《关于国家社会经济状况的报告素材》，1990年2月2日，见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3. Д. 741. Л. 59。

的计划完成102.9%（计划为65亿卢布，实际则为67亿卢布）。存量增长主要是由于1989年的到货数量猛增——为数达83亿卢布，比1988年多出7亿卢布。1988年底尚未安装完毕的设备存量之中，去年进行安装的仅占36.9%（进口总数为17784亿卢布），其余均为用新的到货进行安装，先前购买的进口设备余留转入1989年的数量为30亿卢布，相当于1990年1月1日的总余留额的52%。就配套和无形老化因素的观点而言，这些设备的合格程度，无论苏联的各个部或各加盟共和国的部长会议都未能加以确定……对以进口成套设备为基础的项目建设过程的分析表明，一系列设施生产之所以受阻，基本上都是由于订购这些设施的各个部未能将国产技术装备配套齐全，未能用它们来经常校正设计预算的文献资料……”① 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政府即使在货币财政问题明显增多的情况下，也没有能力采取负责任的决定。苏联领导人意识到与行政业务精英们发生冲突的风险，便继续讨论依靠新借外债来支付规模庞大的一些项目。

对外经济银行领导人致政府的函件中称："根据苏联对外经济银行掌握的资料，目前已完成或即将完成经济技术论证工作的至少有9个大型石油天然气化学综合体，其中每一个的外汇开支都超过2亿卢布，预定以联合企业为基础加以实施。”投入这些项目的开支可以用下列初步数据加以说明（见表5-12）。

实施这些项目所需的资金，拟由外国银行和得到苏联担保的出口代理商的贷款提供。外国合作者拒绝提供贷款担保，其中也包括自己的参股部分。这就免除了国外公司为顺利建成项目所承担的责任。大多数项目的全部风险都归于苏方，而外汇则计入苏联的债务。②

现在所形成的局面，只能是在提高零售价或削减投资和军费开支之间进行选择，这将苏联人置于两难境地——决定与居民抑或与党内业务精英发生冲突。拒绝就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做出决定会增加这样一种风险：随着

① B. M. 谢罗夫（苏联国家建委主任）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减少未安装进口设备存量的措施》，1990年5月7日，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493. Л. 113。

② 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管理局局长 Б. С. 莫斯科夫斯基1989年11月22日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主任 C. A. 西塔良和苏联国家计委副主任 Б. П. 霍缅科的 No. 392/01 号函《关于在苏联建设以联合企业为基础的石油天然气化学综合体》，叶·季·盖达尔私人档案资料。

危机的发展，不得不既与社会也与精英界发生冲突。[①]

表 5－12　用以建设以联合企业为基础的石油天然气化学综合体的总开支

单位：百万卢布

	总计卢布	外汇卢布
1. 托博尔斯克（第一阶段）*	1062	715
2. 苏尔古特（第一阶段）*	1103	1578
3. 新乌连戈伊（第一阶段）	353	311
4. 田吉兹（最低估计）	139	554
5. 萨哈林—2（两个产区）	4895	3799
6. 舍甫琴科（两个阶段）	113	451
7. 舒尔坦（第一阶段）	277	256
8. 下瓦托夫斯克（第一阶段）	1816	1997
9. 乌瓦特（第一阶段）	859	1300
合　　计	10617	10961

* 据提交给苏联国家计委国家鉴定委员会的最后经济技术论证不同方案。

资料来源：1989 年 11 月 22 日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管理局局长 Б. С. 莫斯科夫斯基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主任 С. А. 西塔良和苏联国家计委副主任 Б. П. 霍缅科的信函《关于在苏联建设以联合企业为基础的石油天然气化学综合体》，叶·季·盖达尔的私人档案资料。

新一代领导人显然不懂得这一点。这丝毫不足为奇。苏联经济的传统管理方式总是以天然资源为目标。发展畜牧业的问题在高层讨论的次数，比讨论国家预算还要频繁得多。财政被部门、企业的领导人视为必不可少然而单调乏味的会计学的组成部分。[②] 加之关于预算、外汇储备的实际情

① 据米·戈尔巴乔夫证实，在石油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主管经济的苏共中央书记 Н. 斯柳尼科夫坚持必须执行削减国际开支的路线。这一立场在政治局会议上未能得到支持。见 Д. 穆拉托夫《戈尔巴乔夫周围再次激情澎湃》，载于《新报》2005 年 2 月 21 日第 13 期。根据政府主席尼·雷日科夫的正式讲话及其日后的回忆录可以断定，他在苏联高层领导中最为大力坚持必须将提高物价，作为解决苏联财政危机的方法。与有关削减军费开支的问题一样，关于开始提高物价实际行动的决定一直到国家财政和货币体系瓦解之时也始终未能采取。

② 1980 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讨论财政问题的方式，在苏联财政部长 В. 加尔布佐夫 1985 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预算讨论会上的开幕词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正是从那时开始，国家的财政危机进入尖锐的阶段。加尔布佐夫说："我国人民、全世界进步舆论界怀着深深的满意之情看待授予康·乌·契尔年科同志列宁勋章和'镰刀和锤子'三级金（转下页注）

况和外债、收支平衡等信息，只有一个极其狭小的圈子里的人才能得悉，而且其中许多人此前对这方面的事一窍不通。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安德罗波夫要求我和雷日科夫斟酌整个情况并将结论报告他。我们试图了解此事的实质，并请求让我们能够摸清预算的实际情况。但安德罗波夫只是笑了笑说：'瞧你们打的什么主意。预算我可不让你们插手。'"[①]同时，正如安德罗波夫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B. 克留奇科夫所写的那样，安德罗波夫自己也承认他对经济是门外汉。[②]

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一贯执行领导人非智力化的路线。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份会议记录《关于扎夏德科同志》便很好地描绘出了党的干部政策："关于扎夏德科：据说，已不再酗酒。那就派他去乌克兰任部长吧。"[③]从首都和大型高等学府进入党领导机关的人数比例持续减少，农村出身、仅有基础教育低级水平的人的比例直至改革开始之前都在不断增加。[④]1985 年开始掌权的新一代领导人所受的教育较他们的前辈为好。[⑤]但无论他们还是他们负责经济工作的战友，都没有接受过高水平的经济培训。他们不懂得国际市场的构成、外贸平衡、预算和居民供给的相互关系，不能评估国家所遇到的战略威胁。他们觉得，最主要的问题——经济增长速度缓慢、效率低下、落后于西方等等，都是先前的领导人浅薄无知所造成的。

1990 年夏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说的一番话，可以被解释为

(接上页注②) 星奖章（鼓掌）。列宁式的杰出的政治和国务活动家康士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在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岗位上奋不顾身地劳动，为制定和具体实现苏共列宁主义的内外政策做出了巨大的无可估量的个人贡献。这一政策受到苏联劳动人民无限的信赖，被视作与他们自己的血肉相连的切身事业……" 见 B. Ф. 加尔布佐夫：《关于 1985 年的苏联国家预算和 1983 年苏联国家预算执行情况》，政治书籍出版局莫斯科版，1984，第 4 页。

① 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第 1 卷，新闻出版社莫斯科版，1995，第 234 页。

② B. A. 克留奇科夫：《私事》，奥林普斯 ACT 出版社莫斯科版，第 1 部，1996，第 42 页。

③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4～1964）》，会议记录草稿，速记记录，决议卷 1，第 151 页。

④ A. Д. 切尔涅夫：《229 位克里姆林宫领袖人物·政治局·组织局·共产党中央书记处的人物和数字手册》，《祖国》杂志编辑部、露西卡科学中心莫斯科版，1996。

⑤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吉洪诺夫 1985 年 3 月 11 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最近一段时间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一道工作的时候很多。我们在完善经济机制委员会工作期间的互相了解尤为密切。关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能说些什么呢？这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同他可以商讨问题，在最高的水平上进行商讨。这是中央委员会书记中第一位熟谙经济的人。你们想想看，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见 1985 年 3 月 11 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工作记录《关于苏共中央书记》，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36. Д. 16. Л. 1、2。

自我辩解。尽管如此，他讲的却是实情："我们得到的是一份极为沉重的遗产。我们的经济和整个社会机体由于患有各种慢性疾病已变得精疲力竭。农村、农业和加工工业一片衰败景象，我们的自然状况令人沮丧，生产结构老化，科学技术落后——难道这一切不是数十年来所推行的经济技术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吗?"[①]至于1985年之时他未必了解他和他的同僚们不得不对付的各种问题的尖锐性，那是另一回事。

未来的苏联政府主席尼·雷日科夫这样评价勃列日涅夫时代末期苏联的经济状况："这样，我们便开始干了起来。国内的形势，我要再说一遍，确实很困难。只举一个例子。1982年，居民的实际收入在战后首次停止增长：统计显示的增长率为零……国民经济的状况可以用一句俗语简单地加以描述：走投无路。无论冶金业还是石油开采业都问题成堆，电子部门也要求补充供给，化学部门也是一样——你怎么说都不会过分。"[②]

尽管如此，从1985～1986年新领导人的讲话中却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仍然满怀信心，坚信自己能够恢复苏联经济失去的活力，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克服落后于最发达国家的差距。

三 一连串的错误

当1984年12月在皮聪达讨论不能再这样生活的问题时，米·戈尔巴乔夫和爱·谢瓦尔德纳泽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历史未必能够了解。但从可以接触的档案材料中所查明的一切都显示，他们执掌最高权力之时并没有制订出确切的行动计划。[③] 戈尔巴乔夫掌权22个月之后在1987年苏共中央1月全会上讲话时承认，国家及其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之多出乎他的预

① 1990年6月29日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记录。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ф. 2. оп. 5. д. 495. л. 14。

② 尼·伊·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书籍、教育、慈善"协会莫斯科版，1995，第14、87页。

③ A. 雅科夫列夫写道：1985年党的领导人并没有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和先进性，见A. H. 雅科夫列夫：《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伏尔加书籍出版社雅罗斯拉夫尔版，1994，第213～239页。

料。[①] 遭遇难以控制的危机后，克服危机后果需要集中全部精力、准备采取重大决定并为之负责，而新领导人并未看清和理解威胁的实质与规模。

不过，他们注意到了一个危险的趋势——1985 年苏联石油开采量下降，于是做出了改变局面的努力。戈尔巴乔夫 1985 年 9 月的秋明之行后，撤换了一系列领导人，划拨了补充资金，该地区的石油开采量得以暂时停止下滑。然而 1970～1980 年代初大油田开采强度过大和石油开采条件恶化的根本问题并未获得解决。

苏联领导人明白，石油开采量减少向他们提出许多复杂的问题。1986 年 8 月 23 日的苏共中央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便说过："同志们，我想首先讲一件事情。现在我想在这个圈子里坦率地讲一讲这件事，就是我们大家都应当看到，鉴于石油开采和液化天然气现有的状况，1986 年我们出口资源以及相应的进口能力都大大缩减了。这使我们的收支平衡问题严重地复杂起来，不仅出口计划如此，而且整个经济也是如此。在这种条件下，尽一切可能节约外汇的问题变得空前尖锐。我们当然要将大量外汇用于购买农产品——粮食、肉类以及其他产品。我们以 30 亿卢布购买 900 余万吨钢材、钢管，还有用于化学、有色金属和轻工业等方面的大量原料和半成品。总之这一切都是必要的。我们之所以要购买是因为，不如此便无法生活。"[②]

增加石油开采量，即便比 1970 年代一大批大型油田投产后所达到的速度低得多，对于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定也极为重要。但为此必须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1988 年苏联工业建设银行管理处主任在致政府的信函中提醒说，为满足燃料电力综合体的需要，1986～1990 年预计划拨的基本建设投资比 1981～1985 年已使用的多出将近 1/3，比 1971～1975 年多出两倍。综合体在国家基本建设总支出中的份额，已从第 9 个五年计划的 14% 增至第 12 个五年计划中的 23%。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显著超过产量的增长速度。[③]

---

① 1987 年 1 月 27～28 日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2. оп. 5. д. 45. л. 3。

② 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9. оп. 5. д. 33. л. 168～170。

③ М. С. 佐托夫（苏联工业建设银行管理处主任）致苏联部长会议 Б. Е. 谢尔宾同志函《关于 1989 年燃料能源综合体各部门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项目的一些关键问题》，1985 年 5 月 26 日，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49. д. 1439. л. 72～94。

在戈尔巴乔夫1986年的讲话中，明显表现出对于石油价格下跌所产生的问题的关切。但他的语气证明他并不了解问题的规模。针对克服收支平衡危机和财政危机的措施，并未在1985～1986年的政治局层面上进行过讨论。而且在此期间所采取的一些决定，恰恰与防范危机计划的逻辑背道而驰。

政府在遭遇出口中占主要地位的商品价格行情不利之后，又对国家的财政系统带来了三个额外的打击。[①] 首先，反酗酒运动减少了预算收入；第二，加速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预计会大大增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第三，削减了经由进口采购大众消费工业品的数量。

苏联前国家计委主任H. 拜巴科夫回忆道："4月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讨论了关于缩减含酒精饮料产量的决定。1985年的计划中伏特加占贸易额的24%，因此我在会上小心翼翼地提醒说：'同志们，不要匆忙行事——我们会让预算失去平衡的。事情终归牵涉到250亿卢布呢……''不行，'利加乔夫声称，'我们还是要先大大压缩含酒精饮料的产量，接着再实施禁酒法令……'秋季举行的例会上，中央书记处分析了执行上述决议的过程。大家指出这方面已开展了某些工作，但同时也批评党的边疆区委和州委书记们在降低含酒精饮料生产速度方面行动迟缓。随即提出一条建议，将伏特加的产量减少一半，不过并不是在计划规定的1990年之前，而是在1987纪念年之前——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70周年。这次会议之后，更加积极地开展了反酗酒运动。含酒精饮料的生产和销售开始急剧减少，其中包括葡萄酒和白兰地。"[②] 按照反酗酒决议之前通过的1985年计划，含酒精饮料的销售预计可获得600亿卢布利润。决议通过之后，1986年获利380亿，1987年获利350亿，而1988年由于取消了反酗酒运动，获得的利润超过400亿卢布。[③]

与酗酒进行斗争的运动预计每年削减伏特加和甜烧酒制品的生产、销售10%，5年间减少一半产量。含酒精的水果饮料应当于1988年停止生产。早在1985～1986年，含酒精饮料的产量已经减少过半。反酗

① 摘自米·戈尔巴乔夫纪念改革开始20周年所发表的谈话《我们把财政搞得一团糟》，载于《新报》，2005年2月1日第13期。

② H. K. 拜巴科夫：《从政40年》，共和国出版社莫斯科版，1993，第16页。

③ 尼·伊·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第101页。

酒运动之初，苏联领导人希望提高烧酒价格能够弥补含酒精饮料销售量减少带来的预算和贸易损失的80%。[①] 事件的发展表明，这只是一种幻想。

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提出2000年前将苏联经济潜力增加一倍的任务。加速计划预计，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将超过整个工业增长速度70%，机器制造业产品质量1990年代初要达到世界水平。

玩弄一整套手法之后，苏联统计机关便可以证明1985～1986年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加大了。计算时将酒精产品的销售排除在外，结果这几年中国家收入的增长速度提高了将近一倍。[②] 然而以统计花招遏止财政危机是不可能的。所采取的那些决定与石油价格下跌相结合，使得国家预算赤字的急剧增加已成为无可避免之事（见表5－13、表5－14、表5－15、表5－16）。

表5－13 1984～1987年石油价格下跌对石油和石油产品销售收入所产生的后果

年　份	1984	1985	1986	1987
石油和石油产品销售收入（10亿外汇卢布）	30.9	28.2	22.5	22.8
其中销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0亿外汇卢布）	13.6	10.6	5.5	7.1
石油和石油产品销售收入，占GDP的（%）	4.04	3.63	2.82	2.76
其中销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GDP的（%）	1.8*	1.4*	0.7	0.9

*叶·盖达尔：《论美好愿望》，载于《真理报》，1990年7月24日。

资料来源：占GDP的%据1984～1987年的数据计算。见C.Г.西涅利尼科夫：《俄罗斯的预算危机（1985～1995）》，欧亚出版社莫斯科版，1995。

① H.T.格卢什科夫（苏联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执行苏共中央决定和苏联部长会议1986年7月19日决议》，No.847，1986年8月1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5446. ОП.147. Д.374. Л.32。

② B.M.库德罗夫：《苏联经济回顾》，科学出版社莫斯科版，2003，第102页。

表 5－14　1985～1987 年反酗酒运动的财政后果

年　　份	1984	1985	1986	1987
进入国家预算的酒精产品周转税额（10 亿卢布*）	36.7	33.3	27.0	29.1
进入国家预算的酒精产品周转税额，占 GDP 的（%）	4.8	4.3	3.4	3.5
含酒精饮料零售贸易额（10 亿卢布）*	52.8	47.7	37.0	36.6
含酒精饮料零售贸易额占 GDP 的（%）	6.9	6.1	4.6	4.4

* 引自叶·季·盖达尔的私人档案资料。

资料来源：以 GDP 的% 计算，见 C. Г. 西涅利尼科夫，《俄罗斯的预算危机（1985～1995）》。

表 5－15　1985～1988 年苏联酒精产品的交易量

单位：千万公升

年　　份	1985	1986	1987	1988
伏 特 加	251.2	156.6	123.6	136.9
葡 萄 酒	386.8	189.5	156.7	184.7
白 兰 地	8.5	8.8	9.4	11.3
啤　　酒	667.8	496.9	514.6	564.8
香 槟 酒	21.9	20.7	20.6	21.8

资料来源：C. Г. 西涅利尼科夫，《俄罗斯的预算危机（1985～1995）》。

表 5－16　进口的大众消费品供应量

单位：10 亿外汇卢布

年　　份	1984	1985	1986	1987	1987 年上半年	1988 年上半年
大众工业消费品的进口额	7.6	8.7	8.4	7.9	3.8	4.2
其中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额	1.2	1.5	1.1	0.8	0.4	0.4
供应零售贸易的进口大众工业消费品	27.1	33.0	30.2	24.8	10.4	11.5

资料来源：Б. В. 波诺马廖夫向俄罗斯联邦政府第一副主席助理 В. Б. 波格丹诺夫提供的《1992 年 1 月 1 日外债状况的材料》，1992 年 5 月 15 日，引自叶·季·盖达尔的私人档案资料。

日益加大的财政不平衡本身也导致消费品市场商品短缺的加剧。苏联商业部部长 K. 捷列赫致函苏联部长会议（1987 年 12 月）称："苏联商业部兹报告，当前供应居民的多种日用消费品形势紧张。商业市场情况变化和某些商品需求增加的原因之一，是含酒精饮料的出售急剧减少……1985 年之前，食粮、含酒精的以及另外一些制剂的销售普遍不曾出现断货现象。品种繁多的花露水、护肤液、发蜡、牙膏和其他商品都经常有售。自 1986 年下半年开始，对食糖的需求猛增。1986 年 7 ~ 12 月食糖的销售量增长 22%，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一时期相比增长 16%。1986 年零售商业部门的食糖储备减少 62.5 万吨，1987 年估计还会减少 70 万吨。"[①] 接着这位部长还注意到，1986 年莫斯科售出的花露水增长 50%，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各州都规定了含酒精商品和牙膏的供应定额，胶粘剂销售量的增大超过 30%，玻璃清洗液增长 15%。[②] 信中充满了对反酗酒运动发起人几乎不加掩饰的憎恨，这场运动破坏了消费市场的稳定状况，却要由这位部长承担责任。有关消费市场形势恶化的情况，苏联部长会议情报管理总局局长 B. 科索夫也向政府主席作过汇报。[③]

在消费品供应领域问题不断增多的背景下，物价加速上涨（见表 5 - 17）。它们往日的稳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显出一种假象。

五年计划的前三年间（1986 ~ 1988），与五年计划预先估计的数字相比，国家收入减少 310 亿卢布，支出增加 360 亿卢布。1986 年的货币发行量为 39 亿卢布，1987 年为 59 亿卢布，1988 年则为 118 亿卢布（第 11 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平均发行 36 亿卢布）。苏联国家银行在评估未能满足需求数量时，将 1959 年和 1961 年之间这一时期的货币流通量与贸易额作为之比基础。如果使用这种方法，根据 1986 年 1 月 1 日的情况，流通中的现有货币的余额为 290 亿卢布，1988 年 1 月 1 日则为 350 亿卢布。1971 ~ 1980 年期间，流通中的货币余额增加 150 亿卢布，而 1981 ~ 1987 年则增加 160

---

① K. 3. 捷列赫（苏联商业部部长）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某些商品的供销状况的信息》。1987 年 12 月 2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48. Д. 950. Л. 7、8。

② K. 3. 捷列赫（苏联商业部部长）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某些商品的供销状况的信息》。1987 年 12 月 2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48. Д. 950. Л. 7、8。

③ B. 科索夫（苏联部长会议情报管理总局局长）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同志函《关于 1987 年第 1 季度国民经济工作的某些特点》，1989 年 4 月，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48. Д. 129. Л. 28 ~ 33。

表 5-17　有代表性的商品均价和价目表上零售价的变化（包括各种销售渠道）

	1989 年为 1985 年的（%）			1989 年为 1988 年的（%）		
	所有的商品	食　品	非食品	所有的商品	食　品	非食品
代表性商品的价格	109.5	112.5*	106.7*	102.2	100.8	103.5
平均价格	110.4	113.9	107.3	103.0	102.0	104.0
价格表上的价格	104.2	110.9	98.6	100.7	100.8	100.6

注：在 150 个州中心，边疆区中心和共和国中心组织了物价记录。共挑选 650 种商品用于记录物价。集体农庄商业的价格每月在 264 个城市就 105 种商品进行观察。

* 估计价。

资料来源：Н. Г. 别洛夫（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函《关于大众消费品的价格》，1990 年 8 月 7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227. Л. 27。

亿卢布。①

苏联财政部和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估计，1985 年苏联国家预算的赤字为 180 亿卢布。根据它们的数据，1988 年的赤字水平达 901 亿卢布。按照预计的数额，1989 年期间国家预算的赤字规模应为 922 亿卢布。1989 年初的国家债务为 3124 亿卢布，② 而 1989 年底即已高达 4000 亿卢布或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44%。③ 为了弥补预算开支，便大量使用苏联国家银行的资金和得不到商品资源充分供给的居民的货币资金。国家银行的 650 亿卢布资金来自居民的存款，此前已被提取作为期限延长至 2005 年的农业贷款。④

① А. В. 沃伊卢科夫（苏联国家银行货币流通管理局局长）《答复关于居民未能满足的支付能力需求数额的问题》，1988 年 11 月 22 日，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3. Д. 741. Л. 146～154。

② N. 彼得拉科夫：《俄罗斯的货币稳定：需要做些什么?》，载于《卡托》杂志第 12（3）卷，1993，第 610、611 页。据 С. 西涅利尼科夫估计，1988 年和 1989 年苏联国家预算赤字分别为 944 亿卢布和 977 亿卢布，约占 GDP 的 10%～11%。见 С. Г. 西涅利尼科夫：《俄罗斯的预算危机（1985～1995）》，欧亚出版社莫斯科版，1995。

③ В. С. 巴夫洛夫（苏联财政部部长）和 В. Н. 基里连科（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主任）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克服通货膨胀措施的材料》，1989 年 12 月 5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289. Л. 72；尼·雷日科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Б. 马斯柳科夫（苏联国家计委主任）、L. 沃罗宁（苏联国家物资技术供应总局局长）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发展和深化根本性经济改革的措施和消除贯彻过程中的不足的建议》。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49. Д. 1. Л. 39～56。

④ А. В. 沃伊卢科夫（货币流通管理局局长）《关于货币流通状况》，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3. Д. 741. Л. 27～31。

1988年春，苏联政府审核旨在改善国民经济的财政状况和加强货币流通的措施方案。预定到第13个五年计划初（1991年）确保经济各部门的财政平衡。为了实现所提出的任务，准备动用补充财政资金，各个部378亿卢布，各加盟共和国580亿卢布。[①]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苏联国家计委主任Б.马斯柳科夫、苏联国家物资技术供应总局局长L.沃罗宁于1988年7月17日致函苏共中央，说明国民经济中出现的财政比例失调的严重性。这对国内局势的发展并未产生实际的影响。纳入计划的1989年预算赤字比1988年更高（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②]

苏联国家银行向政府报告了货币流通领域急剧恶化的状况："据专家估计，70年代初货币的流通数量实际上符合货币周转的需要。1971～1980年期间的货币流通量增加1.3倍，而同期的居民现金收入增长80%……至80年代初，满足居民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方面发生了困难，形成了流通中的货币过剩，为数近190亿卢布。1981～1985年期间，货币流通数量增加34.1%，而居民收入仅增长22.6%，零售贸易额则增长19.8%。消费市场的紧张加剧，尽管不止一次提高零售价格，1986年初过剩的货币估计仍多达290亿卢布。本五年计划的形势急剧恶化。根据估计，1990年居民的现金收入将比1985年增加52.8%，然而零售贸易额的增长幅度却较小——仅为42.5%，其结果是1990年末货币的流通量将比1985年的水平高出90.5%。1990年末流通中的现金余额，据苏联中央银行估计的数字为470亿卢布，而未能满足居民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的总额则为1050亿卢布。"[③] 表5－18便显示了这方面事态的发展。

---

① В.Г.潘斯科夫（苏联财政部副部长）、С.А.西塔良（苏联国家计委副主任）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实施财政制度根本改革、使其转入规范基础的顺序和期限》的建议，1988年4月12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ф.5446.ОП.149.Д.1.Л.149。

②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苏联国家计委主任Б.马斯柳科夫、苏联国家物资技术供应总局局长L.沃罗宁1988年7月17日呈交苏共中央的报告，见俄罗斯国立档案馆ф.5446.ОП.149.Д.1.Л.37～56。

③ А.В.沃伊卢科夫（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致В.Г.库切连科同志函《关于国内的发行政策》，1990年9月18日，见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ф.2324.ОП.33.Д.741.166。

表 5－18　1986～1989 年投入流通的货币量

年　　份	一年中投入流通的货币量（10 亿卢布）	货币投放量每年增长速度（%）
1986	3.9	8.3
1987	5.9	51.3
1988	11.8	100.0
1989	18.3	55.1

注：1986 年的增长速度取 1981～1985 年期间年平均货币投放量 360 亿卢布的相对值。
资料来源：计算所据资料见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3. Д. 741. Л. 165～166。

直至 1988 年末，苏联领导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明白财政体系失调、货币流通和消费市场上商品短缺加剧之间的相互关系。①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国家财政和消费市场崩溃之际。

1988 年秋，国家领导人采取了不再继续开展反酗酒运动的决定。根据食粮销售动态所进行的评估表明，与 1984 年相比，此时苏联的手工酿酒数量已增加 5 倍。这完全可以抵补国家所削减的酒精饮料供应量。②

1988 年初，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致函苏共中央政治局，其中说："分析表明，由于酒精饮料的出售数量大为减少，最近三年期间商业部门的排队现象增加了一半以上……因为少买含酒精饮料而节省了钱，很大一部分居民转而求购食品、服装、鞋类、袜子、文化生活日用品……

① O. 拉齐斯在自己的著作中这样描述与此有关的事件："我与盖达尔一起向戈尔巴乔夫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并附上几篇从杂志上剪辑的引文：最近期间论述这一主题的文章……戈尔巴乔夫对报告深感兴趣，在政治局例会开始时进行了宣读，会议议程上根本没有列出这个问题。讨论持续了两小时，据伊万（И. Т. 费罗洛夫）说，谁也不记得什么时候讨论过财政、预算问题……眼看着我们试图让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本身认清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努力落得一个可悲的命运，我对政府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和尤里·马斯柳科夫感到气愤，深信这些军事工业综合体安插的人会暗中抵制政治局的决定，从而将国家经济引向崩溃。也许当时正是这样，但事情不断变化，是我还没来得及想到的唯一正确的结论：苏联国家机器已丧失履行自身基本功能的能力。甚至当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整个政治局都已洞悉灾难已无可避免时，我们的'泰坦尼克'也不能回避与冰山相撞了。"见 O. 拉齐斯：《精心策划的自杀》，莫斯科政治研究学校莫斯科版，2001，第 195～197 页。

② M. A. 察廖娃：《苏联和芬兰的饮酒习惯》、《饮酒改革的效果：某些社会角度》。1988 年 11 月 1～3 日在巴库举行的国际会议。苏联科学院社会研究所莫斯科版，1988，第16 页。

自1986年下半年起，各地的食粮、糖果（硬糖、蜜糖饼干）、果汁、番茄酱和其他某些可供手工酿酒之用的食品销量猛增。例如，1987年的食粮销售量为928万吨，比1985年增加143万吨或18%，而且目前几乎所有各地都需凭票供应。按照苏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87年手工酿酒消耗食粮140万吨，大约相当于14亿~15亿升家酿烧酒，实际上弥补了减少销售的伏特加烈性甜酒产品。"

1989年，国家领导人对财政状况的担心已广为人知。1989年1月戈尔巴乔夫宣布削减军费开支14.2%（与1987年水平相比）、减少武器产量19.2%的计划。这些措施预定两年中实现。[1] 他在1989年5月30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说："国家仍然入不敷出。本五年计划预算开支的增长速度超过国家收入的增长，因而预算赤字日益增大。这在经济上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不能不视作经济政策的严重失误，对此首先应由苏联财政部及其机关承担责任。基本建设中未完工的工程不仅没有像二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所规定的那样缩减，反而显著扩大——增加了300亿卢布。"[2]

1989年3月15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规定减少苏联国家预算总支出。1989年增加预算收入293亿卢布，1990年增加337亿。决议规定对依靠基本建设统一投资进行的生产建设项目进行限制。国家统一投资额减少75亿卢布。预计增加来自商品流转税的国家预算收入110亿卢布，来自对外经济活动的收入41亿卢布，改变出口和进口结构以提高其效率。[3]

苏联领导人意识到不断增加的财政问题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并认定既使与政治行政精英发生冲突，为害也较小，无须回避。然而所采取的决定远不足以应付当时所面临的巨大问题。苏联领导人甚至在已经意识到他们所遇到的危机的严重性之后，仍未就如何采取措施以把握机会阻止灾难发生进行充分的讨论。

---

① 《关于反酗酒斗争中的某些负面现象》，见《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1期，第48~50页。

② 米·谢·戈尔巴乔夫：《关于苏联内外政策的基本方向》，1989年5月30日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政治书籍出版局莫斯科版，1989，第8页。

③ 《关于1989~1990年和第13个五年计划期间改善经济财政状况和加强国内货币流通的措施》，载于《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5期，第14~16页。

四 苏联经济日益加剧的问题

石油工业部送交政府的文件的基调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安。1989 年 6 月 30 日 B. 丁科夫的函件中说："苏联石油工业部认为有必要向苏联部长会议报告在完成 1989 年规定的向国家石油加工厂和出口提供石油的任务方面本部门所形成的复杂局面。本年度前 6 个月中，对国家的定购量而言，尚有 250 万吨石油未能开采出来，若考虑到统一分配的补充提供量，则是 500 万吨。估计后半年无法足额提供的石油将达 1000 万吨……早在 1988 年后半年，在完成石油开采计划任务的过程中即已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局面……苏联部长会议机械工业委员会曾下达任务，要求会同苏联化工机械工业部采取措施，弥补油田和钻探设备以及 1989 年和 1990 年投产项目配套设施的供应不足，这一任务也未能完成。用新式机械设备对石油工业进行技术装备更新的计划实际上已经中断……苏联国家计委 1989 年 6 月 16 日第 33 号决议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它削减了对石油开采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项目及 1989 年度的物质技术资源限额：无缝电焊输油管 30000 吨，大直径焊接管 18000 吨……总而言之，由于 1989 年的生产计划与基本建设投资和物资技术资源的平衡得不到保证，加之一系列油田开采的产地地质条件急剧恶化，苏联石油工业部估计其石油开采能力为 5 亿 9160 万吨，低于国家规定的定购额 1080 万吨，比连同额外的统一鼓励提供量在内的任务少 1780 万吨。"[①]

自 1988 年末起，经济形势迅速恶化。石油开采量重新开始下降是一个危机的因素。石油天然气工业部于 1989 年 8 月报告苏联政府："本年度形势变得特别紧张，潜伏着种种难以预料的事件。鉴于已经形成的极其严重的局面，苏联石油天然气工业部认为有必要修改上述联合公司石油开采量的国家定购额，予以减少，确定一个需要付出巨大努力但是能够完成的额度。据此，苏联石油天然气工业部请求削减整个部 1989 年石油开采的国家定额 1550 万吨。"[②]

石油开采中日益增多的困难加重了整个经济的危机。苏共中央书记 B.

---

① B. A. 丁科夫（石油工业部部长）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 1989 年向国民经济提供石油的情况》，1989 年 6 月 30 日，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50. Д. 1576. Л. 106～111。

② N. И. 费利莫诺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 1989 年石油开采的国家定购额》，1989 年 8 月 16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 ф. 5446. ОП. 150. ЕД. XP. 1576. Л. 43～46。

梅德韦杰夫这样描述1989年苏联经济的事态发展："……就这个意义而言，1988年在一定程度上算是最后一个顺利的年头。随后极其严重的麻烦便开始了，爆发了真正的危机，首当其冲的是消费市场。它被推向极不稳定的境地，即便偶然发生的小小错乱也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引发投机性的需求。从敞开销售的物品中消逝的时而是食粮和糖果食品，时而是牙膏、肥皂和洗衣粉，时而又是学生练习本、电池和'闪电'牌扣子，更不消说肉、鞋、皮毛制品之类了。经济改革陷入官僚主义的泥潭。六月全会之后在这方面一直没有采取任何重大的步骤……1987年的经济改革计划事实上已被束之高阁，人们越来越难得想到它。最重要的则是，放弃了对货币存量和居民现金收入的监控，以极大的力量驱动着通货膨胀的螺旋不断旋转，往后要让其停止将会愈来愈难。"①

全苏市场行情需求科学调查研究所的调查询问数据表明，1989年末在989种大众消费品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敞开出售而又未严重断货的仅占11%，商店中已看不见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洗涤剂、大部分日用化学品、许多种家具、电熨斗、刮脸刀片、化妆品，1987年还不间断有售的诸如洗涤剂、学生练习本、铅笔、漆布之类的用品，也都成了脱销商品。②

苏联国家银行曾报告过货币流通领域日益增多的问题："1989年货币流通中的困难继续增加：居民的货币收入与支出之间的脱节现象加剧，货币发行量增加，满足居民对商品和劳务需求方面的情况严重恶化，卢布的购买力下降，这些都引发了负面的社会后果。上述困难是由于国家计划的基本任务未能完成从而导致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所造成的。1989年在国家收入、社会劳动生产率、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大众消费品产量等方面都未能完成任务。在这样的条件下，居民的货币收入大大超过计划：预计比1988年增长12.9%，而原来预定的1989年计划差额为1.2%，收入高于计划的金额达570余亿卢布。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用于购买商品和劳务支付的费用增长速度40%。居民1989年以现款、存款、公债券、国内有奖债券等方式拥有的货币资金余额增加619亿卢布，占货币收入总额的

---

① B. 梅德韦杰夫：《在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里——内幕一瞥》，壮士歌出版社莫斯科版，1994，第87、103页。

② A. O. 沃罗诺夫：《关于克服脱销现象的问题和调节消费市场的方法》，载于《经济问题》1990年第1期，第26~32页。

11.1%。居民手中积存的货币资金逐年增加：1988年为418亿卢布或货币收入总额的8.5%，1987年为318亿卢布或7%，1986年为277亿卢布或6.4%，1981～1985年居民剩余的资金则为平均每年17.3%或占现金收入总额的4.4%。居民拥有的货币资金余额的高速增长，是由于商品和劳务不足从而使未能满足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标志。1990年初其数额据苏联中央银行估计将近1100亿卢布，而1986年初则为600亿卢布……1988～1989年国内市场的形势恶化尤其显著，原因是居民现金收入的增长超过大众消费品产量、零售交易额和劳务支出的增长……苏联国家银行并未利用货币发行作为贷款的手段：现行五年计划（1986～1989年）前四年期间对经济的信贷投资总额减少1335亿卢布，其中1989年减少167亿卢布。同一时期银行的资金继续用于弥补国家预算赤字。预算借用苏联国家银行的资金1989年末达3501亿卢布，比五年计划开始时（1986年1月1日）增加2434亿卢布，其中1989年期间即达824亿卢布。国家所欠内债1989年末为4000亿卢布，比1986年1月1日之时增加3580亿卢布，其中1989年即增加880亿卢布。国家支出经常性超过收入是卢布贬值的主要原因之一。"①

连续不断的财政危机在物价固定的情况下尚未导致公开的高通胀率。通货膨胀仅仅表现为消费市场的日益混乱、消费品的严重短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并不理解所发生事情的内在规律。

劳动人民写给苏共中央的信中说："居民供应出了什么问题？日用品都到哪里去了？情况一天天地在恶化。食粮供应定额从每人2公斤降至1.5公斤，我们希望得到原因何在的解释（巴甫洛夫市）。" "……我市的货架上已经见不到肥皂和香皂、洗衣粉。当食粮出现短缺实行票证的时候，我们以理解的态度对待这一决定。可是现在呢，地方政府定了那么少的肥皂和洗衣粉生产定额，我们气愤到了极点。请解释解释，是什么原因使洗涤用品不见了踪影（亚历山德罗夫市）？" "……我没什么东西可供喂养五个月大的叶戈尔卡。无论儿童果汁、果泥还是婴儿用混合营养品，我们城里什么都没有（阿帕季特市）。"②

① 苏联国家银行《关于国家社会经济状况的报告材料》，1990年1月2日，见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3. Д. 741. Л. 54～58。

② 《关于实施根本性经济改革某些问题的劳动人民来信》，载于《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8期，第150页。

政府当局明白消费市场所发生的事情令人十分不安，但显然不知道可以稳定局势的办法。

苏共中央农业部送交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89 年 7 月）中称："最近一段时间莫斯科奶制品、香肠、糖果点心食品的供应情况严重恶化。其中许多物品常常发生数日脱销，品种单调，工厂生产进度遭到了破坏。许多商店的货架一天大多数时间空空如也。"① "尽管对于向国家交售含面筋量高的小麦实行物质刺激，其储备量却仅有 620 万吨，而需求量则高达 1400 万 ~ 1500 万吨。与 1988 年相比，本年度购进的高质量（就谷蛋白而言）小麦减少 80%。在最近 20 年间每五年的小麦收购量大致稳定的情况下（1966 ~ 1970 年为 9000 万吨，而 1985 ~ 1988 年则为 8500 万吨），面包用小麦的储存量从 4100 万吨减少至 2400 万吨，硬粒小麦则几乎减少 200%（从 300 万吨减少至 110 万吨）。"② "共计少收粮食 4370 万吨。"③ 表 5 - 19 所显示的是 1988 年的国家粮食储备状况。从这时候起，粮食危机变得愈来愈尖锐。

表 5 - 19　1988 年加盟共和国完成国家粮食定购任务的情况

国家	1988 年国家定购量（千吨）	1989 年 1 月 1 日的储备在内（千吨）	完成计划的（%），不包括借出的	储备量			1988 年为 1987 年的（%）	1986 ~ 1988 年为 1981 ~ 1985 年的（%）
				1987 年（千吨）	1987 ~ 1988 年的年平均数（千吨）	1981 ~ 1985 年的年平均数（千吨）		
苏联	85721	61375	70	73089	71084	66643	84	107
俄罗斯	47000	29165	60	34909	35385	35002	84	101
乌克兰	17500	17321	98	18057	16866	13367	96	126
哈萨克斯坦	16400	9749	58	14601	13678	12625	67	108

资料来源：M. Г. 舍卢季科：《关于 1988 年和第 12 个五年计划前三年期间苏联粮食部完成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总结》，1989 年 1 月 26 日，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8084. оп. 19. д. 4393. л. 269。

① 党中央农业部呈交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关于莫斯科市的食品供销状况》，1989 年 7 月 10 日，载于《苏共中央公报》1989 年第 9 期，第 91 页。

② 《粮食进口：老问题和新问题》，1989，第 2 页。

③ M. Г. 舍卢季科：《关于 1988 年和第 12 个五年计划前三年期间苏联粮食部完成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总结》，1989 年 1 月 26 日，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8084. оп. 19. д. 4393. л. 252、253。

粮食部呈交政府的报告中称："根据1989年1月1日的情况，共有6130万吨粮食进入国家储备，而原计划为8570万吨。国家计划的30%未能完成，其中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未完成额为40%，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42%，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52%。与1987年的水平相比，储备量减少1190万吨或16%，其中小麦储备量减少21.7万吨，黑麦储备量减少86万吨，荞麦储备量减少17.9万吨，黍米储备量减少55.1万吨，豆类储备量减少45.8万吨，大麦储备量减少718.6万吨，燕麦储备量减少92.8万吨……许多州的生产单位还有大量已经脱粒的谷物，却发生了不肯出售给国家的事情。"[①]

1989～1990年的苏联贸易平衡危机还应加上一个变数——全世界谷物的收获量都很低，世界的需求量超过供给量，形成了卖方市场。小麦价格的上涨尤其迅猛（表5－20）。

表5－20　1987～1990年国际市场小麦价格

年　份	1987	1988	1989	1990
年平均价格，（2000年美元/吨）	133	176	207	178

注：国际市场价格取美国、澳大利亚和阿根廷提供的平均价格。

资料来源：计算据国际金融组织《国际金融统计》，2005。

两封致政府的公函清楚地描述了粮食供应的状况："由于饲料谷物出现紧张状况，我们特提交提前对这几种谷物1989年收获量所进行的估算，从上述估算中可以看出，本年度收成中尚缺307万吨饲料谷物……考虑到上述情况，有必要迅即解决从国外购买饲料谷物的问题。"[②] 苏联商业部报告，苏联国家计委（1988年12月31日第115号决议）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减少了1989年的整个市场储备，其中包括上半年在内，面粉减少126.6万吨，谷物原粮51.9万吨。进行削减的结果，上半年的市场储备

① M. Г. 舍卢季科：《关于1988年和第12个五年计划前三年期间苏联粮食部完成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总结》，1989年1月26日，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8084. ОП. 19. Д. 4393. Л. 252。

② 《苏联粮食部部长 A. Д. 布德卡致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B. B. 尼基京同志函》，1989年8月11日，No. 120－272，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8084. ОП. 19. Д. 4421. Л. 244。

中面粉为1508.4万吨，比1988年上半年的实际消耗量低39.5万吨（2.6%），谷物原粮为188.1万吨，比1988年同期少31.4万吨（14.3%），若不将莫斯科、列宁格勒及其他一些集中用粮大户计算在内，则大大低于去年的水平（面粉少55.6万吨，谷物原料少33.7万吨）。在蔬菜产品不足和某些食品短缺的条件下，居民的粮食产品消费需求一直居于高位，1988年第4季度与1987年同期相比，在乌克兰、格鲁吉亚、拉脱维亚、吉尔吉斯、塔吉克、亚美尼亚等加盟共和国和达吉斯坦、北奥塞梯、车臣—印古什、乌德穆尔特等自治共和国以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莫斯科、加里宁、加里宁格勒等州，面粉的消费增加1.5%~8%，全苏联范围内谷物原粮的消费增长3.6%，在许多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州的增长高达35%。[①]

在乌克兰，该共和国数十年来一直是国家储备粮的最大供应者之一，现在粮食收购的状况却很困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已向苏联部长会议汇报了共和国内可能发生的面粉和谷物产品的问题。[②]

苏联商业部副部长П. 康德拉舍夫致苏联部长会议的信函（1989年7月）中称："本年度第2季度谷物产品供应紧张。上述期间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内的消耗量都超过所拥有的存储量，即使考虑到经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粮食部批准预拨到下半年储备项目下的42万吨面粉和19.5万吨谷类原粮也无济于事……城市和农村地区都出现了面粉脱销。"[③]

粮食危机是在对居民的大众消费工业品供应状况持续恶化的背景下爆发的。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主任于1989年10月向苏联部长会议报告说，第1季度批发和零售贸易的商品储备减少5%。本年度10月1日的储备量较之规定的数额低17%。尽管由于进口的肥皂和洗涤剂增加4.5倍后商业

---

① П. Д. 康德拉舍夫（苏联商业部副部长）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1989年上半年居民谷物产品供应所出现的形势》，1989年1月13日，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8084. ОП. 19. Д. 4421. Л. 32。

② Е. 卡恰洛夫斯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补充1989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面粉和谷类原料市场储存量不足的情况》，1989年1月23日，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50. Д. 653. Л. 11~13。

③ П. Д. 康德拉舍夫（苏联商业部副部长）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增加1989年第3季度谷物产品的市场储备》，1989年7月13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50. Д. 653. Л. 31。

部门的投放量比去年多出29%，大多数地区的肥皂仍需凭票购买。合成洗涤剂短缺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居民的烟草制品供应问题也日趋严重，各地的市面上都出现了断货现象。①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领导人颇难作出轻重缓急的抉择，是将日益迅速减少的外汇储备用于进口粮食呢，还是用来争取稳定非食品类消费品供应状况，孰轻孰重殊难决断。下列所引文件对此作出了解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1989年10月）称："消费者感到很难买到的依旧是肉制品、动植物油、糖果食品、食粮和茶叶。高级和上等面粉、谷类粒粮、蔬菜水果、鱼和鱼制品、烟草制品等的供应状况亦已恶化。一大批非食品类商品的生产和市场供应形势十分紧张，其中包括纺织品、鞋类、儿童连袜裤、学生练习本、木材和建筑材料、火柴。"②

1989年末，财政危机所引发的问题和随之而来的威胁已被国家领导人充分意识到，成了公开讨论的话题。1989年11月苏联政府向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称："所有这一切都转化而为国家财政、货币流通和消费市场的严重混乱。本五年计划前三年期间预算资金的增长主要依靠贷款来保证。1988年的预算在总支出较1985年增加730亿卢布的情况下，其收入实际上固定未变。1989年的国家预算赤字为920亿卢布，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货币发行量猛增，本年度为180亿卢布，相比之下，1985年则仅为40亿卢布。愈来愈多的商品出现了短缺。卢布贬值，已无法发挥流通手段的功能，无法正常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进程服务。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外债不断增加，尤其是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债务，本五年计划期间共增加了将近180亿卢布。"③

从所引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当时政权机关终于明白了消费市场和国家财政领域所形成的局面的尖锐性。不过另外一点也很清楚：文件的作者们显然不知道为了制止危机爆发应当做些什么。1989年年中时苏联的信用等级已

---

① B. H. 基里连科（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主任）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本年度1~9月日用大众消费品生产和供应任务的完成过程》，1989年10月10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50. Д. 228. Л. 80、90、92。

② 1989年10月11日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关于1989年日用消费品生产和供应任务的完成过程》，俄罗斯联邦国档案馆 ф. 5446. ОП. 150. Д. 288. Л. 113。

③《关于改善经济的措施、经济改革的阶段和制订第13个五年计划的原则态度》，苏联政府向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莫斯科版，1989年11月，第5页。

经不如从前，但如上所述，仍旧颇高。然而在此之前苏联债务的快速增长和欠债额中短期信贷的份额之高（114亿美元）早已令西方分析家感到不安。他们估计，苏联1988年必须偿外债83亿美元，1989年则为88亿美元。①

从1989年年中开始，苏联外贸机构所签合同的支付能力和拖欠商品贷款的问题，对于与苏联有着悠久贸易关系的西方大公司已变得显而易见。②

在艰难的对外经济形势下，抓紧回收苏联以优厚条件为卫星国提供的贷款的工作似乎是一种明智的做法。然而真要这样去做却不可能。1989年8月2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中便说："在国家贷款（官方债务）方面，苏联作为债权国的根本利益与发展中国家的欠债密切相关……这类债务1989年1月1日已达610余亿卢布（占整个'第三世界'的苏联债务的85%左右），其中属于越南、古巴、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蒙古等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超过320亿卢布……考虑到我们的合作者的实际支付能力状况，苏联不得不定期减轻它们的债务负担。单是在最近一个时期，便已商定将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越南、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利比亚、蒙古和尼加拉瓜所欠我国的部分应付款由1989～1990年往后延期，总金额超过70亿卢布。由此可以看出一种倾向：我们的'第三世界'朋友们将自己所欠西方债款的支付置于优先地位，却认为与我们随时都好商量。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我们以往总是准备对它们的欠债作出通融所造成的，我们首先是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而对互惠经济合作发展的利益却未作应有的考虑。"③

1989年末～1990年初，苏联对外贸易机构在日益严重的货币危机影响下，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大量地违反已签订的和正在执行的合同的付款期限。国家粮食和采购委员会副主任Б. 鲍里索夫致苏联政府副主席С. 西塔良的信函中说："最近期间发生的苏方不断拖欠已发运的进口商品货款事

---

① Н. В. 加列托夫斯基（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主任）致苏联部长会议函《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状况概述（据1989年初的情况）》，1989年7月13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50. Д. 73. Л. 75、76。

② M. I. 戈德曼：《改革出了什么毛病》，W. W. 诺顿公司纽约、伦敦版，1992，第159、160页。

③ 引自呈送苏共中央的报告《关于调整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的刚果人民共和国除外）债务以强化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在联合国讲话中所阐述的立场的建议》，见1989年3月23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摘要。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9. Д. 23. Л. 3、4。

件，导致许多已签订的合同继续向苏联发货的工作已经中止。计有金额为7440万卢布的21.16万吨植物油、金额为1亿6090万卢布的17.71万吨肉和肉制品、金额为7870万卢布的6.65万吨可可豆和可可食品、金额为3940万卢布的4.55万吨黄油、金额为710万卢布的3万吨大豆油粕、金额为1430万卢布的2.04万吨屠宰牛、金额为2690万卢布的1.99万吨茶叶、金额为6930万卢布的各种儿童食品、金额为730万卢布的30亿支供烟草工业用的醋酯过滤嘴——总金额达4亿7830万卢布……按照所签合同尚未支付完毕的总值4亿7830万卢布的食品的发运，只有在付清已经向苏联供货的金额为2亿3700万卢布的食品款条件下才能进行，因此，总共应当支付进口食品货款7亿1560万卢布。”①

本国产品仅能满足苏联药品需求的40%～50%左右。苏联货币危机对保障居民用药的影响，苏联和外国专家都视作最危险的潜在问题。因此，将外汇资金用于购买药品被认为是应予优先选择的方向。但是在外汇日益短缺的条件下，也对此无能为力。

苏联医疗工业部部长B. 贝科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C. 西塔良的信函中说：“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90年3月10日关于确定外贸机构根据轻重缓急偿付外国公司账款的决定，苏联医疗工业部特报告，苏联对外经济银行至今未能提供所划拨的资金，以用于支付在以可自由兑换货币结算国家购买的药品和材料。医疗外贸联合公司拖欠外国公司的债款，以可自由兑换货币计算，1990年4月1日为4341.83万卢布（附证书）。对于逾期支付货款，外国公司通常都提出罚款要求，而其中许多公司现在已宣布中止按所签合同提供药品。此外，在签订苏联卫生部1990年采购奇缺药品合同时，外国公司都要求改为交纳预付款或以信用证方式结算，要么就需提供银行担保，但苏联对外经济银行却拒绝了这几种支付方式。”②

中断进口合同加重了消费品的短缺，其中包括食品。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物资技术供应总局副局长C. 伊万诺夫致苏联政府副主席C. 西塔良的

① Ю. А. 鲍里索夫（国家粮食和采购委员会副主任）致C. A. 西塔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函《关于进口食品的支付》，1990年5月30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ф. 5446. ОП. 162. Д. 1495. Л. 65。

② В. А. 贝科夫（苏联医疗工业部部长）致C. A. 西塔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函《关于以可自由兑换货币采购药品的付款》，1990年4月11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ф. 5446. ОП. 162. Д. 1492. Л. 32。

信函中说："由于分配给莫斯科市执委会的1990年食品配额进口计划未能完成，目前出现了极为困难的局面，已难以履行向莫斯科商业机构和企业提供面包、糖果制品、油漆颜料产品的国家订货合同义务……为了避免无法完成所规定的1990年的计划任务，莫斯科苏维埃执委会请求获得有利于进口采购上述食品原料的决定，或者指示苏联部长会议国家食品及采购委员会向莫斯科供应实实在在的国内产品。"①

1990年初，苏联经济状况的灾难性已显而易见（见图5-1至图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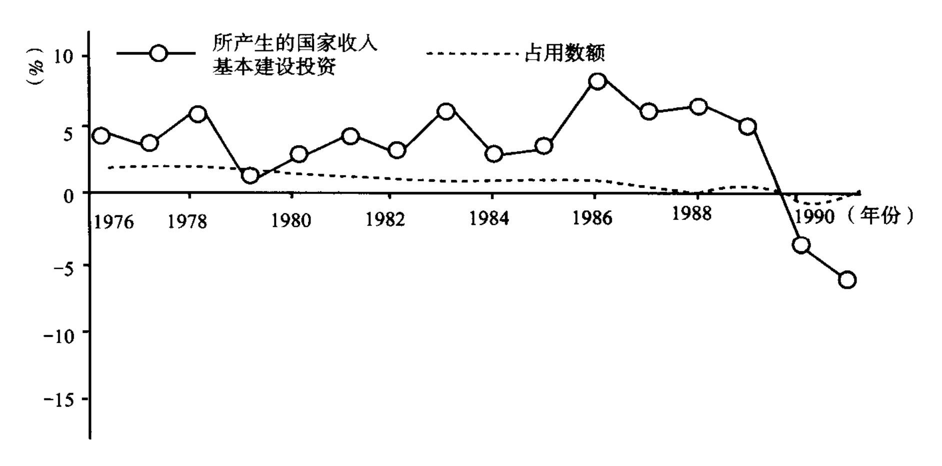


图5-1 1976~1991年期间的经济发展动态（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1991年的俄罗斯经济——趋势和前景》，经济政策研究所莫斯科版，1992年1月，第24页。

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储蓄银行向政府汇报说，吸收居民存款达到创纪录的规模："苏联储蓄银行机构本会计年度吸收存款、证券和货币实物、奖彩票共465亿卢布，超过本年度居民货币收支计划平衡预计数额235亿卢布。对居民资金如此积极地进入银行机构产生影响的，是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速度（640亿卢布或12.9%）超过了用于商品和劳务支出的增长（9.1%）。本五年计划的整个4年之中，按存款计算的居民多余资金增加

① C. 伊万诺夫（莫斯科执行委员会物资技术供应总局副局长）致C. A. 西塔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函《关于充分供应莫斯科市执委会1990年的食品原料》，1990年8月6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500. л.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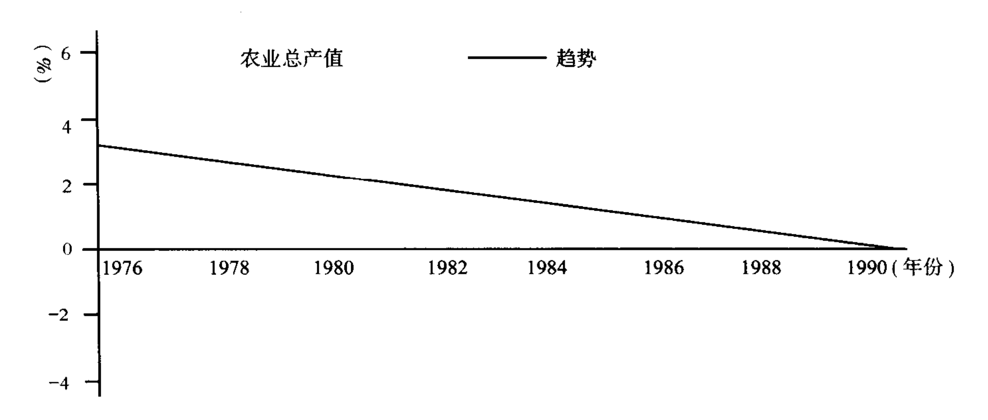


图 5-2　1976~1991 年的农业生产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1991 年的俄罗斯经济——趋势和前景》，第 2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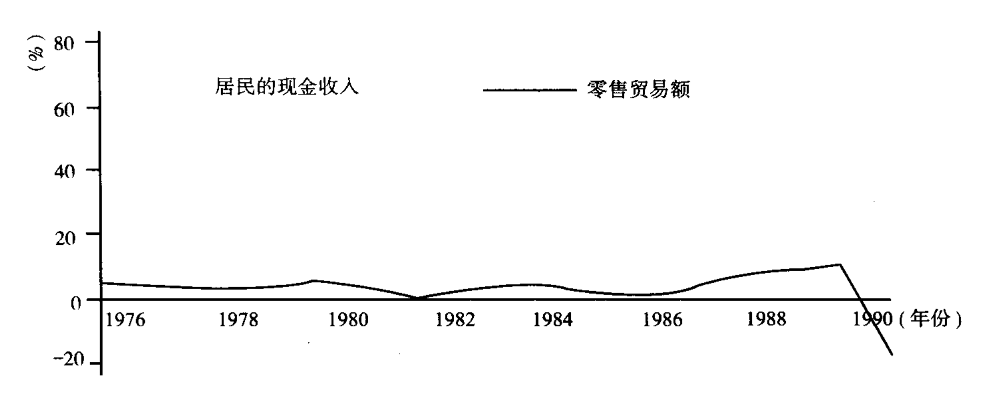


图 5-3　1976~1991 年居民货币收入增长速度和零售贸易额动态

资料来源：《1991 年的俄罗斯经济——趋势和前景》，第 28 页。

1171 亿卢布，亦即 53%。造成如此之高的储蓄增长速度的原因，是居民的货币收入已增长 32.7%，而用于购买商品和支付劳务支出仅增加 23%。1986~1989 年居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7.3%，用于购买商品和支付劳务支出的增速为 5.5%，存款的增速则为 22.2%。从表 5-21 的数据可以看出，储蓄银行机构在确保吸收居民资金和通过苏联国家银行将其用于苏联部长会议确定的目标方面，已超额完成了计划。"①

① 《1989 年苏联储蓄银行工作总结》，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3. Д. 721. Л. 1а、2、4。

表 5-21　1989 年期间苏联储蓄银行执行信贷计划的结果

单位：10 亿卢布

	截至 1989 年 1 月 1 日	截至 1990 年 1 月 1 日		偏离计划	
		经过修正的计划	实际情况	金　额	%
1	2	3	4	5	6
资　金					
银行基金	0.87	0.75	0.93	+0.18	23.7
居民存款和民众结算账户	297.84	331.09	341.17	+10.08	3.0
机关单位活期账户上的资金和其他资金	3.16	2.64	7.12	+4.66	190.1
合　计	301.87	334.30	349.22	+14.92	4.5
资金的增长					
短期信贷投资	0.26	0.30	0.28	-0.02	-4.7
长期信贷投资	4.73	6.11	6.07	-0.04	-0.7
银行的基本金和其他资产	2.30	1.00	4.37	+3.37	340
国家银行中的同业往来账户	294.58	326.89	338.50	+11.61	3.6
合　计	301.87	334.30	349.22	+14.92	4.5

资料来源：《1989 年苏联储蓄银行工作总结》，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3. Д. 721. Л. 3。

关于预算、货币流通和消费市场状况之间的紧密联系，在 1980 年代中期对于国家领导人还那般神秘莫测，至 1990 年初却已经了如指掌。苏联国家银行行长 B. 格拉先科致函最高苏维埃（1990 年 4 月）称：“消费市场满足居民需求的形势仍然极为紧张。许多食品供应不足，首先是畜牧业产品、鱼类、糖果食品、茶叶、土豆、蔬菜、水果。集体农庄市场的农产品价格显著上涨：1990 年 1～2 月份较 1989 年相应时期上涨 14%。”①

① B. B. 格拉先科致苏联最高苏维埃函《关于完成 1990 年第一季度苏联综合现金计划的总结》，1990 年 4 月 6 日，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3. Д. 741. Л. 24。

五　货币危机

1989年春，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管理局局长Ю. 莫斯科夫斯基报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称，苏联不断增加的债务日益成为西方报刊密切关注的目标，而对外经济银行的行动则受到实业界和银行界的细致分析。结果向苏联提供新贷款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心存戒备。[①]

对外经济银行管理局局长致政府函（1989年8月）中称："最近一个时期，许多银行和金融公司的代表在与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的会谈中表达了一种想法，即债权人对于向苏联提供外汇资金似乎已显露出态度日渐警惕的趋势……此外，联邦德国的某些银行（德国合作银行、最佳德意志地方银行、北德意志地方银行等）已开始拒绝向投资性商品进口提供新贷款，其理由是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的此类业务额度似乎已经用完。同时还发表声明，从中可以得出结论：苏联的信贷风险已被认为高于正常水准。"[②]

苏共中央国际政治委员会1989年3月28日的会议材料中记载："В. М. 卡缅采夫：现行五年计划前三年可自由兑换货币收支平衡的逆差增大了一倍以上……供应国外市场的机器设备种类在缓慢地恢复和扩大……1986~1988年期间因苏联商品质量低劣提出的索赔要求超过一百万次，未能足额供应的出口产品达160亿卢布。1988年的出口计划仅完成54%。结果，可自由兑换货币的结算情况十分紧张。债务超过商品出口的年度收入两倍有余。支付利息即需耗费将近20亿卢布，超过石油出口所获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全部进款。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结算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我国对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都出现了贸易平衡赤字……Б. И. 戈斯捷夫：国家债务的增长已达到危急的程度。收支平衡赤字高达110亿卢布，而1976年仅为10亿卢布。如果不能使对外贸易保持平衡，就谈不到任何发展。客观的原因是我们所出售的产品价格暴跌。石油价格

---

① Ю. С. 莫斯科夫斯基（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管理局局长）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函《关于在联邦德国市场发行有券公债的情况》，1989年3月22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50. Д. 73. Л. 53。

② Ю. С. 莫斯科夫斯基（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管理局局长）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函《关于向苏联提供贷款的情况》，1989年8月8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50. Д. 73. Л. 55。

从每吨125美元跌至每吨45～50美元，为此本五年计划之内我们便损失了将近400亿外汇卢布……目前的情况是，我们须将出口所获得的全部可自由兑换货币进款用于偿还外债。”①

1990年初对外经济银行暂停支付进口计划这一事实，着实让苏联高层官员们更加感到惊讶：“苏联对外经济银行自本年度1月18日开始停止用可自由兑换货币向外国公司支付其交付的有色和黑色冶金工业产品的货款。根据今年2月16日的情况，已形成逾期未偿付的债务额达2亿2330万卢布（有色冶金产品方面6630万，黑色冶金产品方面1亿5700万）。此外，本季度末还应当支付3亿1370万卢布（有色冶金产品8070万，黑色冶金产品2亿3300万）。因此，除已支付者之外，今年第1季度还应支付已发运产品货款5亿3700万卢布。”② 对外经济联络部实行关于本部联合公司在已签订和履行合同债务方面的业务汇报。至1990年5月底，在可自由兑换货币方面的债务额高达7亿6710万卢布。③ 1990年秋初对外经济联络部各对外联合公司逾期的可自由兑换货币债务总额已超过11亿卢布。④

政府部门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分配外汇储备，让对外经济银行发放信用证，以便履行进口合同。苏联对外经济银行领导人遭遇尖锐的货币危机，不得不向政府报告外汇业务方面的情况：“吸收中期财政资金方面的工作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国外债权人对于向苏联提供资金尤其是不受约束的资金的消极态度日趋严重，拒绝先前曾表示愿意提供的贷款的事例不断增多。困难情况已报告苏联部长会议（我部1987年7月14日的第1860号文、1989年7月27日的第2019号文、1989年8月15日的第2231号文及1990年1月15日的第106号文）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

① 苏共中央国际政治委员会会议材料《改组对外经济联系》，1989年3月28日，载于《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7期，第38、49、50、53页。

② A.И.卡恰诺夫（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按照1990年资源进口限额进口的黑色和有色冶金商品的支付》，1990年2月21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ф.5446.ОП、162、Д、1465.Л.18。

③ K.Ф.卡图舍夫（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致C.A.西塔良函《关于苏联全俄贸易联合公司拖延支付的情况》，1990年5月28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ф.5446.ОП.162.Д.1463.Л.106。

④ B.H.沃龙佐夫（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致C.A.西塔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函《关于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全俄贸易联合公司拖延支付的情况》，1990年9月14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ф.5446.ОП.162.Д.1464.Л.110。

(我部 1989 年 10 月 27 日的第 2823 号文和 1990 年 3 月 1 日的第 487 号文)。去年年中吸引金融贷款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当时由法国巴黎国民银行组织了一次国际财团向苏联对外经济银行提供为数 1 亿 5 千万美元中期金融信贷的活动。应邀参加的 300 家外国银行中，仅有 5 家同意提供总共 2900 万美元的贷款……同样，1989 年末与英国最大的威斯特敏斯特国民银行关于为数 3 亿美元贷款的谈判亦已中断。试图恢复谈判的努力未获成功。1989 年还同英国米兰德银行进行了关于苏联对外经济银行发行为数达 3 亿英镑有券公债的谈判……原定于 1989 年 11 月 20 日发行债券，但在签字的前一天这家外国银行却将发行时间不定期推延……1989 年夏季开始与德意志银行、法兰克福美茵银行进行关于发行总额为3 亿 ~5 亿美元有券公债的谈判……苏联最大的英国债权人之一摩根・格伦费尔银行在 1989 年期间应我方请求，仔细研究了发行苏联对外经济银行金额达 5 亿美元中期债券的可能性。尽管已经制定了文件和条款，去年 11 月在莫斯科进行的漫长谈判期间这家银行还是最终拒绝了这项交易，声称'西方银行对苏联的信任已急剧下降'。该银行回避继续进行谈判。1989 年末 ~1990 年初，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一些专门从事有券公债配置的金融公司进行了关于发行不同数额债券的谈判（总金额近 20 亿卢布)，然而后来却遭到它们的回绝。这都是一些在资本市场上享有很高职业声誉的公司：Креди Суисс ферст Бостон，Голдман Закс，Ширсон Леman хаттсн，ЮБС филлипс，знд Дpro 等等。现在其中某些公司指出，苏联吸引金融资金目前只有用具体的资产（黄金、石油）做抵押方有可能……1989 年在所提供的中期金融贷款大大减少的条件下，资金的增长主要以短期为基础（通过国际银行存款的方式)。结果我行依赖这种方式已到了危险的程度——靠其吸引的金融资金超过 50%……关于短期资金大规模地骤然流失的现实可能性，我们在 1989 年 8 月 15 日的第 2231 号公文中向苏联部长会议作了报告。自 1 月末至目前未能续约的超过 15 亿卢布，而且根据我们估计，大约 85 家签约银行已暂停向苏联对外经济银行提供短期资金。存在着进一步收回资金的现实危险，仅在本年 5 月末之前即不能排除多达 2 亿 ~3 亿卢布不能再续约的可能性。"①

① Ю. С. 莫斯科夫斯基（对外经济银行管理局局长）致 С. А. 西塔良（部长会议副主席）函《关于苏联对外经济银行 1989 年末 ~1990 年初吸引金融（游离）资金的工作情况》，1990 年 4 月 25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463. л. 110 ~114。

西方银行一再劝告苏联签约方直接向西方国家政府请求给予财政支持，它们解释说，继续增加商业性贷款希望渺茫甚或毫无可能。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西塔良十分了解外汇储备和收支平衡状况的危急程度，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汇报说："按照您从波恩发来的电报的嘱咐，在卡图舍夫、格拉先科、莫斯科夫斯基、霍缅科、西特宁等同志的参与下，我们针对从欧洲共同体国家首先是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可能还有英国等各国政府获取金融贷款的问题，分析了我方可能采取的步骤。据来自联邦德国的信息，德意志银行的领导人建议直接向上述国家的政府提出提供贷款的请求。德意志银行认为，如果以您这样的级别提出请求，可能会有效果。考虑到德意志银行的建议以及这些政府的足以信任，应利用爱·安·谢瓦尔德纳泽同志的波恩之行，争取与赫·科尔及英国和法国部长们会晤时专门提出这个问题，并摸清科尔及其欧洲共同体同僚对待您请求提供贷款的态度。"①

世界最大的多家商业银行的代表 1990 年 6 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会议上发表意见认为，继续向苏联提供贷款只有在西方主要国家政府的参与下才有可能，而不是在私人银行的层次上进行。② 这一情况，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管理局局长于 1990 年 6 月 14 日向苏联政府作了汇报。③

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卡恰诺夫致函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罗宁（1990 年 10 月）称："据来自苏联大使们的信息，大多数西方国家提供贷款都同时提出，要尽快采取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切实可行的方案，签订明确划分中央政府和各加盟共和国权限的联盟条约。看来，在这些措施落实之前，西方对于向苏联提供新的贷款将会持冷淡态度。现在西方强硬地提出要苏联机构按已履行的合同支付西方公司所提供商品的贷款问题。"④

---

① С. А. 西塔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致尼·伊·雷日科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函，1990 年 5 月 3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464. Л. 82。

② 《银行家们在向苏联提供贷款的问题上持谨慎态度》，载于《国际先驱论坛报》1990 年 6 月 5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464. Л. 76。

③ Ю. С. 莫斯科夫斯基（对外经济银行管理局局长）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西方实业界对待向苏联提供资金的态度》，1990 年 6 月 14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464. Л. 74。

④ А. И. 卡恰诺夫（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致 L. A. 沃罗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函《关于国外采购的额外能力》，1990 年 10 月 25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465. Л. 67。

1990年7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日列兹诺沃茨克发表讲话时，对于苏联延期偿还债务的必要性出言不慎。不出所料，金融市场的股东们认为这证明苏联领导人是蓄意中止偿付外债。这位苏联领袖的言论引发了金融市场的恐慌。这一表态之后，英格兰银行立即将苏联列入不可靠债务国名单。①

苏联国家银行这时提醒苏联政府注意官方提出调整债务问题的后果，建议尝试以国家黄金储备担保举债。苏联国家银行行长格拉先科致函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西塔良称："在贯彻大力改善国家外汇状况一系列既定措施的过程中，苏联国家银行可以会同苏联财政部，与一系列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以及国际结算银行进行谈判，吸引为期2~3年的金融信贷作为折中性的资金供给，这在稳定苏联外汇状况时期是必要的。在现有条件下，唯一有效的借贷方式可能只有以苏联国家银行和苏联财政部的名义用黄金作抵押吸引贷款……80年代被迫走上这条道路的国家（墨西哥、巴西和拉丁美洲的其他许多国家，还有波兰和南斯拉夫）的经验表明，债务国官方提出请求延期清偿外债，对该国有着不利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实际上会被视作承认该国完全没有支付能力。因此我们认为，苏联'调整'外债是一种不可行的措施，会给国家带来规模难以预料的经济和政治损失。"②

为1990年5月谢瓦尔德纳泽与科尔会谈准备的备忘录中说："当前由于苏联在可自由兑换货币方面的结算失去平衡，国家痛感保证不间断支付的资金不足，在国家义务方面如此，在已签订的苏联进口商品合同方面也是如此。正因这样，现在已经拖欠外国商行和公司相当一大笔款项（不瞒您说，大约20亿卢布）。尽管对外经济银行仍在按时履行偿还贷款和支付利息的义务，但仍然引起资金从它的账户中加速流出，并为西方合作伙伴提出我国支付能力不足提供了口实。同样这也使我们失去了吸引足以保证1990年计划从外国银行获得需要数量资金的可能性……在今年4月27日举行的对外经济银行代表与德意志银行的会晤过程中，后者的领导认为宜于在最短期间内举行苏联政府与欧洲共同体国家首先是联邦德国、法国、

① C. A. 西塔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致尼·伊·雷日科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函《关于米·戈尔巴乔夫就债务延期必要性的表态》，1990年7月31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461. Л. 14。

② В. 格拉先科（国家银行行长）致 С. А. 西塔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函《关于在政府基础上吸引中期财政资金的可能性》，1990年4月4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464. Л. 80、81。

意大利，可能还有英国政府间的谈判，商谈获得国家担保的问题，有了这种担保，相应国家的银行就会准备提供金融信贷，以弥补苏联的收支平衡赤字并为继续改革苏联经济的措施提供经费……这里所说的可能是一笔总额达200亿马克（70亿卢布）为期5～7年的款项。”①

六 货币金融问题背景下的经济政治自由化

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化，对货币金融危机的控制——这都是对苏联命运具有原则性重要意义的问题，但又各不相同。自由化在高教育水平的、城市化了的国家无可避免。有必要进行讨论的问题只是其时机和形式。

不仅对保留苏联现有经济制度，而且对保留其现有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出质疑的第一份著名的官方文献，是1985年12月A. 雅科夫列夫致米·戈尔巴乔夫的那封信件。信中说道：“如今问题已不仅仅在于经济——这是进程的物质基础。关键在于政治制度……由此就需要有……彻底完全的（与每一阶段具体的历史可能性相适应的）民主主义……民主——这首先是选举的自由。我国却缺少选择，只有集中……如今我们完全不理解已经发生并且历史无可避免的一个转变过程，即从没有选举或不可能进行选举的历史时代，转变到没有每个人参与的民主选举就不可能成功发展的时代。”②

在1986年9月25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维·切布里科夫提出首先释放1/3、然后释放一半政治犯的合理性问题。③国内政治局势开始变化的最初征兆，早在国家政权机关清楚地发出它准备实行类似的变革之前便已经出现。1986年5月13日，电影工作者协会不顾固有的传统，改选了苏共批准的领导人。戏剧家协会也如法炮制。接下来已经是行政当局批准的文学杂志的干部更替，这些杂志于1986年夏秋季

① 《供爱·谢瓦尔德纳泽与赫·科尔会谈之用的备忘录》，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464. Л. 83、84。

② A. 雅科夫列夫：《记忆的深渊·从斯托雷平到普京》（两卷本）第1卷，瓦格里乌斯出版社莫斯科版，2001，第372页。

③ 1986年9月25日政治局会议的工作记录《关于因政治罪服刑的人》，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36. Д. 20. Л. 2。

为发表先前被禁的文学作品开辟了道路。

1987 年 1 月 27 ~ 28 日举行了苏共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中说："……同时我们也看到，朝向好的方面的变化发生得很缓慢，改革事业处于更为困难的境地；社会已累积的各种问题的原因，比你我先前所想象的更为深刻。我们的改革工作越是深化，其宏大的规模和意义便越是变得明显，继承自以往的所有尚未能解决的新问题悉数暴露了出来……总之，同志们，确乎有必要重新分析党和苏维埃社会近来所遇到的、在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之前所发生的各种问题。"① 雷日科夫在同一次全会发表的意见更加明确："……四月全会之后所经历的一年半时间表明：我国社会所形成的状况，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实际上比当时所想象的要复杂和危险得多。"②

梅德韦杰夫的文章谈到了 1987 年在决定国家社会政治改革战略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事件："广泛流传甚而一致公认的看法是，改革开始于 1985 年 4 月。如果就表达一种理念、宣示某些意图而言，这当然是对的。而事实上的改革开端则出现得要晚一些——是在 1987 年。1987 年的转折性质是党和国家生活中三个最大的里程碑所决定的。这就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给予发轫性推动作用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这就是制定了经济改革综合方案的中央委员会六月全会。这当然也是十月革命 70 周年，由于这个节日而对苏联历史最重要的各个阶段进行了重新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意识形态状况。"③

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缺乏效率，因而这种制度的瓦解就总体而言无可避免，与石油价格下跌所引发的短期尖锐问题并无直接的关联，要想调节收支平衡危机必须选择有利于深入改革的经济和政治方针。可以争取统一解决这些问题，但不能期望仅靠自由化本身便足以战胜货币金融危机。1987 年苏联领导人选择了经济和政治自由化路线，在他们并未做好控制尖锐的货币和金融危机准备的条件下，这种选择对事件发展的方式、对苏联经济如何崩溃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① 1987 年 1 月 27 ~ 28 日的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5. Д. 45. Л. 3。

② 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2. ОП. 5. Д. 45. Л. 22。

③ В. А. 梅德韦杰夫：《在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里——内幕一瞥》，壮士歌出版社莫斯科版，1994，第 42 页。

从政治的观点着眼，当时所采取的决定，其逻辑并不难理解。既然稳定经济所必需的措施极不受欢迎，引发了社会公众和精英阶层的不满，既然对新领导人作为的不满情绪在增长，而且又处于消费市场日益混乱的背景之下，那么，就应当提出一套广受欢迎的措施，以显示政府有先见之明，懂得应当将国家引领到何处去。因此在 1987～1988 年便出台了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路线，旨在取代那些困难重重不得人心的措施，开辟政权合法性的新源泉。

关于如何改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辩论自 1960 年代初期即已开始进行。至 1980 年代中期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针对这一制度的激进改革措施遭到禁止。"市场经济"这一词语就苏联而言，即使是套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帽子，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也已不复提及。1970 年代初"改革"一词首次在公开文件中、1986 年又在戈尔巴乔夫于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讲话中加以使用，不过都极为小心翼翼。意识形态的限制取消之后，那些从前只是在私密谈话中讨论的思想已成为公开辩论的话题。对大多数参与讨论的人而言，应当做些什么是很清楚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对劳动的激励，提高利润的作用，从经理计划转向国家订货制度。这一系列想法在有影响力的经理阶层中得到广泛的支持。困难的是，市场取向的重大进展即便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与保留共产党权力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其首要条件必须做到能够平衡需求和供给的价格。[①] 不能平衡这两关，市场机制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往往根本不起作用。波兰 1970～1980 年代的经验便显示了这一点：试图将稳定的价格与扩大企业自主权相结合的尝

① 关于苏联领导人、负责经济政策的机关 1989 年在是否应当进行价格制定方面改革的动摇，关于苏联领导人不愿承担这一艰难决定的责任，见 B. 梅德韦杰夫：《在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里——内幕一瞥》，第 54、55 页，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的调查询问表明，1989～1990 年居民对私有财产合法化持肯定态度，但对价格自由化却坚决反对。社会公众并不懂得两者不可能彼此分离。见社会舆论调查《对待财产问题的态度》，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莫斯科版，1989；C. П. 施皮尔科、L. A. 哈胡林娜、З. B. 库普里亚诺娃、B. B. 博德罗娃、L. Г. 祖博娃、H. П. 科瓦列娃、M. Д. 克拉西利尼科娃、Г. B. 阿夫杰延科：《居民对国内社会经济状况的评价（据 1991 年社会调查结果）》，科学报告，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莫斯科版，1991，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的调查询问证实，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超过一半的苏联居民相信建立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但 58% 的被询问者认为，失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许。见 B. 科斯马尔斯基的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快速工作报告《居民对减少部分工作岗位和裁减在岗职工的态度》，1989 年 7 月 12 日，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莫斯科版，1989，第 8 页。

试以失败告终。东欧最大的国家中的这种事态发展清楚地表明，如果在没有市场价格，也没有对提高效率的刺激因素情况下，企业扩权只会导致财政政策和对居民货币收入监督的削弱以及廉价商品被淘汰；会使得生产者利用产品的短缺，将不利的合同条件强加于消费者。

政府愿意朝着经济活动自由化方向迈进，以自己的方式重复中国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所经历的道路，其中第一个迹象便是1986年11月19日通过的《关于个体劳动活动》的法律。[①] 1987年5月1日生效的关于个体农场经营活动合法化的决定也朝着同一方向前进。在这方面，中国经验的影响同样显而易见。这些决定对经济进程并未产生显著的作用。这就显示出了生活在市场经济之外已三代的苏联人与仅有一代的中国人之间的区别。进行不受国家控制的私人经营活动的技能已几乎丧失殆尽。中国在1979年便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征兆：政府决心哪怕以有限的方式允许农民从事独立的经营活动，并解散了公社，这些都得到了大规模民众的支持。然而在苏联，任何类似的事情都不曾发生。

1988年颁行的对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变革，对经济生活的现实仅仅产生了有限的影响。惯性的力量一如既往，人们依然相信，所宣布的改革与苏联以往惯常的情形一样，不过是装模作样，与生活无关。企业经理们在公开的谈话中断言，所赋予他的权力只是走走过场。自1989年开始，中央权力减弱的一些明显迹象使局势发生了变化。企业领导人、劳动集体[②]开始明白，遇到拒不执行下发给地方的指标时，莫斯科并不准备采取有效的惩罚手段。

扩大企业自主权，扩大各部委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的权力，任合作银行的数量快速增长，只是采取这些事先既未考虑到财政稳定，也未考虑到价格自由化之类缺乏系统性的措施，只会加剧因石油市场行情变化而引发的问题。

苏联政府副主席L. 阿巴尔金这样描述当时所形成的局势："一方面，所有发言的人都要求自主权，取消各部委各部门的强制性指令，削减国家订购的份额。与此同时，却又异口同声地坚持要得到原材料供应的保障。

---

① 1986年11月19日通过的苏联法律《关于个体劳动活动》载于《党和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第16卷第2部分，政治书籍出版局莫斯科版，1988，第489~499页。

② 指企业和事业单位、集体农庄、合作社组织的全体人员。——译者注

我当选部长会议副主席之后，常常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坐在一起，目睹了他的处境。数十名代表来到他面前，都带着书面和口头请求，提出保证供应、确保原材料供给等等诸如此类的要求，尽管大家都应该清楚地懂得，既然你们争得了政府的订货，政府正是借此筹集资金，那么你们也就无权再要求政府对你们进行供应。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①]

吸收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设想，早在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掌权之前即已进行过讨论。这一想法从来就不曾完全脱离苏联政治精英们的视野。约·铁托让南斯拉夫摆脱苏联的政治控制，获得行动自由之后，他正是以这一点与苏联经济模式形成对照。1962 年 11 月 5 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说：“看来，企业中应当有那么一个委员会，分析研究情况，经理必须根据这种情况每月或每季度做一次报告。还应当建立工人委员会，让它们能够检查会计账目、财务部门、原料部门等等。这有什么不好?我有个想法，也许我们可以将厂长、车间主任列为候选人，而由委员会做出决定把企业交给谁来管理。”[②] 1986 年通过、随后在 1987 ~ 1988 年的规范法令中得到发展的关于建立劳动集体委员会的决定，从共产主义思想逻辑的观点看来，根本不像今天所想象的那样奇怪。既然苏维埃政权面世时喊出的口号是“将工厂交给工人”，那么在它遭遇严重危机时，为什么不设法将这一口号变为现实呢?

获得自主权的企业迅速提高了职工的工资，1988 年增长 8%，1989 年增长 13%。1989 年 12 月，苏联部长会议信息管理总局局长 B. 科索夫致函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L. 沃罗宁，报告说居民收入的增长一年内可能加快到 15%。[③] 厂长选举制对劳动纪律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削弱了政府的中央机关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的能力。在既缺乏市场价格，又形成硬性财政限制缺位的情况下，这样做引发了更为尖锐的问题。

1988 年 5 月通过了《关于苏联合作社》的法律，事实上为苏联经济中私有成分的扩张开辟了道路。大多数合作社建立在国营企业内部，它们按

---

① L. 普列沙科夫：《不应该分享，而应该自己去挣》，载于《星火》杂志 1989 年 10 月第 41 期，第 2 页。

②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4 ~ 1964》，会议记录草稿，速记记录，决议卷 1，第 638、639 页。

③ B. 科索夫致 Д. А. 沃罗宁同志函《关于 1990 年停滞膨胀的危险性》，1989 年 12 月 20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50. д. 17. л. 138。

照国家固定价格购进产品，经过加工，再以市场价格出售（常常只不过是转手倒卖）。在商品短缺和财政不平衡的条件下，这就使得企业领导人和那些监管合作社的人都能获取不菲的收益。[①] 许多被列入亿万美元富翁名单的俄罗斯人的财产正来自这一时期。

1989 年年中时，合作社的职工人数已增至 490 万。4/5 现有合作社都建立在国营企业内部。1989 年合作社职工的劳动报酬比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高出一倍。1991 年初已经有 600 万人在合作社中就业。[②]

根据 1989 年 11 月 23 日所通过的《关于租赁》的法律，承租人有权整体或部分赎买所租赁的产业。赎买的条件由租约确定。[③] 这项法律为私有化开创了极为广阔的机会，有利于现有的企业管理人员以及与之相关的人。

1988 年 7 月 6 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第 721 号决议《关于扩大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对外经济活动》，以及 1988 年 8 月 4 日苏联部长会议的第 956 号决议《关于促进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经济活动》，开辟了由共青团精英出身的人控制的青年科技创造中心和一些组织参与包括对外经济活动在内的商业活动的途径。[④]

在空前短促的时间内建立了千余家没有业务熟练干部的银行，而且是在缺乏传统的银行监管情况之下，结果使得这些银行成了货币变现和从国家监督之下抽逃企业资金的工具（见表 5－22）。

苏联国家银行的领导人员对这些问题一清二楚，1991 年 5 月 7 日商业合作银行管理局致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局的信函中说："对某些商业和合作银行过去一年间的平衡表所作的分析说明，相当数量的银行尚未能达到符

① 关于发展合作社所产生的问题，见《合作化的潜力与"生长病"》，与苏共中央社会经济部第一副部长 В. П. 莫仁的谈话，载于《政治教育》1989 年第 16 期，第 38～43 页。关于利用合作社以固定价格收购国有企业产品却以市场价格出售的经营活动，见 А. А. 克拉斯诺皮夫采夫（苏联国家物价委员会副主任）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在遏制无理涨价基础上预防通货膨胀进程的措施》，1989 年 9 月 8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50. д. 2006. л. 27。

② А. 格卢舍茨基：《合作社政策：总结，矛盾，最优化方向》，载于《经济科学》1990 年第 6 期，第 52～67 页。

③ 苏联和加盟共和国立法基础 1989 年第 810－1 号《关于租赁》（1991 年 3 月 7 日收入苏联法律汇编第 2015～1 号）。该文件最初文本发表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公报》1989 年第 25 期，第 481 页。

④ 《苏共中央公报》1989 年第 12 期，第 20 页。

表 5-22　1988～1990 年苏联的银行数量

单位：个

日　期	合　计	日　期	合　计
1989 年 1 月 1 日	43	1991 年 1 月 1 日	1357
1990 年 1 月 1 日	224		

资料来源：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2. Д. 3996А. Л. 93。

合章程规定要求的基金数额，因为这些银行都是最近五个月中刚刚建立起来的。然而其中一些银行已经开始积极开展信贷业务。这是对苏联国家银行法令和这些银行本身章程的公然破坏……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某些商业和合作银行对单一借款人贷款最高额度指标的破坏。"[①] 就同样的事情，苏联内务部部长 B. 巴卡京也曾于 1990 年 7 月 13 日致函马斯柳科夫。信中说，"财政信贷机制方面国家监督的局限促使行贿受贿和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不断增加。"[②]

然而政府主席雷日科夫却坚信这个领域的情况完全正常。他和他的副手马斯柳科夫、沃罗宁一道于 1988 年 7 月 17 日上书苏共中央，表示坚决不能同意国内商业银行数量增加过快的说法："全世界的经验都表明，我国的银行太少，其网点不能满足国民经济的经济核算需求。"[③] 后来雷日科夫在其回忆录中写到了苏联国家银行对 1980 年代发展商业银行网所进行的抵制。[④] 不过这也不足为奇，经过数十年的非市场经济之后，国家领导人很难理解银行必须是最后自由化的经济部门之一，而绝非是先这样做的部门。如果考虑到国内数十年间实际上并没有商业银行活动，没有训练有素的干部和银行监管机关，那么，这场争论倒颇能说明苏联领导人对有关建

---

① 商业和合作银行管理局致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局函《关于 1990 年商业银行的活动》，1991 年 5 月 7 日，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2. Д. 3996А. Л. 96。

② B. 巴卡京（苏联内务部部长）致 Ю. Д. 马斯柳科夫同志函《关于 1990 年上半年经济领域犯罪动态的基本趋势和向市场过渡可能导致犯罪后果的预测》，1990 年 7 月 13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 Л. 56。

③ 尼·雷日科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Ю. 马斯柳科夫（苏联国家计委主任）、L. 沃罗宁（苏联物资技术供应总局局长）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发展和深化根本性经济改革并消除其实施过程中所显露出的缺点的措施的建议》，1988 年 7 月 17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49. Д. 1. Л. 50。

④ 尼·伊·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第 202 页。

立市场经济问题的理解程度。

逻辑矛盾的自由化措施无助于解决国家所遇到的关键性问题：外汇储备迅速减少、财政危机、消费市场日渐崩溃。行政管理的混乱加上民众日常生活条件的恶化，使得人们对政府愈来愈持不信任态度。如果说1985年之时代表另一代领导人的新领袖还拥有一定的信任储备，那么，时至1988年年中这一储备便已急剧减少了。

1989年4月5日，苏共克麦罗沃州通过决议《关于一系列部门企业中劳动者拒绝工作的事实》。在同一机关1989年7月11日的决定中，梅日杜列琴斯克市煤矿企业的局面被称作紧急状态。1989年7月17~18日签署了会议纪要《关于库兹巴斯地区罢工委员会与苏共中央专门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之间的协调措施》，其中规定，为了改善食品和大众日用消费品的供应，1989年下半年补充调拨给克麦罗沃州：肉类6500吨，动物油5000吨，乳品罐头500万定量罐，白糖10000吨，肥皂和香皂3000吨，合成洗涤剂3000吨。[①]

苏联领导人的问题在于，在经济日渐崩溃的条件下，类似的许诺应承起来比履行要容易。不久，无论政府还是矿工们都开始明白，能兑现的只是与现金支付有关的部分。然而拿上钱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买。这又激起了新的罢工浪潮。政治经济制度分崩离析的机制业已启动，它至少有可能让这一制度归于瓦解。

---

① 《库兹巴斯工人运动》，文件和材料集，1989年4月~1992年3月；L. H. 洛帕京编，现代本国书籍出版社克麦罗沃版，1993，第39、40、68~71页。

第六章
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危机的发展

指挥官说道：

喂，别歇斯底里了！

我们就要冲到岸边了！

——B. 维索茨基

一　石油工业的问题

前一章所描述的石油开采工业的状况，乃是苏联经济危机发展成为灾难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见表6－1）。档案文献有助于更细致地看清这种情况。

表6－1　1988～1991年苏联和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石油开采量

单位：百万吨

年　　份	1988	1989	1990	1991
苏　　联	624.3	607.2	570.0	515.8
增加(＋)/减少(－)与上一年的水平相比较	＋0.1	－17.1	－37.2	－54.2
俄罗斯联邦	568.8	552.3	515.9	461.9
增加(＋)/减少(－)与上一年的水平相比较	－0.6	－16.5	－36.4	－54.0

资料来源：《1990年的苏联燃料能源综合体》，莫斯科全俄综合燃料能源研究所，1991，第108～109页；《俄罗斯的燃料和能源》，俄罗斯联邦燃料和能源部莫斯科版，1999，第158、408～409页；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

在 1990 年 9 月 17 日的一次会议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1975～1990 年的石油开采量在 5 亿～6 亿吨的范围内上下波动，而同一时期的基本建设投资则从 38 亿卢布增加至 1991 年的 170 亿卢布（指的是 1991 年的计划——盖达尔注）。百万吨产量的油井数量从 1975 年的 16 口增至 1990 年 165 口，钻探的米数增加 9 倍，而在此种情况下，石油的开采量却又开始下降。[①]

会议材料记载：

“雷日科夫同志：我们能用 5 亿 4700 万吨做什么？国家如何生存？

里亚比耶夫同志：4 亿 6700 万吨用于供应国内的需求……出口量减少……

雷日科夫同志：怎么说也应该搞到我早先和您谈过的 5 亿 8000 万吨吧？

里亚比耶夫同志：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数字。那得增加开采性钻井的钻探量，使 25000～26000 口新油井投产。还需要一下子就大量出油。基本建设投资也要大大增加，每吨的批发价将达到 155 卢布……

西塔良同志：这两个方面需要多少资金？

里亚比耶夫同志：大约 8 亿一级外汇的卢布。

西塔良同志：你们能生产多少？

里亚比耶夫同志：现在我们再也不能低于这个水平了。我们的开采量每天都在下降。从元月份开始是 2500 吨……

雷日科夫同志：你们的任务就是找到走出困境的办法。

里亚比耶夫同志：我们把这一切全都研究分析过了。7 月份我们提出了第一种方案——重新分配国家的资金。国家已根本没有别的资金了。我每个月都要召开两次政府委员会，经常召开业务碰头会。没有资金。根本没有……

雷日科夫同志：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②] 您算了吧。

---

①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同志的会议速记记录《关于 1991 年向国家提供石油，液化天然气和石油产品》，1990 年 9 月 17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 ф. 5446. оп. 162. д. 379. л. 129。

② 指里亚比耶夫。——译者注

……同志：如今之计，需要得到对外经济联络部的担保。如果我们现在能办到这一点，公司老板就准备同我们合作。那时候就需要转账。600 万已划到我们的账户，如果有全苏账户更好。这方面的情况很复杂，我一直都是亲自处理。建议就是这样。今天对外经济银行应当向各公司确认，为对外经济联络部担保。只要有了这种担保，我们就马上开始采购，因为我们已经向我们的外国合作者做好了工作……

西塔良同志：总体形势就是这样，如果出口 6000 万吨，那么我们就会将我们与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置于一个极其复杂的境地。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将 3400 万吨用来换取可自由兑换货币，只剩下 2600 万吨给东欧国家和芬兰、印度、古巴等国……如果我们减产 2000 万吨，这就意味着明年我们的外汇储备只有 140 亿。我认为，签署 6000 万吨的出口合同是不行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不向某些国家提供石油。要是我们坚持这个数字，那么我们国内和许多国家都会彻底坏事。如果我们一点都不给波兰，波兰就什么也不会卖给我们……

……同志：我往最坏里说，也就是 5 亿 8000 万吨或者 4 亿 4700 万吨，我对实际情况的理解就是如此。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要恢复到 5 亿 8000 万吨是不可能的。提出这么多的时候，根据的是计划钻探 4130 万米，我们则希望能钻 3900 万米，实际上却只钻了 3550 万米。

马斯柳科夫同志：我们都明白，唯一的外汇来源当然是石油，所以我提个建议。我认为，应当听取地质工作者们的建议，就增加提供石油采取坚决的措施，无论石油工作者的处境如何。第二，我认为，所提到的各种必不可少的物资，全都一定要向外国的公司进行采购……我有个预感，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一切必要的决定，那么明年我们的日子就会过得连做梦都想不到的糟糕……社会主义国家一方可能骤然间便会完蛋。这一切必将使我们名副其实地垮台，而且不单是我们，还有我们的整个制度……

沃罗宁同志：我只能说，石油工业的处境从来也不曾这样过，即使 1958 年也不是这种状况。它已经落入这样一种境地，如果事

---

① 指雷日科夫。——译者注

情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真的担心连5亿吨石油也保不住……我明白，少于5亿6000万吨~5亿7000万吨我们就无法摆脱困境，我们会使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的一切——粮食、机器制造业都陷进去……最可惜的是，眼下石油价格很贵，而且还会上涨，可我们却生产得越来越少。因此，为了换取外汇就只能尽量少给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需求也要想尽办法压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毫不迟延地满足各种物资的需要。

尼·雷日科夫：……需要对外经济银行担保，可它却无法提供，我们应当采取决定，达到5亿4700万吨，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将6000万吨石油用来出口，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那时候我才能忘掉一切……如果现在我们找不到挽救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办法，我们就连5亿4700万吨也到不了手。应当有一个明确的制度，要么我们逼着完成任务，要么我们看着事情每况愈下。我不放心的是，我们今年开了几次会，都没能克服这种状况。应当坚持5亿6000万吨，并为此提供一切物资，不单是有个目录，还应当确切地一一开列出来，而且要建立监督制度……我看出来了，没有石油，就不会有国家的经济……年初都说是6亿2500万吨，现在却盼望着5亿4700万吨——这就是我们历次交谈对你们所产生的效果。我们还能指望什么……"①

苏共中央社会经济部1990年9月19日的报告中说："……与去年相比，1990年前7个月之中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产量减少1650万吨，煤炭减少2200万吨……1990年的7个月期间，原计划投产的1340万度发电能力中只有310万度交付使用……（甚至是在冬季反常暖和的条件之下）1990年1~7月与去年相比，用户断电的次数增加1.3倍。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电力短缺将近800万度。"②

在石油开采和石油出口量减少的背景下，外汇方面的问题日益增加。

---

①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同志召开会议的速记记录《关于1991年向国家提供石油、液化天然气和石油制品》，1990年9月17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397. Л. 131~137，143~149。

② 苏共中央社会经济部的呈文《关于1990/1991年秋季期间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工作中的一些严重缺点》，1990年9月19日，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20. Д. 8. Л. 4~6。

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卡图舍夫致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称："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现报告本年第4季度完成出口石油和石油产品发运计划方面出现的灾难性局面……如果情况不发生变化，则10~11月间将比计划少装运400万吨石油和石油产品，少收入4亿多外汇卢布。"①

充分供应国民经济所需燃料的问题一年比一年困难。一封致苏联政府的函件中称："国家的燃料能源部门去冬以来潜力空前低下。由于石油、煤炭的开采量和炉用燃料油的产量下降，1991年第1季度供暖锅炉和火炉的燃料产量比1990年第1季度减少1100万吨。与此同时，尽管今年1~3月份工业品产量下降，国内对锅炉和火炉燃料的需求却超过1990年第1季度消耗1090万吨标准燃料，这与今年天气较冷，而1990年第1季度空前暖和有部分关系。大量消费燃料单位的储备，从1990年4月1日的6890万吨标准燃料（16.8天的消耗量），降至1991年4月1日的5900万吨标准燃料（14天的消耗量）……总的说来，考虑到预计的出口额，1991年供国内消耗的供暖锅炉和火炉的燃料储备量预计为14亿9700万吨标准燃料，而非1990年预算的15亿零910万吨标准燃料，实际上的需求还要多出1800万~2000万吨标准燃料，这就会导致年终消费者的燃料储备降至4300万吨，而不是最近三年期间曾经拥有的6900万~7300万吨。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如此之低的储备量会使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的国民经济工作陷入混乱状态。"②

1991年，石油部门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1991年5月31日苏联内阁副总理L. 里亚比耶夫致苏联内阁总理瓦·巴夫洛夫的函件中说："今年已过去的这段时间内，石油工业的事态恶化了。由于机器制造基础发展滞后、已建立的各种联系遭到破坏、供货企业的合同义务未能履行，本部门对主要设备和材料的需求仅能满足50%~60%。国内外汇不足，进口的设备和钢管供应量几乎减少了一半……目前各油矿已有22000口油井停

① K. ф. 卡图舍夫（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函《关于1990年第4季度的石油商品出口》，1990年10月31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ф. 5446. ОП. 162. Д. 1524. Л. 1。

② 摘自B. И. 科斯秋宁（苏联物资技术供应总局副局长）、A. A. 特罗伊茨基（苏联国家计委副主任）致苏联内阁副总理L. 里亚比耶夫同志的函件《关于1991/1992年秋冬季期间国民经济和居民的燃料保障》，1991年5月23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ф. 5446. ОП. 163. Д. 1640. Л. 60~61。

产……本年度1～5月份石油日平均开采量的水平，仅能保证年产5亿3000万吨，供应各炼油厂4亿5200万吨，供出口6100万吨……最近数十年由于矿山地质条件不断恶化、本部门产量最高的各油田的储油量枯竭，每年都减少将近1亿吨的石油产能。企业生产的经济指标急剧下降。最近5年期间，油井出油量下降50%以上，产品含水量增至80%，而创造新的石油产能的单位开支却翻了一番。"①

苏联石油开采量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质因素所致及产量高的矿区开采过度。1980年代后半期油井的产量大大下降（表6－2），退出产能的情况增多。新油田就更难办，开发时每吨油所需的开采费用要大得多。

表6－2　1975～1990年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油井的平均出油量

单位：吨/月

年　份	1973	1980	1985	1988	1989	1990
苏　联						
全部油井	652.2	621.1	447.8	368.4	338.7	314.4
新油井	1755.8	1167.3	808.4	609.5	549.9	518.1
俄罗斯联邦						
全部油井	882.7	828.8	555.0	429.1	394.5	354.2
新油井	1873.6	1214.7	815.9	627.7	566.3	522.1

资料来源：《1988年的苏联燃料能源综合体》，全俄综合燃料能源问题研究所莫斯科版，1989，第127页；《1990年的苏联燃料能源综合体》，全俄综合燃料能源研究所莫斯科版，1991，第140～141页。

苏联石油工业的技术结构无法弥补开采条件的恶化。国家石油生产规模的增长是以粗放的方式实现的，该部门的技术水平较之世界水平差距悬殊。1986～1990年用于创造新的石油开采能力的单位资本支出较前五年增加80%的同时，同一时期对本部门投资的实际增长仅为28%。②

① 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269. Л. 17～20。

② Ю. 博比列夫、А. 切尔尼亚夫斯基：《俄罗斯石油勘探和生产危机的经济影响》，载于《俄罗斯联邦的石油和天然气发展》，国际遗产出版社亚历山大版，1992，第63、87页。

石油开采量的下降及其出口量的减少，使得收支平衡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外汇不足同样使本部门的工作困难重重。石油和天然气工业部部长丘里洛夫致苏联政府的函件中称："目前各对外贸易联合体签订的为苏联石油和天然气工业部提供物资技术资源的合同，总金额将近 8 亿卢布。还有按苏联国家银行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官方汇率计算达 13 亿卢布的合同已准备好签署。然而一些合同的签订已不止一次延期，由于苏联石油和天然气工业部缺少外汇资金，今后要继续签订将难有进展……苏联对外经济银行向苏联内阁报告无法执行上述命令，这使石油部门在完成石油开采任务方面陷入危险境地。"①

二　政治信贷

数十年期间苏联一直执行谨慎的信贷政策，国家领导人不愿意依赖于西方银行。苏联拒绝偿还沙皇的债务之后，总是按时清偿自己所欠的外债。1980 年代中期苏联享有无可指责的一流借债人的声誉，其获取信贷资金的可能几乎不受限制。然而在日益严重的财政失调的情况下，要长久保持债权人的信任是不可能的。正如前数章中所说，早在 1988 年西方银行即已产生怀疑：苏联财政状况的可靠性究竟如何。在商业基础上吸引信贷资金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有限，提供贷款的条件也越来越严格了。这既关系到利率，也关系到还款期限。

为了弥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来账户资产负债表上的赤字，苏联对提供补充贷款的需求却不断增长。这是比例失调的结果，而造成比例失调的则是石油价格下跌，始终存在着支付进口粮食费用的需求，既不能削减采购量，又无法增加与燃料无关的商品出口。1988 ~ 1989 年之时已经很清楚，依靠借新债清偿先前所借债款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为了偿还引进的贷款所需要的款项，必须依靠出口的现有收入进行抵补。除去往来账户资产负债表上的赤字之外，还有平衡资本交易方面的困难。

苏联领导人决定使用外汇储备，增加黄金出售的数量。但是苏联的黄金

---

① 摘自 L. Д. 丘里洛夫（苏联石油和天然气工业部部长）致苏联总理 B. C. 巴夫洛夫同志的函件《关于为苏联石油和天然气工业部提供物资技术资源的紧急报告》，1991 年 7 月 12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1446. Л. 158。

储备自1960年代以来便是歉收年景紧急购买粮食的资金来源，至1980年代中期已为数不多。苏联的外汇储备从来就不算充裕。无论黄金还是外汇都是易于耗尽的资源，依靠它们弥补长期的负债表上的赤字是不可能的。

1988～1989年，苏联领导人重又面临1985～1986年那样的选择，但环境更为糟糕。外汇缺乏迫使生产、消费的规模和结构必须适应新的现实。这可能激发尖锐的经济危机，或许还有政治危机。采取硬性的稳定措施，尤其是在已经开始政治自由化的条件下，是颇为冒险的。因此当时苏联人觉得，经济上和政治上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大规模吸纳西方国家的贷款，用以弥补减少了的商业借贷资金。然而这样的贷款向来带有政治倾向。如果你领导着一个世界性的超级大国，懂得这一点大有裨益。

1985年时任何人都不会认真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苏联可能会向西方主要国家请求提供含有政治理由的贷款，并开始准备就它在各方面作出某种妥协进行对话，以回应这些国家的慷慨解囊。仅仅过了三年，这个不久之前还显得荒谬绝伦的想法，便已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离开含有政治理由的贷款，要保障苏联国民经济哪怕最低限度的稳定也绝无可能。

1989年夏的矿工罢工首先是由产煤区居民供应条件的恶化引发的，它向苏联领导人清楚地表明，消费市场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具有爆炸性危险。

1980年代初的波兰事件乃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联所发生的一切的序幕，当时国家已沦为先前十年间所吸纳的西方巨额贷款的人质，这些债务的无力清偿引发了财政危机，迫使政府当局采取政治上冒有风险的措施，提高零售价格。[①] 对于1980年代初的波兰和1990年的苏联而言，事件发展的财政外汇背景毫无二致。苏联领导人明白，在进入战时状态、“团结工会”遭到镇压情况下，寄望于西方解决波兰的财政问题是不理智的，还得靠苏联掏钱来买单。不过当年苏联还有钱维持附庸制度。它也这

---

① 1991年5月O. 拉齐斯写道，1981年波兰事件的发展与1991年春苏联所发生的事情极为相似：“我们现在差不多是生活在1981年的波兰……无论是波兰经济危机的萌发，还是过程，我们都正在加以重复。同样是不负责任的部门超额投资，同样是以过度消费形式送给民众的‘礼物’（并非高度温饱，根本不是，而是我们所消费的比生产的要多），同样到头来是国家预算赤字、外债增长和信贷奴役，同样是放开价格无可避免和拒绝接受这种不可避免性，工人们愤而抗议。紧随着政治争论之后，仿佛一个巨大的阴影，爆发了罢工流行病——十年之前折磨人的波兰病。”见O. 拉齐斯：《是破坏还是价格的某些天性》，载于《消息报》1991年5月7日。

样做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则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准备为挽救苏联的制度而掏腰包。

既然获取巨额国家贷款是一种刚性的需要，那就不得不让政策适应能够提供贷款者的要求。外汇储备减少之后，商业性贷款渠道变得愈来愈难以走通，苏联领导人唯一的出路似乎只能是尝试着利用改革和新思维及业已改善的与西方的关系，来获得足以战胜货币金融危机的资金。

戈尔巴乔夫明白是何种长期问题引发了对苏联而言规模大得反常的军事开支，便试图缩减其增长速度。因而在有关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便出现了新的语调，这一点，自从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雷克雅赤克（1986年10月）会晤以来即已显而易见。不过，1988年之前这个问题还与战略选择有关：经济增长的长期前景即为军事安全。自从苏联外债偿付危机爆发以来，情况产生了改变。现在已别无选择——苏联经济政治制度崩溃的风险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与西方就对苏联趋于瓦解的经济提供财政援助的条件达成协议。

只有了解苏联1988年之际遭遇的经济问题的尖锐程度，才能够理解戈尔巴乔夫总统1988年12月在联合国发言中所提出的关于裁减军备的倡议，也才能够理解苏联领导人何以同意不对等地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签署中程导弹协议，其条件实际上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初所提出的完全相同。①

形势的变化在戈尔巴乔夫与乔治·布什的马耳他会谈（1989年11月）中清晰可见。戈尔巴乔夫在裁减军备问题上的友好和谦让不仅仅与希望减轻军费开支负担有关。这在战略上很重要，在政治上却颇为棘手。要想让缩减军费开支能对苏联的经济状况发挥影响，还需要时间。对苏联当局具有紧急意义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促使美国及其盟友向苏联提供国家信贷资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贷款。在货币危机的条件下，这对苏联领导人可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为了增大获得贷款的机会，可以在有一点上作出正式的保证：苏联将不会为保持自己对东欧的政治控制而使用武力。②

---

① 米·戈尔巴乔夫1988年12月在联合国讲话时谈到的是，苏联武装力量的数量将减少50万人，战略坦克数量减少1万辆，飞机数量减少820架。考虑到部队调动的补充措施，坦克数量预计减少15000辆，飞机减少860架。见《苏联共产党第28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2~13日，速记报告，政治书籍出版局莫斯科版，1991，第210页。

② 据美国驻苏联大使J. E. 梅特洛克证实，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向布什保证，苏联军队不会被用来维持东欧的现有制度，他准备向东欧提供选择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自由。见J. E. 梅特洛克：《亲历帝国：美国大使对苏联的描述》，兰登书局纽约版，1995，第272页。

这些承诺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戈尔巴乔夫自身的信念，最好由他本人作出评判。不过，如果当时为首的苏联领导人是一位西方的夙敌，同时又并不打算为实施一项应对危机的重大计划而进行政治自杀，那么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也不得不执行一条类似于戈尔巴乔夫所选择的对待西方的路线。这条路线并非出自个人的偏好，而是由国内的经济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三　妥协的代价

西方的谈判伙伴十分理解苏联的处境，明白它当时多么离不开基于政治理由的贷款。于是便出现了新的对话语调。当最重要的问题是调节军备竞赛，而双方又都拥有军事政治均势之时，它们也曾准备进行长期的折磨人的谈判，但这是地位平等的谈判。如今苏联领导人遭遇货币金融危机，自身无力加以克服，只好乞求经济援助，平等已荡然无存。[①] 这就是世界的现实。经济政策中出现不应有的失误，包括数十年前所造成的失误，又不肯为纠正这些失误付出国内的代价，那就只好被迫在对外政策上让步。现在苏联领导人在各种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上都不得不考虑强加于它的规则。

关于运用武力保持对帝国东欧部分的政治控制之事只好置诸脑后。这方面的任何步骤都会使获取大规模经济援助的希望化为泡影。不过也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相互理解：东欧这个苏联利益范围本来是存在的。这就意味着，无论欧洲和美国的舆论是如何为苏联旨在保持附庸统治集团掌权而对这个地区进行军事干涉感到愤怒，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的政府都不打算采取阻碍这种干涉的任何行动。这样的相互理解是苏联得以保持对这个地区控制的最重要因素。1986 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之后，不得不使用武力。众所周知，苏联领导人在必要时总是准备干出这种事情。

1980～1981 年波兰发生骚乱，当时在阿富汗战争仍在持续的背景下，苏共领导人对于是否应当动用苏联军队镇压波兰工人运动的问题犹疑不

① 关于苏联领导人越来越坚决地请求提供基于政治理由的贷款及苏联与西方对话性质的改变，见 C. D. 布莱克：《革命的抵押品》，对外关系商讨出版社版，1993，第 5 页。关于苏联从西方获得作为放弃东欧报答的财政利益的局限性，见 S. 拜阿勒：《苏联共产主义的灭亡》，载于《对外事务》1991/1992 冬季号，第 176～177 页。

决，头一回被迫考虑这一点：为了保全帝国，他们究竟能走多远。[1] 不过这个问题并未公开地提出来，只是不事声张地进行了讨论。他们说服波兰领导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实行战时状态。从阿富汗撤军之事，在1985年秋天时无论苏联政治领导人或军方领导人都已深信无可避免，这一决定使人对苏联是否打算动用自己的军队保全帝国的东欧部分产生了怀疑。然而获得对这一问题的明确回答是不可能的。

单方面裁减苏联武装力量，包括从东欧撤出5万名苏军，这是向东欧社会发出的明确无误的信号：有限主权学说的时代、苏联为了保持附庸统治集团掌权随时准备使用武力（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988年末～1989年初，东欧各国的社会公众和政治精英都明白，苏联在经济上依赖西方国家的情况下动用军事力量已不可能。帝国的东欧部分的崩溃仅仅是方式和时间的问题。1989年4月，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之间就国会进行自由选举的条件开始谈判。两个月之后，团结工会让亲苏联政权遭到毁灭性的失败，获得了对议会上下两院的全面控制权。

没有足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苏联军事实力的支持，即使像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这样的准备无条件使用武力对付本国人民的人，也无法挽救他的政权。戈尔巴乔夫与布什在马耳他会晤（1989年11月）之时，戈尔巴乔夫曾非正式地向布什保证，苏联武装力量不会参与在东欧的军事行动，此时与帝国的东欧残余部分彻底垮台之日相隔不足两个月。

正如历史上常有的情形那样，帝国覆灭的进程一旦开始，其发展便比人们所预料的更为迅速。1989年9月苏共中央还确信波兰领导人近期不会提出退出华沙条约的问题。[2] 为时不久，再提这个问题已毫无意义——华

---

① 关于苏联领导人不准备直接动用军队以保证对波兰实行政治控制，他们希望波兰领导人自己这样做，见1980～1981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材料。B. 布科夫斯基《莫斯科进程》，俄罗斯思想出版社、“莫斯科投资公司”巴黎、莫斯科版，1996。http://www.belousenko.com/wr-Bukovsky.htm。苏共中央负责波兰问题的Г. 沙赫拉扎罗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苏斯洛夫也有功劳，应当说一开始他便为委员会的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他第一次发言即已声称，苏联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波兰实行军事干涉。同一原则也得到委员会的下一任主席安德罗波夫的肯定。”见Г. 沙赫拉扎罗夫《同领袖们相处和没有他们的日子》，瓦格里乌斯出版社莫斯科版，2001，第250页。

② 爱·谢瓦尔德纳泽、A. 雅科夫列夫、德·亚佐夫、B. 克留奇科夫致苏共中央的函件《关于波兰的局势、其发展的可能方向、苏波关系的前景》，1989年9月20日，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9. Д. 33. Л. 13。

沙条约业已不复存在。

西方为让苏联放弃控制东欧所付出的代价并不算高。联邦德国为争取同意德国统一而提供的贷款和资助、意大利的有关贷款、美国的粮食贷款——如果考虑到问题的价值，这一切都微不足道。但苏联领导人的处境已不允许他们像以往那样将自己的条件强加于谈判对手了。对他们最为重要的是，西方提供巨额国家贷款的问题业已公开，有望在这方面取得突破，并在此基础上稳定国家的经济状况。

苏联当局如果想要获得财政援助将持何种态度，西方社会和政治精英非常清楚，而且他们的要求决不仅局限于东欧。苏联领导人得到明确无误的信号：你们想要得到经济援助，那就请维护人权，不要滥用武力。然而，此类劝告对于其稳定的基础就是随时准备使用暴力对付本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言，又能有什么意义呢?[1] 那无异于要求消灭这种制度。

那些主张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恢复 1939 年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2]签订后丧失的独立地位的政治家，得到来自美国的明确信号：如果这些国家宣布独立，美国不会为维护它们的主权采取任何行动，也不会承认新的政府。不过，苏联领导人也发出信息：镇压波罗的海国家主张独立的人和使用武力，会对与西方的关系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3] 翻译成普通的俄语，这话的意思就是：你要进行镇压，就休想得到西方的钱。

随着有关往事真相的揭露，情况逐渐变得清楚起来：苏联在尖锐危机时期所遇到的问题，较之已经解体的帝国其他组成部分更为复杂。对后者而言，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是征服者的权利。苏联领导人为了替自己的权力寻找论据，则诉诸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公开的，社会公众已能了解到的关于这一制度种种暴行及其形成过程的信息——这些都使苏维埃政权残留的一点合法性荡然无存。

---

① 关于苏联领导人未能放手使用武力对付本国居民和附属领土的居民与帝国和苏联制度崩溃之间的关系，见 J. 豪夫：《1985～1991 年苏联的民主化和革命》，布鲁金斯学院华盛顿特区版，1997。

② 此处所说的条约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划入苏联势力范围。里宾特洛甫则为法西斯战犯，时任德国外交部长。——译者注

③ J. F. 梅特洛克：《亲历帝国：美国大使对苏联的描述》，兰登书局纽约版，1995，第 231、339 页。

四　帝国危机与民族问题

像极权主义多民族国家常有的情形一样，制度的自由化、民主化首先会动员起那些准备利用民族感情的政治力量。在苏联，因为民族关系而招致镇压的牺牲者是朝鲜人、库尔德人、涅涅茨人、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希腊人、麦斯赫基土耳其人。[1] 可以想象得出，这类镇压使得族际关系何等紧张，又造成了多少长期问题（在某个时期之前一直被掩盖）。[2] 在缺乏民主传统的情况下，诉诸民族历史、利益、屈辱的口号便是政治斗争中的有效武器。从这个观点来看，苏联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事件的发展并非例外。

戈尔巴乔夫在其掌权的最初数年内，并未意识到族际关系中潜伏着多大的爆炸性，相信苏联的民族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自己的一席话可以证明他是多么不了解苏联族际利益问题潜在的严重性，不了解其爆炸性危险性质在任何自由化的尝试过程中都可能表露出来。他说："如果我国的民族问题并没有基本上获得解决，就不会有在社会、文化、经济、国防等方面呈现出今天这种面貌的苏联。如果没有使各共和国获得事实上的平等，如果没有在兄弟般团结合作、互敬互助基础上形成的大家庭，我们的国家也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3]

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错误，是这位领导人相信了官方宣传便不想再了解现实的一种表现。他应该能够记得，几乎是在赫鲁晓夫的制度自由化刚刚开始之后，1956年3月4～9日格鲁吉亚便发生了群众性的演讲活动。那是苏联战后首次政治性抗议的公开表现，参与者近3万人。3月9日军队使用了武器，打死了13人，63名伤者中又死去8人。当天还发生了数起

① C. 阿利耶夫编《事实真相：苏联的民族镇压》第1卷，因桑出版社莫斯科版，1993，第13页。

② 关于1920年代以来所积累的苏联族际关系及其潜在的危险性的问题，见A. F. 维什涅夫斯基：《镰刀和卢布：苏联保守的现代化》，ОГИ出版社莫斯科版，1998。

③ 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新思维之于我国及全世界》，政治书籍出版局莫斯科版，1987，第118页。

示威游行者与军队的冲突，也造成了伤亡。[①]

1986 年在阿拉木图所发生的事件，极其鲜明地显示出了极权主义制度的多民族国家一旦出现自由化征兆时引发民族冲突的风险。当地发生了喊出民族口号的学潮，参加者近万人。大学生们抗议任命俄罗斯人 Г. 科尔宾担任哈萨克斯坦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领导人当时并未感到自己使用武力时有任何束缚，便迅速将风潮镇压了下去。[②] 将近 8500 人被捕，约 1700 人受伤。[③] 尽管阿拉木图大学生们的抗议被严加制止，事件结束之后苏共中央却显现出了衰弱的最初征兆：关于科尔宾的任命决定被撤销，另行任命哈萨克人努·纳扎尔巴耶夫为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只要允许有公开性，便足以让涉及民族欺凌、压制、历史性分歧、经济剥削、民族天然环境的破坏等等的内容充斥报刊版面。这种情况下，像在南斯拉夫一样，类似的话题也在构成帝国核心的共和国大众传媒中积极进行着讨论，这样的共和国分别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塞尔维亚。1988 ~ 1989 年在苏联，俄罗斯的地位受到伤害的话题谈论之热烈，一如那些南斯拉夫国内谈论塞尔维亚受歧视的话题。

以现行价格计算，与别的共和国进行贸易时获得顺差的只有俄罗斯、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这个情况人所共知。A. 格兰贝格和 B. 苏斯洛夫按照国际价格，对 1989 ~ 1991 年各共和国之间和对外经济贸易差额进行计算的数据，同样已不成其为秘密（见表 6 - 3）。[④]

自然，若从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是苏联国内仅有的其他各共和国的资助者，苏联解散，转而以国际价格进行贸易会改善它们的经济状况，这并不正确。然而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却成了那些利

---

① 《1954 ~ 1964 年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稿，速记记录，决议卷 1，第 929、930 页。

② N. 安列库洛夫：《哈萨克斯坦的族际冲突与解体》，R. Z. 萨格杰耶夫、S. 艾森豪威尔编，A. R. 道格拉斯：《中亚：突击、解体和变化》，CPSS 出版社马里兰州切维蔡斯版，1995。

③ 《1986 年 12 月的阿拉木图》，“奥达尔马”协会；阿尔滕奥尔达出版社阿拉木图版，1991，第 8 页。

④ A. Г. 格兰贝格：《共和国之间地区间关系的经济机制》，载于《工业生产的经济学和组织》1989 年第 9 期；B. L. 苏斯洛夫：《国际互动关系效果的衡量：模式、方法和结果》，科学出版社新西伯利亚版，1991；A. 格兰贝格、B. 苏斯洛夫：《苏联解体前夕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载于《地区发展与合作》，1997 年第 10 期，第 17 ~ 25 页。

用俄罗斯在苏联的地位受到伤害大做文章的人手中的有效工具。

早在1988年夏季之前，在波罗的海沿岸、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便已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倾向的运动。这一浪潮迅速波及全苏联。通常，民族运动强有力的领袖们都会物色一些外族的仇敌。那些领导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民族运动的人并不需要多长时间寻觅，便彼此认定对方为敌人。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奥塞梯民族运动的领袖们也是如此。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

表6-3 1988年按国际价格计算的各共和国之间和对外经济贸易额差额

单位：10亿卢布

共和国	共和国之间的交换	对外经济的交换	合计
俄罗斯	+23.88	+6.96	+30.84
乌克兰	-1.57	-1.32	-2.89
哈萨克斯坦	-5.94	-0.63	-6.58
白俄罗斯	-1.59	-0.46	-2.05
乌兹别克斯坦	-2.63	+0.09	-2.54
阿塞拜疆	-0.24	-0.21	-0.45
立陶宛	-3.33	-0.36	-3.69
格鲁吉亚	-1.61	0.30	-1.91
摩尔达维亚	-2.22	-0.41	-2.63
拉脱维亚	-0.99	-0.32	-1.31
亚美尼亚	-1.06	-0.31	-1.37
吉尔吉斯	-0.54	-0.52	-1.06
爱沙尼亚	-1.06	-0.24	-1.30
塔吉克斯坦	-1.20	+0.08	-1.12
土库曼	+0.1	-0.06	+0.04

开始了一系列以民族为基础的越来越血腥的冲突和洗劫，有时还转化为军事行动。在这种背景之下，显现出了苏联领导人首先是戈尔巴乔夫自相矛盾的状况。他启动了民主化进程，为民族运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中许多运动的目的都是获取独立，退出苏联。当时至少在波罗的海地区和格鲁吉亚，以民族独立为目标的力量在民主选举中获胜业已成为现实。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于1990年2月25日举行。主张立陶宛独立的"萨尤迪斯"联盟赢得了选举的胜利。这也为其他共和国内主张脱离苏联而独立的力量开辟了道路。

在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为有关族际冲突问题所提交的一份报告中说："国内由于族际关系急剧尖锐化，居民被迫迁徙已呈现出广阔的规模。超过60万人已经离开常驻地点。而且这一进程在许多地区仍在持续并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总的来说，难民问题涉及8个加盟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的半数地区，他们独自行动或经过有组织的运送奔赴这些地区。一系列共和国中分离主义倾向的增强，可能导致不久的将来迁徙的人流急剧增多。因为目前生活在本民族形成地域之外的人超过6000万，其中有2500万俄罗斯人。但被迫迁徙的问题所牵涉的不单是俄罗斯居民，其政治、社会经济后果必将触及居住在我国的所有民族千百万人的命运……开展工作的结果，40余万人的临时住所有了保证，10余万人得到安置，对急需衣服鞋帽者给予了救助。然而所采取的措施与问题的规模和急迫性仍不相称……"①

戈尔巴乔夫唯有运用武力和进行镇压才能遏止这一进程。如果办不到这一点，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必将波及其他地区，其中包括乌克兰。时至1989年9月，民族运动在乌克兰这个苏联第二大共和国的兴起已变得显而易见。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弗·谢尔比茨基的退职、乌克兰天主教徒的集会、以乌克兰获得独立为目标的政治运动"鲁赫"第一次代表大会，都使其成为政治现实。② 事件的这种发展，对于绝大部分苏联政治行政精英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如果苏联领导人采取使用武力的决定，则不

---

① 摘自苏共中央书记处1991年2月4日的决议《关于按照法律、组织和经济原则调节迁徙活动的建议》。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20. Д. 31。

② T. 库齐奥、A. 威尔逊：《乌克兰：改革对独立》，圣马丁出版社纽约版，1994，第100页。

仅会破坏戈尔巴乔夫作为民主派和解放者的威信，破坏他所获得的政治支持的基础，正是这种支持使得他能够经受住对于已启动的改革的抗拒，而且还会对西方舆论对待他的态度产生负面影响。

不使用武力便保住帝国是不可能的；不保留帝国而保住政权同样不可能。在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情况下，想要获得出于政治理由的长期贷款是不现实的，而正是这种贷款有望哪怕延缓日益临近的国家破产及其种种后果。一旦表明获得西方贷款的道路已被堵死，则随之而来的经济灾难必将导致权力的丧失，而且不仅是领袖个人权力的丧失，而是整个共产党高层权力的丧失。种种情况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 1989 ~ 1991 年苏联当局那种乍看起来颇为奇怪的行为的客观基础。

1980 年代人口所发生的变化，非斯拉夫民族青年数量的增加，使军队兵员的补充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其他领土毗连帝国的军队当年也曾遇到类似的困难。军官仍然以斯拉夫人为主，但士兵却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由非斯拉夫民族首先是中亚各共和国的青年增补。如果考虑到精英部队（战略导弹部队、空降兵、空军、海军部队、克格勃部队）主要由斯拉夫族的士兵和军士补充，而陆军（坦克师、摩托化步兵师、炮兵师及其他部队）却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不再是斯拉夫人了，那么，很难指望有效地利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的部队镇压骚乱，特别是在士兵们认为民族和文化方面与自己接近的那些地区。这一来政府当局只得依靠精英部队。然而这些部队的兵员有限，而且动用这种部队不可避免地会加剧使用武力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的宗主国与外族居民之间的冲突。[①]

1989 年 4 月第比利斯学潮期间军人使用了暴力。事后表明，政治领导人并不准备承担责任，而是信誓旦旦地说，对所做出的决定他们谁都一无所知。[②] 这样的声明在社会公众中引起了对统治集团愈加不信任的态度，而一次又一次被政治家们推到风口浪尖的军队也越来越不愿充当替人挨打的孩子的角色。这在 1989 年 5 ~ 6 月间的费尔干纳[③]表露无遗，当地爆发

---

① 与苏联武装力量的多民族性有关的问题，见 A. 阿列克谢耶夫、C. 努里克：《戈尔巴乔夫手下的苏联武装部队》，兰德公司研讨会报告兰德公司出版，1990 年 2 月，第 21、22 页。

② 关于政治领导人中谁也不愿意承担 1989 年春在第比利斯使用暴力的责任，见 A. 索布恰克：《1989 年的第比利斯转折，或血腥的星期日》，莫斯科版，1993。

③ 乌兹别克斯坦城市。——译者注

了一连串针对麦斯赫基土耳其人的大洗劫。亚美尼亚指挥官在直接得到明确的命令之前，一直不肯采取制止骚乱的行动。政治领导人也一再拖延。成千上万人成了政府当局麻木不仁的牺牲品，它在危急关头未能采取必要的紧急行动以保障秩序和保护公民。[①]

五 经济政治局势失控

1989～1990年，苏联领导人愈益丧失了对国内局势的控制。与日俱增的经济困难、消费市场短缺现象的加剧、限额供应商品范围的扩大——凡此种种都在动摇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从而使反共宣传获得群众性的支持。这对各个首都和大城市形势的影响尤其巨大。

苏共中央书记瓦·梅德韦杰夫这样描述1989年春苏联历史上首次进行半自由选举的政治后果："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过程中，160名党委第一书记中有32名落选……在列宁格勒，没有一名市、州两级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当选，没有一名州党委委员当选，包括第一书记甚至军区司令员在内。在莫斯科，党的干部基本上也同样遭遇失败，90%的莫斯科人投了叶利钦的赞成票。"[②] 在伏尔加河沿岸，在乌拉尔，在西伯利亚、远东、乌克兰东南部，在波罗的海沿岸，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党的领导人全都纷纷

---

① 费尔干纳谷地的骚乱起始于1989年5月23～25日，6月3日早上具有大规模的性质。自6月4日早晨开始，大量以刀和斧头、铁棍武装起来的人群冲击土耳其人居住的地点和行政处所，并在那些部门里躲藏起来免遭镇压。一位目击者对这次事件作了如下的描述："从空中可以看到城市、集镇和村庄中的房屋燃烧的熊熊烈焰，有时整个街区都陷入火海。州中心费尔干纳全城到处显露出刚刚经过大火焚烧的斑斑痕迹。在浩罕（乌兹别克城市——译者注），几条街道彻底为化为灰烬。麦斯赫基土耳其人的房屋被付之一炬。"见B. 安德烈耶夫：《费尔干纳：往事重现》，载于《莫斯科BBC》2005年5月13日。http：//news8. thdo. bbc. co. uk/hi/russian/news/newsid 4544000/4544787. stm。费尔干纳事件的结果，死亡103人，致伤致残1011人，焚毁和洗劫住宅757所、国家目标27处。见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费尔干纳州的悲惨事件以及党、苏维埃和护法机关的责任》，载于《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10期第95页。直至4日晚上8时内务部部队才开始采取制止骚乱的坚决行动。至7月5日早上，调来的部队多达6千人。关于影响在费尔干纳延迟动用部队达三天之久的因素，见M. 卢里耶、П. 斯图杰尼金：《焦煳和痛苦的气味——费尔干纳，1989年惶惶不安的六月》，书籍出版社莫斯科版，1990，第4、5页。

② 瓦·梅德韦杰夫：《在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里——内幕一瞥》，壮士歌出版社莫斯科版，1994，第85、86页。

败北。

国内诱发犯罪的环境急剧增大。1990年上半年苏联记录在案的犯罪达151.4万起。这比前一年同期多出25.1万起。使用射击武器犯罪的数量增加了近1/3。袭击公民住所进行抢劫的数量迅速增长。[①] 国家已丧失保障基本社会秩序的能力。

经理选举制和改国家计划为国家订购，在严格的政治控制条件下无异于用以掩盖保留行政性经济管理体制的一种过场。政权的削弱使得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现实。它让企业领导人可以无视上级政权机关的指示，保留国营企业产品的固定价格和放开合作社销售的价格，为大肆进行半合法的重新分配使资源落入私人手中创造了条件。

全苏的、共和国的、州的、地方政权机关的互相矛盾的决定，为企业领导人提供了灵活掌握的广泛自由。这再一次显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点：它只能在保留严格的政治制度情况下运转，离开这种制度便会归于崩溃。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1989年7月9日的决议，显示了一种社会意识的特殊性，这种社会意识尚不具备负责任的民主的经验，但已经不受极权主义政权控制。决议指出了与财政制度紊乱、市场失衡、商品和劳务日益短缺有关的种种问题。决议的作者在确认这种情况的同时，还建议立即提高全体公民养老金的最低额度，增加一、二类残疾人的抚恤金，取消对在国民经济中就业的退休人员和残疾人员退休金的发放限制，不限制劳动报酬幅度等等。[②]

政权的削弱和政治控制的丧失，引发了全苏和各共和国的行政当局展开一场竞赛：看谁能够为苏联财政制度的瓦解作出更大的贡献。1991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利用全苏预算和其他来源的资金共计476亿卢布，以集中的方式落实居民社会救助方面的措施，其中25亿卢布用于将婴儿抚养补助提高到最低工资水平；82亿卢布用于放发年龄从一岁半至六岁的儿童每人每月相当于最低工资50%的补助费；7亿卢布用于发放相当于最低

---

① A. 伊列什、B. 鲁德涅夫：《民警求援，它越来越难以对付日益增长的犯罪浪潮了》，载于《消息报》，1991年1月5日。

②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1989年6月9日的决议《关于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载于《真理报》，1989年6月25日。

工资三倍的婴儿生育一次性补助；197 亿卢布用于落实新的退休金法令中所规定的措施；21 亿卢布用于提高药品及其他保健需求的开支标准；26 亿卢布用于落实居住在切尔诺贝利原子能发电站事故造成放射性污染地区的居民加强健康保障和改善物资状况的补充措施；16 亿卢布用于对所有成绩优良的大学生实行助学金教育；22 亿卢布用于取消和降低公民所得税以增加居民的收入；25 亿卢布用于对文化、卫生、社会保障、国民教育等部门工作人员实行新的工资规定；17 亿卢布用于为某些非生产领域部门的职工建立新的工资率和其他劳动报酬支付条件，此前这些部门尚未实行这样的规定。①

至于在预算危机的条件下要靠什么资金来加以保证的问题，苏联行政当局与俄罗斯联邦当局一样很少为之焦虑不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将不少于 15% 的国民收入用于支援农业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决议，和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种种广有名声却显然不会执行的决议一样，只是说说好听而已。②

1988 年夏天政府领导人致函苏共中央称，不迟于 1989 年上半年必须完成价格改革。③ 刚到秋天便已很清楚，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的决心。1990 年 2 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讲话时说，价格制定体系缺少变革是所欠缺的一个主要环节，因而使得经济改革停滞不前。但他的语气透露出对于国家行政当局是否迈出这一步缺乏信心。他继续说道："必须加紧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党仍然采取原则性的立场。价格制定的改革应当这样进行：它不能影响居民尤其是缺少保障的阶层的生活水平。"④ 1990 年 7 月，他既指出居民的商品供应情况严重，消费市场状况令人无法忍受，同时却又坚决拒绝从提高价格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认为这种想法是荒谬的，他

① 苏联最高苏维埃 1991 年 1 月 12 日第 1897－1 号决议《关于苏联政府对 1991 年国家经济运行和苏联 1991 年国家计划联盟管辖领域的全苏预测》。

② 《俄罗斯联邦第 1～6 次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文件汇编》，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颁布，共和国出版社莫斯科版，1992，第 191 页。

③ 尼·雷日科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Ю. 马斯柳科夫（苏联国家计委主任）、Л. 沃罗宁（苏联物资技术供应总局局长）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发展和深化根本性经济改革和消除其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缺点有关措施的建议》，1988 年 7 月 17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49. Д. 1. Л. 50。

④ 苏共中央全会，1990 年 2 月 5～7 日，《关于苏共中央在党的第 18 次代表大会之前的行动纲领草案》，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2. ОП. 5. Д. 403. Л. 17～21。

只想从一些无关痛痒或深受欢迎的措施开始改革。[1] 下面就是他讲话的一个片断："结果价格问题几乎已经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似乎这俨然就是必须以其开始向市场过渡的唯一措施。向市场过渡时应当首先采取当务之急的一些措施。如今谁都不会再阻碍开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为企业家的活动创造真正的自由，将小型企业、商店用于出租，将住宅、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和部分生产资料列入交易范围。必须加快建立商品和证券的交易所，改革银行制度，让利息政策发挥效力，为出现竞争性的生产部门和联合企业、中小企业创造条件，尤其是在生产大众消费品的领域。"[2]

负责国内经济状况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对此作出回应时坦率地指出："应当说，无论选定何种价格制订方案，不进行价格改革便不可能成功地迈向市场形成之路。最大的错误就是再次像1988年所做的那样表现出犹豫不决，重新将这一异乎寻常复杂但客观上必不可少的任务推延到'以后'。"[3] 他在后来也将拒绝进行价格制定改革视作他担任政府首脑期间所犯的主要错误。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相信：我们的主要错误便是，我们在改革的这一环节上撕断了它的链条……而最为困难的则是与零售价格改革有关的问题。无论生产者、商业部门或每个家庭的利益全都在这里紧紧地纠结成一团。到1990年时，这个领域简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扭曲变态！如果说最近35年以来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增加5.5倍的话，那么国家对价格所做的补贴则超过29倍！单是用于食品的补贴就将近1000亿卢布，而随着在零售价格不动的情况下实行新的采购价，补贴还会增长30%，占到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五分之一。"[4]

---

① 1988年12月初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Л. 阿巴尔金上书国家领导人，其中预告说，提高零售价格可能导致社会动乱，建议将其延后2~3年。见 Л. 阿巴尔金：《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关于完善我国所进行的经济改革的建议》，1988年12月1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50. д. 2. л. 94~138。在1989年11月政府向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必须将零售价格改革问题提交全民讨论的想法。见苏联政府向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关于健全经济、经济改革阶段和制订第13个五年计划的原则立场》，莫斯科，1989年11月，第21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18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2~13日，速记报告，政治书籍出版局莫斯科版，1991，第67页。

③ 《苏联共产党第18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2~13日，速记报告，政治书籍出版局莫斯科版，1991，第67页。

④ 尼·伊·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书籍、教育、慈善"协会莫斯科版，1995，第249、424~425页。

这里引述的是正值有关价格改革的决定对国内局势发展极端重要之时政府的一些往来公文。苏联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B. 先恰戈夫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1990年12月）："由于1991年1月1日将实行新的批发和采购价格，有关立即实行零售价格改革的问题更形尖锐。目前的情况是，国家用于生产和销售各种大众消费品的开支，包括葡萄酒伏特加酒产品和进口商品在内，将超过其销售进款的20%～30%。这就意味着支出与进款之间的差额需要以补充发行货币资金来弥补。国家经济再也无法承受现有的价格扭曲了。"①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Л. 阿巴尔金1990年9月在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中称："在零售价格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转而实行新的批发价和税率，使预算形成的逆差将近1100亿卢布。此外，在预算收入基数减少的情况下，由于有关生活水平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决议已获通过，需要补充拨款的数额达370亿。除本年度的赤字580亿卢布之外，共计需要增补1900亿卢布。"②

在1990年9月制订的建立可调节的市场经济的政府计划方案中，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做了这样的描述："由于国家财政和货币流通混乱，商品货币失衡加剧，通货膨胀进程加速，使得物质生产领域的危机更加严重，'避开'货币，投机的需求，商品全面短缺，在贸易额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许多地区严格实行凭卡定量购货——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现有的分配关系体制已濒临全面瓦解。"③

主管经济的苏共中央书记H. 斯柳尼科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90年）上所讲的一番话，清楚地表明了当时形势的紧迫性和执政党领导人已意识到货币灾难的临近："……四年之中，货币的收入超过购买商品、劳务和各种花销、费用的支出将近1600亿卢布……结果居民在银行账户上的存款增长50%，手中的现金也增加1/3。如此大量涌现的货币使得消费市场陷入混乱，将货架和货摊上的所有商品一扫而光，造成明显的社会紧张，甚至引起民众对改革的怀疑。1200种商品之中，将近1150种脱销。政府所采取的措

① B. K. 先恰戈夫（苏联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函《关于物价制定的管理问题》，1990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270. л. 149。

②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Л. 阿巴尔金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4次会议上的发言，1990年11月26日，速记报告第4部分第196页。

③ 《建立可调节的市场经济结构和机制的政府计划》，莫斯科，1990年11月，第5页。

施不足，效果不大，也不够及时。"①

六 货币危机

俄罗斯的粮食采购量和国际市场上的粮价同时增长，导致苏联用于购粮资金的外汇支出迅速增加。时至1988年，粮食采购开支已增至41亿美元（1987年为27亿美元）。②

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向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主任西塔良报告（1990年4月）："今天一系列外国公司（"Луис Дрейфус"、"фризахер"、"Бунге"等）已经停止向苏联发货，所包租的用于装运粮食和谷物类饲料的轮船已经在港口内停泊了数日，等待问题的解决。"③

外汇灾难如此深重的局面，似乎应该促使苏联领导人关心一下尽量削减外汇支出的事了。根本没有。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看来也不打算拒绝为大规模的对外政治活动提供经费。1989年12月国际部部长B. 法林报告苏共中央："援助'左派'工人组织国际基金多年来都是由苏共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其他许多共产党自愿缴费支撑的。然而自1970年代末以来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同志、1987年以来匈牙利的同志都借口货币金融困难，停止参与该基金。1988年和1989年，德国统一社会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保加利亚共产党并未解释原因，便回避交纳来年预计它们会缴的费用，结果基金全靠苏共拨付资金维持。上述三党分担的费用1987年为230万美元，亦即投入该基金资金总额的13%左右。原规定（1989年12月28日的144/129号决议）1989年苏共向'左派'工人组织国际基金缴纳的费用数额为1350万外汇卢布，按官方牌价折合为2204.4673万美元。1989年基金会共向73个共产党、工人党、革命民主党派和组织提供援助。划拨的总金额达2120万美元，其中到目前为止已交付各党2050万美元。长期按时从基金获得一定款项的各党都高度评价这种国际主义团结的方式，认

---

① 苏共中央全会，1990年2月5~7日，《关于党的第18次代表大会之前苏共中央的行动纲领草案》，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2. оп. 5. д. 403. л. 3。

②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署数据，2005。

③ K. ф. 卡图舍夫（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呈交C. A. 西塔良（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主任）的报告《关于购买粮食和谷物成品的支付》，1990年4月13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515. л. 21。

为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援助形式将其取代。此前已通过适当方式收到这些党派中的大多数党关于1990年向其提供援助的理由充足的申请，有些党还请求大大增加援助额度。1990年苏共向援助‘左派’工人组织国际基金交纳的款额保持与今年大致相当的水平——2200万美元，看来是适宜的。”①

在外汇问题不断增长的压力下，1990年8月苏联领导人决心削减1990年下半年全苏预算中向外国提供无偿援助的拨款6亿卢布。② 然而这已经不足以控制外汇储备的局面。

随着货币危机的发展，政府部门往来公文关于外汇分配、结算状况问题的语调变得越来越激动。“隶属对外经济联络部系统的各个全苏外贸公司所欠西方公司的逾期未付债款，截止到1990年10月1日已达2亿4390万卢布，其中购买黑色金属轧材、薄板和管材5600万卢布，购买食品5000万卢布，购买机器设备3140万卢布，购买专利许可证及附带设备2590万卢布，购买有色金属和精饲料1040万卢布。”③

“由于苏联对外经济银行耽延了开具信用证的时间，‘K. 费季科号’和‘E. 季托夫号’油轮已经在鹿特丹港（25000吨菜子油）和印度尼西亚泗水港（15000吨棕榈油）停泊了一段时间……合同已悉数与外国公司签署。各公司均已准备发运，但在早先已经供货的9780万卢布欠款得到清偿和开具新合同的信用证之前，它们不会批准轮船起航……已经不止一次提出了开具信用证的请求，苏联对外经济银行（T. 阿利别戈夫同志）却一直未作出回应。”④

如果熟悉反映了不断增长的货币危机背景下对外经济银行本身状况的文件，那么T. 阿利别戈夫没有回应也就不难理解了。

---

① B. 法林（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呈交苏共中央的报告《苏共中央国际部的一个问题》，引自1988年12月28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44号记录，П144/129号文件，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38. Д. 55. Л. 1～3。

② C. 西特宁（财政部副部长）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函《关于减少向外国提供援助的拨款》，1990年8月23日，俄罗斯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457. Л. 140。

③ K. ф. 卡图舍夫（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呈送 Л. A. 沃罗宁的报告《关于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全苏外贸联合公司所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公司逾期债务的支付》，1990年11月11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512. Л. 181。

④ A. 卡恰诺夫（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呈送 Л. A. 沃罗宁的紧急报告《关于苏联11～12月份食品的供给》，1990年11月11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512. Л. 195～197。

国家银行行长格拉先科和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管理局局长莫斯科夫斯基为同一件事报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目前苏联各对外经济机构在执行进口计划和政府某些决议中，逾期未付的购货债款约为30亿卢布。作为许多对外贸易联合公司的债务，这种商业性的逾期从表面上看不是国家支付能力的问题。实际上这恰恰是苏联对外经济银行不能履行担保义务的直接后果，这种担保是它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并受政府委托进行的。还必须考虑到，银行所担保的债务总额目前已超过50亿卢布。"①

清楚地认识到对外经济银行缺乏支付能力的现状，令政府领导人极为不安。他们仍在不断收到关于货币危机影响国家经济的越来越糟糕的信息。

各部门继续发来加急电报："……尽管已经得到指示，苏联对外经济银行至今仍未清偿已有的欠债3380万卢布，其中560万卢布为外国公司今年四五月间已经发运的植物油货款，690万卢布为付款逾期的利息，2130万卢布为对方公司于10月~11月初所发运的27.2万吨植物油的货款。此外，至今仍未为总额7150万卢布开具付款凭单……为了避免船舶闲置和外国公司拒绝履行合同义务，谨请您指示苏联对外经济银行无条件执行1990年11月13日的44241号政府决定，立即恢复支付货款。"②

对外经济联络部各联合公司的领导对获得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的答复感到绝望，便直接求助于国家领导人。全苏外贸联合公司"食品外贸公司"经理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报告："全苏外贸联合公司'食品外贸公司'全体职工被迫向您本人请求紧急解决食品的支付问题。联合公司最近数月中曾就这一问题不止一次向政府提出请求。根据今年8月1日的情况，联合公司所欠外国公司的债务为2亿4500万外汇卢布……尽管已经通过了优先支付进口食品的决定，苏联对外经济银行仍未支付食品货款，虽然付款期限已到……由于拖欠货款，联邦德国、法国、新西兰、挪威的供货公司已宣布停止提供动物油、肉、肉制品和奶粉。停止按已签合同发货的还有巴西的肉和肉制品，马来西亚、塞浦路斯的植物油，荷兰的奶粉，瑞典的

---

① В. В. 格拉先科、Ю. С. 莫斯科夫斯基呈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的报告《关于苏联对外经济银行就进口采购的支付发放担保书》，1990年10月1日，俄罗斯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457. л. 133。

② А. И. 卡恰诺夫（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А. М. 别利琴科（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粮食和采购委员会副主任）呈送 Н. А. 沃罗宁的《关于对外经济银行债务的紧急报告》，1990年11月28日，俄罗斯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512. л. 150。

黄油。苏联面临其他许多国家停止发运食品的威胁……中断执行政府的决定和1990年食品进口计划任务，可能在国内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进口食品本应用以供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库兹巴斯和沃尔库塔的煤矿区、秋明的天然气工作者、外高加索各共和国和国内其他一些大工业中心。中断这些地区的进口食品供应，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社会和政治冲突的迅速激化。"①

由于苏联经济依赖于粮食进口，这时候拖欠"食品外贸公司"所签合同的货款显得尤其危险，该公司早已成为一家庞大的境外机构。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沃龙佐夫向苏联政府副主席西塔良报告说："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谨向您报告，全苏外贸联合公司'食品外贸公司'在支付外国供应货款方面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外国公司一直要求立即支付本年度3～6月份所供应商品的货款，并以利息的方式补偿拖欠所造成的损失，这笔补偿金因拖欠的款项巨大目前已将近450万卢布，而且随后每逾期一天即增加16000卢布左右……然而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的担保证书至今未能发放，尽管政府已于1990年1月29日、1990年5月11日、1990年6月27日一再责成其办理。"②

苏联各外贸联合公司的欠债不断增加。这构成了尖锐的国民经济问题。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沃龙佐夫向苏联政府副主席西塔良报告称："按照1990年3月10日的托付，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特此报告：据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的业务资料，本年4月5日的状况是：拖欠各外贸公司委托支付的国外账款总额为6亿5600万可自由兑换卢布……"Pypra3"康采恩公司中的联邦德国公司（有"Маннесманн"等公司）以冻结我国所供给的天然气进款相威胁。"③ 在现有的外汇储备情况下，发往政府的这类函件不可能得到解决。

---

① A.K.克里文科（全苏外贸联合公司"食品外贸公司"经理）呈送尼·伊·雷日科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报告《关于联合公司所欠外国公司的债款》，1990年8月15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514. Л. 57、58。

② B.H.沃龙佐夫（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呈送C.A.西塔良（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报告《关于进口粮食的支付》，1990年8月6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500. Л. 81、82。

③ B.H.沃龙佐夫（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呈送C.A.西塔良（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报告《关于苏联对外经济银行拖欠对外经济联合公司委托支付国外账款》，1990年4月10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495. Л. 2。

时至1990年秋，苏联政府领导人已经公开地谈论对外经济领域的紧急状况。Ю. 马斯柳科夫1990年11月26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对外经济综合体内所出现的形势已接近于紧急状态：一方面，需要清偿国家的债务（这一数额1991年已增长为一笔巨款——90亿卢布），另一方面，由于石油开采量和木材储备量下降、棉花收成减少，形势变得更加困难——这些产品长期以来已经是外汇的基本来源。"①

七　从危机到灾难

1989年工业生产停止增长，并从1990年初开始下降。由于矿工罢工，煤炭开采量也开始急剧下降（见表6-4、表6-5）。

表6-4　1988~1990年苏联的煤炭开采量

单位：百万吨

年　份	1988	1989	1990	1991
煤炭开采量	772	740	703	629

资料来源：1991年之前的数据见《1990年的苏联国民经济》，财政和统计出版社莫斯科版，1991；1991年的苏联数据见《1991年1~9月的苏联经济》，信息出版中心莫斯科版，1991。

表6-5　1988~1990年俄罗斯联邦的煤炭开采量

单位：百万吨

年　份	1988	1989	1990	1991
煤炭开采量	425	410	395	353

资料来源：1991年前的数据见《1990年的俄罗斯联邦国民经济》，共和国信息出版中心莫斯科版，1991；1991年的数据见《1991年简明统计通报》，莫斯科版，1992。

包括焦煤在内的煤炭开采量下降，致使冶金产品减产，这是工业生产总量下降的因素之一。

同时，居民对大众消费品的需求却在增长。苏联国家银行行长向苏

① Ю.Д. 马斯柳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1990年11月26日，速记报告，载于《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莫斯科版，1990，第187页。

联最高苏维埃报告（1990年9月）："在全国许多地区，有些食品已对居民实行凭票供应——粮、肉、黄油和植物油、茶叶、粒粮、通心粉制品……1990年国内市场形势的急剧紧张化，不单是由于居民货币收入的高速增长，而且也是顾客行为改变的结果，他们预料零售价格将会提高，又受到某些经济学家关于进行货币改革或'冻结'存款建议的影响，便想方设法花掉现有的钱——在家中建立储备，过量（与通常相比）购买商品，这就加剧了消费市场的紧张状况。年底前要遏止这种趋势显然不可能。1990年的前9个月期间，居民有计划的储蓄和手中剩余的现金合计增加437亿卢布，而1989年同期则增加384亿卢布；1990年全年增加728亿卢布，1989年则为619亿卢布……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居民现金收入和支出的计划平衡表之后，又作出了一系列决定，将其付诸实施必将导致居民的现金收入无可避免地超过计划数额：关于加速国家粮食采购的措施的决定，其结果将是农业劳动报酬的提高；关于向公民征收所得税和分阶段对鳏寡孤独和小家庭公民减税的决定（自1990年7月1日起执行）；关于增加助学金的决定（自1990年9月1日起执行）；关于在退休金方面实行补充优惠（自1990年10月1日起执行）和对有儿童的家庭实施社会保护（自1990年12月1日起执行）的决定。单单由于上述措施，1990年下半年居民的现金收入就会额外增加90亿卢布。"①所有这些措施都得靠开动印钞机来提供经费，对于这一点，那些采取这类决定的人也都一清二楚。

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И.波戈索夫向苏联部长会议报告（1990年11月）说，商品短缺成为越来越尖锐的问题，投机性需求日益加剧。商品购买量的不断增加，正是消费者对卢布贬值的针对性反应。他注意到，居民的供应情况由于1990年下半年起进口开始减少而更加严重。如果说1990年上半年进口数量增加11%的话，那么第3季度却减少了17%，而10月份则减少25%。他指出，市场商业部门的食品储备10个月中减少29%。8~10月间实际上所有各种食品都已脱销。居民甚至在合作社商店里出高价都很难买到肉和肉制品。集体农庄市场的价格加速上涨。6月份

---

① В.В.格拉先科致苏联最高苏维埃计划和财政预算委员会В.Г.库切连科同志函《关于1990年的货币流通》，1990年9月19日，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ф.2324.ОП.33.Д.741.Л.69~74。

与去年同时期相比已上涨27%，10月份更上涨38%。9个月中，列宁格勒肉制品供应计划仅完成73%，莫斯科则完成60%。1990年中期，160种日用商品中敞开供应的一种也没有。[①]

八 “紧急努力”代替改革

1990年春围绕着经济改革计划的例行辩论期间，戈尔巴乔夫未能做出决定，既不赞同Н. 彼得拉科夫提出的激进计划，也不认可在Л. 阿巴尔金领导下起草的较为温和的计划。他推迟作出选择。然而，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迫使政府采取行动。延迟做出决定已无可能——这是1990年4～5月间那场社会性辩论中最主要的话题。苏联政府将一些建议提交1990年4月17～18日的总统会议和联邦会议讨论，这些建议设想了一整套克服经济危机状况的措施，首先针对的是减少预算赤字、保障消费市场平衡。[②] 1990年5月22日，雷日科夫的政府就转入由市场经济调节的五年计划发表谈话。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便是从1990年7月1日起将面包的价格提高3倍。还提出自1991年1月1日起提高其他食品的价格。

1990年5月，全苏社会经济问题舆论调查中心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提供信息称，56%的被询问者支持转入市场经济，但60%的人认为这在较短期间不会产生正面结果，还可能引发政治危机。[③] 同一机构于1990年12月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全国56%的居民认为经济形势危急，37%的人认为不尽如人意。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1990年比前一年更为艰难。对于预计未来数月内苏联的情况将会如何的问题，70%的被询问者回答说，他们预料情况还会恶化。超过半数的居民（54%）认为1991年可能面临经济灾难，49%的人认为会出现大量失业，42%的人认为会发生饥荒，51%的人认为会断水断电。70%的被询问者认为，最近一两年来他们的物质状况恶化了。令人们感到担心的主要问题是：日子难过，家人的食品和日用必需

---

① И. А. 波戈索夫（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呈送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关于1990年1～10月份各企业和机构在充分满足消费市场日用消费品需求问题方面的工作》，1990年11月26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268. Л. 109～116。

② 尼·伊·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第421页。

③ 全苏社会经济问题社会舆论调查中心快速报告《居民对加速转入市场经济可能性的态度》，1990年5月22日，俄罗斯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2. Л. 225。

品的供应，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最让苏联民众焦虑不安的是食品供应急剧恶化，肥皂、服装、布匹、鞋子和其他一些日用品脱销。[①] 对于苏联何时能摆脱危机的问题，1991 年初 45.8% 的被询问者回答说不早于 2000 年，12% 认为永远不可能。60% 的被询问者认为，苏联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短缺、排队和贫困。1989 年末，52% 的被询问者完全赞同戈尔巴乔夫的活动。时至 1990 年末，支持他的人数已减少到 21%。1988 年有 55% 的人回答说，他们准备将戈尔巴乔夫命名为“年度人物”。1990 年这个比例则下降至 12%。[②]

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破除了对权力的恐惧基础，铺平了消解政权意识形态基础的道路。这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是沉重打击，它打击了 1928～1929 年以来显得根深蒂固的一种信念：国家政权运用暴力资源能够统一地筹集到粮食并进行重新分配。1989 年通过的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超过计划所上交粮食支付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决议是一个明显的征兆：国家政权机关已丧失了以直接强迫的方式保证粮食储备的能力。

政权机关为戈尔巴乔夫起草的苏共中央 1990 年 10 月 8 日全会上的开幕词提纲中，对当时的形势是这样描述的：“……消费市场的情况极为困难，经济关系严重失调，交通运输混乱，国家纪律显著松弛，围绕着所有权、自主权和职权范围划分问题的政治冲突有时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犯罪持续增加——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目前危机仍在继续深化……”[③]

Г. 亚夫林斯基与此同时发表的谈话中也说：“现在应当学习在严重通货膨胀的条件下生活。这也是一项独立进行判断的工作，其中需要高度的职业技能，需要巨大的责任心和勇气。不过必须记住：这项工作既不容许民粹主义、歇斯底里发作，也不容许对任何人的政治依赖。”[④]

1990 年 11 月 16 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谈及当前食品供应方面的形势：“在筹备全会的过程中，我对国内形势有了一个全面

---

① В. Л. 科斯马尔斯基、Л. А. 哈胡林娜、С. Л. 什皮利科：《关于转入市场经济的社会舆论》，科学报告，全苏社会经济问题舆论调查中心莫斯科版，1991，第 8 页。

② S. 怀特：《戈尔巴乔夫及他之后》，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版，1991，第 239、247 页。

③ 1990 年 10 月 8 日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开幕词提纲，“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档案馆，引自 Г. 沙赫拉扎罗夫基金会 15368 号档案第 14 页。

④ Л. 普列沙科夫：《下一步怎么办？Г. А. 亚夫林斯基访谈》，载于《星火》杂志 1990 年第 44 期 10 月号，第 5 页。

的了解，但并不完全清楚。我彻底查明了一切，而且应当告诉大家：为了稳定粮食供应，还需要作出紧急的努力。"①

苏共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 Б. 吉达斯波夫在同一次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说，"目前的形势当然非常困难。我早晨去上班，看见成百上千的人排队。我就想：此刻要是有谁呼地一声砸破橱窗，列宁格勒就会爆发反革命事件。那时候我们将无法挽救国家。"②

然而苏联总统所坚持的紧急努力并未能产生效果。国家的根本性财政问题不可能用空谈来解决。需要的是行动和政治毅力。这些却都没有。消费市场的状况继续恶化。

苏联商业部部长 K. 特列赫报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1990年 12 月）："根据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11 个月中，商业部门提供的大众消费品较预定的商品保障计划少 217 亿卢布，其中食品少 43 亿卢布……轻工业商品少 61 亿卢布，其他非食品类商品少 120 亿卢布……特别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城市居民的畜产品供应情况。然而由于没有偿还本年度的欠债，1991 年第 1 季度的采购也缺乏外汇，对外经济联络部已不能保障 1 月份的食品供货，这将导致对莫斯科、列宁格勒两个城市的居民和其他集中消费人群供应的中断……用于进口轻工业品的拨款减少，对这些商品的供应将会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进一步将布匹、服装、鞋的储备投入商品流转，1991 年第 1 季度这些物品的供应情况将会更加严重。仅仅在 1990 年，这类商品即已减少 70 亿卢布……考虑到商业部门非食品类商品极为紧张的状况，苏联商业部请求苏联部长会议为 1991 年进口这些商品划拨所需的外汇资金，以便在今年第 4 季度以预支方式开始采购。苏联部长会议已对苏联国家计委做出相应的委托。"③

1990 年年中时，合作社商品的价格高出国家零售价一倍，集体农庄市

---

① 1990 年 11 月 16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速记记录，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42. д. 30. л. 16、20。

② Л. 普列沙科夫：《下一步怎么办？Г. А. 亚夫林斯基访谈》，载于《星火》杂志 1990 年第 44 期 10 月号，第 5 页。

③ K. 3. 特列赫（苏联商业部部长）呈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同志的报告《关于 1991 年第 1 季度大众消费品的资金》，1990 年 12 月 25 日，俄罗斯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1046. л. 138 ~ 142。

场价格则高出两倍。①

苏联国家储蓄银行副行长 B. 索洛沃夫向苏联部长会议报告（1991 年 1 月）："1990 年期间存款金额增加 436 亿卢布，1986～1990 年合计吸纳存款 1650 亿卢布，1990 年存款余额增加 12.9%，整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 70%，至 1991 年 1 月已达 3814 亿卢布……存款额度方面的结构变化是在下述影响下发生的：居民的支付能力未获满足的情况大幅度增长，商品的平均价格提高，以及某些社会集团居民的收入产生的差别扩大化……1990 年年底苏联国家银行在资金支付方面所欠苏联储蓄银行债款共计 3 亿 310 万卢布。我们认为，与苏联国家银行之间相互结算的调整问题应于 1991 年获得解决。"②

"由于国家计划的主要任务未能完成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经济发展中的比例失调，1990 年投入流通的货币达 266 亿卢布，大大超过以往历年（1986 年发行 43 亿卢布，1987 年发行 59 亿卢布，1988 年发行 120 亿卢布，1989 年发行 179 亿卢布）……国民经济中的劳动报酬基金，包括合作社的劳动报酬在内，1990 年比 1989 年增加 680 亿卢布或 16 个百分点，超过计划 440 亿卢布……1990 年消费市场的状况恶化，实际上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发生脱销现象，出现了对食品和非食品类商品的投机性需求。食品供应不足引起集体农庄市场的价格飙升。1990 年集体农庄市场的物价比 1989 年上涨 29%，而 1986～1989 年期间的涨幅为 11.1%……同时还继续提供贷款以弥补国家预算赤字。1990 年的国家债务增加 1500 亿卢布，对经济、财政、货币流通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③

据国家统计委员会估计，1990 年连同黑市在内的消费价格综合指数为 105.3%。未能满足的需求的增加额，国家统计委员会估计为 550 亿卢布。④

---

① Н. Г. 别洛夫（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呈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的报告《关于大众消费品的价格》，1990 年 8 月 7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277. Л. 29。

②《1990 年苏联储蓄银行对会议决算的说明报告》，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3. Д. 747. Л. 4、7、25。

③ 致 А. В. 沃伊卢科夫同志（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局副局长）的函件《关于 1990 年的货币流通管理工作》，1991 年 3 月 25 日，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3. Д. 741. Л. 172、173、174、179。

④ В. Н. 基里琴科（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主任）呈送苏联总理 В. С. 巴夫洛夫同志的报告《关于 1990 年的通货膨胀和居民未能满足的需求的规模》，1991 年 1 月 23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185. Л. 97、98。

各首都城市首先是莫斯科享有特权的供应条件，常常被统治集团视作可资对国内政治局势保持控制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尽管苏联领导人已经非智力化，但对于为布尔什维克掌权铺平道路的俄国革命是从首都食品骚乱开始的这一点，他们还是懂得的。时至1991年初，即便在莫斯科，消费市场的形势亦已变为灾难性的了。

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Ю. 卢日科夫致函苏联总理B. 巴夫洛夫（1991年2月）称："莫斯科商业部门所掌握的全部非食品类商品仅为51亿卢布，亦即去年的42%。进口商品在布匹、服装和鞋等资源中的比重历年都达到55%，今年却计划减少进口商品供给量75%。但即便是这样的调拨数量目前也未能落实……在现有的商品补给情况下，连对居民安排定额供应都不可能。据此，莫斯科市委执委会请求研究并认真解决关于向莫斯科提供非食品类商品和专门向首都进口商品首先是日用品的问题。"[①]

在非首都的各大城市，消费市场的情况更糟。下诺夫哥罗德市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上书戈尔巴乔夫（1990年12月）说："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下诺夫哥罗德市的居民食品供应状况已恶化到了极点。所调拨的存货无法保证哪怕以近于急救的标准向诸如儿童、孕妇和哺乳妇女之类的居民供应基本食品。国营商店部门除了定额供应的商品之外，实际上已经没有了食品。在这种情况下，市里在按照已发放票证供应肉类、砂糖、动物和植物油等方面对居民形成了很大一笔欠债。"[②]

对矿工有利的大众消费品再分配事例，哪怕只是一种承诺，也不可能不影响到对苏联经济运行至关重要的其他部门首先是石油天然气部门的形势。1990年3月10日《秋明真理报》上发表了一封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沙拉耶夫的信，秋明州石油天然气工作者工会委员领导人H. 委福诺夫警告说："如果4月1日之前不对石油天然气工业部门劳动集体屡次向苏共中央和政府发出的请求作出回答，劳动集体准备让各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停产。"[③] 最后通牒的结果是，决定向石

---

① Ю. M. 卢日科夫（莫斯科苏维埃执委会主席）致苏联总理B. 巴夫洛夫同志函《关于保障莫斯科市居民对非食品类商品的需求》，1991年2月26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ф. 5446. ОП. 163. Д. 1049. Л. 35、36。

② 下诺夫哥罗德市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致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的呼吁书，1990年12月，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ф. 5446. ОП. 163. Д. 1047. Л. 12。

③ 《以秋明估量社会经济冲突》，载于《莫斯科新闻》1990年4月1日第13期第8版。

油天然气开采企业划拨一部分所开采的油气产品供其出口和在国内销售。这减少了本来数额即已微不足道的可供国家支配的外汇收入。

苏联最高苏维埃就提高零售价格一事向苏联人民发出的呼吁书中说："全国居民的面包和谷物产品供应形势危急……1989 年全国对粮食的需求将近 40% 通过从国外进口的途径来满足。这就意味着所消费的每公斤面包中，有三分之一的费用属于外汇开支。"①

货币危机也影响到工业生产。古比雪夫冶金生产联合公司（科研生产联合企业和全苏轻合金研究所）、斯图皮诺冶金联合企业、白卡利特瓦冶金厂、乌拉尔地区卡缅斯克冶金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冶金厂、苏联航空工业部轻合金厂的经理们上书苏联总统米·戈尔巴乔夫同志（1990 年 10 月）："……初级铝的供应情况导致各冶金厂的许多压延车间停产。1990 年的前 9 个月中少供应 35000 吨初级铝和 15000 吨再生铝。1990 年 10 月在铝轧材国家定货项目下，Л. А. 沃罗宁同志通过 1990 年 9 月 24 日的 ЛВ－10－172 号电报，补充要求苏联冶金部各铝厂发运 2 万吨初级铝供出口。这将导致轧材设施停止运转，劳动力闲置，许多家庭丧失维持生计的工资。8 万订货者——各工业部门的金属加工企业，将得不到 15 万吨铝轧材，完不成生产价值超过 120 亿卢布的大众消费品的计划。工厂停产所产生的后果，以出口铝所购得的任何产品都无法弥补。考虑到这种种情况，我们只得请求您明察目前的情况并给予帮助，为苏联航空工业部各冶金厂提供 1990 年国家定货用的初级铝，让工人有工作，劳动者家人有维持生计的条件。我们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同志所提出的请求迄今未得到明确的结果。"②

如果说 1989 年在讨论经济政策和国内所出现的形势时普遍使用的流行词语是"危机"，然后是"尖锐危机"的话，那么，到 1991 年初时使用越来越频繁的则是另一个词："灾难"。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稳定经济和向市场关系过渡的计划中说："共和国的经济日益濒临一个界限，越过它，需要谈论的已经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灾难……经济的不可

---

① 苏联最高苏维埃《为提高零售价格告苏联人民书》，1990 年 6 月 12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777. Л. 83。

② 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8. Д. 45。

控程度已达到灾难性的规模。"① 还有一个当时在描述国内形势的官方文件中常常提到的词："紧急"。1991 年 1 月 25 日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议就名为《关于批准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紧急委员会条例的决议》。这明显与 1918 年的实际情形相类似。列宁格勒行政当局向政府报告："列宁格勒市在居民肉品乳品供应方面所形成的紧急状况使得我们不得不向您报告如下：食品贸易总局 1991 年 3 月 15 日的第 2/10 ~ 20/615 号函规定列宁格勒的肉制品市场储备量为 51.2 万吨，亦即保持去年的水平……然而食品贸易总局计划从各加盟共和国获得的总共才 17.38 万吨，仅为去年水平的 62%。"②

还有一份颇具那个时期典型特色的文件可作例证：1991 年 1 月 26 日的第 YΠ - 1380 号总统令《关于与经济怠工和经济领域其他犯罪行为进行斗争的保障措施》。这个名称对于熟悉 1917 ~ 1921 年现实情况的人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生产量持续下降（见表 6 - 6）。燃料原料部门的生产下滑速度最快。燃料开采量比 1990 年同期减少 6%，其中石油减少 10%（俄罗斯为 11%），

表 6 - 6　1991 年独联体和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
（当年下降速度，%）

	独联体	俄罗斯
所产生的国民收入	15.0	13.0
用于消费和积累的国民收入	16.0	12 ~ 13
其中：		
积累基金	25.0	24 ~ 25
消费基金	13.0	11 ~ 12
国内生产总值	17.0	13 ~ 14
工业产量	7.8	3.0
零售贸易额	18.3	7.7

资料来源：《1991 年的俄罗斯经济——趋势与前景》，经济政策研究所莫斯科版，1992，第 31 页。

① 《摆脱绝境 ·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稳定经济和向市场关系过渡的计划》，载于《共青团真理报》，1991 年 4 月 23 日。

② H. A. 特列季亚科夫（列宁格勒肉、油和奶类商品批发贸易联合公司总经理）呈送总理 B. C. 巴夫洛夫同志的报告《关于居民食品供应的极其严重的形势》，1991 年 6 月 11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1047. Л. 39。

煤减产 10%（俄罗斯为 11%）。

现摘引经济政策研究所采集的一些资料。[①] 石油开采量急剧下降：如果说 1988 年俄罗斯的开采量是 5 亿 6900 万吨的话，则 1991 年预计的产量仅为 4 亿 6100 万吨。因此，整个 3 年之中石油开采量减少将近 20%。同时，开采量下降的速度也逐年加快（1991 年俄罗斯方面为 5500 万吨）。1991 年独联体和俄罗斯的石油开采量仅相当于 1970 年代中期。减产的主要原因为一系列老产区的油已经采尽，加之由于投入本部门发展的财政资金和物质技术资源急剧减少，致使在新的生产能力投产方面落后。

当前石油开采工业发展的特点是：高产油田的储量采尽程度高，原料基地的结构恶化，新的和仍在开采的油井出油量减少，所采石油的含水量升高，设备和材料无保障的情况日趋严重，生产基础设施耗损严重，采油区的生态状况恶化。在工业等级的石油储量结构中，低效等级的份额显著增加。如果说第 12 个五年计划之初这一份额为 34%，而主要采油地区（秋明州）为 44% 的话，那么到 1991 年初已相应占到 45% 和 57%。这与新增储量中高效的份额减少（西西伯利亚地区从开发初始阶段的 88% 减少为目前的 25%）和高产储量油井大多（超过 60%）已采尽有关。

1991 年由于出口量急剧下降，独联体和俄罗斯对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内部消费减少不多。石油的出口则减少 50%。

开始于 1989 年的煤炭采掘量下降在 1991 年时骤然加速。1991 年俄罗斯的煤炭采掘量为 3 亿 5200 万吨，比 1990 年的水平低 11%。[②]

消费品的日益紧缺和生产的下降，是在政权机关明显丧失驾驭经济进程能力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央委员会农业政策部副部长 A. 符拉索夫和 И. 斯基巴呈交苏共中央的报告（1991 年 3 月）《关于加强与经济领域的犯罪进行斗争的必要性》中说："正当斯维尔德洛夫、彼尔姆、车里亚宾斯克、克麦罗沃、伊尔库茨克、赤塔等州以及俄罗斯联邦的其他许多地区、外高加索和中亚各共和国向苏共中央、国家政府提出给予食品救助的紧急请求之际，今年 3 月初在一些港口的仓库里由于同样的原因（缺少车皮）却积

---

① 经济研究所（后来在其基础上成立了过渡时期经济研究所）建立于 1990 年末～1991 年初。其创始人认为研究所最重要的任务是分析和预测苏联经济严重危机的发展过程，同时对经济政策提供建议（从建立至今该研究所均由本书作者担任所长。——译者注）。

② 《1991 年的俄罗斯经济·趋势与前景》，第 38～40 页。

压着9000吨易腐食品，1万吨粒粮、茶叶、咖啡、糖果和通心粉制品，17.9万吨白糖……与此同时，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的伊万诺夫、诺夫哥诺德、下诺夫哥罗德以及其他许多州却在实行面包定额消费。"[①] 财政危机、消费市场崩溃和政府当局丧失对商品流转甚至运输工具的控制能力——这是一些齐头并进、相互强化的进程。

1991年1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下令联盟共和国货币委员会于2月1日之前解决外汇拨款问题，用以在国外购买粮食和保障生产计划内食品所需的原料。[②] 涉及这一时期石油工业形势和苏联结算情况等问题的来往公文使人毫不怀疑：这一命令并未得到执行。

苏联国家物资技术供应总局副局长呈送苏联政府的报告称："这样，早在今年1月份苏联石油天然气工业部门各企业比规定的任务少提供300万吨用于加工的原油，招致区域间供发动机、锅炉和火炉使用的燃料供应极不稳定……本年度油品生产形势危急。用于生产发动机机油的添加剂历年都是通过进口采购。由于苏联对外经济银行未能清偿外国公司1990年提供添加剂的债款，也没有划拨供1991年第3季度使用的经费，外国公司停止发运添加剂，于是供应农工综合体和海洋、铁路、航空运输以及其他极其重要的用户的发动机机油生产实际上陷于停顿。此外，进口采购油品的问题至今未获解决，其中包括用于电气技术工业的变压器油，用于轧钢机的冷却油和医用石蜡，这些油品的生产都不能满足国民经济的需求。为了充分供给国民经济各需求部门和国防需要的发动机燃料和油品，最低限度的需要量也必须达到：（1）供应今年第1季度加工之用的原油再增加400万吨，亦即达到1亿1600万吨，为此可相应减少石油的出口量。万一第1、第2季度石油加工无法保证达到所规定的数量，就必须由政府采取决定，对国民经济各需求部门（农工综合体除外）实行限量供应：车用汽油限定为1990年同期消费水平的70%，柴油为85%……（5）责成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立即偿付1990年为购买添加剂所欠的债务；从统一来源划拨1亿7430万外汇卢布用于预付1991年上半年采购添

---

① A. 符拉索夫（苏共中央农业政策部副部长）呈送苏共中央的报告《关于加强与经济领域的犯罪进行斗争的必要性》，1991年3月18日，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20. д. 49. л. 8。

② 苏联总统1991年1月10日 УП－1303号命令《关于改善1991年食品状况的紧急措施》。

加剂、试剂、原材料和润滑油的货款，并以出口石油产品收入的资金支付后续的赔偿费。”①

“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谨报告本年第4季度完成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发运工作计划方面出现的灾难性局面。”② 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A. 卡恰诺夫致函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Л. 沃罗宁称：“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迫不得已报告：尽管经您责成（1990年11月的ЛЛ－43655号文件），供货单位仍未完成今年第4季度出口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发运计划……这样，如若情况不能改变，则10～12月期间将较工作计划少发运价值约5亿外汇卢布的400余万吨石油和石油产品。”③

1991年夏讨论石油部门的状况时，话题必定涉及比一年前看似灾难性的数字还低得多的一些数字：“在对决定草案进行平衡计算时，所采用的基本上都是经各个部加以明确的水平：1991年的石油及液化天然气的开采量为5亿1840万吨，而不是先前预计的5亿2880万吨，供应加工用的数量为4亿480万吨，而不是4亿5110万吨，煤炭采掘量预计为6亿4100万吨，实际只有6亿3300万吨，其中炼焦煤仅1亿6150万吨，而非1亿8690万吨。”④

外汇的危急形势对各个经济部门发挥功能造成了严重影响，其中包括对国家收支平衡状态至关重要的一些部门。1990年6月12日“天然气工业”康采恩管理局代局长P. 维亚西列夫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C. 西塔良报告：“根据1990年商品进出口计划，规定向国营天然气康采恩提供为数1亿8602.4万卢布的物资技术资源。目前各外贸机构已与外国公司签订了

① B. H. 科斯秋宁（苏联国家物资技术供应总局副局长）呈送苏联第一副总理B. X. 多古日耶夫的报告《关于1991年我国国民经济石油产品的供应保障》，1991年1月31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267. Л. 27～31。

② K. ф. 卡图舍夫（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呈送尼·伊·雷日科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报告《关于1990年第4季度石油商品的出口》，1990年10月31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524. Л. 1。

③ A. И. 卡恰诺夫（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呈送Л. A. 沃罗宁的报告《关于1990年出口柴油和炉用燃料的供货情况》，1990年11月23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2. Д. 1523. Л. 27。

④ A. A. 特罗伊茨基（苏联经济预测部副部长）、B. H. 科斯秋宁（苏联材料资源部副部长）致苏联国家燃料能源委员会副主任B. B. 马林的函件《关于我国国民经济对1991/92年秋冬期间工作的准备情况（1991年6月12日的第Л9－2902号文委托）》，1991年7月23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1640. Л. 93。

金额为9725.1万卢布的合同。然而由于缺少外汇，所欠外国公司的债款至5月底累计达7210万卢布，其中国营天然气康采恩已偿付1180万卢布。余下的成为欠债，因而未能按所分配的管材、天然气开采设备、汲气联动装置备用零件、部分化学试剂的限额数量签订合同。因此之故，据各外贸机构报告，已停止按所签合同发货，研讨工作处于半停顿状态，为卡拉恰加纳克斯克和奥伦堡的油气冷凝矿区、阿斯特拉罕天然气综合体和其他天然气工业项目提供设备和材料的合同也未能签订。"①

1991年春货币危机已变得无法控制，苏联领导人对这种情况一清二楚。苏联内阁总理瓦·巴夫洛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5次会议上（1991年4月22日）发言时说："国家仍然存在对进口的依赖，尤其是在粮食、轻工业、汽车运输材料和拖拉机制造等方面。国家实质上处于依赖外国贷款的境地。根据去年的贸易结果，我们已成为几乎所有国家甚至东欧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的债务人。如今也应当以可自由兑换货币向他们进行支付。举债的日子自然不会没有尽头。清偿债务的时刻已经来临。如果说1981年用于偿还外债及其利息我们拨出的款项是38亿可自由兑换货币的话，那么今年需要偿还的债款已经达到120亿。考虑到我们的国内价格水平，这无异于损失了将近600亿卢布。"②

1991年春的苏共中央材料中称："……医疗工业发展的低速度，长时期面向经互会成员国大量采购药品的方针，近年来对医疗制剂和医用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这一切都导致这些商品对居民的供应状况极度紧张。

医疗业务常用的3000种药物之中，1/3我们根本不能生产，其余的产量也仅及需求量的40%。由于基本生产设施过度耗损，国产药物制剂的质量低下。

不足的制品向国外采购，每年要耗费15亿~20亿卢布，由于众所周知的外汇拨付的困难，造成了包括最简单的急救用药在内的实际上所有的

---

① P. И. 维亚西列夫（"天然气工业"康采恩管理局代局长）呈送C. A. 西塔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报告《关于1990年的外汇划拨》，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5446. ОП. 162. Д. 1492. Л128。

② B. C. 巴夫洛夫总理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1991年4月2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速记报告，苏联最高苏维埃莫斯科版，1991，第84页。

各种药物都持续紧缺。没有苏联对外经济银行对1991年的支付担保，加之去年未能偿还的为数将近1亿8000万卢布的债务，造成了连已经签订合同的进口药品实际上也都不能到货。

这个问题触及全国民众的利益，已经从社会经济问题转化而为政治问题，影响到社会局势，对党和政府活动的评价留下负面印记。"①

保证药品供应——这只是没有外汇便无法解决的问题之一。危机已波及国民经济所有的新部门。1991年4月22日总理瓦·巴夫洛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发言时说："因此之故，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积累基金将会十分显著地减少，这既会严重影响农村，也会严重影响社会领域：我们无法修建住房、医院、学校、道路。应当公开说明的是，全国居民的物质福利消费水平至少会下降15%～20%。"②

M. 季莫希申致函苏联部长会议（1990年6月）称："下半年向国民经济供应的上述油脂原料将短缺65.058万吨，从8月份开始便会引发生产肥皂、人造奶油和其他各种食品的原料供应间断，损害对市场消费者以及国民经济至关重要部门的植物油供应。"③

食品供应对政府而言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而要确保农工综合体的工作哪怕做得稍微令人满意一点都需要资金，包括提供大量无机肥料。但在这方面外汇资金不足同样构成严重的问题。农业化学联合会主席H. 奥利尚斯基报告部长会议副主席C. 西塔良："国家农业化学联合会有义务按照国家计划和政府指令保证向国民经济提供价值4亿8640万卢布的商品。根据今年10月29日的情况，已提供的2亿6170万卢布的化学产品中，仅支付了1亿1720万卢布，此时已拖欠外国公司超过6～9个月。"④

农业技术装备供应形势的发展也颇为类似："由于本部门生产联合公

① 引自1991年5月27日呈送苏共中央的报告《关于居民和保健机关的药品和医用产品供应的紧急情况》，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ф. 89. ОП. 20. Д. 50。

② 苏联总理B. C. 巴夫洛夫的发言，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1991年4月22日，速记报告第88页。

③ M. Л. 季莫希申（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粮食和采购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呈送苏联部长会议的紧急报告《关于1990年国民经济的油脂供应》，1990年6月18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ф. 5446. ОП. 162. Д. 1492. Л. 42。

④ H. M. 奥利尚斯基（国家农业化学联合会主席）呈送C. A. 西塔良（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主任）的报告《关于国家计划方面的义务问题》，1990年10月31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ф. 5446. ОП. 162. Д. 15. Л. 87。

司和企业的物资技术资源供应不足，当前汽车拖拉机和农业技术装备的生产处于前所未有的停滞状态……已经通过的关于按1990年第1季度水平供应1991年第1季度所需物资的决定，并未能保证企业的全部需求，因为缺少外汇，1亿560余万可自由兑换卢布的进口金属产品、化学材料和其他各种材料并没有到货……原料方面的现有状况使得生产时松时紧，导致劳动集体中的不满情绪增长，罢工思潮蔓延。"①

1991年4月，苏联内阁关于摆脱经济危机的行动计划草案的作者们这样看待当时的国内局势："1991年的主要任务在于防止经济混乱和崩溃，为稳定生产进程和经济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为达此目的，必须会同各共和国——立即清除许多地区和共和国在商品流通道路上人为设置的行政和经济障碍，使企业和地区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保证完成最重要的物资首先是满足农工综合体所需物资的供应，使其加工部门的新设施投入运转，生产日用必需品，保持国家的出口潜力……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苏联内阁将与立法和执行机关相配合，坚持实施强硬的反通货膨胀的财政信贷政策，同时实行批发、采购、零售价格的自由化，千方百计激发商业活力。"②

九　濒临崩溃的边缘

外汇状况变得越来越危险。从1989年年中开始，国家已濒临宣布自己丧失支付能力的边缘——苏共中央社会经济部部长如此向一位政治局委员报告：根据文件，1990年苏联的支付平衡逆差达171亿美元，1991年的外债当期应付金额为207亿美元。③

如果不是西方领导人自己便是他们的经济顾问已十分清楚，提供资助或低息长期贷款并不能解决苏联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不能实现认真的稳定财政计划和经济自由化，所拨付的专款便会用于试图填补预算和支付

---

① 苏联汽车和农业机械制造部党委致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B. A. 伊瓦什科同志函，1991年4月11日，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ф. 89. ОП. 22. Д. 32。

② 《苏联内阁摆脱经济危机的行动计划草案》，莫斯科版，1991年4月，第5、6、15页。

③ 在目前所能见到的档案材料中，并没有发现这份文件。我是按照公开发行的报刊上所发表的方式进行引用。作者们的声誉不容对其真实性产生疑问。见E. 阿尔巴茨、Б. 鲍威尔：《国家的黑色钱柜》，载于《商人报》，1999年4月21日第67期。

平衡中不断扩大的窟窿。到手的资金耗尽之后，国家重又会遭遇同样的那些问题。

苏联总统顾问 B. 扎格拉金于 1990 年 7 月末致函苏共中央说："从经济的角度看，实际上所有外商的主要动机都可能是这样形成的：危机日益严重，但总的看来，暂时还没有摆脱危机的某种明确计划。如果有，为什么不加以实行呢？"①

1990 年，七大国领导人责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苏联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就一些问题提出建议，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构成向苏联提供有效财政援助的前提条件。向这些机构的专家们解释，说苏联的问题是可以调节的，不必制定和开始实行旨在消除宏观经济不平衡度的措施——那是不会有多少效果的事情。于是开始了苏联领导人与西方领袖之间拖延不决的对话。对话的实质，从苏方来说——急需要钱，否则我们将面临灾难，就西方而言——请制定出可以让国家摆脱危机的明确的行动计划，届时才可以讨论财政援助的问题。②

苏联领导人向西方领袖们说话的语调是急切的，寻求援助的请求越来越执著。苏联总统助理 A. 切尔尼亚耶夫的日记中说："晚上我们坐下草拟戈尔巴乔夫致科尔的信件。他没有打电话向科尔提出自己的请求，而这可是'SOS'③：因为有些州已经发生饥荒，顿巴斯正在罢工，同时高呼'打倒总统！'各大城市商店里的货架绝对名副其实地空空如也。M. C. ④ 请求科尔火速施以援手，迫使银行提供贷款，同时以我国从德国撤军时遗留的军产作抵押预支一笔款项。"⑤

---

① 摘自资料《关于对苏联形势及其演化前景的某些西方评价》，1990 年 7 月 31 日，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档案，引自切尔尼亚耶夫基金会第 8459 号档案。

② A. C. 切尔尼亚耶夫：《1991 年：苏联总统助理的日记》，TEPP、共和国出版社莫斯科版，1997，第 125 页；R. 布赖特怀特：《跨越莫斯科河·世界完全颠倒》，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伦敦版，2002，第 249 页；J. F. 梅特洛克：《亲历帝国：美国大使对苏联的描述》，兰登书局纽约版，1995，第 510、511 页。

③ 国际紧急呼救信号。——译者注

④ 戈尔巴乔夫本名和父称的缩写。——译者注

⑤ A. C. 切尔尼亚耶夫：《1991 年：苏联总统助理的日记》，第 115 页。关于米·戈尔巴乔夫试图向德国和美国筹集含有政治动机的国家贷款，亦见 J. F. 梅特洛克：《亲历帝国：美国大使对苏联的描述》，第 531、532 页。

关于苏联领导人在多大程度上为获得西方援助操心，再三为此提出请求，下面这份颇具时代特色的文件做了很好的描述。西塔良报告戈尔巴乔夫："已向联邦德国代表团转达苏方的综合建议：首先采取援救措施，自1991年初起向苏联提供粮食、药物、日用必需品。同时我们希望从德国和其他欧洲共同体国家以同样的援助方式获得11亿卢布的粮食，40万卢布的药品，20万卢布的医疗技术装备，5亿卢布的大众消费和日用必需品。我方表达了一种愿望：上述商品一部分以无偿援助的方式提供，一部分以合适的商业条件使用优惠的商品贷款，1995年之后再用苏联传统出口商品陆续偿还……此次会谈中已具体商定，在无偿的基础上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政府和西柏林参议院的储备中提供为数4亿1500万马克的食品和消费品（供应莫斯科）。"①

严重的赤字使得苏联对外经济和对外政策机关的工作陷入瘫痪。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K. 卡图舍夫向苏联总理巴夫洛夫报告（1991年4月）："苏联外经部中央机关的财政状况仍然危急……由于没有支付能力……民航停止向苏联外经部工作人员出售机票，而这些工作人员是为了解决政府间的协议问题而短期赴国外出差的；某些机构警告要切断电话、水电和取暖供应，取消部门外的警卫队……我部已丧失偿还苏联各商务代表处为数60万外汇卢布（相当于180万苏联卢布）的能力，也无法转拨用于即将出差国外进行政府间协定谈判的经费。"②

米·戈尔巴乔夫与乔治·布什、约翰·梅杰进行会谈时重申，1990年末至1991年初西方耗费1000亿美元解决波斯湾危机，不可能不明白防止苏联国内危机事件发展的性质何等重要，完全有必要筹集类似数量的资金，用以帮助苏联领导人解决国内尖锐的财政问题。1000亿美元这个数目，在他与西方领导人的对话中已经提到过不止一次。③

---

① C. 西塔良呈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关于与联邦总理府对外政策局局长X. 特尔契克所进行的谈判（1990年11月27~28日于莫斯科）》，1990年12月7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1192. Л. 113。

② K. ф. 卡图舍夫（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呈送苏联总理B. C. 巴夫洛夫同志的报告《关于对外经济联络部的财政状况》，1991年4月4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45. Л. 9~10。

③ R. 布赖特怀特：《跨越莫斯科河·世界完全颠倒》，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伦敦版，2002，第206页。

西方领袖们原则上准备帮助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为了感谢他收敛苏联的军事威胁或解决东欧的所作所为。他们之中的某些人，首先是赫·科尔，在许多方面都受益于他。此外，嗣后公布的材料表明，德国当局原打算为苏联同意德国统一付出比实际的花费更多的开支。[①] 不过当话题涉及千百亿美元的时候，感谢并不是最有力的理由。事情另有原因。在一个行将瓦解、充斥着核武器的世界性超级大国的领土上发生混乱和族际冲突，这是谁都不需要的。西方领袖们希望保全苏联，这一点在乔治·布什 1991 年 8 月 1 日在基辅讲话的语气中表露无遗。他试图让乌克兰政府和社会公众相信乌克兰脱离苏联是不可能的，他说："自由和独立——这并不是一回事情。美国人不会帮助那些滥用自己的自由、以地方性专制取代先前的暴政的人。也不会帮助那些倾向于欢迎以民族仇恨为基础的自戕式民族主义的人。"[②]

1990 年末，苏联当局不仅公开请求西方提供新的贷款和信贷担保，而且请求给予慈善救助。欧洲议会于 1990 年 12 月通过向苏联提供食品和医疗援助的决议："鉴于苏联通过大众传媒和外交途径不断向欧共体发出呼吁，请求以采取紧急措施提供救援的方式帮助缓解食物和药品不足的状况……兹号召委员会在最短期间通过利用现有基金途径向苏联提供紧急食品救助……希望援助物资的分发能在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委员会应向欧洲议会就这一问题做出工作汇报。"[③]

苏联武装部队领导人也向潜在的敌人发出紧急救援请求。国防部副部长 B. 阿尔希波夫致函人道救助分配中央委员主席列·沃罗宁（1991 年 1 月）称："尊敬的列夫·阿列克谢耶维奇！请求您将来自德国的联邦国防军军用一日量口粮（干粮）分配 800 万份与苏联国防部，用以分发给军人及其家庭成员，这些口粮作为人道援助提供给全苏粮食外贸联合公司并已运抵列宁格勒、塔林和克莱佩德[④]等港口。"三天之后国防部再次致函沃

① Л. М. 札米亚京：《戈尔比与玛吉·一位大使谈两位著名人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全俄科技信息研究所生产出版联合企业莫斯科版，1995，第 110 页。

② A. 科瓦利：《美国第 41 任总统乔治·布什 13 年之后重返乌克兰首都》，2004 年 5 月 21 日，www. ukrinter. com。

③ 《关于向苏联提供食物和药品的决议》，1990 年 12 月 13 日欧洲议会通过，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1028. Л. 25 ~27。

④ 塔林为爱沙尼亚首都，克莱佩德为立陶宛城市。——译者注

罗宁："尊敬的列夫·阿列克谢耶维奇！请求您斟酌能否分配给苏联国防部7000吨来自人道援助的用白铁盒长期保质的面包。"①

1991年4月Г. 亚夫林斯基的一次答记者问摘录：

> M. 列昂季耶夫：现在格拉先科和奥尔洛夫（财政部长）都'明白'财政灾难快临头了。
>
> Г. 亚夫林斯基：尊敬的同志们，亲爱的朋友们！这种事8月刚开头就告诉过你们了。你们却总是肯定地说，情况并不是这样。现在你们怎么就难受了？预算赤字巨大，将近2500个亿，你们都推给了各共和国，搞了那么多的'遮羞布'，要想掩饰实际上的赤字的耻辱。怎么，你们真的认为这种玩意儿会有作用……
>
> M. 列昂季耶夫：最终我们会面临财政体系全面崩溃这样一种局面吗……
>
> Г. 亚夫林斯基：整个情况看来就是如此。②

1991年5月，苏联财政部长B. 奥尔洛夫向苏联内阁提交一份报告，开头的话富有那个时期的特色："苏联财政部现报告有关今年全苏稳定经济基金进款出现的紧急情况。"③

财政体系崩溃与消费市场的崩溃不约而同。即将来临的灾难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见。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上书苏联政府总理巴夫洛夫（1991年5月）称："尊敬的瓦连京·谢尔盖耶维奇！列宁格勒居民的基本食品供应情况继续恶化。已多次向俄罗斯联邦和苏联中央政府机关发出请求并直接与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联系，均未获得应有的结果。"④

---

① B. 阿尔希波夫（苏联国防部副部长）致使用人道援助中央委员会主席Л. A. 沃罗宁同志函《关于人道援助的分配》，1991年1月16日、1991年1月19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ф. 5446. ОП. 163. Д. 1028. Л. 44、45。

② M. 列昂季耶夫：《我无权剥夺人们的希望……》，载于《独立报》，1991年4月13日。

③ B. E. 奥尔洛夫呈送苏联内阁的报告《关于1991年建立稳定经济的预算外基金的问题》，1991年5月27日，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ф. 5446. ОП. 163. Д. 37. Л. 39。

④ A. A. 索布恰克（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致苏联总理瓦·谢·巴夫洛夫函。1991年5月16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ф. 5446. ОП. 163. Д. 1446. Л. 19。

1991 年春的居民供应情况是这样："在雅罗斯拉夫尔，人们都喜欢排队：站了队，就可望买到东西。然而排队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在日用工业品商店和百货商店里早已无队可排。两星期之前新排起了一种队——买面包。如今这是最后、最难受和最令人悲观失望的队列。"[①]

一名苏联小学生 1991 年 2 月 14 日发出的信中说："上星期我站了一次可怕的队买肉。您知道我站了多长时间吗？我都害怕告诉您，可我在那儿站了足足五个半钟头。以前我们这里也老排队（这您是知道的），可那些队伍都不像这么长，我们也不是买什么都排队。但是现在我们买所有的东西都要排队，从买肉买鞋开始，直到买火柴和盐。我们排队买大米、买白面、买油……这是一个开列不完的名单……以前我从来不哭——我的性格坚强，但现在我常常都哭。我们已经变得像动物了。要是您看见我们这些粗野疯狂饥饿难忍的人站在可怕的野蛮的队伍里，您准会休克。每个国家都在援助我们。我们已经公开乞求救助并且心甘情愿接收救助。我们已经忘记了一个美好的字眼——自尊心。我为我们的国家感到羞耻。"[②] 诸如此类童年时代体验到的伤痛通常都不会毫无痕迹地消逝。无法让人相信这一席话的作者今天还会梦想重现帝国的辉煌。

在这样的背景下，石油部门、货币和财政的形势继续恶化。一封致苏联内阁的函件中说："为了稳定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工作，已经将石油出口的税率从规定的 40% 减至 10%，天然气则从 40% 减至 5%，钱都用于行业稳定基金……结果对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补充投资估计为 150 亿卢布（石油 77 亿卢布，天然气 73 亿卢布），其中由于减税而获利 21 亿卢布，减少出口收入 129 亿卢布。这样一来，由于上述因素，国家财政平衡赤字增加 653 亿卢布，其中全苏预算赤字增加 296 亿卢布。此外，落实提高劳动报酬水平的措施和解决煤炭工业企业劳动集体的其他社会问题，1991 年需要从全苏预算中补充拨款 50 亿卢布……根据财务报告数据，本年度 1 ~ 3 月份全苏预算收入的进款为 199 亿卢布，而不是预计的数额 550 亿卢布。同一时期的支出为 470 亿卢布，计划为 609 亿卢布。支出超过收入 271 亿卢布。对外经济活动收入进款计划的完成情况严重滞后。今年第 1 季度进

---

① A. 科列斯尼科夫：《标签华尔兹舞的第一圈 · 关于雅罗斯拉夫尔如何准备提价》，载于《莫斯科新闻》，1991 年 4 月 7 日第 14 期，第 6 版。

② M. I. 戈德曼：《改革出了什么毛病》，W. W. 诺顿公司纽约、伦敦版，1992，第 14 页。

款44亿卢布，而已批准的预算规定为170亿卢布……今年第1季度燃料能源集团商品的外贸价格比预计价有所下降（石油价格目前的水平为每吨60卢布，并非计划中核定的105卢布），从而出口税收也减少4亿卢布……在获取银行和商业贷款方面的预算收入未到账款为25亿卢布，原因是苏联对外经济银行主要是使用纳入计划的银行贷款来偿还1990年苏联进口方面的逾期外汇欠债，同时由于外国贷款人怀疑苏方订货人能否及时偿还而使得商业贷款项目下的进口减少。"①

政府试图寻找摆脱危机状况的出路，哪怕提出那么一套给人以稳定局势希望的措施也好，当时的局势已经被称作紧急状态了。苏联经济部副部长B. A. 杜拉索夫于1991年6月20日向苏联内阁报告："……在目前的紧急条件下，有必要采取一些补充措施。已研究了摆脱现有局面的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以对居民现金收入实行严格限制的非经济手段为基础。其中包括：（1）削减用于各种社会计划的预算开支……为了将预算系统的总体赤字削减到今年预定的水平（估计到价格标准的变化——约1000亿卢布），需要暂停为数300亿~350亿的社会计划的实施；（2）按本年度7月1日的状况冻结各部门的工资。这就可以限制居民的现金收入增长约1000亿卢布。此外还必须尽最大的可能压缩统一资金对基本建设的投资，无论会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后果。上述方案在理论层面上是可行的。然而在现有的社会政治局势下，却未必能够实现。在目前的条件下，第二种方案看来根据更为充分，其基础是承认通货膨胀进程无可避免，自觉地将其用以稳定宏观经济，并保障拥有固定收入的有限的人群能够抗御通货膨胀，就是说，物质生产领域的职工必须主要依靠增加产量和商品市场上的销售量来弥补物价上涨的损失。这一方案的实质在于，自今年7月开始所有的价格彻底实行自由化，以便在1992年初之前仅有为数不多的燃料和原料资源保留固定的常规价格，大宗货运的运价不变，而零售价不变的则是那些构成消费收支计划基础的商品。"②

---

① B. E. 奥尔洛夫呈送苏联内阁的报告《关于1991年执行全苏预算和稳定经济基金的过程》，1991年4月30日，见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7773. оп. 65. д. 5578. л. 99~102。

② B. A. 杜拉索夫（苏联经济部副部长）呈送苏联内阁的报告《关于稳定苏联经济的整套可行计划措施的材料及1991年的经济发展预测》，1991年6月20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8. л. 182、183。

政治风险会阻碍采取所建议的第二种方案。一位同时代人关于1991年春矿工罢工的记叙中说："满街都是纠察队和巡逻队：身穿白衬衫的壮实小伙子。理想的秩序和犯罪现象城里都没有。官方当局无所作为，自愿将自己的权力拱手让与昨天还不许踏进自己办公室门槛的那些人。基洛夫斯克、斯涅日诺耶、沙赫乔尔斯克、多列士、顿涅茨克……这已经不是罢工，而是一场革命……"①

苏联政府的某些成员明白，拒绝采取必要但不受欢迎的措施要冒致命的风险。B. 巴卡京与M. 涅纳舍夫谈话时说："……如果试图对1990年春主导我们的领导人的感情做出概括，除了怯懦，我再也找不到别的字眼。无论戈尔巴乔夫还是雷日科夫，都害怕转向市场经济，之所以害怕是由于无知，由于不明白这是无可避免之事，而拖延、原地踏步则很危险，因为他们这是在加速经济不稳定的进程及中央与各共和国的矛盾。"② 然而这类讨论并未转化为实际行动。

苏联领导人重又处在1985～1986年他们所面临的那种选择的门槛上。但形势已经恶化了——国家背负难以控制的外债、外汇储备枯竭、消费市场处于灾难性状况、政治稳定遭到破坏、族际冲突连续不断。苏联领导人并不准备采取挽救财政危局的决定，还在那里讨论改革的计划。这些计划或者由于经济的原因，或者由于政治的原因，都无法付诸实施，对国内局势的发展都不会产生实际的影响。

---

① C. 博古斯拉夫斯基：《阶层变位》，载于《文学报》1991年3月20日。

② M. 涅纳舍夫：《苏联最后的政府：人物、证据、对话》，克罗姆股份公司莫斯科版，1993，第73页。

第七章
国家趋于破产

你的生命只有半小时了。

——威廉·莎士比亚

一 货币危机（1991 年）

无可避免的事迟早总会发生。自 1990 年下半年以来，苏联已经耗尽了外汇储备，再也无法吸引外国贷款，不得不大力缩减进口。1991 年，进口总量已从 821 亿下跌至 447 亿外汇卢布。对于苏联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某些方面 1991 年上半年的进口动态如表 7-1 所示。

表 7-1 1991 年第 1、2 季度与 1990 年同期相比苏联最重要的几类商品进口量的变化

单位：%

商品种类	1991 年第 1 季度	1991 年第 2 季度
黑色金属	-67.6	-68.3
粮　　食	-44.4	-10.4

资料来源：统计汇编《关于我国的国民经济工作》（各个月份），国家统计委员会莫斯科版，1991。

在国民经济日益严重的种种问题中货币危机的作用，经济部门此时已经有充分的了解。内阁总理巴夫洛夫 1991 年 2 月 19 日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中说："至于进口采购，由于缺少外汇，问题很长时间都

未能解决。关于以进口的方式采购原料的决定，内阁是在 1991 年 1 月 30 日做出的，所以预付款采购和原料供应都尚未进行。正因为如此，1 月份和 2 月初轻工业停滞的征兆已清晰可见。1 月 30 日我们所做出的决定是这样：采购不多不少正好价值 22 亿卢布的原料，其中需要 17 亿可自由兑换卢布。你们自己可以判断，我们的轻工业依赖外国供货商的程度究竟如何。你们都明白，这些钱并不是轻工业本身挣来的，它也没有能力办到这一点。但除此之外，目前我们还需偿还 1990 年的债务（尽管我们做出了决定，但既然还欠着这些债，当然就谁都不肯签订任何合同，也不打算发货）。根据今年 2 月 15 日的情况，我们共负债 3 亿 2600 万外汇卢布。现在已开始供货，首先是羊毛和化学工业部件。今年限额项目下的原料供应合同基本签订完毕。我们已做出决定，用日常收入账上的 4 亿多卢布支付进口原材料费用。还决定在所提供的贷款项目下再使用 2 亿 5000 万卢布进行采购。不过考虑到这方面已经出现了间断，这种下降趋势自然仍然存在。看来，应当现实地进行估计。原料大约要 3 月中旬才能开始陆续运抵企业。在此之前零星的批次也会到货，但我说的是情况正常化之后的事。”①

实际上，情况的发展比 2 月间政府所想象的更糟。4 月份苏联国家计委向政府报告说，比起那些列入经济运行状况预测、苏联管辖领域 1991 年国家计划和各加盟共和国相应计划的设想，国家的货币状况已严重地复杂化。1991 年的国家计划预计用于建立联盟—共和国货币基金的进款为 190 亿卢布，其中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自由兑换货币 99 亿卢布。此外，按照 1990 年 11 月 2 日的苏联总统令，计划用于支付可自由兑换货币外债的进款为 97 亿卢布。1991 年第 1 季度，从联盟—共和国货币基金中共支付进口费用 17 亿卢布。联盟—共和国货币基金缺少进款的原因是“……向国外提供苏联商品的状况令人极不满意”。②

苏联国家银行对货币流通领域的局面失去控制。各共和国的财政和货币部门对它的指示不予置理。苏联国家银行行长 B. 格拉先科向苏联总统

① 《苏联总理瓦·谢·巴夫洛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讨论苏联总理关于旨在进一步稳定消费市场和推行价格政策措施的报告》，1991 年 2 月 19 日，速记报告第一部分第 94 页。

② Л. Б. 维德（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呈送苏联内阁的报告《1991 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方案评价》，1991 年 4 月 27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8. Л. 93、94。

戈尔巴乔夫报告（1991年4月）称："在一些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曾试图准备发行'自己的'货币……许多共和国的法令和实际行动都阻碍上缴全苏预算收入。苏联财政部只得使用极其有限的进款和来自苏联国家银行的有限借款。这将导致无钱可以支付军队的津贴和供给全苏管理机构经费这样一种状况。劳动者的退休金发放也受到威胁，因为苏联退休基金的来源同样受阻。这种状况最终必将造成信贷发放以及随后的银行货币发行极度失控，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螺旋，从而不仅对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而且对各个共和国的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后果。苏联国家银行试图调节与各共和国中央银行在执行统一的货币信贷政策方面的关系，但并未得到积极的回应……各共和国政府和管理机关都不愿意正视无论苏联还是外国专家都已警告过的货币信贷分离主义的灾难性后果……应当估计到，货币信贷制度可能很快便会遭到摧毁。"①

他还忧心忡忡地报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A. 卢基扬诺夫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共和国的法律，都赋予各该共和国中央银行独立发行钞票的权力。② 苏联国家银行行长的信中还有一个片断："……造成目前经济状况的原因之一，是建立在共同的货币单位——卢布基础上的国家统一的银行体制遭到破坏，各加盟共和国违反了《关于苏联国家银行》、《关于银行和银行的活动》等苏联法律。如果这一进程得不到遏止，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通货膨胀加剧、民族货币流通、全苏市场经济关系破坏，最终则导致事实上的经济崩溃。"③

春末夏初，政府间往来公文的语调变得更加悲观。部长会议副主席西塔良和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卡图舍夫致函苏联总理巴夫洛夫（1991年5月）称："由于统一的出口资源不足（与1990年相比减少将近50%），用于支付进口的资金缺乏。例如，支付资金的主要来源石油的供货量减少，

---

① В. В. 格拉先科呈送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的报告《关于货币信贷制度》，1991年4月8日，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2. д. 4005. л. 58～60。

② В. В. 格拉先科呈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А. И. 卢基扬诺夫同志的报告《关于银行体制的一些问题》，1991年4月4日，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2. д. 4005. л. 64、65。

③ В. В. 格拉先科呈送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的报告《关于贯彻统一的信贷货币政策》，1991年4月11日，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2. д. 4005. л. 69。

从1990年的1亿2400万吨减至1991年的6100万吨。在这种情况下，供应东欧国家的石油减少了几乎2/3（从1990年的6000万吨减至1991年的1900万吨）……这样，苏联所欠东欧国家的债务（包括前民主德国在内，但不包括波兰，与该国的债务调整问题尚未商定）1990年1月1日共计61亿卢布，1991年初则为145亿卢布。波兰方面，1990年1月1日就全部支付义务而言我方有顺差52亿卢布，而1991年1月1日却出现了为数13亿卢布的赤字。如果不采取特别措施，今年年底时所欠上述各国的债务可能增至186亿卢布（同时与波兰的债务相互冲销）……在苏联负债日益增加的条件下，东欧国家坚持苏联哪怕能部分清偿1991年的债务（数额不少于12亿卢布），并提出立即平衡进出口供货量和相应的明确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协定指导性清单的问题。针对这些国家的资金总的赤字估计为35亿卢布……不能按时支付进口商品货款以及苏联对外经济银行拖延为这些商品开具信用证亦已成为严重的问题。例如，今年未能付清东欧国家已经供货的货款3亿卢布，没有给价值6亿卢布的专为我国订货生产并已准备发运的紧缺商品（药品、大众消费品、成套制品和备件）开具信用证。”①

在油价持续低迷的情况下，石油开采量灾难性地下降，外汇消耗殆尽，商业贷款不足——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进口的急剧减少无可避免。苏联经济部副部长B. 杜拉索夫向苏联内阁报告（1991年6月）：“由于苏联生产的石油价格较预测价大幅度下跌，出口石油获取的外汇仅为21亿卢布左右……为了保证本年度生产的物资—技术平衡，广泛采用了取消在国际市场上出口具有竞争力产品的做法。取消出口并转供国内消费的资源总价值超过28亿卢布……然而由于外汇短缺，采购达不到预计的水平，最好的情况下也仅及先前规定数量的73%左右。而且即便提供这样数量的出口商品也必须具备种种条件才能办到，即：出口的苏联商品不能继续减少，易货贸易必须严加控制，应就提供贷款的事与西方国家金融界达成协议并全部到位。”②

---

① C. A. 西塔良、K. ф. 卡图舍夫致苏联总理瓦·谢·巴夫洛夫函《关于1991年的苏联对外经济关系》，1991年5月14日，俄罗斯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46. Л. 98～100。

② B. A. 杜拉索夫呈送苏联内阁的报告《关于稳定苏联经济的现行和计划措施的材料及其1991年的发展预测》，1991年6月20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8. Л. 15。

与经互会国家改为以可自由兑换货币结算之后，1991年第1季度与1990年同期相比，苏联与保加利亚的贸易额减少50%，与匈牙利减少约41%，与波兰减少约23%，与罗马尼亚减少约37%，与捷克斯洛伐克减少约23%。[①]

就拖欠外国贸易伙伴债款之事向苏联领导人提及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语调也越来越刺耳。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卡恰诺夫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西塔良报告："对外经济联络部收到美国商务部部长P. 莫斯巴赫来函，提及苏联机构与美国公司所签合同的逾期债务问题。根据1990年12月20日的情况，欠债超过1亿1700万美元（苏联外经部各机构所欠为1720万美元——附清单）。"[②] 日苏贸易协会会长T. 左滕致函苏联科学工业联合会主席A. 沃尔斯基称："日苏贸易协会谨向您深表敬意并将苏联各对外贸易联合公司所欠我会成员公司债务详情奉告。"[③]

二　粮食问题

苏联部长会议1990年5月7日的第451号决议规定，对粮食作物实行新的采购价格。这就要求国家预算每年增加支出90亿卢布。苏联国家计委建议苏联政府提高面包和面包类制品零售价格两倍，粒粮价格1.9倍。[④] 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1990年并未通过对面包实行新价格的决议。

1991年（一如1918年、1928年），粮食问题对于苏联政府当局已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内阁总理巴夫洛夫1991年1月19日在最高苏维埃

① P. 格林贝格、K. 列加伊：《解体的阶段：苏联与东欧的贸易问题》，载于《独立报》1991年5月25日。

② A. И. 卡恰诺夫（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呈送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主任C. A. 西塔良同志的报告《鉴于美国商务部部长P. 莫斯巴赫关于苏联机构与美国公司所签合同欠债的来信》，1990年12月27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ф. 5446. ОП. 163. Д. 1177. Л. 26。

③ T. 左滕（日苏贸易协会会长）致苏联科学工业联合会主席A. И. 沃尔斯基先生函《关于苏联外贸联合公司所欠日苏贸易协会成员公司的债务》，1991年2月13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ф. 5446. ОП. 163. Д. 1178. Л. 69。

④ B. A. 杜拉索夫呈送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关于新的粮食采购价及面包和面包类制品零售价与对居民额外支出实行补偿相结合的建议》，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ф. 5446. ОП. 162. Д. 277. Л. 76、77。

主席团会议发言时说："1990 年我们获得了最大的丰收：散装重量 2 亿 3700 万吨和仓储重量 2 亿 1800 万吨。这的确是最好的丰收年景之一。与此同时，去年进入国家粮食储备的则仅 6680 万吨，比国家订购数少 1800 万吨，比获得同样收成的 1978 年的储备少 2800 万吨。这就是说，粮食到哪里去了的问题答案已经很清楚：它留在了生产部门手里，而为居民供应操心的则是国家。原因就在于'过渡时期的花费'，总而言之，交售的纪律极差。如今粮食已经变成了货币，被用来作为施加压力和进行交易的手段。现在政府决定，取消农业所需数量的物质技术资源的供给，包括轻型汽车的供给在内。许多人抱怨买不到轻型汽车，说缺少这种车，也缺少技术装备……但即使在缺货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决定取消这些资源的供给，甚至包括分配给 1991 年的资源，转而为农业提供所需要的一切（这在我国主要是三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旨在以这些资源作为交换，获得面包。我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得到将近 300 万吨粮食。不过也要想到，无论在任何条件下，交售纪律和履行义务的问题始终明摆在那里。现在我们能收购也能供应，以后怎么办？这个将来的问题无论如何总得解决。大致说来，现在有些城市只剩下两三天的口粮，而且这条'线'随时都可能断掉，国家这样过日子是不行的。"①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从 1990 年的收成中共计采购粮食 3390 万吨，完成计划 72%。国家少收购 1310 万吨粮食。② 苏联政府农业工业部门领导人阿库利宁报告巴夫洛夫（1991 年 4 月）："国内近期居民的谷物产品供应和畜牧业的精饲料供应可能会出现紧急情况。这两方面每月消耗将近 800 万吨用作食品和饲料的粮食。根据今年 3 月 1 日的情况，国家余粮（不算种子）的数量专家估计约为 1300 万吨，其中将近一半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就意味着，食用粮储备（哈萨克斯坦除外，那里的粮食足够用到下一次收获之前）至 3 月底即将告罄。面粉的供

---

① 苏联总理瓦·谢·巴夫洛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 5 次会议上的发言《关于进一步稳定消费市场和执行价格政策的报告》，1991 年 2 月 19 日，速记报告，第一部分第 96 页。

② М.Л. 季莫什申（苏联国家粮食资源采购委员会主任）就 1991 年的粮食供应呈送 ф.Л. 先科同志（苏联副总理）的报告，1991 年 4 月 15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562. л. 17。

应状况眼下已令人极度不安……在莫斯科市、伊万诺沃、图拉、下诺夫哥罗德、秋明、斯维尔德洛夫、赤塔、堪察加和其他一些州，面粉的储备量不足 10 天之需。它们都无法通过进口解决粮食的来源问题。今年1～3 月份，预计供应的 1240 万吨粮食中，到货的进口粮食仅为 370 万吨。国家领导人三番五次责成加紧从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调运商品粮，同时加快进口粮食的供应速度，但却未能对改变形势产生明显的影响……考虑到国家粮食储备的紧急状况，看来宜于立即采取下列措施：第一，派遣一个有权威的中央负责干部工作组前往哈萨克斯坦，就地解决粮食调运问题……第二，要求对外经济部门和运输机构确保每月运抵国内的进口粮食不得少于 550 万～600 万吨；第三，让各共和国再次重视补充收购农业生产单位 1990 年收获的余粮的必要性（目前已收购供 2～3 月份之需的 10 万吨左右，而预定数额为 300 万吨左右）。"[①]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B. 福京致苏联总理瓦·巴夫洛夫函（1991 年 2 月）的实质，就是要求于 1991 年 2～3 月从全苏储备中返还 120 万吨小麦，年底之前再向共和国运送 240 万吨饲料用粮，增加上半年用作配制饲料生产和国家资源原料的共和国储备 120 万吨。[②]

1991 年春所形成的食品供应状况，首先是与粮食有关的情况，让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И. 波洛兹科夫感到极度不安。他致函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总理巴夫洛夫（1991 年 3 月）："在俄罗斯联邦，出现了居民面粉、粒粮和其他谷物产品以及畜牧业配制饲料供应极其严重的局面，为其他任何共和国所未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粮食产品部证实了面粉粒粮工业和复合饲料工业粮食资源供应的危急状况。上半年俄罗斯缺粮约 1800 万吨，几乎是需要量的一半。在农业生产单位储备粮食现在已是一件几乎没有可能的事。27 个地区的形势都是灾难性的，再过一星期那些地方的面粉厂便可能

---

① B. 阿库利宁呈送瓦·谢·巴夫洛夫同志的报告《关于居民粮食产品和畜牧业精饲料的供应出现紧急状况的可能性》，1991 年 3 月 18 日，见俄罗斯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560. Л. 16、17。

② B. 福京（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致瓦·谢·巴夫洛夫（苏联总理）函《关于共和国的粮食供应》，1991 年 2 月 5 日，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562. Л. 9。

停工，面包烤制和家禽饲养场、大型畜牧综合体的配制饲料供应也将中断。”①

当时部门之间的往来公文也可以证明，И. 波洛兹科夫这位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否合理问题上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著名人物，在上述情况下并未夸大俄罗斯联邦粮食形势的危险程度。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粮食产品部第一副部长 A. 库杰利亚呈送副总理 ф. 先科的报告（1991 年 3 月）称：“事情的实质在于，俄罗斯联邦目前由国家资源供应制作面包的面粉加工、粒粮制品加工的粮食以及供应家禽饲养企业和畜牧业配制饲料加工的粮食都出现了危急的局面。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下述几种原因：第一，由于进入国家资源的粮食采购机制不完善，技术装备和物质资源价格猛涨，在国家定购量为 4700 万吨和总收获量近 1 亿 2700 万吨的情况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交售国家的粮食仅为 3390 万吨。其余部分的粮食则留在了生产单位，或者避开国家资源部门直接或通过合作社进行销售；第二，没有及时贯彻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以进口方式采购粮食的决定。去年第 1 季度运到的进口粮食为 740 万吨，但今年预计仅 220 万吨。结果根据 4 月 1 日的情况，除去种子之外，估计国家资源所拥有的粮食为 440 万吨（去年上述日期时拥有 1170 万吨），而每个月需求即将近 500 万吨……考虑到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粮食和采购委员会计划 4 月份运抵俄罗斯联邦的进口粮食约为 200 万吨（超过全苏联到货的 50%），再由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提供 50 万吨，从加拿大运抵经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担保购买的 40 万吨，这样，4 月份粮食产品企业将拥有 550 万吨实有粮食资源。同时也应当注意，考虑到有必要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工业中心建立最低限度的粮食储备，足可保障粮食产品供应不致脱销的结转余额至少应当不低于 570 万吨，而今年 5 月 1 日的时候却只有 50 万吨。粮食资源方面所形成的状况 3 月间即已导致雅罗斯拉夫、下诺夫哥罗德、伊万诺沃、弗拉基米尔等州的面粉企业和绝大部分区、州、自治共和国的配制饲料厂停工……”

在粮食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央和各共和国机关的领导人任意决定

---

① И. 波洛兹科夫（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一书记）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总理巴夫洛夫函，1991 年 3 月 21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562. Л. 16。

更改粮食产品供给计划数量、随心所欲地改变收货部门地址，已开始具有普遍的性质。这就更加破坏了局势的稳定。在面粉生产所需的小麦资源不足的同时，迫于地方机关的压力，小麦却被用来加工配制饲料。上面所摘引函件的作者继续写道："4月间的形势将更加恶化，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加速从哈萨克斯坦和通过进口调运粮食（除上述数量外，另外还需要至少100万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居民粮食产品和公共畜牧业精饲料的供应普遍中断。根据所掌握的信息，5月份从统一来源调运的进口粮食预计会大大低于今年4月份的水平，无法保障居民的口粮供应。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粮食产品部从1990年第4季度开始，曾多次向国家和共和国领导人报告国家粮食资源所形成的危急状况。然而却未见采取全面的措施。尊敬的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在现有的情况下，我们请求火速解决按规定采购的进口粮食的支付来源问题，并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于4～6月份每月供应不少于400万吨，同时于4～5月份从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调运（根据政府间的协议）至少80万吨小麦。"[①]

上半年所形成的居民和国民经济的粮食供应状况，可用表7－2的数据加以说明。

负责粮食经营管理的专家们了然于胸的粮食危急状况，越来越严重地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苏联商业部部长捷列赫向苏联总理巴夫洛夫报告（1991年3月）："目前由于储备额有限，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莫斯科除外）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面粉销售实际上已经不再进行，其余各共和国则凭票供应。粒粮买卖到处（莫斯科除外）都须凭票，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则凭息票，而且时断时续。"[②]

关于1991年初春国内食品供应所形成的局面在苏共中央机关心目中究竟危机到何种程度，下述苏共中央文件可资佐证："此前过冬的四个月中，整个国家的牛奶产量与先前的水平相比减少了将近230万吨。在俄罗斯联

① A. 库杰利亚（俄罗斯联邦粮食产品部第一副部长）呈送苏联内阁 ф. Л. 先科同志（苏联副总理）的报告，1991年3月15日，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562. Л57～59。

② K. 3. 捷列赫（苏联商业部部长）呈送苏联总理巴夫洛夫的报告《关于增加1991年5～6月面粉和粒粮的市场储备额》，1991年5月5日，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562. Л. 95。

表 7－2　1991 年上半年粮食资源结算

单位：百万吨

	根据国家委员会平衡表	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
支出		
用于面粉加工	12.3	12.3
用于粒粮加工	2.2	2.2
用于成品工业加工	2.1	2.1
用于配制饲料加工和饲料目的：		
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储备额	5.3	9.2
供应全苏消费	1.1	1.1
用以交换种子	5.5	5.5
提供良种	0.5	0.5
出口	0.1	0.1
报废	0.6	0.6
1991 年 7 月 1 日结转余额	4.5	4.5
支出和结转余额合计	34.2	38.1
资源		
1991 年 1 月 1 日实有	18.9	18.9
经由进口进货：		
根据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决定（1～3 月份）	2.2	2.2
根据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决定（1～6 月份自加拿大进口）	·	4.0
来自哈萨克斯坦（1～3 月份）	0.7	0.7
其他来源	0.5	0.5
资源合计	22.3	26.3
4～6 月份必须运到	11.9	11.8
或者每月平均	4.0	4.0

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562. л. 60。

邦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产单位中，这个时期牛奶的产量减少 10%，在立陶宛、阿塞拜疆和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减少 11%～13%，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减少 15%，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减少21%～24%。生产部门各种畜产品的产量和收购量大大减少的还有科米

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巴什基尔、莫尔多瓦和图瓦等自治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的伏尔加格勒、普斯科夫、梁赞、雅罗斯拉夫等州……1月份享受补贴的地区和大工业中心比原定计划少发运了：肉53000吨，牛奶和奶制品13万吨。这对国内大工业中心居民的肉、奶和其他产品的供应产生了负面影响，首当其冲的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城市。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作如下解释：全国许多地区储备的饲料都较上次过冬时为少，而且质量低劣。家禽饲养场和大型猪肉、牛肉生产综合体的平衡配制饲料供应出现间断。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物资技术供应急剧恶化……许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最近期间毫无根据地加紧大量抛售家畜家禽，尤其是母畜母禽，这让扩大肉食来源的基础遭到破坏，会影响到许多年……保障1991年庄稼的收成，尤其是增加粮食产量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去年播种的越冬作物减少500万公顷，这是20年来最少的秋播面积……许多地区种子供应不足，播种准备工作拖延时间……技术装备的准备速度缓慢、质量不高令人不安。全国未做好生产准备的有将近44万台拖拉机，25.4万辆载重汽车，33.2万台谷物联合收割机，25万余台拖拉机牵引的播种机，以及其他许多技术装备。苏联汽车和农业机械工业部的大多数企业未完成供应农村机器、装置、备件和设备的国家订货。”①

苏联国家食品资源采购委员会主任M.季莫什申向苏联政府报告（1991年5月）：“当前粮食产品的储备极其有限。面粉结余按今年5月21日的情况全苏联仅150万吨，亦即仅能保证全国15天的需求。”②

就在同一天，请看苏共中央书记、后来八月政变的参与者O.舍宁却在为一些什么事情操心。1991年5月21日他致函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要求拨付8150万可自由兑换卢布用于为党的印刷企业购置设备和材料，另拨1700万外币用于为苏共中央和地方党的机关购买印刷设备和现代办公设备，并认为应当火速向苏共中央和党的其他机关配发2500辆汽车。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应对由于提高零售价和税率而增加额外开

---

① 苏共中央农业政策部呈交苏共中央的报告《关于加强党委在畜牧业越冬和为春天做准备过程中克服困难方面的工作》，1991年2月12日，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20. л. 33。

② М.Л.季莫什申（苏联国家食品资源采购委员会主任）呈交ф.Л.先科的报告《关于增加1991年5～6月面粉和粒粮的市场储备》，1991年5月22日，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562. л. 97。

支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补偿，由全苏预算开支。在经济灾难即将来临之际，另外一个问题也令这位苏共中央书记牵肠挂肚：“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党中央和中央监委负责干部和选举产生的机关成员转为由苏联内阁直属医疗保健联合组织提供服务的问题，至今仍未获解决”。[①] 这堪称当年我国社会主义现实“清醒理智”和“社会平等”的一个惊人事例。不过，对于千百万民众早已经受过的、常言所说有着切肤之痛的经济状况的种种艰难困苦，那些与此类烦恼关系绝少的当权派也开始有所察觉。我指的是那些内部供应站和特供食品部的常客，这里就有一个佐证。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的日记摘录，1991 年 3 月 31 日，星期日，“昨天安全会议开会。讨论的是粮食问题……不过现在更具体了——是面包问题。达到平均标准尚缺 600 万吨，莫斯科全城到处都在排队，已经像是两三年前买香肠的情形。要是不能从什么地方搞到粮，到 6 月可就该闹饥荒了。各共和国中只有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勉勉强强）能自己养活自己。国内想要有面包，看来像神话。刮净粮囤，弄到外汇和贷款到外国去买。可是我们已没有了支付能力。谁都不肯提供贷款：寄望于卢泰愚（米·谢·戈尔巴乔夫同意离开日本途中在济州岛停留，与韩国总统商谈 30 亿贷款之事）……还有就是寄望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似乎会拒绝，虽然费萨尔应允过，他为支持他们反对伊拉克而对米·谢·戈尔巴乔夫感激不尽……前去见 H. H.，她还在生病，要我买点面包。和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乘车跑遍了整个莫斯科，从巴里纳小树林开始：面包店要么大门紧锁，要么糟糕得绝对空空如也。这样的情景，也许莫斯科的整个历史上都前所未见——哪怕是在最饥饿的年代。”[②]

三　物价飙升

临到此时此刻，关于国家危机深重、必须采取坚决的紧急措施加以克

---

① O. 舍宁（苏共中央书记）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函《关于财政和物质技术保障问题》，1991 年 5 月 21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32. Л4、5。

② A. C. 切尔尼亚耶夫：《1991 年：苏联总统助理的日记》，TEPPA、共和国出版社版，1997，第 124 ~ 126 页。

服这一点，已无须对政治精英和社会公众进行说服了。[①] 1990 年与 1991 年之交的冬末，最后一届苏联政府决心大幅度提高最重要的各种消费品的价格，这是几年前根本谈不到的事。涨价以 1991 年 3 月 19 日苏联政府令的形式生效。新的价格和税率预定于 1991 年 4 月 2 日起实行。[②] 政府的零售价格改革方案预计上涨幅度为 60%。实际上物价上涨达 90%，肉和家禽上涨 1.6 倍，香肠制品上涨 2.1 倍，面包制品上涨 2 倍（见表 7－3）。[③]

表 7－3　某些食品的零售价格

单位：卢布/公斤

食　品	1990 年 4 月	1991 年 3 月	1991 年 4 月
一级牛肉（带骨）	1.97	3.35	7.90
母鸡（小鸡）肉	3.03	3.52	5.85
肉饼（10 个）	1.15	1.28	4.03
肉馅饺子	1.38	1.53	4.40
高级煮香肠	2.79	3.26	3.90
高级小灌肠	2.40	2.82	7.34
高级半熏制肠	6.23	8.43	19.12

资料来源：引自 B. H. 基里琴科（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主任）呈交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关于物价动态》，1991 年 5 月 23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185. Л48。

与种种担心相反，这一措施在绝大多数地区一开始都执行得相当平静，并未导致群众性骚乱。社会公众有目共睹形势的紧急性质迫使人们承认这种措施无可避免。但提价之后社会公众逐渐明白了先前专家们早已懂

① 经济政策研究所 1991 年的材料："1991 年，苏联和俄罗斯的领导人逐渐拒绝公开或隐秘的民粹主义（包括声称不降低民众生活水平也能摆脱危机）。苏联领导人于春天、俄罗斯领导人于秋天都走上了制定不得人心的措施的道路。总体上可以说，人民已对类似的事件发展有所准备……1991 年期间居民基本群众中的怀疑情绪不断增长，同时认为不付出重大的社会牺牲便无法摆脱深刻危机的看法逐渐深入到社会意识之中。无论春天还是秋天，超过半数的居民（根据社会调查的数据）预料经济状况将会继续恶化，首先是物价会进一步上涨。2/3 的俄罗斯居民 12 月时不相信生活条件不暂时恶化便能克服危机，这既证明了寄望于'经济奇迹'的情况并不普遍，也证明了缺乏'期望革命'的明显征兆。"见《1991 年的俄罗斯经济——趋势和前景》，经济政策研究所莫斯科版，1991，第 13、14 页。

② 1991 年 3 月 19 日的苏联总统第 УП-1666 号令《关于零售价格改革和居民的社会保障》。

③ B. A. 杜拉索夫（苏联经济部副部长）呈送苏联内阁的报告《关于稳定苏联经济的现行和计划的综合措施及其 1991 年发展预测的材料》，1991 年 6 月 20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С. Л. 177、178。

得的道理：为了改变局面，单有强硬的措施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效的措施。对居民涨价损失的补偿，日益加剧的预算比例失调，尚未解决的货币问题——所有这一切在数月之中让大众日用消费品脱销现象甚至在那些曾短期减少了的地区又再次发生。① 根据全苏社会舆论调查中心的数据（1991 年 4 月末），大部分被询问者认为，提价之后购买商品和食品并没有变得容易一些。几乎谁也不相信所进行的物价改革会消除短缺现象。②

提价并未导致消费市场状况明显的、社会公众能感觉到的改善，这对政府当局构成了新的更加复杂的政治问题。苏共中央社会政治组织联络部副部长 И. 扎拉缅斯基 1991 年 4 月 15 日向苏共中央报告："由于提高物价，国内的社会政治局势急剧恶化。其他各部门和各共和国的劳动集体也加入到了罢工的矿工之中。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出现了极不平常的局面。一个月之前大多数劳动集体对待矿工罢工的态度还很冷静，最近数日内对其行动的支持已普遍增强。通过白俄罗斯一些事件的例子可以看出，在反对派势力的影响下，劳动者所提出的经济要求已转变为政治要求，首先是与对政府和苏共的中央机关表示不满联系了起来。"③

提价后对居民的补偿性支出使得哪怕略为改善财政状况也成为不可能的事。全苏预算的问题只有更加严重。用于补助性支出、提高非生产部门工资、维持预算内机关和机构的资金总额达 2400 亿卢布，实际上与改变价

---

① "1991 年的计划和预算中预定在社会方面实现全年合计 470 亿卢布的规模空前的一整套措施……这次改革规定提高物价总水平为 3110 亿卢布，用于补偿居民因涨价所造成的损失为 2660 亿卢布，占进款的 85%。事实上，由于固定价格和合同价格对比关系的变化，以及日常劳务和其他劳务的税率提高和共和国之间已达成的协议范围之外所采取的其他决定，价格的增长估计将近 4500 亿卢布。4 月之后，无论苏联政府还是各加盟共和国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补充决定，增加对居民的补助发放数额，结果补助支出实际上达到提价进款的总量。此外，以存款和有价证券方式对居民损失进行补偿的数额超过 1600 亿卢布，其中 400 亿卢布在 1991 年内即可使用。"见 В. А. 拉耶夫斯基、В. Г. 格里博夫致苏联国民经济业务管理委员会函《关于克服通货膨胀和稳定货币流通的措施（К-28，Л. 9)》，1991 年 9 月 27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41. Л. 26、27。

② В. Л. 科斯马尔斯基、Л. А. 哈胡林娜、С. Л. 什皮利科：《关于转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舆论》，科学报告，全苏社会舆论调查中心莫斯科版，1991，第 16 页。

③ И. 扎拉缅斯基（苏共中央社会政治组织联络部副部长）呈送苏共中央的报告《关于稳定国家社会政治局势的若干措施》，1991 年 4 月 15 日，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22. Д. 69. Л. 1、2。

格和税率的规模相当。全苏预算并没有从提高零售价格中获得额外的财源。商品流转税悉数进入了共和国和地方预算。用于支付食品价格差额的预算拨款节余为数不多。补贴的基本额度依靠的是各共和国和地方政权机关拨付的资金。同时，留给全苏政府当局的义务则是对依靠全苏预算资金获得收入的军人和其他公民进行补助，并给全苏直属机关和组织由于提高零售价而产生的额外支出提供补偿。①

时至1991年夏季中期，在大大提高了的新价格情况下仍然几乎普遍出现脱销。A. 弗拉索夫向苏共中央报告零售价格改革过程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时说："在大部分地区，商店补给商品的进度极其缓慢，而且实际上情况并无改善，其中许多商品依然在实行定量分配，因而局势仍在恶化。由于脱销，投机性需求居高不下，尤其是对进口商品投机倒把的规模迄未减少。当前消费市场所形成的状况关键是由货源不足所造成。在缺乏有效调节的情况下实行新的批发、采购和零售价格，暂时不会对加速生产发展产生刺激作用。今年第1季度开始的大众消费产品产量下降在4～5月间达到8%。食品产量减少10%，而轻工业品更是减产12%。"②

集体农庄市场的价格水平超过国家零售价将近5倍。③ 居民在黑市购买非食品类商品的份额占到30.9%，食品则占10.9%，劳务占25.7%。④

《消息报》1991年5月发表的一篇短文，反映了居民的心态，特别是对未来的困难的预想："眼下到处是一片菜园种植的热潮。人们都十分清楚，如今首先得靠自己。下班之后，在节假日，纷纷扛上铁锹和钉耙，直奔自己的那一小块菜地。当然啦，这根本不是彻底解决食品问题的办法，倒不如说是对可能发生的商品断档的一种补救。"⑤

---

① B. E. 奥尔洛夫呈送苏联内阁的报告《关于1991年全苏预算在零售价格改革和居民社会保障方面的收入支出的更加确切的说明》，1991年5月12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35. Л. 218、222。

② A. 弗拉索夫（苏共中央社会经济政策部部长）呈送苏共中央的报告《关于零售价格改革的过程及其社会政治后果》，1991年6月29日，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20. Д. 72. Л. 79。

③ A. 伊拉里奥诺夫《苏联和俄罗斯推行财政稳定政策的尝试》，http://www.budgetrf.ru/publications/Magzines/Ve/1995/95－7illarionov/95－7illarionovooo.htm。

④ И. A. 波戈索夫（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副主任）致 B. И. 谢尔巴科夫同志函《"黑市"的销售量和价格》，1991年8月2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185. Л. 66。

⑤ B. 科诺瓦洛夫：《冬天我们会有蔬菜和土豆吗?》，载于《消息报》，1991年5月31日。

四　金钱与帝国的命运

货币危机、国家收入减少、预算赤字增加都促使货币供给量增大。1991 年的货币发行量达到苏联存世最后十年间前所未有的规模（见表 7－4）。

表 7－4　1988～1991 年的货币发行量

单位：10 亿卢布

时　间	1988 年	1989 年	1990 年	1991 年
4 月	4.13	3.63	2.60	4.77
5 月	－0.93	－1.55	0.22	5.50
6 月	3.40	3.48	2.62	18.74
7 月	3.76	2.18	2.93	19.87
8 月	－2.06	－0.20	5.76	17.13

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41. л. 27。

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和苏联政权的分崩离析，使吸引带有政治动机的贷款机会变得微乎其微。甚至连那些原先宣布准备签订协议将苏联历来所欠各该国公司的债务改办手续变为国家担保的国家，到 1991 年夏季也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警惕性。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 K. 卡图舍夫 1991 年 6 月 26 日向苏联总理汇报希腊贷款的情况："为执行苏联政府的委托（1991 年 6 月 5 日的 ПП－17860 号文），从今年 6 月 24 日起与希腊就协商贷款和以商品充抵的条件进行了谈判。希方基本上准备向我们提供贷款，用以购买各种商品和支付拖欠的债款，但又对最近半年在减少现有债务方面毫无进展表示不安，这明显地影响了他们在贷款问题上的态度。这样，如果说去年年底希方自己表现了向我们提供财政援助的主动性的话，那么今年 6 月勉强才同他们在正式谈判的日期方面达成一致，此时由于希腊人并未做好准备，谈判又从 6 月初推迟至月底。"[①]

① K. Ф. 卡图舍夫（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呈送苏联总理巴夫洛夫同志的报告《关于支付希腊公司的债款》，1991 年 6 月 26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03. д. 1504. л. 82。

苏联领导人曾试图以恢复外交关系换取从韩国获得不大的一笔政治性贷款——5亿美元，因1989～1990年海湾冲突过程中所采取的立场而从科威特获得2亿美元。他们未经存户同意便强行提取了苏联机关团体和公民个人存在对外经济银行的60亿美元巨款。①

尽管如此，外汇仍然极度缺乏。1991年6月苏联经济部副部长报告苏联内阁："购买进口原料的外汇资金急剧减少导致1～5月份轻工业制品与去年同期相比减产12%……日用必需品方面脱销的情况更加严重了……大众消费品的产量下降主要由两个因素引起：供给原料、材料和配套制品的经济联系遭到破坏，通过进口采购这些物品的外汇资金缺乏……一级肉和肉制品的工业加工量减少13%，香肠制品减少10%，肉罐头减少14%，动物油减少14%，全奶制品减少9%……商业方面年底前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商品的供应可望获得一点明显的改善。"②

富有当时特点的一些文件的名称也反映了日益加剧的危机的实质：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增拨黄金和钻石用于以可自由兑换货币进行销售。同意苏联部长会议对该问题的处理方案》，③《关于将国家储备的部分贵重物品交由苏联国家物资技术供应总局供1990年以可自由兑换货币出售。同意苏联部长会议对该问题的处理方案》。④ 1985年苏联的国家黄金储备为719.5吨，至1990年末已减少为290吨。⑤

对外经济银行拖延对已提供的商品进行支付，苏联船只因为对商品和港口服务无力付款而被扣留在外国海港。当时部门之间来往公文的主要话题之一，便是对于身处国外的苏联专家该怎么办。既无钱为他们发工资，也无钱接他们回国。

在这个阶段党的领导人已开始明白，苏联再也无力为外国共产党提供

---

① 其中也包括戈尔巴乔夫自己在国外出版著作所得的钱款。看来他本人对此并不知情。

② B. A. 杜拉索夫（苏联经济部副部长）呈送苏联内阁的报告《关于稳定苏联经济的现行和计划的综合措施及其1991年发展预测的材料》，1991年6月20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8. л. 165、166、168。

③ 引自1990年5月10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87号记录。NO. П187/15。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10. д. 58。

④ 引自1990年5月15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87号记录。NO. П187/30。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10. д. 60。

⑤ Э. 侯赛因诺夫：《俄罗斯的黄金储备如何被侵蚀》，载于《消息报》，1996年5月17日。

财政援助了。1991年6月5日，苏共中央第二书记B. 伊瓦什科致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巴夫洛夫："芬兰共产党（统）主席Ю. 哈卡年由于党的物资状况极为艰难求助于我们。之所以落入如此境地，主要是因为对外经济银行拖延了向这些朋友控股的"普林特—尤赫季耶特"印刷康采恩偿还债款……眼下的状况已成这样：如果近日内欠债得不到清偿，就将导致康采恩和芬共（统）一齐破产，因为这些友人的全部物质基础，包括党的领导人的个人财产在内，均已抵押在银行里，而银行要求立即付款，不再接受任何结算担保。"[①]

稳定局势的最后希望是1991年夏的"七大国"会议。戈尔巴乔夫恳求邀请他赴会。在戈尔巴乔夫出访之前先期抵达伦敦的E. 普里马科夫在英国发表电视讲话，谈论苏联一旦崩溃以及如果西方不肯提供经济援助而造成混乱时将会引发的种种威胁。[②] 西方领导人无法拒绝邀请戈尔巴乔夫，但也不肯答应给钱。

如果考虑到七大国会议上讨论问题的通常程序，注意到这个机构向来并不作出决定，一般只是确定对待问题的共同态度，那就很难设想苏联领导人会得到数量和期限都足以防止苏联破产的财政援助，甚至很难提供一个摆脱危机的切合实际的严格计划。但这个问题并没有机会进行讨论。苏联领导人即便能获得财政资金，也一直未能决定为稳定经济局势该做些什么事情。在这种条件下，在伦敦不可能进行言之有物的会谈。

不使用暴力便不可能保全帝国，而试图以暴力挽救帝国则无望获得西方的财政援助，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在1990年末~1991年初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正是这一点可以解释苏联领导人出乎意料、突如其来的政治转折。

在立陶宛于1990年2月18日、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于3月18日所进行的最高苏维埃选举中，拥护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独立的人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1990年2月就独立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全民公决中，投票赞成独立的居民在立陶宛占90%，在拉脱维亚占77%，在爱沙尼亚也占90%。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政治进程与发生在其他领土毗连帝国的情形

① B. 伊瓦什科致B. C. 巴夫洛夫同志函《关于向芬兰共产党偿付我们的债务》，1991年6月5日，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22. Д. 39. Л. 2~5。

② R. 布赖特怀特：《跨越莫斯科河 · 世界完全颠倒》，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伦敦版，2002，第299页。

相区别的一个非同寻常的特点，就是属于宗主国移民的很大一部分居民也都支持退出帝国。①

1990年春，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发表主权宣言。这是明确表达对独立国家地位的要求。摩尔达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纷纷效法它们的榜样。至1990年夏末，联盟的大部分都已拒绝服从苏联宪法。宪法危机尖锐，局势危险，置身其中的苏联总统既不能承认这些共和国的新地位，又无法取消这种地位，社会舆论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②

1990年4月13日，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向立陶宛领导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撤销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的一系列法律。如果不肯这样做，将以经济制裁相威胁。4月18日开始对立陶宛实行局部能源封锁。③苏联领导人暂停石油和石油产品供应，西方领导人要求立陶宛当局必须寻求与莫斯科妥协，这就迫使共和国政府于1990年初夏决定参加关于暂停实施与立陶宛独立有关的决议的谈判。但对话收效甚微。

1990年夏，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缔结政治联盟。在此基础上达成了关于大力扩展加盟共和国权利和权力、协调防止危机经济政策的协议。事实上，8月间所提出的计划拟将国家改变为松散的邦联，其中对采取关键性决定的机制并未做出明确规定，反通货膨胀措施的核心则是缩减预算开支，首先是用于国防和强力部门的开支，减少国家基本建设投资。“500天”计划规定将1990年第4季度的基本建设投资削减20%，军费开支（用于购置军事技术装备）削减50%～70%，削减对外经济活动开支（拟冻结对别的国家的援助和贷款），削减预算中非保护性项目10%～15%。④如果单就经济而言，这样的结构性变动在1985～1986年倒可以尝试着加以实现。但在1990年年中正值预算、货币问题恶化之际，提出这些措施则已经很不够了。然而事情并不仅限于此。这样的计划对于联盟的整个高层、

① A. 布兰登：《斯大林主义：它的起源和文化》第4卷《崩溃》：1.《东欧的崩溃》。http://home.mira.nef/~andy/bs4-la.htm#3~9。

② C. 基谢廖夫：《骑士的举措》，载于《莫斯科新闻》1991年1月13日第2期；Э. 格尔：《立陶宛：苏联成员中的独立年》，载于《莫斯科新闻》1991年3月24日第12期。

③ M. 索科洛夫：《立陶宛：总统的复活节礼物》，载于《商人报》1990年4月23日第15期。

④ Г. А. 亚夫林斯基、M. M. 扎多尔诺夫、A. Ю. 米哈伊洛夫、H. Я. 别特拉科夫、Б. Г. 费奥多罗夫、C. C. 沙塔林、F. B. 亚雷金娜等：《转向市场》，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莫斯科版，1990，第221页。

武装力量和克格勃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国家领导人内部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莫斯科附近的军事训练成为论据之一，此后戈尔巴乔夫作了让步，开始进行新的尝试，试图与那些还相信可以用武力解决政权和国家面临的问题的人达成一致。总统的新盟友们掌握着强力机构，他们开始尝试采取武力手段恢复政治控制。[①]

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之中，1987~1988 年拉脱维亚一度是争取民族复兴和独立运动的领袖。1988~1989 年担当这一角色的是爱沙尼亚，自 1990 年起则是立陶宛。不过无论战术的差别如何，赢得独立、重返欧洲的意志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却是共同的。对独立的追求得到很大一部分讲俄语居民的支持。1990 年戈尔巴乔夫所作的让立陶宛精英们相信必须保全苏联的尝试显然没有指望。可以有助于保持帝国完整性的论据只剩下一个，那就是强硬地坚决地使用暴力这一使苏联得以存在数十年之久的资源。

这个话题在 1990 年春的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但并未作出最后的决定。尽管如此，1990 年末~1991 年初在波斯湾战争的背景下，西方各国的注意力从苏联发生的事情上被吸引开了，一部分苏联政治精英决意表明武力解决波罗的海沿岸问题的办法是可行的。1991 年 1 月末苏联总检察长 H. 特鲁宾解释在波罗的海沿岸使用武装力量之事时曾说："在波罗的海沿岸暂时还将继续存在对抗，当我们事实上有着两个警察系统、两套检察机关的时候，要保证以宪法方式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②]

苏联报纸这样描述 1991 年 1 月立陶宛所发生的事情："1 月 7 日往立陶宛空投了伞兵部队。1 月 8 日空降人员开始采取行动。按照《时间》节目评论员的说法，他们将报刊大厦和城内的其他一些目标'置于保护之

---

① 内务部部长 Б. П. 普戈就拉脱维亚海关人员被不明身份人员杀害一事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大约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之前，我分析研究了波罗的海沿岸的事件和取缔非法武装队伍的可能措施。我认为，地方海关机关的问题亦已成熟。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苏联边界扣留非法运送出国的物品时，地方海关不是按规定将没收所得上交全苏预算，而是交付共和国预算。然而这些货物却是从全国各地、往往是距离波罗的海沿岸十分遥远的地方运来的！（记者）好吧，就算是这样，但我们看到，波罗的海沿岸的正义是使用野蛮的手段恢复的……（Б. П. 普戈）我自己也对事件的这种转折感到吃惊和不快。在流了血，而事情又变成这样一种情况之后，局势还孕育着新的流血和更加严重的后果。"见 И. 安德烈耶夫：《边境上纵火之后。Б. П. 普戈访谈》，载于《消息报》1991 年 5 月 27 日第 125 期。

② И. 安德烈耶夫、В. 鲁德涅夫、С. 莫斯托夫希科夫：《来自权威渠道的消息》，载于《消息报》1991 年 1 月 21 日第 18 期。

下'。报刊大厦是通过使用射击武器的方式才置于保护之下的。有些人受了伤。有关立陶宛的报道全部中断。机场停航，火车停驶……就在1月7日，亚佐夫元帅发布使用空降人员保障例行征召青年入伍工作的命令。向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空投了伞兵。从其他地区（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中亚）同样传来部队调动的消息……1月11日国家电视广播委员会主任列昂尼德·克拉夫琴科下令关闭独立的大新闻通讯社'国际电传'的信息通道，驻莫斯科的许多西方记者都使用该通讯社的服务。"[①]

苏共中央民族政策部部长B. 米哈伊洛夫1991年1月11日向苏共中央报告立陶宛所发生的事情："据正在立陶宛的苏共中央负责工作人员（卡久林和乌多维琴科同志）报告，今年1月11日维尔纽斯市的报刊大厦和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其中驻有地区警备队）等建筑、考纳斯市的军官培训大楼都已置于空降兵的控制之下。实施这一行动过程中基本未发生重大冲突……当地时间17时在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部长Ю. Ю. 叶尔莫拉维丘斯宣布，共和国内已成立了立陶宛民族救亡委员会。该委员会执掌全部政权。它设在无线电测量仪器厂内（厂长为O. O. 布尔坚科同志）。委员会通过了告立陶宛人民书，并向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发出最后通牒，其中要求对苏联总统的呼吁书立即作出反应。"[②]

A. 切尔尼亚耶夫（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助理）事后对M. 布赖特怀特（英国驻苏联大使）说，决定是在未征得戈尔巴乔夫同意的情况下，按照苏联陆军司令员瓦连尼科夫大将的指示作出的。[③]

苏联强力机构的行动遭到激烈反对。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议员，莫斯科苏维埃和列宁格勒苏维埃，都谴责立陶宛所发生的事情。库兹巴斯的罢工委员会要求苏联总统辞职，解散人民代表大会。西方尽管遭遇科威特危机，还是向苏联领导人发出了强硬的声明。戈尔巴

---

① M. 索科洛夫：《立陶宛：谢瓦尔德纳泽顺便警告……》，载于《商人报》1991年1月12日第2期。

② B. 米哈伊洛夫（苏共中央民族政策部部长）呈送苏共中央的报告《关于立陶宛事件》，1991年1月11日，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28. Д. 31. Л. 1。

③ 关于瓦连尼科夫将军在波罗的海沿岸事件中的作用，见R. 布赖特怀特：《跨越莫斯科河·世界完全颠倒》，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伦敦版，2002，第206页。

乔夫在苏联议会会议上所说的话对所出现的局势作了最精彩的论断："事情散发着煤油味。"①

西方各国首都对莫斯科讲话的语调变得露骨的冷淡。同时货币财政问题也尚未解决，急需西方贷款。苏联领导人退让了。那些决定使用武力的人相互推诿，追寻罪魁祸首。结果，应当为所发生的事情负责的成了维尔纽斯卫戍部队司令。

Ю. 谢科奇欣这样描写当局对维尔纽斯事件的解释："尚未被批准的内务部部长 Б. П. 普戈无法向议员们解释清楚，享有全权的'民族救亡委员会'为何物，它竟然能将坦克派上维尔纽斯大街。而苏联国防部长 Д. Т. 亚佐夫的解释除了引起惊惶不安，别无其他。他推托说他本人对各种细节毫不知情（因为，用他的话来说，'不在事件的现场'），也未下达过让坦克和空降兵出击的任何命令，他抛出了自己对维尔纽斯悲剧的说法。他的说法可归结如下：当在议会附近被毒打的'民族救亡委员会'成员来到维尔纽斯卫戍部队司令面前时，他们的模样对将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他下令占领正在不停地转播'反苏电视节目'的电视中心。也就是说，按照亚佐夫元帅的解释，电视中心附近的流血悲剧是一位感情冲动的将军个人引起的……如果维尔纽斯悲剧是一位将军的行为所致，那么这种行为可以视作主动发起暴乱，为此，像在任何文明社会一样，军事长官应当依法受到惩处。"②

这时候总统最亲密的战友之一，他的助理 A. 切尔尼亚耶夫致函戈尔巴乔夫，表述自己对所发生事件的观点（1991 年 1 月）："此次的选择是这样：要么您直截了当地说，您无法容忍哪怕剥夺苏联的一寸土地，准备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坦克，阻止出现这种情况。要么您就承认发生了中央无法控制的悲剧性事件，您谴责那些使用暴力、杀害民众的人并让他们承担责任。在第一种情况下，这就意味着您葬送了自己五年间所说所做的一切，承认您本人和国家尚未做好迈上文明之路的革命性转折的准备，只得按旧有方式处理事情和对待人民。在第二种情况下，事情还能够以继续执

① M. 索科洛夫：《立陶宛危机：如今一切取决于俄罗斯》，载于《商人报》1991 年 1 月 21 日第 3 期。

② Ю. 谢科奇欣：《无法驾驭的军队》，载于《文学报》1991 年 1 月 16 日第 2 期，第 1 版。

行改革方针的名义加以纠正。虽说某种不可逆转的事已经发生了。"[1]

俄罗斯领导人中和工人运动中对苏联政府持反对态度的力量活跃了起来。1991年春的重要事件——矿工罢工，是在政治要求（首先是要苏联领导人辞职）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进行的。罢工损失370万个工作日，采煤量减少1500万吨。[2]

在西方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作出了与1991年1月立陶宛的暴力行动划清界限的决定，这实质上是在发出明确无误的信号：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已是既成事实。不过这并非他个人选择的问题。苏联政府机动的自由是由日益临近的货币财政灾难硬性确定的。

时至1991年春，戈尔巴乔夫已经非常清楚，用武力保全帝国绝无可能。随后在1991年3~7月间所发生的政治转折——导致根本改变苏联国家结构与各共和国领导人的结盟，便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1991年7月30日在新奥加廖沃所进行的谈判中，戈尔巴乔夫向各共和国领导人作出了实质上结束苏联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的关键性让步，同意了单渠道税制的想法，在这种税制下，苏联政府在一个关键的问题——国家开支的经费提供方面，将完全依赖于各共和国政府。实质上，这是一个解散帝国、寄望于将其转变为松散邦联的决定。

---

① A.C. 切尔尼亚耶夫1991年1月15日书面报告，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档案，档字第8780号。

② 《1991年的俄罗斯经济·趋势和前景》，经济政策研究所莫斯科版，1992，第8页。

第八章
崩　溃

我是怎么活过来的，
只有我和你才知道……

——康·西蒙诺夫

一　破产政变的政治经济学

6月17日，戈尔巴乔夫签署《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并于18日将其送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经过重大修改之后，最后的文本于1991年6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进行讨论。6月29~30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会晤时作出决定，条约将于8月20日由各加盟共和国首脑签署。

在签署这一使帝国和平有序解散的手续条约前夕，苏联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军事工业委员会领导人、陆军总司令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支持下，决定做一件在他们看来由于总统性格懦弱难下决心的事情——使用武力，来恢复政治控制，保住中央政权。三天之间即已分晓，问题不在于总统，而在于已经变化了的国家。

1991年8月19~21日，数十年来政府所担心的事终成现实——军队拒绝向民众开枪。仅仅用了三昼夜，一个超级大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便已寿终正寝，而这一制度的核心正是能够而且随时准备对自己的人民毫无限制地使用暴力。

破产的政变让许多人回想起来像一出闹剧。然而其策划者们都面临着

非同寻常的任务——在一个业已城市化的发达社会里很难觅得愿意下令用坦克碾压民众的指挥官以及同样愿意执行这种命令的士兵。军官们根据1980年代末的经验早已熟知他们必须承担何种责任，便尽量做得不致趋于极端。况且政变的领导人并非出生于革命和国内战争，他们经历的是一个稳定政权的数十年时光。他们力图将使用暴力的责任推诿给他人也就不足为奇。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 B. 克留奇科夫的回忆录清楚地证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政变领导人这样称呼夺取了全部政权的机构）并未打算采取可能引起流血的任何决定，而是指望内政部、克格勃和国防部等机关能自己处理好一切。[1]

攻占白宫[2]的行动预定于8月21日夜间开始。制定攻打计划的指示是克格勃主席 B. 克留奇科夫于8月20日上午9时发出的。这应该是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的一场名为“雷霆”的协同行动。该项决定在总参谋部从8月20日中午一直讨论到下午。将军们报告说，就军事观点而言占领白宫不成问题。但与此同时，和平居民的大量伤亡也不可避免。起初将行动定在深夜1时，后来又改为凌晨3时，但结果却并未实施。拒绝采取行动的主要因素是政变领导人不愿承担大规模流血的责任。军队等着克格勃动手，克格勃等着军队动手，而内务部则等着这两家和其他人。快到深夜时才得知，克格勃的“阿尔法”部队拒绝参与攻打行动，内务部的图拉师和捷尔仁斯基师按兵不动，“温暖营地”旅则不知去向。[3]

Г. 沙赫拉扎罗夫[4]写道：“如果调进莫斯科的坦克向街垒开火并得到空中攻击的支持，几乎转瞬之间便一切都会结束。各共和国也都会屈服，这从它们小心翼翼的反应便可得到证明，他们显然希望赢得时间，看看联盟首都的事态如何发展。这样，如若有斗胆之人敢于号召反抗，他们的脖子立马便会给套上绞索。”这倒并不那么简单。1917年2月在彼得格勒即

---

① B. 克留奇科夫：《私事》，第2部，奥林波斯 ACT 版，1996，第184～200页。

② 俄议会大厦，因其建筑物为白色而得名。——译者注

③ A. C. 巴尔先科夫、A. Ю. 沙德林：《苏联1991年8月19～21日的政治危机》，载于《莫斯科大学通报》2001年9月8日第3期，第50页。关于1991年8月政变破产的原因，也见 B. 梅德韦杰夫：《1991年8月》，载于《自由思想》1993年第12期，第67～77页。

④ 沙赫拉扎罗夫：《同领袖们相处和没有他们的日子》，瓦里乌斯出版社莫斯科版，2001，第440页。

曾有军队长官下令向示威者开枪。[①]

1917 年 8 月俄国陆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也曾打算发布这样的命令。这并未能挽救统治集团。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要的不仅要看是否发布过类似的命令，而且要看是否有部队肯执行命令，以及有没有人准备投奔到反抗现有制度的一方。

1991 年 8 月的三天表明，戈尔巴乔夫没有运用武力挽救政权不单是因为他不愿意，而且也因为即使愿意也办不到这点。著名政治评论家马克西姆·索科洛夫在政变失败后当即这样描述其后果："莫斯科的最后两天成了下葬的日子：愚不可及的制度以愚不可及的方式寿终正寝。政变显得愚蠢可笑，因为人民已不再是傻瓜……这创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先例——73 年之间公民首次得以迫使武装到牙齿的国家屈服投降。社会生活开始不再以恐惧的惯性而是以无畏的惯性定位……如果说在别的国家制造变乱通常都是一伙凶犯的异想天开，事后便被投入监狱去过他们一向所过的日子，那么八月政变则是没有先例的。这次政变中让自己触犯法典种种条款的，实际上是所有的苏联领导部门：强力机构（军队、内务部和克格勃的上层人物），权力执行机关（内阁），立法权力机关（卢基扬诺夫和"同盟者"），党的权力机关（苏共上层人物）。而当一个国家所有上层人物要么是罪犯，要么是其帮凶，并且他们都在人民面前遭到毁灭性失败的时候，这样的国家是无法立足的。国家的所有领导人都陷入政治的虚无之中，便会从政治真空中产生另外某个国家。这样的国家产生了，而且不止一个。"[②]

---

① 1917 年 2 月 25 日，彼得格勒参加罢工的人数多达 20 万。当天晚上 9 点，C. 哈巴洛夫中将接到通过专线发至总参谋部的电报："我命令明天即行制止首都的骚乱，值此与德国和奥地利开战的严重时刻，不能容许发生骚乱。尼古拉。"上午 10 点，哈巴洛夫向高级军官们宣读了沙皇的电报并命令说，如遇人群进行挑衅，应开枪予以杀伤。从 2 月 27 日早上开始，部队已普遍拒绝向民众开火。哈巴洛夫本人这样描述 2 月 28 日早上 8 点所形成的局面："（1）我所掌握的只是海军总部大厦、4 个近卫连、5 个海军分舰队和百人队、两个炮兵连，其余部队都转向了革命者方面或者按照与其达成的协议保持中立。个别士兵和匪帮在城内四处游荡，向路人开枪，解除军官的武装。（2）所有的火车站均受革命者支配，并由其严密把守。（3）全城都被革命者控制，电话不通，与城市其他地区的联系中断。"当天 12 点时哈巴洛夫无力对抗已显而易见。不久他即被巡查海军总部大厦的士兵逮捕。见亚·勃洛克《旧制度的最后日子》，载于《俄国革命档案》第 4 卷，柏林版，1922，第 5～54 页。（这里所引用的文章是诗人根据临时政府非常委员会在调查前部长们的非法行动过程中所搜集的材料写成的）。

② M. 索科洛夫：《谢天谢地，改革结束了》，载于《商人报》1991 年 8 月 26 日第 34 期。

1991 年 8 月前在苏联所形成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事态发展可能的各种模式都难以逾越的界限。甚至即使政变的策划者能够牢牢掌握政权，那也改变不了国家的经济形势，其轮廓在此之前即已严格确定。

8 月初戈尔巴乔夫签署关于增加居民所需商品生产和劳务的紧急措施的命令。其中责成全苏和共和国货币委员会、苏联经济和预测部、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会同苏联对外经济活动银行，确保将外汇资金优先用于采购粮食、药品、生产民用商品必需的原材料和配套产品。[①] 如果将该命令中的严格指示与政府间的往来公文材料放在一起，便不难明白命令总体上与现实的差距是何等巨大。

苏联国家银行行长格拉先科向苏联内阁总理巴夫洛夫报告（1991 年 6 月）称："政府自 1959 年以来各个时期所通过的决议都责成苏联国家银行在执行预算开支时，从利用信贷资金达到调节差价目的的特别账户中对农业原料与其他产品的差价进行补偿，随后再从预算资金中偿还所形成的欠债。由于经常拖延上述欠债的清偿，预算的负债额年复一年增加，这对国家的货币流通造成了不良影响。自 1991 年开始，苏联财政部基本上将物价差别补偿推给了各共和国的预算……同时，在转向市场和价格上涨失控的条件下，银行不得不支付农业原料和其他产品日益增大的差价。例如，今年第一季度支付差价所用的信贷资金数额为 292 亿卢布，4 月为 59 亿卢布。包括去年所支付的金额在内，预算因这类支付而欠下银行的债务在年初至 5 月 1 日期间已从 616 亿卢布增加至 967 亿卢布。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国家整体债务的增长，苏联国家银行的集中贷款资金已全部用于抵补预算开支。如果继续将银行资金自动用于弥补物价补差而形成的预算开支，那么，补充资金的唯一来源就只能是信贷发行和现钞发行。由于并未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而导致信贷和现金的发行失控，我们认为有必要立即取消上述差价补偿制度，以免破坏经济稳定和造成通货膨胀进程失控。"[②]

---

① 米·谢·戈尔巴乔夫：《关于增加居民所需商品的生产和劳务的紧急措施》，载于《消息报》，1991 年 8 月 5 日。

② B. B. 格拉先科呈送苏联总理 B. C. 巴夫洛夫同志的报告《关于农业原料和其他产品的价格差别》，1991 年 6 月 26 日，见：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2. д. 4005. л. 125 ~ 127。

苏联内阁第一副总理 B. 谢尔巴科夫致苏联联邦委员会函（1991 年 8 月 16 日，即政变尝试前三天）："国家正以加快的速度陷入深重的财政危机和货币流通混乱。这些因素当前正在决定性程度上造成国内经济、社会心理和政治状况的恶化……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首先是采取不受欢迎的措施时迟疑不决，许多领导人对加强全联盟政府的作用畏首畏尾，不同层次的权力执行机关之间的组织和经济工作协调程度低下等等。实际上实现反危机计划的能力在日益减弱。稳定国家财政状况的主要措施本应于 7 月 1 日实施。然而无休无止的协商、讨论之类导致已经损失了两个月时间。在此期间，尽管同样延迟，总算还采取了稳定基础部门和部分大众消费品生产工作的决定……必须明白，再过 2 ~ 4 个月要想使形势正常化，就必须另行采取迥然不同的措施，而反危机计划则只能扔进废纸篓……正在出现难以置信的局面。一方面，预算系统会将自己将近 3100 亿 ~ 3200 亿卢布的赤字倾泻到流通领域，另一方面，企业还会添加上将近 2500 亿卢布……由此可知，预算系统正在成为产生严重通货膨胀进程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们的意见是，在各共和国同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苏联总统命令实施一个决定：立即（自 9 月 1 日起）冻结一切尚未开始按 8 月 1 日情况拨款的全联盟和共和国的社会性质计划，规定将这一措施至少延长至 1992 年上半年……在第二阶段（1991 年 12 月 1 日之后）主要是实行自由价格形成制度过程，同时启动劳动报酬基金形成的新机制……应当强调的是，这些做法并不足以解决整个财政稳定问题，只能将其解决推迟至 1991 年以后……因此，这些措施只能使现有的形势不致恶化，但对财政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并不会产生最重要的作用。"[①] 此前苏联的外汇储备已完全枯竭。[②] 1991 年夏季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分析材料中称："在苏联对外结算方面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状况。出口的外汇收入减少，同时对进口的需求却在增加，收支平

① 苏联第一副总理 B. И. 谢尔巴科夫致苏联联邦委员会函《关于国家财政和货币流通正常化的紧急措施》，1991 年 8 月 16 日，No. 1157C；O. 拉齐斯：《不知发向何处的胜利信号·苏联政府终结前三天里最怕什么》，载于《消息报》1996 年 6 月 28 日。

② Г. 亚夫林斯基和 M. 扎多尔诺夫这样评价苏联 1991 年 5 月的货币形势："1990 年初苏联还有外汇储备约 150 亿美元储存在外国银行里。年末它们便被顺利地'吃掉'。相反，从去年 11 月以来未支付外国公司已经供货的货款在 30 亿 ~ 50 亿美元的范围内增减不定。"见：Г. 亚夫林斯基、M. 扎多尔诺夫：《加上"七大国"：有组织地回归大经济的计划》，载于《消息报》，1991 年 5 月 20 日。

衡赤字加大。自由外汇储备枯竭。商务合同方面形成了大量的逾期债务。国家的外债已达到危急的程度。苏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声誉下降……货币政策方面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国家的支付能力……"①

"1989年年底苏联进口方面的支付便开始不时间断，拖欠合同款往往长达数月。1990年底逾期未付的款项为29亿卢布。这种状况令人对苏联在国际信贷市场上一向无可指责的声誉产生怀疑。在苏维埃国家的整个历史上，苏联的债务（例如对外经济银行担保的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各外贸机构的期票）在市场上流通时首次需要贴现。因此各种市场已将苏联视作不可靠的债务人。这与1980年代初期的情形一样，当时苏联也遭遇国际信贷市场的信任危机，债权人的恐慌使得随后的短期交易贷款额度急剧减少。1980年代苏联外债的绝对规模增加一倍多：从1981年的150亿卢布增至1991年初的322亿卢布。存放在外国银行中的苏联可兑换货币资产仅为37亿卢布。可见，苏联的'净'债务为285亿卢布。1991年苏联偿还外债连本带利需要支付约100亿卢布。如此巨大的集中支付额恰恰在1991年造成了国家收支平衡额外的紧张，已经需要对本年度的出口收入采取特殊的分配方法。"②

国家距离破产、终止支付外债只有数周时间——连这也还须停止进口供货结算才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休想得到成功获得大笔西方贷款的机会。新的行政当局不得不采取决定：进一步减少粮食采购，压缩牲畜头数，减少其他食品进口，因进口的配套产品缺乏而让工厂停产。

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领导人O. 巴克拉诺夫于1991年1月上书戈尔巴乔夫："当前国民经济的状况已被视为危机……此外，国家依赖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材料和技术资源的程度愈来愈大。据苏联物资技术供应总局估计，1991年国内短缺的国民经济正常运转所需的原料资源将近90亿卢布，基本上都是从国外采购……国家所欠外国公司1990年提供原料、材料、食品和工业品的外汇债务相当多，这

① 苏联最高苏维埃决议草案《关于1991年下半年统一的国家货币和信贷政策的主要方向》，1991年5月8日，见：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2. д. 4005. л. 95、99。

② В. В. 格拉先科致总理巴夫洛夫函《对1991年下半年统一的国家货币信贷政策的主要方向草案的说明报告》，1991年5月8日，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2. д. 4005. л. 103、104。

使原料采购的形势更为困难。由于缺乏原料，1990年末许多种产品已开始减产，其中也包括大众消费品，因此今年第1季度预计许多车间、生产部门和企业会大批停工。单是轻工业就有400家工厂亦即现有工厂的1/3可能停产，将近100万人无活可干。由于可能停工而造成近期内生产形势紧张的公司有：‘吉尔’汽车厂、罗斯托夫农机厂、切尔诺夫策州拉辛鞋厂、切博克萨雷市‘电路’厂和电灯厂、阿尔泰拖拉机厂、第涅伯罗彼得诺夫斯克州东方采矿选矿联合工厂、莫斯科机床制造生铁铸件厂以及其他许多企业。”①

所有这一切，政变的策划者们都一清二楚。O. 拉齐斯曾引用政变即将发生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收集的情报资料：“1991年基本建设计划完全失衡。根据现有的预测估计，投入使用的主要基金1991年比去年减少30%～35%，住房投入减少20%～22%，其他社会领域项目减少15%～70%。为了保证航空企业不间断地生产，按照民用航空部的计划需要提供193.8万吨航空煤油和5.3万吨航空汽油。至8月末，已运送到的总共只有100.5万吨航空煤油和2.8万吨航空汽油，亦即一半略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生产单位企业1988年开始的牲畜总头数的减少目前越来越加剧……莫斯科动力领域出现了若干困难。有些热电站的设备磨损率已达70%。重油储备量仅及50%～80%。供热工程的城市系统在技术能力的极限上运行。消费市场形势严峻。城市商业网的肉奶产品进货率平均不超过去年的80%。全市的食品供给率仅60%～70%，现有的储备量只有15天……动力领域的形势也很困难。各热电站的燃料刚一卸车便投入使用。煤和重油必不可少的储备仅及所需数量的50%。食品供应时断时续。30%的居民6、7、8月间购买食粮、动物肉、肉制品的票证无法兑现。居民的谷物产品供应尤其令人担心。规定的标准为每人每天250克（H. A. 萨文科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局局长，1991年9月2日）。签署该文件的H. 萨文科夫是苏联克格勃管理局领导人，经济安全也属于该局管辖范围。”②

---

① 苏共中央社会经济部1991年1月28日为戈尔巴乔夫同志撰写的报告《关于1991年末能满足国民经济原料资源供应的情况》。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 ф. 89. ОП. 22. Д. 9. Л. 2～4。

② O. 拉齐斯：《危机开始的时候——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1991年9月撰写的情报资料说些什么》，载于《消息报》1993年4月15日第70期。

1991 年第 3 季度的预算赤字迅速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 30%。[①] 这意味着消费市场的形势仍然是灾难性的。不消除结构性的比例失调，不减少国防开支、对农村的补贴、基建投资，进一步提高价格只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再次引发消费品的脱销。这一切都应当由不得人心也不合法的政权负责。如果考虑到此种背景之下波罗的海沿岸、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西乌克兰将会发生的事情，这个政权的命运便不难预料。

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助手之一 B. 梅德韦杰夫在 8 月事变期间曾对阴谋参与者 B. 博林说："对待外国慷慨援助的皮诺切特式态度不会过时；相反，国内的骚乱和对外经济援助渠道的必然截断会迅速将经济引向灾难。政变不仅不会削弱联盟内的离心趋势，相反，倒会无可避免地招致联盟崩溃，因为各共和国都不愿意在这样的政权之下过日子。"[②]

苏联内阁总理巴夫洛夫比那场政治阴谋的其他参与者都更为了解国家的货币金融形势，8 月 18 日晚他喝了大量的酒，结果严重的高血压危险症状令他卧床不起。最后一届苏联政府的这位首脑当时都在想些什么已无从知晓。我不排除他非常明白政变注定覆灭的政治经济学原理。[③]

二　政治上的濒死状态

1991 年 8 月 19～21 日的事件之后，帝国的灭亡不但无可避免，而且

---

① A. 伊拉里奥诺夫估计，1991 年俄罗斯预算即全苏预算与俄罗斯地域重合部分的总体赤字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31.9%。1991 年 5～12 月货币量的增长速度提高 8.1%，而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8 个月中增至创纪录的水平 76.5%。1991 年 5～12 月广义货币数量为同时期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 60.7%。见 A. 伊拉里奥诺夫：《苏联和俄罗斯推行财政稳定政策的尝试》，1995。www. budgetrf. ru。据 C. 亚历克萨申科计算，1991 年的预算赤字规模按国际方法估计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 34%。见 S. 亚历克萨申科：《苏联财政制度的崩溃：应当做些什么？》，载于《过渡经济学评论》第 1 卷，1992，第 39、40 页。世界银行估计 1991 年俄罗斯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考虑到被迫储蓄）为 30.9%。《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跨越结构性转变的门槛》，世界银行版，1992。

② B. 梅德韦杰夫：《在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里——内幕一瞥》，壮士歌出版社莫斯科版，1994，第 195 页。

③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B. 克留奇科夫回忆录摘录："巴夫洛夫详细地讲述了经济形势、国家已经陷入的深刻危机，预计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还会遇上更大规模的危机。他强调说，不能指望贷款，人家根本不会向我们提供贷款，因为我们再也没有支付能力了。苏联甚至已没有钱支付先前所获贷款的利息。" 见 B. 克留奇科夫：《私事》第 2 部分，第 151 页。关于总理过量酗酒引发的高血压危急症状，见同书第 182 页。

已经发生。问题仅仅在于，对全国居民而言其崩溃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将会严重到何种程度。

自然，苏联当局可以无休无止地援引3月17日就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所进行的全民公决，[①] 以证明12月1日乌克兰所举行的全民公决与苏联法律相抵触——乌克兰的全民公决有84%的共和国居民参与，其中90.3%的人表示赞成这个第二大加盟共和国独立。所有这一切对于现实的政治进程已经没有关系。所有的帝国轰然坍塌之际，其命运都不会取决于全民公决。早在3月17日投票的两周之前，M. 索科洛夫即曾正确地指出："从法律形成的观点来看，有失体统的全民公决不可能产生法律结果，从实际出发，它不会为戈尔巴乔夫额外提供任何一个可靠的师团……戈尔巴乔夫准备（或者不准备）采取坚决的行动取决于更暂短的因素，而不是取决于苏联公民对一个毫无意义问题的毫无意义的回答。还有更加发挥作用的因素：居民的愤懑，军队的不可靠……"[②] 1991年12月正式确认联盟解体之前，苏联领导人没有掌握任何可靠的部队。这一点，所发生事件的同时代人都一清二楚。

政变的第一个后果是：显示了苏联当局已不能运用武力保证对领土的控制。1991年8月末，任何一辆坦克、任何一个连队都没有按照苏联领导人的命令出动保卫现任政府和保障社会秩序，这是客观现实。[③]

这对于行将垮台的帝国已是屡见不鲜。奥匈帝国、南斯拉夫的经历都令人信服地表明，当中央政权的合法性被摧毁，军官和士兵的忠诚在他们的原籍所组建的新国家与宗主国以及他们驻扎的那个帝国的行政当局之间被搞得四分五裂之时，国家机关所遭遇的困难是十分巨大的。通常的结果只有一个——军人丧失采取任何行动的能力。

---

① 交付表决的问题是："您认为是否有必要保留苏联作为一个由享有平等权利和主权的共和国组成、任何民族的人的权利和自由都得到保障的崭新联邦？" 76.4%参加投票的人回答："是的。" 6个加盟共和国没有正式举行全民公决。

② M. 索科洛夫：《全民公决：算了吧，没什么可怕的……》，载于《商人报》1991年3月4日第9期。

③ 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的回忆录摘录："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宣布其领土上的一切武装力量归其管辖，军队的全部财产转归其所有。简直是神经错乱！" 见A. C. 切尔尼亚耶夫：《1991年：苏联总统助理的日记》，TEPPA、共和国出版社莫斯科版，1997，第235页。

无论苏联还是各共和国政府当局，1991 年秋都已不具备控制武装力量的能力。1991 年 11 月的车臣事件清楚地显示出了这一点。俄罗斯当局试图调入军队保住紧急状态下的政权，结果失败了，主要就是因为苏联当局已为军人准备好无所作为的借口。当一个国家不仅丧失了对暴力的垄断，而且连使用暴力的能力亦已丧失的时候，它便不复成其为原本意义上的国家了。

紧随八月事件之后，各共和国政府发表了一系列独立宣言。联盟想要阻止独立，却已既无力量也无威信。这种情况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苏联无力控制自己的领土，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已不能承认其主体地位。在波罗的海沿岸，在乌克兰，苏联当局已不能控制海关和苏联边境的局势。各共和国之间具有法律效力的固定边界不复存在。[①] 实际上这已意味着苏联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9 月 5 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自动解散，结束了苏联 70 余年的存在。至少大众传媒是这样看待这些决定的。[②]

10 月初由部分加盟共和国草拟的《经济共同体条约》的条款是含糊不清的。第 16 条达成的协议认为有必要保留卢布作为统一的货币单位。同一条又规定各国——经济共同体成员可以采用民族货币。货币问题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关键性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当时并未确定，建议日后由专门的协议加以调整。建立了一个在储备制度原则上活动的银行联盟。至于它如何采取决定，却并未写明。对于任何 一个国家和国际机构都至关重要的预算问题也悬而未决。该文件称：“经济共同体的预算依靠其成员按规定数额缴纳的费用构成。规定交纳费用的多寡和次序由经济共同体成员的专门协议确定。”这是什么意思颇难理解。

位居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后的最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在 1991 年 8 月 19～21 日的事件中采取谨慎的立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拒绝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直至 21 日政变的尝试完全失败已显而易见时为止。正是这点使得无论是他还是

---

① 1991 年秋戈尔巴乔夫试图引述种种论据证明保留联盟的必要性，他向各共和国领导人讲：“国家内部没有边界，我们只有行政边界。谁也不会心血来潮去树立什么界桩。况且各共和国之间 70% 的边界是由区执委会、村苏维埃的决定设定的……武装力量我们同样不会加以分割……”然而像所有领土毗连帝国崩溃时常有的情形一样，这些话说服不了任何人。见《联盟本来可以保留》，白皮书，有关戈尔巴乔夫改革和保存多民族国家政策的文件和事实。A. Б. 韦贝尔主编，“85 年 4 月”出版社莫斯科版，1995，第 296 页。

② M. 索科洛夫：《自由共和国联盟土崩瓦解……》，载于《商人报》1991 年 9 月 9 日第 36 期。

乌克兰共产党全体领导人都别无选择地支持乌克兰独立的想法。在相反的情况下，无论是他或共产党都已没有政治上幸存的机会。8 月 24 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实际上一致通过了关于独立的决定。①

1991 年 11 月 8 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Л. 克拉夫丘克说："经济条约和协议仅可视作一般性原则——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少。我们将反对建立任何中央机构。如果条约要设立无论什么类型的中央机构，我们都不会批准它。除了参与条约进程各国将要建立的协调机构之外，总的说来不应当有任何中心。"②

三 政治的分崩离析：经济的后果

早在 1991 年上半年八月政变之前，俄罗斯就仅从其他共和国获得按计划供应 22% 的糖、30% 的茶叶、19% 的粒粮、22% 的肥皂。除俄罗斯外，所有的共和国都在自己的边境设立了海关，旨在限制将商品运往邻国，尤其是运往俄罗斯。海关的工作是单向的——将商品运往俄罗斯不行，从那边运进来则可以。1991 年初乌克兰和爱沙尼亚安排在国外（加拿大和瑞典）印制自己的钞票。作为预备措施，乌克兰定于 1991 年 11 月让息票作为临时货币进入流通。③

前苏联政府副总理 Л. 阿巴尔金写道："10 月初（1991 年——盖达尔注）我在美国时会晤了美国联邦储备局局长格林斯潘先生，他是当代最有经验的财经专家之一。我们早已相识，彼此十分了解，实际上讲同一种语言。他问我：'您是否明白，要防止财政破产只剩下几个星期时间了？'我回答说，我们估计的期限还有两个月。其实，区别仅仅在于表达思想的方式不同而已：几个星期或者两个月——这实际上是一回事。"④ Г. 沙赫拉扎罗夫在笔记中提及 1991 年 10 月 16 日的国务会议时也说："国务会议上，

---

① 关于 Л. 克拉夫丘克在政变最初数日的立场，见 T. 库齐奥、A. 威尔逊：《乌克兰：为独立而改革》，圣马丁出版社纽约版，1994，第 171～172 页。

② A. Б. 韦贝尔主编《联盟可以保留》，白皮书，有关戈尔巴乔夫改革和保全多民族国家的政策的文件和事实，"85 年 4 月"出版社莫斯科版，1995，第 245 页。

③ 《关于前苏联各共和国的经济政策》，1991，叶·季·盖达尔私人档案馆中的政府工作材料。

④ Л. И. 阿巴尔金：《通过危机达到目的 · 再过一年……》，光辉出版社莫斯科版，1992，第 176 页。

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作关于经济联盟的报告。他引用一些数字：1991 年产量下降 15 个百分点，1992 年预计减产 23～25 个百分点……生产的停滞和物价连翻一两番，将会造成走投无路的局面。”① 全苏政府机关控制税收的能力本来就微乎其微，自 1991 年秋季开始更是化为乌有。全苏政府只能从某些加盟共和国得到为数不多的一点钱。不过这里所说的已经不是税收，而是赠款。况且其数额与全联盟的预算需求也极不相称。国家支出的经费供给几乎悉数依靠国家银行的贷款。

在货币领域，全苏政府机关同样失去了垄断地位，它已不能控制各共和国中央银行进行现金的划拨，只是沦为钱币供给的竞争者之一。苏联国家银行行长 B. 格拉先科 1991 年 8 月 9 日致函戈尔巴乔夫称：“在使用统一货币的条件下，不可能遏止那些利用自身权力推行独立货币信贷政策的共和国的破坏性行为。因为按照条约的含义，所赋予联盟的货币发行功能仅仅意味着发行用于流通的纸币和硬币的技术性功能。决定通货膨胀进程的真正的货币发行，则是由各共和国本身在其中央银行开展信贷业务的过程中进行。”②

在这些文字的作者看来，1991 年秋的局势有如下述：“在第五次代表大会授予总统额外权力从而开辟了深化经济改革的道路之前，6 年的动摇、犹豫、妥协已经造成了真正的社会经济混乱……大家都十分清楚，为了这一切遭受惩罚的时刻已经来临：为数年来财政的不负责任，为对外经济银行缺乏支付能力，为国家自然资源被盗窃一空，为金融陷于崩溃，为不起作用的卢布，为空空如也的售货台，为所有那些近年来大肆散布的蛊惑人心的许诺……1991 秋天——这就是社会生产的急剧下滑，这就是迅速停产的黑色冶金工业，紧随其后则是整个机械制造业和建筑业停工的威胁。1991 年秋天——这就是深深的沮丧和悲观的季节，预示着饥饿和寒冷的季节。所有那些在这种艰难的形势下仍然决定继续花费时间无休无止、徒劳无益地讨论顺利转向市场和稳定经济的途径，期待造就一个市场竞争阶层、形成高效的私人所有制的人，他们等到的只能是生产的瘫痪、俄罗斯

① Г. 沙赫拉扎罗夫：《同领袖们相处和没有他们的日子》，瓦格里乌斯出版社莫斯科版，2001，第 482 页。

② В. В. 格拉先科（苏联国家银行行长）1991 年 8 月 9 日致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函，“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档案馆，来自沙赫拉扎罗夫基金会，档字第 10811 号，Л. 27。

式的民主和国家体制本身的毁灭。"①

我后来有机会见到的档案材料表明，对当时在俄罗斯所形成的局势这一评价是正确的。兹引述文件的若干摘要如下："根据核算规定，商品的储备量按一天开始时它们在商业部门的存量计算。考虑到大部分商品当即就销售一空，实际上可以认为，卢布在目前并没有商品作保障……由上述比例失调引起的经济上的商品—货币失衡，因居民的大量需求得不到满足而日趋严重，而这种得不到满足的需求则是多年积累的结果，按照苏联国家银行的数据已达到2330亿卢布……整个卢布流通地区预算系统方面总的预算赤字达3000亿卢布。如此巨额的赤字对于财政和货币流通不啻一场灾难。同时这也使形势想在年底之前得到实质性的真正改善已无可能……1986~1991年期间苏联国家银行向全苏和共和国预算所提供的贷款已从1410亿卢布增至5810亿卢布，如将1991年所借资金考虑在内，这一数额则为6400亿卢布……目前居民在储蓄银行中的存款已在各共和国之间进行瓜分，成为银行资金。同时，按检索系统估计高达6000亿卢布的居民全部存款，已完完全全充作了国家内债。"②

"整个经济形势的恶化，尤其是构成全苏预算很大部分的对外经济活动收入的减少，也影响了全苏预算的执行情况。仅仅今年的近9个月中，由于出口规模缩小和国际市场的变化，即已少收出口税151亿卢布，进口收入减少92亿卢布。今年前9个月苏联预算得到的收入共计802亿卢布，比预定的这一时期的精确预算进款额少969亿卢布。1991年联盟预算和全苏稳定经济基金方面的财政资金总体赤字估计为2046亿卢布，其中今年第4季度为904亿卢布。"③

1991年的苏联国家预算赤字连同稳定经济基金共计1560亿卢布。1991年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国家团结预算赤字连同稳定基金赤字为1970

① 《俄罗斯联邦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1992年4月6~21日》第1卷，速记报告，共和国出版社莫斯科版，1992，第151页。

② В. А. 拉耶夫斯基（苏联财政部副部长）、В. Г. 格里博夫（苏联经济和预测部副部长）致苏联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函《关于克服通货膨胀和稳定货币流通的措施（К-28、П.9）》，1991年9月27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41. Л. 28、29、30。

③ В. А. 拉耶夫斯基（苏联财政部副部长）、В. Г. 格里博夫（苏联经济和预测部副部长）致苏联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函《关于1991年第4季度联盟特别预算和预算外基金》，1991年10月23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41. Л. 49、62。

亿卢布，加上对依靠中央银行贷款进行生产的农产品的价格补贴开支则为2960亿卢布。[1]

预算危机导致货币流通进一步混乱。苏联国家银行领导人认为，现有的状况是灾难性的。苏联国家银行行长B. 格拉先科致函苏联国务会议（1991年10月）称："居民货币收入正在难以遏止地增长，1991年的前9个月与1990年同期相比增加63%……1991年第3季度实际增加了一倍。10月间这一进程仍在继续。1991年10月上半月的收入估计比1990年同期增长1.1倍……消费市场的特点是实际上所有各种商品都供不应求，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不断加剧，投机倒把猖獗……苏联国家银行调节货币流通数量的努力未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因为银行体系实质上已支离破碎，各共和国的国家银行在许多情况下都不执行苏联国家银行的指示，而是推行自己的与稳定统一货币单位利益相抵触的政策。"[2]

货币比率、居民的名义收入和消费市场等方面的事态发展，可用表8－1和表8－2的数据加以说明。

表8－1　居民的货币积累与商业部门和工业现有商品储备的对比关系（年底）

年　份	1970年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1年9月1日
居民的货币资金（存款，现金，有价证券），（10亿卢布）	73	228	320	568	854
居民的货币资金，占GDP的（%）	19.3	36.8	41.2	55.4	69.5
居民货币资金每1卢布的商品储备	0.62	0.29	0.30	0.13	0.14

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41. Л. 28。1970～1989年的数据按所占GDP的份额计算。С. Г. 西涅利尼科夫：《俄罗斯的预算危机》，欧亚出版社莫斯科版，1995；1990～1991年的数据则为按独联体统计委员会数据进行的GDP计算。

全国居民都十分了解现有局势的危急程度。全苏社会经济问题舆论调查中心报告苏联领导人："……居民各阶层的消费行为特征一无例外地都

① С. Г. 西涅利尼科夫：《俄罗斯的预算危机》，欧亚出版社莫斯科版，1995。

② 摘自B. B. 格拉先科致苏联国务会议函《关于1991年的货币流通》，1991年10月24日，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2. Д. 4006. Л. 65～68。

是：需求具有投机性质、回避货币、囤积商品（食品、日常服装等）。从今年8月所进行的民意调查的资料看来，平均有近1/3的居民都力图抢购各种短缺商品，不管本人是否需要。半数接受调查询问的人表示愿意为购得某种商品而多付钱。对货币不信任、急于将其出手的倾向，不仅表现在抢购商品以备不时之需（消费者这样做首先是脱销使然），而且也表现在具有经济危机特点的储蓄战略的选择。居民中最为流行的是购置贵重金属制品这种储蓄保值方式（38%的接受询问者回答说，目前是购置这类物品的合适时机）；其次的流行做法则是利用可自由兑换货币（33%的接受询问者认为，目前是获取这类货币的合适时机）。对政府的不信任表现在对储蓄的国家方式（将钱存入储蓄银行、购买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的评价很低。"①

表8-2 1985~1991年居民收入的增长

年 份	居民收入的增长（10亿卢布）	居民收入的增长与上一年收入相比（%）
1985	14.0	
1986	15.1	3.5
1987	17.3	3.8
1988	41.5	8.4
1989	64.5	11.6
1990	94.0	14.4
1991（估计）	570~590	517.0

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5446. ОП.163. Д.41. Л.29，据各年度《苏联的国民经济》统计汇编的数据进行计算，财政与统计出版社莫斯科版。

预算赤字不能大幅减少，国家财政方面所形成的状况不能正常化，就不可能有稳定的货币流通。然而这方面的危机仍在继续加剧。苏联检查院

① С.П. 施皮尔科、Л.А. 哈胡林娜、Э.В. 库普里亚诺夫、В.В. 博德罗娃、Л.Г. 祖博娃、Н.П. 科瓦列娃、М.Д. 克拉西利尼科娃、Т.В. 阿夫杰延科：《居民对国内社会经济状况的评价（据1991年社会调查的结果）》，科学报告，全苏社会经济问题舆论调查中心，莫斯科版，1991，第55、56页。

院长 A. 奥尔洛夫致函苏联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主席 И. 西拉耶夫（1991 年 11 月）称："1991 年的 9 个月之中预算赤字和国家债务都超过苏联最高苏维埃规定的 1991 年年底的指标许多倍。所规定的 1991 年全苏预算赤字最高限额为 267 亿卢布。事实上根据苏联财政部的报告，1991 年 10 月 1 日进行检查之时全苏预算赤字为 845 亿卢布，超过法定水平 2.2 倍。业经批准的 1992 年 1 月 1 日的国家内债最高限额为 5670 亿卢布。事实上国家内债已从 1991 年 1 月 1 日的 5661 亿卢布增至 1991 年 10 月 1 日的 8900 亿卢布……据估计，年底前国家债务将超过 10000 亿卢布……苏联最高苏维埃（原先的组成人员）所通过的提交给国家权力执行机关的不切实际（首先是在收入部分）的 1991 年全苏预算，是苏联财政预算和信贷体系发生危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全苏预算危机的基本经济原因是，较之以往历年的和 1991 年所批准的计划，其收入基数减少了许多。所得税、合作社收入和交易税的提留并未进入全苏预算。切断全苏预算与居民收入、市场新机构收入和交易税的直接联系，是最大的战略性失误和对预算稳定性、无赤字的打击……乌克兰没有为全国计划划拨资金。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国内所有收入则一律列入共和国预算……销售税成了全苏预算收入并不可靠的来源。9 个月中进入全苏预算的这种收入共计 65 亿卢布。而 9 个月的计划则为 268 亿卢布……据苏联财政部估计，来自对外经济活动的收入最多也不过 348 亿卢布，而不是 863 亿卢布，亦即仅为 1991 年计划的 40%……由于中断出口供货合同，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国家遭受巨大损失。例如，煤炭、页岩、冶金焦炭、生铁、轧材、氨水、水泥、锯材、纸浆、运货汽车的年度配额仅完成 13% ~35%，石油、铁矿石、铜、用材、纸板、拖拉机、轻型汽车则完成 37% ~66%。与去年同期相比，1 ~9 月的煤炭出口减少 1800 万吨，原油减少 4800 万吨，天然气减少 10 亿立方米，棉纤维减少 14.4 万吨等等。出口量减少，而外债偿付额增加，这就决定了必须削减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采购数量（达 36.6%）……政治性的因素影响到外国债务人暂停偿还我国所提供的贷款（伊拉克、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叙利亚），因而使预算少收入 91 亿卢布。"①

---

① A. 奥尔洛夫（苏联检查院院长）致苏联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主席 И. 西拉耶夫同志函《检查和分析 1991 年 9 个月中全苏预算和预算外基金执行情况的材料》，1991 年 11 月 22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31. Л. 66 ~75。

В. 格拉先科和 Ю. 莫斯科夫斯基向 И. 西拉耶夫报告所收到的利雅德银行的电报，其中告知，苏联的局势使该行不得不无定期推迟第二和第三批贷款（合计5亿美元）。[①]

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管理局副局长 Ю. 波列塔耶夫致苏联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领导人 И. 西拉耶夫的函件描绘出了国际社会对苏联财政状况的关切程度："鉴于美国总统今年8月底决定在美国农业部计划范围内加快向苏联提供担保，兹报告如下：苏联对外经济银行通过自己的代表处在纽约与多家美国银行进行了谈判。然而其中没有一家银行打算在目前参与向苏联提供贷款。美国各银行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苏联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不稳定和不明朗，它们不愿承担任何对苏方面的风险，因为按照该计划的条件，所担保的只是98%的贷款基本金额和部分利息应付款。美国银行和出口公司所提出的可行方案是修改担保的一项基本条款，旨在对100%的贷款基本金额进行担保。"[②] 在苏联事态发展难以预料的情况下，甚至损失2%所提供的信贷资金的风险当时对美国的银行家而言也过于重大。

1991年秋，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Л. 阿巴尔金在文章中写道：

> "我有一份由研究所同事 О. 罗戈沃伊撰写的报告。从中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其后经济便会崩溃，发生虚脱。别的一些计算也证明了这一点。可以争论的只是这一预测在细节上的正确程度……1991年整整一年之中，衰退逐月逐季加剧。数据分析使人想到表示这种衰退急转直下的一个斜面……1991年内我在1月、4月、9月以及最近的11月都作过同样的估计。而每一次分析事态发展的过程时对正在出现的前景所作的估计愈来愈不乐观。然而这局势不是一般的四平八稳地恶化。大约在1991年夏季中期，更为确定的是在秋季行将来临之际，经济危机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崭新的因素……决定危

① В. В. 格拉先科、Ю. С. 莫斯科夫斯基致 И. 西拉耶夫的紧急报告《关于利雅德银行（沙特阿拉伯）所提供贷款的使用情况》，1991年10月25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47. Л. 7。

② Ю. В. 波列塔耶夫（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管理局副局长）致苏联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领导人 И. С. 西拉耶夫函《关于依靠美国农业部担保在美国采购粮食的资金提供》，1991年9月11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1436. Л. 12。

机的性质并使其无可避免进一步加剧的那些进程和趋势越来越强劲。”①

对于1991年秋末国家经济所出现的危机程度，最后一任苏联政府一清二楚。1991年11月19日И. 西拉耶夫呈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关于1991年第4季度的特别预算》中称：“为了说明财政和货币流通极其困难的状况，我仅引用几个数字。如果将全苏稳定经济基金为数513亿卢布的赤字考虑在内，则总体赤字应为2046亿卢布。与事前的计划相比，各共和国的预算赤字也都增加了。赤字加大的根本原因何在呢？首先在于今年全苏预算的收入基数急剧减少。9个月中预算的进款比预计少970亿卢布，而全年预计减少1470亿卢布，亦即预算的进款较最初所计划的数额要少47%。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权力执行机关还是立法部门，都对收入的减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指的是那些业经通过的实际上是在取消销售税、将利润税从45%降至35%、提供大量税收优惠等的决定。这些决定中央作出了，各共和国也作出了。乌克兰每年欠交88亿卢布。这个共和国从今年7月起已停止向全苏预算划拨款项。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根本不与全苏预算清账……除此之外，居民社会救助统一基金也须从全苏预算中开支。在预备进行零售价格改革时，曾打算依靠各共和国缴纳的费用来建立这一基金。然而后来所有应向基金划拨资金的共和国都拒绝履行这一协议……最后，由于价格上涨，国防支出还需要增加120亿卢布。这样一来，全苏预算和稳定基金总的赤字仅前9个月便高达1142亿卢布。今年10个月中的现金发行已经多达826亿卢布，其中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533亿卢布，乌克兰61亿，乌兹别克斯坦44亿，哈萨克斯坦56亿。一年之间流通中的现金数量已增加1100亿~1400亿卢布。”②

苏联政府越来越清楚，要想克服国家财政、货币流通、消费市场的崩溃所引发的日益严重的问题，离开价格自由化是不可能的。苏联检查院院长A. 奥尔洛夫致函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主席（1991年10月末）

① Л. И. 阿巴尔金：《通过危机达到目的 · 再过一年……》，光芒出版社莫斯科版，1992，第135、157、162~164页

② И. 西拉耶夫呈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关于1991年第4季度的特别预算》，1991年10月19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41. Л. 101~106。

称："弥补全苏预算和预算外基金所产生的巨额赤字的主要来源是运用向苏联国家银行借来的资金，方式上则采取以苏联总统和苏联财政部名义要求贷款（680亿卢布）和发行货币（400亿卢布），后者同样具有贷款的性质。所有这些借来的信贷资金（除50亿卢布之外）均经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因而已将苏联总统置于为难的境地……据我们计算，它（指预算赤字——盖达尔注）在第4季度可以减少15%～16%，而不致让国防企业大面积停工和在军队内部引起恐慌。可按1～3季度的实际情况进行资金拨付，撤销用于现役军人缺员（75万人）的拨款，取消原计划的训练，压缩国防部和各军兵种及各军区机关，减少过时重复的军事技术装备品种和型号的生产，裁减部队接待人员，让1/3的将军和高级军官退役，解散从事别墅村和狩猎活动服务的部队、部分海军陆战队和海岸防卫部队、民防部队……为了寻求全苏预算收入的补充来源，必须……加速向价格自由化过渡。"①

货币发行量以俄罗斯货币史上前所未有（1921～192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后）的速度增长。"今年的9个月中投入流通的货币达703亿卢布，超过以往5年间的发行数量（656亿卢布）。"② "今年的8个月居民以正规方式（存款、有价证券）进行储蓄的数额为580亿卢布，较1990年1～8月增加318亿卢布，即增长1.2倍。居民资金的积聚在一定程度上是迫不得已之举，因为由于国内市场的商品和劳务短缺，民众无法让所挣到的钱变现。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增加大众消费品的生产和付费劳务的规模以及限制企业不合理地将资金用作劳动报酬，则1991年居民的货币资金积存可能会增加2500亿～2800亿卢布，其中现金增加1000亿～1110亿卢布。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可能从1991年1月1日的1360亿卢布增加至1991年底的2400亿～2500亿卢布……苏联国家银行看不到国家预算赤字依靠短期信贷资金亦即发行现钞可以继续直接得到贷款的可能性。目前将近60%的这种资金已经用于弥补预算性质的开支，继续采取这样的政策会对经济产生极

① A. 奥尔洛夫（检查院院长）致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主席 И.С. 西拉耶夫函《关于全苏预算的状况完成以及拨款手续和减少1991年第4季度赤字的措施编制1992年联邦预算的原则》，1991年10月1日，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41. Л. 35、37、38。

② И. 西拉耶夫致苏联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函《关于货币流通的状况》，1991年10月，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44. Л. 40。

其不利的影响。"①

表 8-3 1991 年全苏预算预计执行情况

	1991 年的原定计划（10 亿卢布）	预计 1991 年内的执行情况（10 亿卢布）
总收入	250.1	112.1
总支出	276.8	253.7
赤字	26.7	144.6

资料来源：B. A. 拉耶夫斯基（苏联财政部副部长）致苏联国民经济经营计划委员会函《1991 年全苏预算预计执行情况》，1991 年 9 月 12 日，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41. Л. 2、3。

苏联财政部领导人 9 月间对 1991 年全苏预算状况的看法（见表 8-3）。

И. 西拉耶夫向戈尔巴乔夫报告称："与此同时，目前在苏联管理领域的许多经济部门，由于对所完成的工程和劳务欠下大量债务，已出现了极其困难的局面。因此，为了对最紧迫的开支提供资金，必须解决向 10 月份的全苏预算补充划拨 200 亿卢布苏联国家银行贷款的问题，同时允许将一笔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今年 5 月 27 日决议所提供的 50 亿卢布贷款延期至 1991 年 12 月 31 日。"②

苏联财政部副部长 B. 拉耶夫斯基致苏联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的函件说："今年 10 月份吸收苏联国家银行信贷资金用于预算拨款的整体需求确定为 300 亿卢布。"③

时至 1991 年 11 月，苏联财政和货币流通的崩溃已是既成事实，在公

① B. A. 库利科夫（苏联国家银行第一副行长）致 И. С. 西拉耶夫同志函《关于货币流通的状况（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委托书 K—28. П. 9）》，1991 年 9 月 24 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41. Л. 13～15。

② 引自 И. С. 西拉耶夫 1991 年 10 月 31 日致戈尔巴乔夫的信件，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36. Л. 118。

③ 引自 B. A. 拉耶夫斯基（财政部副部长）致苏联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的函件《对苏联财政部 1991 年 10 月 3 日 No. 01-01/121-1 号公函的补充》，1991 年 10 月 8 日，见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36. Л. 119。

开发行的报刊上受到广泛的议论。Г. 亚夫林斯基1991年秋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货币数量正在雪崩式地大量增加，9个月中从9890亿卢布增至17000亿，到年底则可能达到2万亿。这一进程的最强有力的推动力量乃是全苏和各共和国预算的巨大赤字、不断加剧的信贷扩张和收入的'自由化'。所有这一切已经导致卢布彻底丧失其全部功能。正因为如此，各种经济联系或者瓦解，或者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易货贸易所代替，而卢布则逐渐被排挤出国内市场。卢布的拍卖行情已跌至100卢布买1美元……10个月中出口减少31%，外汇收入的有限使得进口大大减少（少43%），其中包括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原料、设备以及大众消费品。归根结底，所有这些问题都对民众产生了影响。民众对物资福利和劳务的消费9个月中（亦即早在真正的通货膨胀发生之前）减少17%，而在所有的共和国，家庭的实际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一无例外地都降低了。"①

12月初，苏联国家银行报告全苏政府机关领导人，说它已在全国范围内暂停支付由全苏预算供给经费的各种开支和款项。这涉及工资、助学金、某些种类的养老金和补助费、军人的货币津贴等等的发放和各种全苏计划的经费拨付。②

对价格的行政监督尚能将通货膨胀控制在有限的水平，物价在上涨，但速度较货币的供给缓慢得多。然而恶性通货膨胀的财政基础已经形成。苏联国家银行行长呈送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政府首脑会议的报告中称："今年的11个月中，现钞发行量为1024亿卢布，超过去年同期的指标3倍……正因为如此，1991年1～11月居民手中和有组织的储蓄项目内额外积存有2250亿卢布，比1991年11月时多出1670亿卢布。1991年1～11月居民的现金结余增加968亿卢布（相比之下，1990年同期则为241亿卢布）。"③

1991年年终时，国家货币厂无力大规模印制满足国家银行需要的钞票，这成了苏联货币流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格拉先科向戈尔巴乔夫报告

① Г. 亚夫林斯基：《轨道已到尽头，不容迟延》，载于《劳动报》，1991年11月27日。

② В. В. 格拉先科致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函《关于全苏预算开支》，1991年2月2日，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2. Д. 4006. Л. 103～104。

③ В. В. 格拉先科呈交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政府首脑会议的报告《关于1991年9月的货币流通》，1991年12月9日，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2. Д. 4006. Л. 103～104。

(1991年11月):"1991年1~9月零售贸易额的规模较1990年同期缩减12%,商品零售价上涨70%。消费市场的特点是,实际上所有各类商品均出现短缺,投机倒把日益加剧。结果1991年1~10月居民手中和有组织储蓄项目下额外积存1593亿卢布……1991年1~10月居民的现金结余增加815亿卢布(1990年同期则为203亿卢布)。因而居民的现金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距逐月增大……国家货币厂不能确保完成苏联国家银行提高了的钞票预订印数,因为国家货币厂的制钞厂和印刷厂生产能力已经负担过重,1991年它们的工作实际上是三班倒……属于居民的货币资金余额的增长量预计在2500亿~2800亿卢布左右,比1990年多出2.2~2.3倍。1991年底流通中的现金可能达到2700亿卢布,一年间的增加额为1100亿~1400亿卢布……今年9个月中,周转的货币总量已从9890亿卢布增至16612亿卢布,亦即增加6722亿卢布或70.2%……一多半周转中的货币量用于抵补国家的内债和预算性质的开支。国家所欠银行的内债今年10月1日时为8437亿卢布,比今年1月增加3251亿卢布或62.7%……1991年货币流通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各共和国和中央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其总额1991年估计将近3000亿卢布。各共和国仿佛在各自预算赤字的规模上展开竞赛,纷纷提高对现金的要求。苏联国家银行调节货币流通数量的努力未能产生所需的效果,因为银行体系事实上已经彼此隔绝,各共和国的国家银行在许多情况下都不肯实施苏联中央银行的建议,而是执行与稳定统一货币单位利益相抵触的自己的政策。"①

苏联总统助理A. 切尔尼亚耶夫在其日记中写道:"国家银行包揽了一切支付项目:军队、官员、我们、罪犯。我们却一直拿不到工资。"②

全苏社会经济问题舆论调查中心1991年11月所进行的调查询问过程中,对于"我们目前正在经历艰难的时光,抑或它已经过去或是还在前头,您的看法如何"这一问题,69%的响应者回答说还在前头,21%的人说我们眼下正在经历。1991年秋全苏社会经济问题舆论调查中心曾就可能发生的社会抗议行动的规模、对国内局势失去控制的风险、居民中充斥着

---

① B. B. 格拉先科呈送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关于1991年的货币发行》,1991年11月13日,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2. Д. 4006. Л. 84~88。

② A. C. 切尔尼亚耶夫:《1991年:苏联总统助理的日记》,第280页。

的“潜在的恐慌情绪”可能转变成真正的社会性爆发等问题向政府作过预告。①

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1991年8月29日向苏联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主席报告说，对外经济银行已经停止就苏联所购买的进口粮食的信贷债务发放担保证书，这可能导致粮食发运的停止和国内企业粮食供应的中断。②

戈尔巴乔夫1991年8月末在与英国驻苏大使谈话时这样描述苏联的货币财政状况：1991年的未来4个月应偿付债务170亿美元，同期预计出口75亿美元，另有20亿美元可以依靠已商定的信贷方针进行筹集。需求与能力之间的缺口为75亿美元。他向西方国家申请20亿美元新的贷款，必须于数周之内提供；关于苏联债务的重组，他提到苏联在粮食和药品供应方面需要紧急援助。在这次谈话过程中，他还再次提及西方国家在海湾战争中耗费1000亿美元这一数字。P. 布赖特怀特应允向本国领导人报告所进行的谈话，但正如他自己所写的那样，成功的希望不大。③

1937年年中宣布苏联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为374.6吨。此后便停止补充，这些储备本身也交由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用于补差。自1930年代末期开始，关于黄金储备量的资料已成机密。苏联国家银行行长B. 格拉先科1991年11月15日向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报告：“今年10月宣布，国家官方的黄金储备共约240吨。黄金作为国家偿付能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按照专家们的意见所宣布的官方储备水平与大国和主要产金国的地位不相称。关于苏联黄金储备量的消息在黄金市场的专家中引起困惑，他们原先的估计为1000亿～1300吨。”④

---

① C. П. 施皮尔科、L. A. 哈胡林娜、3. B. 库普里亚诺娃、B. B. 博德罗娃、L. Г. 祖博娃、H. П. 科瓦列娃、M. Д. 克拉西利尼科娃、T. B. 阿夫杰延科：《居民对国内社会经济状况的评价（根据1991年的社会学调查结果）》，科学报告，全苏社会经济问题舆论调查中心莫斯科版，第6、20、21页。

② B. A. 曼加泽耶夫（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呈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主席 И. C. 西拉耶夫同志的报告：《关于对所购买的进口粮食提供财政保障》，1991年8月29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1436. л. 4。

③ R. 布赖特怀特：《跨越莫斯科河·世界完全颠倒》，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伦敦版，2002，第249页。

④ B. B. 格拉先科呈送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的报告《关于苏联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1991年11月15日，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2. д. 4006. л. 90、91。

在苏联日益严重的货币困难背景下，在国外经营的苏联银行纷纷陷入危机局面。莫斯科国家银行代理财务经理 A. 布京向俄罗斯联邦政府报告："自 1990 年年中开始，莫斯科国民银行便遭遇到从行际市场吸引资金的困难。银行还被迫针对前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的欠债建立数额巨大的保险储备金。在同一时期，它已被英吉利银行纳入特别监督之列……1991 年银行的状况急剧恶化。存款流失起初达到 40%，随后更高达 75%。出售资产也未能以足够的金额在短期内解决问题。"[①]

1991 年末，苏联国外银行系统的破产已成为显而易见、几乎无可挽回的威胁。苏联在国外的各商业银行的代表报告叶利钦（1991 年 12 月）："国外商业银行网包括在奥地利的多瑙河银行，在英国的莫斯科国民银行（创建于 1915 年），在德国的东西方商业银行，在卢森堡的东西方联合银行和在法国的北欧商业银行（创建于 1921 年）。这些银行在新加坡和柏林设有分行，在俄罗斯国内外还有许多租赁、咨询、贸易和其他方面的专业分公司。上述银行的总资产为 97 亿美元……现在出现了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的债权人扣押该行存于外国银行中的货币资金的风险，其中也包括存于我们海外银行中的款项。我们在海外的银行由于国内拖欠支付而使其资金严重不足的现象更为加剧，这种种因素，使得这些银行正式破产的前景已变成现实……银行破产必然随即引起为这些银行服务的其他国外商业机构的连续破产，使轮船公司、航空公司的工作陷入困难境地，使开设有银行账户的我国同胞丧失私人资产。银行的资本也会无可挽回地损失一空。"[②]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记载："亚夫林斯基告知，11 月 4 日对外经济银行将宣告破产：它已无钱可为我国的大使馆、商务代表处和其他机构在国外存在下去支付费用——回国也无钱可作路费……米·谢·戈尔巴乔夫吩咐我们致函'七大国'协调人梅杰：'亲爱的约翰！救救我！'"[③]

时间常常改变对情况的认识。下面是 12 年之后 Г. 亚夫林斯基对当年

---

① A. A. 布京（莫斯科国民银行代理财务经理）《用于同英吉利银行就在伦敦保留莫斯科国民银行进行谈判的资料》，1992 年 1 月 23 日，材料来自叶·盖达尔的私人档案库。

② 各商业银行领导人呈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叶利钦的报告《关于国外的俄罗斯商业银行》，1991 年 12 月 19 日，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2324. оп. 32. д. 4006. л. 110 ~ 112。

③ A. C. 切尔尼亚耶夫：《1991 年：苏联总统助理的日记》，莫斯科版，第 260 页。

现实的描述："财政稳定确有必要，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社会牺牲和扭曲的代价，其中包括国家债券被拒付的代价，但在1990年代末已基本达到目的，不过并非在自由化和私有化之后，而是在其开始之前；而且并非依靠对政府和合法的财政机构首先是银行系统总体上已失去信任的居民，而是依靠苏联末期积存于国家及其各类机关手中的资金。"①

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管理局副局长1991年11月致函苏联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称："正如业经向共和国间经济委员会报告的那样，可以变现的外汇资金已彻底告罄，来自出口的现有外汇进款无法抵补需要清偿的国家外债。"②

苏联国家对货物流通的监督早在1990~1991年初即已鲜有效果。对中断完成国家订货的人的制裁越来越不起作用。八月事变之后，全苏和共和国的各个部硬性向企业规定产量和产品分配结构的能力已接近于零。在对权力的恐惧消失之后，货流的行政调节系统即不复发生作用。政变令人不安的最初后果之一便是，事变后一周内俄罗斯联邦的粮食国家收购量急剧下降。

货流的行政管理体系崩溃导致来自出口的进款进一步减少。苏联经济和预测部副部长B. 杜拉索夫1991年11月28日致苏联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副主任Ю. 卢日科夫的函件中说："今年的9个月合计，供货量达不到规定出口指标者有金属产品、木材、石油产品、水泥、化肥、石炭和其他商品，按外贸价格计算，总金额将近40亿卢布，这造成了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确保债务偿付方面的危急状况。"③

1991年11月15日，圣彼得堡市长A. 索布恰克致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主席И. 西拉耶夫的函件中这样描述该市的食品供应状况："由

① Г. 亚夫林斯基：《外国资本主义——20~21世纪在国外论述俄罗斯经济制度的讲演》，经济政治研究所积分信息出版社莫斯科版，2003，第24、25页。

② А. П. 诺斯科（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管理局副局长）致苏联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函《关于可变现外汇资金的枯竭》，1991年11月26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1504. Л. 11、12。

③ В. А. 杜拉索夫（苏联经济和预测部副部长）致苏联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副主席Ю. М. 卢日科夫函《关于以易货方式进口食品和药品（苏联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授权，1991年10月10日No. ПК16470号文）》，1991年10月，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1437. Л. 114。

于来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各主权共和国的肉奶商品供货量大大减少，圣彼得堡市在凭票向市民供应食品方面形成了危急的局面，最令人不安的是内部机关和儿童单位公共饮食网点的食品供应。冷冻联合工厂中肉奶制品的存量仅够满足全市3～4天的需求。12月份和1992年初食品的供货前景无望保证我市的稳定供应。此种状况可能导致圣彼得堡市内出现危险的社会政治局面。”①

粮食形势变得愈来愈紧张。苏联食品资源采购委员会副主任 B. 阿库利宁1991年9月6日致函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主席 И. 西拉耶夫及其副手 Ю. 卢日科夫（1991年9月6日）称：“为了促进将粮食和油料籽储备起来作为1991年所需的国家资源，已延长向生产单位以可自由兑换货币进行收购的时间。但用于上述收购的资金却未能预作考虑。”② 他还致函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1991年9月27日）说：“尊敬的伊万·斯捷潘诺维奇！③ 苏联国家食品资源采购委员会先前曾向您报告过面粉厂食用小麦资源所形成的紧急情况……目前由于进口粮食来源不足，粮食产品的供应状况可能急剧恶化……因此请求您责成苏联经济部、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和苏联对外经济银行：采取措施在已生效的贷款项目下于今年9～10月份向国家提供不少于120万吨小麦；立即寻求外汇来源，在国外补充采购并于1991年11月1日之前向国家供给至少100万吨食用小麦。”④

苏联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于1991年8月31日通过《关于居民食品供应的紧急措施》的决议。这一决议令那些了解20世纪我国经济史的人清楚地回想起1915～1921年的现实。下面是这一文件的若干摘要：“许多地方在生产部门粮食资源充足、粮食收购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却坚持不肯向国家出售，这是不能容许的……要临时建立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苏联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关于向全苏联的消费者提供粮食和

---

① 俄罗斯国立经济档案馆 ф. 692. ОП. 1. Д. 5. Л. 32。

② B. И. 阿库利宁（苏联食品资源采购委员会副主任）致 И. С. 西拉耶夫同志函《关于以可自由兑换货币收购粮食》，1991年8月28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1438. Л. 54。

③ 指西拉耶夫。——译者注

④ B. И. 阿库利宁（苏联食品资源采购委员会副主任）致 И. С. 西拉耶夫函《关于运送至国内的小麦和豆粕的数量》，1991年9月27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1439. Л. 75。

食品、按共和国间供给和关于向最北方地区运送食品的指示必须加以执行。这一过程中发生相互结算的问题，在草拟和签订经济合同及确定1992年食品平衡计划时即应进行研究。”

读罢这段文字便会明白：那些签署这一文件的人并不相信他们能够像1918～1921年实行余粮收集制时期将数十万人逮捕和枪毙。而下不了这样做的决心，则诸如此类的决定便不会起作用。因此决议中出现了这样的条款：“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和苏联国家食品资源采购委员会应征得Ю. М. 卢日科夫同志和Г. В. 库利克同志同意后采取紧急措施，根据今年所确定的任务于1991年9～11月向国外购进食品和生产食品的原料。苏联对外经济银行应及时开具信用证并对包括运费在内的上述采购款予以优先支付……应责成Ю. М. 卢日科夫同志、Г. В. 库利克同志和Ю. С. 莫斯科夫斯基同志在有关各部和其他国家管理机关参与下立即与外国银行进行谈判，商谈能否吸引贷款用于采购粮食、豆粕、食糖、植物油和其他食品。”[①]

食品供应方面不断增加的困难酿成了爆炸性的政治局势。内务部副部长В. 图尔宾致函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主席И. 西拉耶夫（1991年11月8日）称：“据苏联内务部得到的消息，居民的面包和其他日用必需食品供应情况在全国许多地区仍然很困难……食品商店外常常排起人数众多的长队，排队的民众尖锐地批评地方和中央领导，其中有些人还号召采取抗议行动。”[②]

1991年秋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参加的国务会议所草拟的报告中说：“居民谷物产品供应方面可能出现危急的形势。谷物歉收，不可能迅速扩大进口采购规模，加之生产部门拒绝按国家订购额交售粮食，凡此种种确有可能将国家和共和国推向饥饿的边沿。在现有的形势下，行政措施未必能取得明显的效果。摆脱困境的唯一现实办法是允许生产部门按市场价格自由出售粮食，并对谷物产品零售价进一步实行自由化。不过渡到自由定价并结合对农业和商业加速实行非国有化，生产便不能获得自身增

① 苏联共和国间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1991年8月31日的第4号决议《关于居民食品供应的紧急措施》。

② В. Б. 图尔宾（内务部副部长）致И. С. 西拉耶夫同志函《关于充分供应居民面包和其他日用必需品》，1991年11月8日，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 ф. 5446. ОП. 163. Д. 562. Л. 141。

长的积极推动力，其结果是形势在1992～1993年可能更加恶化。”① 然而正如全苏社会经济问题舆论调查中心向政府当局提供的消息那样：“……俄罗斯领导人倾向于推行价格自由化，同时却面临极其尖锐的社会局势，这种局势的特征是：相当大一部分居民对价格自由化设想持否定态度；对社会保障和维持生活水平方面的任何措施都不信任；消费市场因贫血而显得苍白；预计会出现饥馑；极为广泛的居民阶层中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②

1991年12月，关键性的问题已经不是筹集用于采购食品的外汇，而是清偿船舶运费的欠债，这些船舶是用来向俄罗斯国内运送食品的。当时苏联对外经济银行接到指示，可将每周外汇进款数额的80%用于向苏联和外国船主支付运费。③ “考虑到确保支付购粮和运粮费用方面的危机情况，特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1991年12月19日的第57号决议《关于充分供应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谷物产品的紧急状况》作出补充：获悉苏联对外经济银行自12月19日起暂停企业和机构货币基金、商业银行账户方面的各类业务，此类业务不包括支付自美国和加拿大运送粮食的费用，也不包括在某些情况下支付食品和药品的费用，而是按照先前所开具的信用证，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担保，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共和国外汇储备项目下开支。”④

西方债权国政府与苏联机关、1991年已宣布自己为独立国家的加盟共和国当局进行谈判的最重要话题之一是，谁将为苏联的债务负责。这意味着债权国已经将苏联从账户上注销，不再将其作为金融协议的主体。对于它们而言，主要的是保证苏联所承担的债务由新的事实上独立的那些国家从法律上加以继承。兹将苏联在中止存在之时的国内外货币债务状况的数据列举如下（见表8－4、表8－5）。

---

① 国务会议工作小组《关于俄罗斯与其他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用于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参加的国务会议》，载于《阿尔汉格尔斯克报》1991年10月24日。材料来自叶·季·盖达尔私人档案资料。

② С. П. 施皮尔科、Л. А. 哈胡林娜、З. В. 库普里亚诺娃、В. В. 博德罗娃、Л. Г. 祖博娃、Н. П. 科瓦列娃、М. Д. 克拉西利尼科娃、Т. В. 阿夫杰延科：《居民对国内社会经济状况的评价（根据1991年社会学调查结果）》，科学报告，第49页。

③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1991年12月19日的第57号决议《关于充分供应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谷物产品的紧急状况》。

④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1991年12月19日的第244P号命令《关于无条件充分供应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谷物产品的补充措施》。

表 8-4 前苏联可自由兑换货币①方面的外债

单位：10 亿美元②

苏联的外债	按照 1992 年 1 月 1 日的情况
总计（1~7）	83.4
其中：	
1. 由苏联政府、苏联国家银行和苏联对外经济银行吸纳或担保的贷款	70.5
其中：	
a. 基本债务	57.1
b. 全部贷款的利息①	13.4
2. 1992 年 12 月 31 日前所开具的进口信用证方面的债务②	2.7
3. 中期银行贷款项目下所开具的信用证	2.3
4. 第三国的已被确认的信用证	1.2
5. 进口方面的逾期未付款③	4.2
6. 以适当方式获得授权的各类企业和机构直接吸纳贷款（估计）	2.4
7. 因先前运送外贸货物而欠下外国运输机构的债务（估计）	0.1
此外：	
租借法案	0.8
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欠债（余额）④	33.7
非现金结算易货贸易方面的欠债（未考虑所开具的进口信用证）⑤	5.9

注：因此，未计入苏联官方可自由兑换货币外债、但被对外经济银行领导人列入国家债务的负债为 404 亿美元，而苏联的总体外债该机构则估计为 1238 亿美元。

原表包括的类别数量更多，但它们对于理解苏联外债所形成的状况并不那么重要。

①加算贷款其余整个有效期的利息（估计）。由于加算因贷款逾期未付而产生的补充利息，利息数额将会增加（经债权人同意将作出更为确切的说明）。

②根据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登记在册的文件。

③应当会同美国权威机构作出更为确切的说明。

④所引数据仅仅根据转账户布现行结算余额和划拨清算（数据是初步的，应当按照与前社会主义国家谈判过程中的数额和重新换算的汇率更加确切化）。大致的汇率为：1 转账卢布合 1.795 美元。

⑤按有利于苏联的非现金结算易货贸易方式进行结算，欠债应为 7 亿美元（阿富汗）。非现金结算的外汇按国际市场汇率折算为美元。

资料来源：Ю. В. 波诺马廖夫致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总理助理 В. Б. 博格丹诺夫函《根据 1992 年 1 月 1 日情况的外债资料》，1992 年 5 月 15 日，引自叶·季·盖达尔的私人档案材料。

---

① 未考虑某些独立国家没有对外经济银行参与而独自承担的债务。

② 按 1991 年 12 月 26 日卢布的交叉汇率换算为美元。

表 8-5 对外经济银行所欠国内自然人和法人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外汇债务（1992 年 1 月 1 日）

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	法人账户		自然人账户
	总计	其中对外经济银行各商业银行和机构的代理银行账户	
俄罗斯	8856.3	2036.6	433.8
乌克兰	462.1	421.1	45.8
白俄罗斯	220.1	194.6	10.6
乌兹别克斯坦	53.6	46.1	2.5
哈萨克斯坦	68.2	31.5	0.9
格鲁吉亚*	36.1	11.8	0.9
阿塞拜疆	49.0	30.4	0.5
立陶宛	68.9	61.8	9.6
摩尔多瓦	16.0	15.3	—
拉脱维亚	39.0	15.0	0.9
吉尔吉斯	3.2	—	—
塔吉克斯坦	3.8	1.0	—
亚美尼亚	33.3	31.6	3.2
土库曼	150.8	146.0	—
爱沙尼亚	19.6	—	—
合计	10079.7	3042.8	508.7

* 1991 年 12 月 1 日的数据。

数据来源：Ю. В. 波诺马廖夫致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总理助理 В. Б. 博格丹诺夫函《根据 1992 年 1 月 1 日情况的外债资料》，1992 年 5 月 15 日，引自叶·季·盖达尔的私人档案材料。

四 文明离婚

苏联的崩溃并非意味着前共和国之间已经确立了一种井然有序的关系体系。宣布自己已经独立的那些国家之间的边界并不确切，历来存在着争议，这就具有冲突和流血的潜在威胁。边界问题上的不确定性是极权主义帝国崩溃后形成稳定的民主制的最大障碍。[①]

① D. A. 拉斯托：《过渡到民主政治：面向强有力的榜样》，载于《比较政治学》第 2、3 卷，1970 年 4 月，第 350、351 页；J. 林兹、A. 斯蒂潘：《民主的过渡和巩固问题——南欧、南美和前共产主义欧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巴尔的摩版，1996，第 17 页。

各个新国家在与联邦之下的一级政权机关的关系中遇到种种棘手问题。这类问题在涉及民族自治体的时候尤其尖锐。谁也不知道它们的地域内会施行一些什么样的规范性法令。政府当局无力保证哪怕最低限度水平的社会秩序。1991年秋谈论的问题已经不是保存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可能性，而是如何摆脱政治和经济混乱，同时避免大规模的内战。① 如果考虑到当时分散在四个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苏联核潜力的规模，则文明的命运已面临威胁。

20世纪在苏联之前覆灭了三个领土毗连的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南斯拉夫几乎与苏联同时瓦解。四分之三的情况下帝国的崩溃都为旷日持久的流血战争铺设了道路。有一种情况下（奥匈帝国）则是一连串由于确立新的边界而引起的武装冲突，但被协约国所制止。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以及南斯拉夫溃灭之后，内战接踵而至。历史的经验并不会令人对苏联解体可以少流一些血抱有希望。

如果说1989年时消息灵通的分析家们曾被问及，两个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哪一个的瓦解在更大程度上孕育着内战风险：是南斯拉夫吗，它比其他任何一个东欧国家都更为接近于加入欧盟，就社会主义尺度而言具有相对自由的政治制度，已建立起开放的市场经济；抑或是苏联？压倒多数的回答都说这会是苏联。历史却做出了另一种安排。

长期生活在稳定的民主社会中的“左派”知识分子，很难理解发生在极权主义制度危机和崩溃背景下的进程的情节变化。对其独特的世界图景，Э. 托德的因具有反美倾向而风行一时的《帝国之后》一书有所描述。他以三页的篇幅提及俄罗斯1990～1997年异常激烈而又毫无条理的经济自由化，还谈到，苏联当局和其后的俄罗斯当局消除了人类历史上一度存在过的最严厉的极权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并未诉诸暴力，不仅同意东欧邻国独立自主，还向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高加索各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各共和国提供自由；也同意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在各

① 在1991年10月撰写的名为《俄罗斯在过渡时期中的战略》的论述当前国内形势的报告中，认为俄罗斯政府效仿的榜样应是1940～1960年代初的英国政治，它能够相对不流血地拆散帝国，适应新的世界现实。《俄罗斯在过渡时期中的战略》，1991年10月，引自叶·季·盖达尔的私人档案材料。

个新国家中的存在不会对它们的独立构成障碍。[1] 帝国的和平解散和经济的自由化是相互联系的，作者对于这一点很难理解。对于这一时期参与制定关键性的政治和经济决定的人而言，彼此之间没有领土要求，不打算采取暴力作为在农村掠夺粮食的手段，以此为前提的是刻不容缓地经济自由化和建立市场机制的必要性——要认清这些有着相互联系的事情则比较容易。

为什么内战在南斯拉夫而不是在前苏联区域内爆发？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谁都不知道。对采取关键性决定进程的参与者而言也是如此。只能提出各式各样的假设。我也想谈谈自己的假设。产生影响的是种种客观因素以及叶利钦和米洛舍维奇个人政治背景不同而在优先选择上的差异。对于塞尔维亚共产党人领袖米洛舍维奇而言，在原有的意识形态瓦解的条件下，指靠激进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是保住政权的先决条件。从社会舆论的观点看来，叶利钦是先前的“降落天使”、是为民众受苦受难之人，他指靠的是与丧失了声誉和支持的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相对抗。

我认为，前苏联存在着核武器库这一事实也发挥了作用。在乌克兰，1991 年末之时集中了战略三位一体[2]设施地面部分将近五分之一的弹头。那里的战略核武器装置总数大大超过英国和法国合计的数量。

有关前苏联领域内核弹药分布的数据并不绝对可靠。这又一次证明 1991 年末国家所处的局势是何等危险。从事苏联核遗产历史研究的消息灵通人士常常引用下列确乎不够完备但却颇为一致的数据（见表 8－6、表 8－7）。

最为严重的并不是与战略核武器有关的问题。这种武器受到来自莫斯科的有效控制。据接受俄罗斯政府咨询的苏联军事专家估计，新独立国家要想掌握运用这种武器的能力需要许多年时间。战术核弹药的情况比较麻烦。其中的一些就技术方面而言，军区司令员即可决定加以使用。[3] 说得更确切点便是，他们有能力自行决定使用核炮弹和核地雷。战术导弹的

---

① Э. 托德：《帝国之后·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末日的开端》，国际关系出版社莫斯科版，2004，第 173～177 页。

② 指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空军和能发射海基弹道导弹的核潜艇。——译者注

③ 关于根据军区部队司令员的决定运用战术和战役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见 K. 索罗金：《苏联的战略性遗产》，载于《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92 年第 2 期，第 51～65 页。

表 8-6 苏联战略核武器装置在各共和国的分布

国家	CHB 种类	数量（件）	
		运载工具	爆炸装置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МБР	1064	4278
	ПЛАРБ/БРПЛ	62/940	2804
	ТБ	101	367
乌克兰	МБР	176	1240
	ТБ	21	168
哈萨克斯坦	МБР	104	1040
	ТБ	40	320
白俄罗斯	МБР	54	54

注：CHB——战略进攻性武装；МБР——洲际弹道导弹；ТБ——重型轰炸机；БРПЛ——潜艇弹道导弹；ПЛАРБ——携带弹道导弹的原子潜艇。

资料来源：A. 皮卡耶夫、A. 萨韦利耶夫《苏联的核威力：地上、海上和空中》，载于《独立报》1991 年 11 月 2 日第 137 期。

表 8-7 独联体领土上的战略核武器分布，1992 年

国家	陆基 МБР		БРПЛ		СТБ		合计	
	运载工具（件/份额%）	弹药（件/份额%）	运载工具（件/份额%）	弹药（件/份额%）	运载工具（件/份额%）	弹药（件/份额%）	运载工具（件/份额%）	弹药（件/份额%）
俄罗斯	1037/73	3919/62	914/100	3626/100	27/26	234/24	1978/81	7719/71
乌克兰	176/13	1240/19	—	—	44/36	420/43	220/9	1660/16
哈萨克斯坦	104/8	1040/17	—	—	40/38	320/33	144/6	1360/12
白俄罗斯	81/6	81/2	—	—	—	—	81/4	81/1
总计	1398/100	6280/100	914/100	3626/100	111/100	974/100	2423/100	10820/100

注：СТБ——战略轰炸系统。

资料来源：编制所据资料：M. A. 别尔沃夫：《战略目的导弹部队的导弹武装》，维奥兰塔出版社莫斯科版，1999，第 213 页；《俄罗斯的战略核武器》，原子能出版社莫斯科版，1998，第 12 页。

运用，技术方面由莫斯科控制。[①] 但在领土毗连帝国崩溃的条件下，这也

---

① 关于战术核武器某些组成部分尤其是其中较为陈旧的型号缺少莫斯科的有效监督，也见《2002 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鉴》，科学出版社莫斯科版，2002，第 572 页。

是对文明的一种威胁。后苏联核国家之间武装冲突的风险意味着什么，采取决定过程的参与者都心知肚明。

后苏联区域内的事态可能按南斯拉夫模式发展的威胁是现实存在的。1991 年 8 月 26 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新闻秘书 Л. 沃夏诺夫曾警告说，有可能重新考虑俄罗斯与不肯签署联盟条约的那些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除外）的边界。声明中对北哈萨克斯坦、克里米亚和左岸乌克兰的一部分提出了领土要求。沃夏诺夫的话引发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领导人极不正常的反应：他们将之视作讹诈。莫斯科市长 Г. 波波夫 1991 年 8 月 27 日和 28 日向乌克兰提出了范围更为广阔的领土要求，不仅包括克里米亚和左岸部分地区，而且扩展到敖德萨州和第聂伯河沿岸。[①]

俄罗斯领导人 1991 年秋天并未讨论过在发生领土争端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对付其他共和国的计划。不过重要的不单是现存的事实，而且还有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看待的问题。1991 年 10 月 24 日《独立报》的一篇文章中说："……甚至像《莫斯科新闻》这样具有民主精神的报纸（我从前这样认为）……也在头条位置上发表来自俄罗斯领导人非正式谈话的消息：可能对乌克兰实施预防性核打击。我和伊万·普柳晓夫在莫斯科之时，我曾就此事询问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回答说：'知道吗，科斯佳，你少看点报纸，也就会少操些心了。'叶利钦却说，他同军人们讨论过这种可能性，但没有这样做的技术能力。无论哪一种回答，都既不能使我也不能使乌克兰的民众感到满意。"[②]

美国当局 1991 年对于在数十年间与之对抗的帝国中所发生之事的想象是模糊的，但在有一个方面却颇富洞察力。它清醒地估计到在这个处于濒死状态的超级大国领土上由于失控而使用战术核武器所引发的威胁。1991 年秋布什所提出的建议中，这个问题占据了关键性的地位。美国行政当局提出一项销毁地面和海上各类战术核武器的计划。这一计划如果实现，将会大大减小各共和国可能觊觎的苏联核遗产的规模。正如历史上常有的情

① M. 索科洛夫：《联盟的命运：'N + O' 抑或 '9 - 9'》，载于《商人报》1991 年 9 月 2 日第 35 期。

② B. 波尔特尼科夫：《叶利钦与军人讨论对乌克兰实施核打击的可能性……》，载于《独立报》，1991 年 10 月 24 日。

形那样，即便具有说服力的颇富创新精神的建议，也常常落后于事态的实际发展。苏联已经不具备实施类似方案的可能性了。

在1991年末苏联和俄罗斯政府的内部函件往来中，从其他共和国撤出核武器首先是战术核武器的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牵涉从其他共和国运出仓储的战术核武器现有能力问题，曾作为关键性的问题加以研究。这些武器从波罗的海沿岸和外高加索撤出后又被转运。在中央政府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撤走这些武器可能遭到居民中有组织的群体的反抗，对与此有关的风险也进行了讨论。正因为如此才作出规定，撤出核弹药之事以履行业已签署的裁军协议为借口进行。[①]

冷战时期能限制一些行为发生的核武器，在苏联解体期间也成了一种制约因素。前苏联区域内获得独立的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成熟到足以理解：当话题涉及边界的时候，无论这些边界是多么相对的不公平，都无异于谈论战争。12月8日在白俄罗斯所达成、12月21日在阿拉木图批准的各项协议，为战略力量协议的签署（1991年12月30日）铺平了道路。其中确定了参与国促使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清除核武器的义务，规定1992年7月1日之前这些共和国应确保撤出战术核武器，转运至中央的厂前基地，以便在共同监督下拆毁，商定各方不得妨碍核武器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等共和国领土上转移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②]

乌克兰武装力量所装备的战术核武器于1992年5月6日前已转运至俄罗斯。至于战略性武器，乌克兰则打算在获得补偿和美国、俄罗斯方面的安全保证之后再转交俄罗斯。相应的协议于1994年1月14日在莫斯科签署。2月3日乌克兰议会加以批准。将核武器自乌克兰转运至俄罗斯和摧

---

① 《关于俄罗斯在军事建设、裁军和宇航方面的近期行动的报告：从昔日的加盟共和国撤出核武器》，叶·季·盖达尔的私人档案材料，1991。

② 关于在核武器方面采取共同措施的协议，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1991年12月12日第2014-1号决议《关于批准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有关1992年7月1日之前将战术核武器运送至中央的厂前基地以便在共同监督下予以折毁的情况，见В.Ф.达维多夫《苏联的解体与核武器的不扩散》，载于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1992年第3（267）期第25、29页；С.М.罗戈夫《核对抗的转折点》，载于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1992年第1（265）期。关于在苏联崩溃的情况下西方分析家对俄罗斯战术核武器命运的关切有时会转变为直接的惊慌，见Г.米尔霍林、Д.怀特《苏联核威力的瓦解——是幸运抑或威胁?》，载于《国际生活》1992年第1期，第43~55页。

毁发射井的工作亦已于1996年6月1日之前完成。

哈萨克斯坦议会于1992年7月12日通过关于批准撤走战略进攻性武器第一阶段条约的决议，1993年12月13日哈萨克斯坦作为非核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此期间已将核弹头运往俄罗斯并炸毁了哈萨克斯坦领土上的发射井。[①]

在白俄罗斯，撤走核武器的工作于1992年开始，年底前绝大部分核武器已转移至俄罗斯。1993年2月4日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批准撤走战略进攻性武器第一阶段的条约。将该弹头从白俄罗斯撤至俄罗斯的工作于1996年11月23日正式结束。1996年秋通过举行全民公决的决议，改变了白俄罗斯的政治局势，事实上承认了亚·卢卡申科的专权合法化，如果将这一切与俄罗斯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和从白俄罗斯撤出核力量的完成日期加以对比，后苏联区域历史上的许多事情会变得更加清晰。[②]

※　※　※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退位之后，苏联昔日各共和国的独立不仅成为政治上的事实，而且也是法律上的事实。[③] 这为克服日益严重的混乱提供了机会，但也仅此而已。苏联在1991年秋初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武装力量的失控[④]，行政当局无力保证社会秩序，外汇储备缺乏，边境所

① A. B. 托尔库诺夫编《国际关系的本质和规律性——现代国际关系》，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莫斯科版，2000。

② 1996年8月8日卢卡申科向议会建议举行关于修改宪法的全民公决。宪法法院认为，就如此重要的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绝不可能具有强制的性质——只能属于协商性质。白俄罗斯政府佯装不知道国家最高法院的决定。11月15日国家元首解除中央选举委员会领导人维克多·贡恰尔的职务。俄罗斯政府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国家杜马主席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和联邦会议主席叶戈尔·斯特罗耶夫均因公飞往远离白俄罗斯的另一个方向时突然改变航行，于1996年11月21～22日夜间在白俄罗斯首都着陆。俄罗斯当局向白俄罗斯精英和社会公众发出明显的信号：不支持卢卡申科政权的反对派。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没有参加1996年11月27日（全民公决之后）为从白俄罗斯领土撤出最后一枚俄罗斯战略导弹而举行的庆祝大会。Л. 舍列梅特、C. 卡林基娜：《偶然上台的总统》，利姆布斯出版社圣彼得堡版，2004。

③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签署放弃自己的苏联总统权力的命令。莫斯科时间19时38分，从克里姆林宫顶降下苏联的红旗，升起俄罗斯的三色旗。

④ 1992年1月对全军军官会议参加者的询问调查表明，73%的军官认为，在有关武装力量未来的问题上，具有决定性发言权的显然应当属于军人。有关苏联武器力量失控的状况和1991年8月之后苏联领导人已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见 Б. И. 科瓦利：《今日俄罗斯·文件中的政治肖像》，第2辑，1991～1992，《国家体制的形成·军队和政治·新的政党·教会和社会》，国际关系出版社莫斯科版，1993，第81页。

需的装备不足和存在争议，在市场关系缺位的情况下行政、业务管理关系体系瘫痪——所有这一切，它的解体都不能加以解决。如今这些问题有待于各个新国家的政府去处理。它们如何选择建立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战略，解决食品供应、财政稳定问题，为不致出现饥荒而斗争，制订共和国的市场改革计划等等，我已经多次作出描述①，这里就不拟重复了。

作为一个对所发生之事的了解不单来自书本和档案文件的人，我能够说的是，从苏联存世最后数年吸取的经验归结为：在采取政治决定时重要的是要明白，看似牢固却缺乏弹性的经济政治结构没有变化的能力，不能适应现代世界的挑战，往往是脆弱的，会在很难预测的情况下发生崩溃。

英国一首小曲中有这样几句著名的话（萨·马尔夏克译）：“钉子没了，马掌就脱落；马掌脱落，战马就跛脚；战马跛脚了，指挥官就被打死了；骑兵被打败了，陆军就逃跑了！敌人攻进城里，对俘虏不肯怜惜。这全都是因为，铁匠铺里没了钉子。”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引起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垮台的导火索，正是 1980 年代中期国际石油价格的下跌，而此事的意义再大，似乎也与所发生事件的规模无法相提并论。石油市场的事态发展，对于苏联经济而言的确并不是原因，而是它崩溃的导火索。

斯大林选择与布哈林迥然不同的工业化模式，奠定了经济政治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基础上开始形成巨大的裂缝，在相对微不足道的外力作用下便构成了它坍塌的风险。苏联在其存世的最后数年间的事态发展显示，制定经济政策时考虑到长期风险，不仅从一年或三年的观点、而且前瞻数十年对所采取的决定进行估计，这一点该有多么重要。如果不这样做，今后几代俄罗斯人仍将不得不对今天所犯的错误承担责任。

---

① 本书作者及其志同道合者——过渡时期经济研究所的主要专家们对俄罗斯后社会主义过渡关键问题的态度，在下列著作中有着详尽的阐述：叶·季·盖达尔《失败和胜利的日子》卷 1，亚欧出版社莫斯科版，1997；《过渡时期的经济：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经济政策随笔，1991 ~ 1997》，过渡时期经济研究所莫斯科版，1998；《过渡时期的经济：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经济政策随笔，1998 ~ 2002》，事业出版社莫斯科版，2003。

后　记

如上所述，1980 年代中期苏联遭遇了严重的收支平衡和财政体系危机，进而转变为全面经济危机，导致生产和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政治失去稳定，最终则是现存政治制度和苏维埃帝国理所当然的崩溃。

俄罗斯这个作为苏联继承者的国家，1990 年代末建立了崭新的开放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整套尚显稚嫩、不够完备但却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私有制、可自由兑换货币、银行体系、有价证券和自然垄断的市场调节体制，还有管理精英的市场经济知识和技能的积累规模，善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作、富有效率的经理人员的临界质量。所有这一切都足以使之走出转变过程中的退化，启动经济增长，保障稳步提高生活水平，在经济中取得积极的结构性的进展，稳定国家财政状况和对外经济状况。

1992 ~ 1998 年出现的结构性进展所大致遵循的那些方针，如果苏联领导人从遭遇危机一开始的 1986 ~ 1987 年便采取稳定货币财政的措施，也都应该能够实行。基本建设投资、军费开支、粮食进口大大减少了，向国外提供的原料和燃料能源增加了，其内部需求降低了。向西方国家购进的材料和配制品的减少以及在苏联和经互会框架内数十年间所形成的经济联系体系的瓦解——所有这一切都导致生产量的下降；不得不适应新的货币金融形势，适应大大下降了的居民生活水平。然而 1991 年末枯竭了的外汇储备已经开始恢复，可自由兑换货币收支平衡赤字业已消失。1991 年末 ~ 2000 年初国家已逐步恢复了可靠借债人的声誉。

假若苏联领导人早先开始实行这类措施，则生产量和生活水平的稳定大约在更短的期间内便可以达到。然而苏联当局无法做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将集中计划和管理经济的社会主义体制改变为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体制。因此改革能付出的代价本可以是为时不久、转瞬即逝，可生

活的安排却是这样：俄罗斯和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同时进行货币金融稳定和结构改革，在经历了一条极为艰辛的道路之后，才终于得以建立市场经济的框架。

这些年来业已构建起年轻的尚不完善的民主制度。其中也存在着民粹主义、缺乏政治责任心和贪污受贿等成分。尽管如此，国家已经有了制约和平衡的制度。这就可以使人指望，克服社会主义实验最严重的后果之后，国家便会具备在市场和民主基础上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自然，民族间的冲突，首先是在高加索，依然是对国家安全和政治制度稳定的重大挑战。但业已形成的联邦关系使人有理由认为，国家结构的应变能力足以保障这个巨大的多民族的国家中生活秩序和政治进程的稳定。

经济和政治制度结构中已经建起了机动的元素，它们是制度稳定性的保证。换言之，就是可望在一旦遭遇突如其来的挑战时，这种制度便能以相应的变化而不是灾难性的毁灭加以应付。

2000～2003 年进行了持续的整体上成效卓著的经济改革，使税收和财政体系的质量得到改善，让联邦关系的财政基础变得透明合理，巩固了土地所有权，通过了符合市场经济实际的劳动法令，实施了一系列重要而有益的扩展经济基础的其他变革。许多人都认为，俄罗斯民主制度和俄罗斯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上所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已经获得解决。应当承认，本书作者也可归入此类人士之列。

不过，正如常有的情形一样，历史再次表明，根据短期趋势的推论匆忙得出结论是危险的。自 2003～2004 年开始，在俄罗斯政治体制、联邦关系和经济的关键性发展方向中又开始显现出一些令人不安的倾向。

2000～2002 年，俄罗斯有一个总体上忠于总统和政府但也相对独立、保留了自己发言权和对决定进程发挥实际影响力的议会。为了在杜马和联邦会议中通过法律，政府必须与议员们对这些法律进行仔细的讨论，寻求妥协和可行的决定。与这样的议会一道工作自然很不简单。这可不是使权力执行机关所通过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的橡皮图章。但正如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它的存在可以提高国家的管理质量。一个负责任和独立的议会，不允许不与社会公众商量、不与劳动纪律方面与政权机关无牵连的专家进行讨论便悄悄制定和通过决议。

当议会成为对权力执行机关的行动和意图只是在形式上加以首肯的工

具之时，它所通过的决议的质量便会降低。即便是高效的官僚机关，如果不遭遇系统性专业的批评，也会犯错误，而且有时是不可宽恕的错误。

2000 年代初俄罗斯有着相对独立的报刊。它们绝非总是遵循崇高道德和社会利益的支配，倒往往成为寡头集团之间新闻战的工具。但是由于集团的数目不止一个，社会公众便有机会从众多的来源获得信息，对国内所发生的事情独立地作出结论。当越来越多的报刊直接或间接处于国家政权机关的严厉监管之下时，又一种社会监督手段被封死了。

数年之前俄罗斯曾有一些诸如俄罗斯实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之类颇具影响力的企业家组织。它们的呼声在制定关键性经济决定的过程中能够被听到和考虑。这对国家大有裨益，因为企业界客观上对提高俄罗斯的投资吸引力感兴趣。这会增强公司的资本化，扩展获取信贷资金的能力。俄罗斯大企业为改善立法质量和经济政策做出了不少贡献。自 2003 年开始，俄罗斯实业家和企业家联盟日渐变成了徒供装点门面的机构。

许多在新旧世纪之交处于管理杠杆位置的地区政权机关领导人，说得客气一点，并不那么在行，也并非无可指责的正派（自然，这并不是针对所有的人）。与此同时，各地区的居民根据自己的经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开始领悟到，当他们选举州长的时候，一定要分清谁是常常跑莫斯科、能够将地方问题喊得比所有人都更加响亮的人，判断出自己的日常生活、儿童的教育质量、父母的医疗、城市的供暖、垃圾的清理等等都取决于谁。这种领悟只能来自经验。在发达的民主制度之下，形成这种领悟花费了数十年工夫。而 1990 年代末～2000 年代初事态的发展正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2004 年采取的任命州长的决定，重新将当前地区问题的责任转移给了莫斯科，使得地方政权机关、地方精英们可以诿过于中央，辩解说他们对于解决地方问题什么事也做不成。

诸如取消单席位选区之类的决定，其中每一个都并非不可避免，只不过为俄罗斯民主制度发挥作用造成了风险，因为单席位选举可以为政治上杰出的人物创造一种机会，使他们成为议会中的代表，在讨论国家问题时即便不能发挥影响，也可发出呼声，跨越那道对能够反映千百万俄罗斯公民观点的许多政治力量起着限制作用的百分之七的栏杆①（取消这种选举对于发达的

① 按规定，只有获得百分之七以上选民支持的政党方可以参与议会角逐。——译者注

稳定的民主制度实为一种非同寻常的举措）。这些决定同时还意味着正通向建立一种可以称之为封闭的（可控的）民主制或温和专制主义制度的道路。自然，这种权力的组织体系与苏联严酷的极权主义制度鲜有共同之点，但尽管如此，专制主义特有的不稳定的弱点和要素在其中已经开始显现出来。

这样的政治结构在尚未遭遇危机首先是经济危机之前暂时是稳定的，而当危机出现时所要求的不单是沉默的温驯，而是需要社会公众的支持。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清楚地显示出，这种结构要获得社会的支持颇为困难。这在政府当局和国家都最需要灵活的时候，却大大限制了灵活的能力。1980 年代后期的苏联领导人根据自身的经验已确信了这一点。遗憾的是，并不仅仅是他们为如此惨痛的教训付出了代价。

民主制和真正联邦制成分的缩减，影响了民族间关系的进展。要将 1990 年代末～2000 年代初俄罗斯的许多民族共和国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民主制度，这种话总觉得难以启齿。尽管如此，这终归是地方精英组成的政权，足以控制共和国内的族际关系，对当地社会具有影响力。试图以莫斯科任命的傀儡取代他们，有时候会导致形式主义的共和国国家机关毫无权力。实际上采取决定的过程绕过了他们，真正有权的是那些有影响力的地方精英的代表人物，他们轻易地便能将所发生的问题的责任推诿给支持傀儡政府的莫斯科。由联邦中央任命自治共和国总统实际上是将强有力的王牌交到了民族主义者手中，使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证明莫斯科并未将自治区域的居民视作享有全权的公民，而是俯首帖耳的臣民。再也想不出能提供给分离主义者更好的礼物了。

在经济政策方面，俄罗斯政权机关已从苏联经济的遭遇吸取了教训。这在负责任的预算和货币政策上便清晰可见，这种政策是在 2000～2004 年石油价格高企和与此相联系的高而欠稳定的预算收入的背景上实行的。预算政策是保守的，保证了可以减少苏联遗留下外债的相当大的预算超支，压缩了债务费用的开支。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议会设立了按照明确规则建立的稳定基金，表现出政治责任感，显示了对我国历史而言非同寻常的从前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能力。

2000～2004 年，俄罗斯预算无需大笔的花费和严重的不平衡便做到了在石油的中长期价位下发挥功能，甚至在出现类似 1986～1990 年、1998～1999 年那样空前低价位情况下也能保持稳定性，长久坚持这样的负责任的

财政方针是困难的。丰富的国际经验便能证明这一点。

在石油价格空前之高的背景下，目前俄罗斯当局通过购买一些国家的有价证券来积存稳定基金，这些国家的货币均可作为准备金，关于这种政策太不明智的议论乃是经济政治活动中必然的现象。只有懒惰的俄罗斯政治家才不会参与一场竞赛，这场竞赛的实质是：在如何使用稳定基金上，看谁能推出最闻名、最独特的创意来。然而，俄罗斯的稳定基金至 2006 年 1 月 1 日时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5.7%，而挪威的国家石油基金 2005 年 10 月 1 日之时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70.1%，它也像俄罗斯一样，不得不解决“石油冤家”的问题。如若将这两种基金的数额进行比较，显而易见，关于我国的稳定基金的金额反常的认识多少有些夸大其词。同样广为人知的一个话题是国家的黄金外汇储备过多（2006 年 1 月之时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24.2%）。关于只有祖国的敌人才会以这样的规模积存外国资产的议论，在当代经济政治市场上是一种畅销货。然而在最近 15 年来其经济政策常常被作为俄罗斯政权效法榜样的中国，2006 年的外汇储备却是国内生产总值的 36.3%。[①]

2005 年以来即已很清楚，政府继续执行足以在石油价格下跌时将国家可能遭遇的财政和货币危机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的政策的能力越来越有限。正如在第三章所指出的，向社会公众说明国家不可能拨款用于某种现实需求，因为没有钱，这是可以的。而在有钱的时候却宣称这办不到，解释说国家的经济可能过分取决于某种不可预测的因素，这可能转化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需要为之付出比短期利益高得多的代价——这是比较困难的。

政府所采取的依靠额外石油收入提供经费、增加预算义务的步骤，暂时相对地受到限制。按照 2006 年计算，预算义务的增加与 2004 年相比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3.5%。但即便是这些义务，在稳定基金数额有限的情况下也会降低国家财政制度的稳定性。俄罗斯的经济与以前的苏联一样，正在变得依赖于石油价格保持史无前例的水平。

过渡时期经济研究所所作的初步计算表明，在 2009 年前石油（“布伦特”级）价格不跌至 25 美元的情况下，联邦预算收入与 2005 年相比会减少约 9%。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会被下降所取代。联邦预算赤字为国内生

---

① http://www.odin.dep.no/fin/english/pension_ find/p10001683/bn.html，《国际金融统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产总值的7%。稳定基金资金余额将等于零。黄金外汇储备的规模与2005年相比将减少近800亿美元。通货膨胀的速度则高达40%。[①]

自然，这里所说的并不是预测，而是初步的计算。过渡时期经济研究所既分析研究与石油的超高价格有关的方案，也分析研究惯性方案。这些方案得出了另外的结果。但如上所述，在依赖天然资源市场行情的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时重要的是需清醒地估计石油市场难以预料的事态发展的风险。

切合实际的预测表明，在稳定基金业已积累资金的条件下，甚至在不利的事态发展情况下，俄罗斯在2006～2008年都不会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威胁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减缓有关。不过在讨论长期风险时重要的不仅仅要考虑到两三年的经济政治前景。今天采取经济决定、制定预算义务时，我们就应当确定未来10～15年内俄罗斯政权机关必须在其中工作的那些环境轮廓。1980年代初的石油高价所保障的那笔稳定储备金，使得苏联领导人能够毫无作为也依然可以保持政治上的稳定性。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所积累的种种问题后来才显现出来，但却是以难以想象的规模显现。关于如何调节这些风险的决定不得不由其他人——在毁灭了的帝国废墟上出现的各个国家的政府当局来采取。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使俄罗斯在这方面不致重蹈苏联的覆辙。

根据今天的情况，俄罗斯局势失去稳定的风险大大低于1980年代初苏联所存在的风险。我们将现有的政治制度称之为温和的专制主义。其中尚有不少自由和机动灵活的成分。这使人抱有希望。俄罗斯人在俄罗斯所占的比例比在苏联中要高得多，这使得族际关系的调整在明智的政策下成为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市场经济在俄罗斯所发挥的功能比社会主义经济更为机动灵活。它能更容易地适应世界经济行情的变化。它的逻辑是不会让经济生活变化的责任全都落到现任政府的肩上。但这终究并不意味着由于丧失适应能力以及由于国家对各种变数的依赖增长而引发国家领导人无法控制的风险已经消失。目前乃是这样一种态势，其中小心谨慎、对国家可能遭到威胁的清醒估计已成为负责任的政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① 宏观经济和金融变化动态以及2006～2010年俄罗斯联邦预算指标的预测，建立在过渡时期经济研究所制定的俄罗斯经济结构经济模型的基础之上。据以进行这些计算的模型乃是反映基本宏观经济变化之间联系的结构计量经济学方程式。借助于该系统，在外源性设定的某些变化动态的情况下可以获得其余指标的预测。